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十一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8—194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1)

ISBN 978—7—5098—0128—4

I. 共… I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8—1943 ②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8—1943 IV. K260.6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534 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1)

书 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8—1943)

编 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0mm×203mm 1/32

字 数:560千字

印 张:23.5

印 数:1—1200册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128—4

定 价:258.00元(共四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82517687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霍海丹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3)》。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12年2月
于京北宝盛里

编者说明

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21卷。本卷汇集了除本丛书第18、19卷所收档案外的有关中共对苏德条约和苏德战争的态度与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群众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的建设和延安整风,共产国际的解散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评价等四个专题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散见于有关中文图书报刊之中,包括以前已由外文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①。

本卷所收的文件主要是1938年至1943年之间的文献和档案。为了说明问题,有的文献在时间上向前和向后作了延伸。所选用的文献包括:一、共产国际发表的有关声明和宣言;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电报;三、共产国际领导人发表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日记;四、联共(布)中央作出的有关决议及编写的党史教材;五、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及其领导人的电报和报告;六、中共领导人发表的有关文章;七、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指示精神所制定和发布的指示。

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刘宋斌同志负责选编。

^① 译者稿酬按有关规定支付,请与本卷编者联系。

目 录

一、中共对苏德条约和苏德战争的态度与评价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1939年9月1日) 毛泽东 3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1939年9月28日) 毛泽东 8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1939年12月20日) 毛泽东 15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1941年6月23日) 毛泽东 1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1941年7月7日) 18

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

(1941年7月18日) 23

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

——苏德战争第六周战局及中国国内形势

(1941年8月2日) 25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1941年8月19日) 27

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

——苏德战争形势和反对亲日派反苏反共阴谋

(1941年8月26日) 30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 | |
|-------------------------|-----------|
| (1942年10月12日) | 32 |
|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 |
| (1942年11月6日) | 37 |
| 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 |
| (1943年2月21日) | 毛泽东 38 |
|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 |
| (1943年3月16日) | 毛泽东 40 |
|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 44 |
|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群众工作 | |
| 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节译) | |
| (1938年5月1日) | 57 |
| 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 | |
| (1938年8月16日—23日) | 61 |
| 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为纪念国际青年日 | |
| 向各级青救会发出的号召 | |
| (1938年8月25日) | 64 |
| 中国青年爱国者 | |
| (1938年9月6日) | B. 罗戈夫 65 |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世界青年 | |
| 和平大会运动基本任务的决议(节录) | |
| (1938年10月10日) | 68 |
| 季米特洛夫就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关系致青年共产国际 | |
|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信 | |
| (1938年10月14日) | 71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节译) | |
|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1周年 | |
| (1938年11月7日) | 72 |

| | |
|---------------------------------------|--------|
| 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节译) | |
| (1939年5月1日)····· | 75 |
| 为保卫祖国而斗争的中国妇女 | |
| (1939年3月8日)····· | 冀 玲 78 |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青年共产国际成立 二十周年的宣言(节录) | |
| (1939年11月)····· | 82 |
| 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 | |
| (1940年5月1日)····· | 85 |
| 中国的青年爱国者 | |
| (1940年9月1日)····· | 李锡声 87 |
| 美国青年代表大会致全世界青年书(节录) | |
| (1941年7月6日—9日)····· | 90 |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青年 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决议(节录) | |
| (1940年11月1日)····· | 92 |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书记处关于解散 青年共产国际的决定 | |
| (1943年6月1日)····· | 94 |
| 中国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拥护 世界和平大会通电 | |
| (1938年2月20日)····· | 96 |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队部致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贺简 | |
| (1938年8月13日)····· | 97 |
|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致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电 | |
| (1938年8月15日)····· | 99 |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致世界青年大会贺电 | |
| (1938年8月16日)····· | 101 |

| | |
|--|-----|
|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致世界青年大会函 (1938年8月) | 102 |
| 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关于国际青年日宣传大纲 (1938年8月25日) | 105 |
| 延安青年纪念国际青年日大会宣言 (1938年9月1日) | 107 |
| 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任务 ——冯文彬在边区青年代表大会的报告大纲(节录) (1938年10月3日) | 109 |
|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 (1939年2月20日) | 111 |
| 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 (1939年3月3日) | 113 |
|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 (1939年4月12日) | 120 |
| 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 (1939年11月1日) | 123 |
| 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部的指示 (1940年2月1日) | 127 |
| 中央关于“五一”工作的指示 (1940年4月16日) | 129 |
| 中央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 (1940年6月7日) | 131 |
|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关于纪念国际青年节的通知 (1941年8月1日) | 134 |
|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筹备会致世界青年团体书 (1941年11月27日) | 136 |
| 延安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告世界各国青年书 | |

| | |
|--------------------------------|---------|
| (1942年1月6日) | 138 |
|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的建设和延安整风 | |
|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 | |
| (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决议) | 143 |
|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问题的决议(节录) | |
| (1940年3月11日) | 163 |
| 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 |
| (1939年8月25日) | 165 |
| 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 | |
| (1940年1月3日) | 168 |
| 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 | |
| (1940年2月15日) | 170 |
| 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 | |
| (1940年3月20日) | 173 |
| 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 | |
| (1940年10月20日) | 176 |
| 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 | |
| (1940年10月25日) | 179 |
| 中央宣传部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 |
| (1940年10月26日) | 183 |
| 改造我们的学习 | |
| (1941年5月19日)..... 毛泽东 | 185 |
| 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 | |
| (1942年1月26日) | 193 |
| 整顿党的作风 | |
| (1942年2月1日) | 毛泽东 196 |
| 反对党八股 | |

| | |
|---|---------|
| (1942年2月8日) | 211 |
| 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 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 | |
| (1942年2月11日) | 225 |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节录) | |
| (1945年4月24日) | 毛泽东 228 |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节录) | |
| (1945年5月31日) | 毛泽东 242 |

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

联共(布)中央审定

一九三八年

| | |
|--|-----|
| 导 言 | 245 |
| 第一章 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人政党而斗争 | |
| (一八八三至一九〇一年时期) | 247 |
|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成。党内布尔什维克派 组织与孟什维克派组织的出现 | |
|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时期) | 272 |
| 第三章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 俄国革命时期 | |
|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七年时期) | 300 |
| 第四章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独立马克思主义政党 | |
|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时期) | 344 |
|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前工人 运动高涨年代 | |
|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时期) | 396 |

| | |
|----------------------------------|---------|
| 第六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 | |
| 俄国第二次革命 | |
|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时期)····· | 412 |
| 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实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 | |
| (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初的时期)····· | 434 |
|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 | |
|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时期)····· | 479 |
|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 | |
|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时期)····· | 503 |
|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 | |
|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时期)····· | 537 |
| 第十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 | |
|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时期)····· | 559 |
|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而斗争和新宪法之施行 | |
|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时期)····· | 591 |
| 四、共产国际的解散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评价 |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 |
| (1943年5月26日)····· | 631 |
|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 |
| (1943年5月26日)····· | 毛泽东 634 |
| 共产国际结束声明 | |
| (1943年6月9日)····· | 639 |

论共产国际底解散

(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 641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1943年6月27日《解放日报》社论)…………… 646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1943年7月5日)…………… 王稼祥 652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1943年)…………… 663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1960年7月14日、15日)…………… 682

共产国际会议简介…………… 693

共产国际会议一览表…………… 725

丛书后记…………… 728

一、中共对苏德条约和苏德战争的态度与评价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1939年9月1日)

毛泽东

记者问：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其意义如何？

毛答：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英法苏三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

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三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九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届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

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而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问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上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上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

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

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

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国坚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

要丝毫大意。

因此，毫无疑问，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

这就是：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

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1939年9月28日)

毛泽东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有些人说:苏联利于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中,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在过去,苏联不但为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巩固苏联和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关系,不使发生反苏战争;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谓民主国家挑拨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多年以来,苏联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国际联盟,同法国同捷克都订立了互助协定,竭力想同英国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订立保障安全的条约。当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采取名义上“不干涉”实际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时候,苏联就积极地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反抗德意,而反对英美法

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当英法两国牺牲奥国和捷克纵容希特勒侵略的时候，苏联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的黑幕，向英法提议制止侵略的进一步的发展。当今年春夏波兰问题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不管张伯伦、达拉第如何没有诚意，苏联还是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企图订立一个英法苏互助条约，制止大战的爆发。无如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所障碍，世界和平事业就遭受了最后的挫折，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知道的。在这种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放弃《防共协定》，承认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国人不去注意此种阴谋，不去注意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实在是上了这些阴谋家的甜蜜宣传的当。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说所蒙蔽，而不知道他们笑里藏刀的可怕，而不知道在张伯伦、达拉第决心拒绝苏联，决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苏德才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这些人应该觉悟过来了。苏联这样地

维持世界和平到最后的一刻,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爆发了,苏联或者会参加战争的一方,就是说,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都应该揭穿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不利于世界人民的这种性质,都应该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的行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关于这一点,苏联过去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有些人把苏联根据苏德商务协定同德国做生意一件事,看作是苏联参加德国战线的行动,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的缘故。不但不能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通商和援助混为一谈。例如在西班牙战争中,苏联是同德、意两国通商的,但世人不说苏联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西班牙的缘故。又如在中日战争中,苏联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世人也不说苏联援助日本侵略中国,而说它援助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

援助了中国的缘故。现在世界大战的双方都和苏联有通商关系，这种事实，对于双方都说不到援助，更说不到参战。除非战争的性质有了变化，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战争经过一定的必要的变化之后，对于苏联和世界人民有利的时候，那时才有援助或参战的可能；否则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至于依据交战各国对苏联的态度是亲苏或反苏的分别，使苏联对它们的通商不得不多有少，有厚有薄，这是各交战国自己态度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但是即使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采取了反苏态度，只要它们还愿维持外交关系，订立通商条约，而不向苏联宣战，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德国那样，苏联也不会同它们断绝通商关系的。这种通商关系，不是援助，更不是参战，这是应该认识清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国内许多的人，对于苏联进兵波兰的问题，糊涂起来了。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德国方面，英法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波兰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在德国方面，它是为了掠夺波兰人民而进行战争的，是为了击破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而进行战争的。这种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英法方面，是把波兰作为英法财政资本掠夺的对象之一，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拒绝德国帝国主义重分它们的赃物而去利用波兰的，是把波兰当做自己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来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的所谓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波兰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它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它又是一个大波兰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波兰民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即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等一千余万人口的非波兰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波兰反动政府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在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同情应该寄在波兰人民方面。在苏联方面,则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下面的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呢,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呢?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选择了第二条路。在那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居住的一大块土地,还是在一九一八年订立布列斯特条约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从幼年的苏联手里强迫地割去,而后来又 被凡尔赛条约强迫地放到波兰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面。苏联现在不过是把过去失掉的土地收回来,把被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解放出来,并使免受德国的压迫。这几天的电讯,指明这些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把红军看做他们的救星;而在德军占领的西部波兰地方,法军占领的西部德国地方,则丝毫也没有这种消息。这就是表明,苏联的战争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英法的战争,则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压迫他国民族、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除此以外,在苏联面前,还有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张伯伦企图继续他的反对苏联的老政策。张伯伦的政策是:一方面大举封锁德国的西面,压迫德国的西部;一方面企图联合美国,收买意大利,收买日本,收买北欧各国,使它们站在自己方面,以孤立德国;再一方面,则拿波兰,甚至还准备拿匈牙利,拿罗马尼亚,作为礼物,以引诱德国。总之,用威迫利

诱种种办法，推动德国放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之倒转枪口，进攻苏联。这种阴谋，不但过去和现在是存在着，而且将来也还会继续的。苏联大军的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地成功了。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正确的。但当诺蒙坎停战协定订立之后，英、美通讯社纷传日苏互不侵犯协定行将订立的消息，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一种忧虑，有些人认为苏联或者将不援助中国了。这种观察，我以为是错误的。诺蒙坎停战协定的性质，和过去张高峰停战协定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这种停战协定，将使苏联增加对于中国援助的可能，而不是减少其援助。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这一个基本原则而定。具体地说，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据我看，根据斯大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苏联最高议会上的演说，苏联是不会变更这个基本原则的。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那些有反苏成见的人，借着诺蒙坎停战协定的订立和

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掀风鼓浪，挑拨中苏两大民族间的感情。这种情形，在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在中国的投降派中，都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应该彻底地揭穿其黑幕。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该根本拒绝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

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国人议论纷纷的问题。国人注意国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注意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这是很好的现象。我现在提出我对于上述各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否有当，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1939年12月20日)

毛泽东

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嘒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这还不够明白吗?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①

(1941年6月23日)

毛泽东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

(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①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 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1941年7月7日)

全国同胞们，抗战将士们！

我伟大中华民族为抵抗日寇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已经整整四年了。当此抗战第五年到来之时，正值国际形势发生严重的变化，疯狂的德国法西斯罪魁希特勒已经大举进攻苏联，苏联政府正在统率二万万人民与数百万红军举行粉碎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争。

同胞们，将士们！苏联这一反法西斯的战争，完全是和我们的抗日战争属于同一性质的，都是保卫独立、保卫自由、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而在德国法西斯方面，则与日本法西斯进攻中国完全相同，乃是侵略的、奴役的、非正义的。因此，我们与苏联是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

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苏联的同情，迅速散布于全世界。而在我国人民，则关切之情，尤为深至。一则因为苏联是扶助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四年抗战，助我最多最力者唯有苏联；再则因为苏德战争直接影响我国的抗战，希特勒如在苏联得逞，则中国即将遇到严重的危机。故我国人民，咸知苏联人民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是保卫苏联的，而且是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之自由独立的。苏联的成败，即是中国的成败，即是一切民族之民主与自由、独立与解放、公理与正义、科学与光明的成败。而希特勒则不但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一切自由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敌人，因而

打倒希特勒，不但是苏联人民与各国人民的任务，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任务。毫无疑问，法西斯希特勒的疯狂进攻，适足以加速其死亡，法西斯的敌人已遍布于全世界。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正在全世界树立起来。目前是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

欧洲的法西斯国家，为着拉拢日本，巩固法西斯同盟，反对中、苏、英、美之目的，不惜明目张胆，承认中国叛逆汪精卫，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魔爪现已伸向太平洋，其为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与全人类的公敌，实已暴露无余。而法西斯日本西陷中国泥淖，南与英美抗争，经济衰颓，民心怨愤，如又欲撕毁日苏中立协定，树敌于伟大之苏联，则其死亡崩溃之日，必愈益临近。惟其情况愈危迫，则横决以求一逞之心，必愈难阻遏，反苏之危险固已增长，灭华之方针则决不放弃，南进以侵犯英、美、荷、澳之野心，亦依然存在。法西斯同盟对于全世界的威胁，西方与东方同时增长。惟有建立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坚决的斗争，方能制凶焰于已燃，挽狂澜于既倒。一切幸灾乐祸侥幸取巧的心理，均属浅薄无识之表现。至于张伯伦覆辙的重寻，汪精卫后尘的学步，所谓绥靖政策与投降路线者，尤为愚不可及之下策，宜为中国与欧美民主国家所不取。中国人民对于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是永远坚持反对的。

我伟大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不独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亡，亦且有助于国际反抗侵略的奋斗。四年以来，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不顾牺牲，不怕困难，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渡过了许多的难关，卒能使敌寇胆寒，环球心折，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此皆我上下同心，军民协力，党派合作，友邦增援之所致，值得我们欢欣庆祝，大书特书的。

然而敌人之进攻方兴未艾，协以谋我者，且有凶恶的法西斯同盟，南京之傀儡既为虎作伥，内部的亲日分子复诱张为幻，政治犹未澄清，民生愈见凋敝，党派仍有磨擦，民意尚未伸张，各种惊心怵

目之暗影,竟有越来越大愈闹愈凶之势。尤可异者,反共成为政策,“异党”见于文书,军纪军令之美名,却假以打击抗日部队之最积极者,于是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被解散了,特务横行,非法逮捕之事层出不穷了,抗战之元气为之斫丧,抗战初期之新气象因而挫折了。凡此阴暗方面,如不加以消除,则抗战四年的成绩有中堕之忧,全国军民有无所适从之感,而国际同情亦将失所附丽,这是国人应该深切警惕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当此抗战第五年开始,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时,正我除旧布新的良好机会,全国人民必须执行许多重大的战斗的任务,从外交以至内政,皆宜有新的改革与建树,方足以适应目前形势,一新国人耳目,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本党不敏,谨陈如下各端:

(一)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

(二)加强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肃清汪逆余党,巩固抗日阵营。

(三)加紧全部国军的整理训练,加强前线各军的配合作战,救济敌后各抗日部队的军饷弹药,积极反攻敌人。

(四)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设施,由政府予以援助,俾能长期坚持于敌后,使敌人无法抽调兵力西进、北进、南进。

(五)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调整国共关系,解决新四军问题,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活动,停止逮捕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消弭内部磨擦,培养抗战实力。

(六)给一切爱国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发动民智民力,反抗敌寇。

(七)改革政治机构,罢免贪官污吏,引用开明人员,从政府机

关中淘汰暗藏的亲日分子，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八)禁止贪官污吏奸商劣绅囤积居奇，操纵国民经济，实行调剂粮食，平抑物价，以苏民困。

(九)改革兵役动员制度，禁止敲诈、贿买、强迫、虐待，代以鼓励人民上前线的政治动员，以利抗战。

(十)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信用本地人才，团结少数民族，以固后方。

本党认为上述各项，实为今日内政外交之基本方针，如能见之施行，则全国之气象必焕然一新，一切困难皆可克服，抗战建国之胜利便有了坚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声明：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对于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本党实为最忠实最坚决的执行者。本党对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实践到底，决无丝毫违误之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国军的一部分，最忠实最勇敢的执行抗战任务，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人，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敌后的许多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一步一步的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各党派、各阶层合作的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保证一切抗日阶层（包括地主、资本家在内）的人权政权财权，实行了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农村政策，实行了一方面改良工人生活，一方面加强劳动纪律的劳动政策，实行了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的经济政策，实行了消灭文盲愚昧、提高民族精神的文化政策。凡此一切，无一不在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保卫祖国的先锋队，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党，是团结抗战的模范，是艰苦奋斗的典型。而敌人汪逆与亲日派则集矢于本党，务欲破坏之消灭之而后快，盖彼等深知本党之存在，实为其灭华计划之最大障碍，如不灭共，则断断不能灭华。所可怪者，一部分尚在抗战的国内人士，其污蔑陷害与破坏本党之

心,竟与敌人如出一辙,称之为匪军,溢之为奸党,摧残镇压,不遗余力,大敌当前,相煎何急,诚有令人百思不解者。所望此等现象,迅速加以消除,回复抗战初期之状态,化戾气为祥和,易相克为相助,共以国家民族为重,则抗战前途,光明立见,抗战第五年的局面,必可变为团结进步胜利的局面,这就是本党所馨香祷祝的。

同胞们,将士们!抗战的第五年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努力,不犯错误,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法西斯奴役!

援助苏联!

抗战胜利万岁!

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七日
根据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
《解放日报》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八路军新四军应 取长期斗争方针

(1941年7月18日)

少奇同志：

文^①电悉。(一)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②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二)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三)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苏之数百万后备军目前刚刚用上,或在数日内有一决战,制止德军攻势,则大局最有利。如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城不守,则日必攻苏,苏之困难加重,将变为长期战争,但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四)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③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五)你前电所提以《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两书作老干部文化课本,似不适宜,因太深读不懂。还宜重新编课本,中宣部在着手。(七)你的两篇文章望从香港寄来,以资快睹。

① 文,即十二日。

② 七七宣言,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③ 蒋,指蒋介石。

毛泽东

巧

根据手稿刊印

(录自《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

——苏德战争第六周战局及中国国内形势

(1941年8月2日)

一、第六周苏德战争，德军虽继续猛攻，但迄今毫无进展，红军不仅坚持列菲尔、斯摩林斯克、什托米尔等处阵地，还实行了许多局部反共〔攻〕。现在连德军统帅部也被迫承认，战争已陷于胶着状态，我们应指出苏联的重大胜利，时间及国际形势对苏有利，中国亲日派亲德派希望德国胜利仅属徒劳。但欲战胜希特勒，除苏联人民的努力外，尚须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更大配合。

二、日本根据日法“联防协定”占领越南后，英美对日采取了比较强硬步骤，如英美封存日本在英美及其殖民地之资金，英方废止英国及其属地与日本之一切贸易条约，美国增强菲律宾及关岛中途岛等地防务，荷印废除日荷石油协定等，但同时美国还不愿放弃“同时援助中日两国的害己政策”（纽约时报语），仍以石油及其他物资供给日本，其目的仍在求得妥协，希望使日本停止南进，实行北进。我们应欢迎英美对日某些较强硬步骤，但同时应批评美国对日姑息政策的错误及其挑动日本攻苏的阴谋。

（三）七月皓日至梗日，亲日派首领何应钦捏造八路军自由行动的消息，经过中央社发动一次反共宣传，经过我党代表周恩来同志的揭破及新华社的反击已暂时收束。何应钦此次反共宣传目的，准备舆论，便于日本攻苏时，迫我开至黄河以北，此事为英美派郭泰祺、王世杰等所反对，外人亦绝不同情，反对我表示好感，故经我们还击后迅即收束。我应继续揭穿何之阴谋，并多将各地反共

行动反映上来(要有人名、地名、时间),以便打击亲日派。

(四)自皖南事变以来至六月,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战绩:作战三七二次,敌伪伤亡六九二八名,俘敌伪官兵九八四三名,缴获马步枪一一二六枝,轻机枪一三八挺,重机枪三八挺,以及其他军用品甚多。现在敌人正在如皋、盐城等地向新四军残酷进攻,我们应说明新四军不畏陷害,不畏困难,始终坚持抗战的光辉战绩,以事实证明反共派屠杀新四军,取消新四军,以至配合敌寇进攻新四军的罪恶,同时我们应号召一切抗日友军与新四军亲密团结起来,共同粉碎敌人在江北的扫荡。

(五)在“七七”四周年纪念日开幕之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到有一千五百万人民所选出之代表一百三十三人。代表包括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及许多无党无派人士,在会议上杨秀琳〔林〕先生作了工作报告,大会进行了热烈的民主的讨论,大会全体通过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选举边区政府委员,并决定起草边区政府组织章程和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临参会已胜利完成任务。我们应宣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对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战建国胜利的重大政治意义。

中宣部

未冬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1941年8月19日)

关于罗斯福邱吉尔宣言及行将召集的莫斯科会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如下：

八月十四日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及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联合宣言及提议在莫斯科召集三国会议，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罗邱宣言及其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表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是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因为过去与现在的最大危险，是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企图违背人民意志，接受法西斯和平，但此宣言拒绝了这种和平。或者主张隔岸观火，让苏联独负消耗法西斯的重担，以便将来乘机取利，但罗、邱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以便具体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之行动，则打击了这种消极的企图。只要英美承认“解除各侵略国武装是必要的”，主张“纳粹的最后崩溃”，同意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便保证了苏联与英美的胜利，保证了中国与全世界的胜利。斯大林在其七月三日的著名演说中所谓苏联信守条约德国毁约攻苏之事实，造成了一个长期政治因素，这种因素实为军事胜利的基础，这一真理，在此次罗、邱宣言中及召集莫斯科会议的提议中，完全证明了。罗邱宣言及其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反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而莫斯科会议则将在组织上完成之。法西斯侵

略阵线,已经处于孤立状态中,法西斯失败的前途已经确定。目前的这一形势,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欧战爆发之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当时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虽然力主组织保障国际安全的反法西斯阵线,但当时英美方面还存在着害人害己的慕尼黑政策,只在残酷战争的教训之后,这一错误政策才改变过来。从直接的因素说来,这是苏联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红军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使得罗斯福邱吉尔有勇气举行了此次会议,发表了此次宣言。这又是英美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打击了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使得罗斯福邱吉尔敢于拒绝法西斯和平的引诱,发表了此次伸张人类正义的宣言,决定了英美苏三大强国坚固联合这种具有政治远见的政策。这又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国阻止了日本法西斯匪军的进攻,使得英美有勇气声明解除一切侵略国的武装。宣言未提日本之名,宣言的第四条暗示可与日本通商及供给原料,第七条暗示允许日本移民,仍在企图拉拢日本现状维持派,表示其愿与日本妥协的一面,但宣言的第二条反对强制变更领土,第三条主张恢复被剥夺权利的国家,特别是第八条承认解除一切侵略国武装的必要性,这些都是积极反日的。总之,全中国人民都欢迎英美宣言,欢迎行将在莫斯科召集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国人民相信,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坚持团结与抗战,克服抗日阵线内部企图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因素,积极组织对日寇的反攻。中国内部存在着敌人的第五纵队,这就是亲日派及亲德派,他们违背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在国内倡言反共,完全是响应希特勒的“反布尔塞维克十字军”,为日本法西斯肃清道路。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大团结实行建立之时,此辈第五纵队如尚毫无觉悟,继续其反共反人民反民族反人类的罪恶行为,必为全国全世界所不齿。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增强努力,肃清第五纵队,

则团结便能巩固,抗战便能坚持,反攻便能实现,中国是有资格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而成为一个有力的方面军的。全中国与全人类的命运关系于这一向法西斯主义的决斗,中国各党派应该善处此种千载难逢的时机,团结全国人民,一致向好的进步的方向努力,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深切期望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
根据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
《解放日报》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

——苏德战争形势和反对亲日派反苏反共阴谋

(1941年8月26日)

(一)第五周德苏战争,由于苏联顽强抵抗战线无甚变化,德方因损失重大现正从各地调兵补充,德军困难日增,我们应说明战争形势对苏联日益有利,以打击亲日派亲德派宣传苏联失败实行反苏的阴谋。

(二)日近卫新内阁成立后除继续进行灭华政策外,一方面增兵满洲,另一方面派遣大批军舰驶向越南。日寇意图在德国允许之下,趁英美措手不及迅速占领全部越南。其增兵满洲系一种预先措置,其目的一方面是在应付德国的反苏要求;另一方面是在引诱英美反苏分子及中国反苏反共分子,使他们对日本要求表示让步给日本攻苏奉送“路费”。至日本何时向苏联进攻,则尚要看德苏战争形势及英美对其占领越南的行动表明态度而定。我们应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而急起制裁日寇。

(三)当德军进抵斯摩林斯克附近时,我国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加上亲德派发动了反共宣传,捏造十八集团军攻击中央军的谣言,他们估计苏联必败,日必攻苏,那时国民党军队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上,重弹其开至黄河以北之老调,否则即对我加以军事攻击。因此他们于事先进行反共宣传以作舆论准备,此种谣言,已经我党驻渝代表周恩来同志及延安新华社痛加驳斥,但国民党中英美派如王世杰郭泰祺等并不同意何之政策,国民党中宣部曾通令各报不要评论这种反共消息。我们应暴露何应钦等亲日派以及

亲德派的反苏反共，破坏抗日，破坏中苏英美四国合作，帮助德日意的阴谋，同时应该强调团结抗日，争取英美派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来共同反对亲日派、亲德派。

中宣部

未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摘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①

(1942年10月12日)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许多人在这种时候还被德国的攻势所迷惑,以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军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军的战役统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军的最精锐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带决战性的。德军猛攻不克,整个德奥土保阵线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后的崩溃。然而当时英美法阵线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军仍极强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经快到面前。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

^①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视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间世界人民的注视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希特勒在西线胜利以前，他似乎是谨慎的。攻波兰，攻挪威，攻荷、比、法，攻巴尔干，都是注全力于一处，不敢旁骛。西线胜利后，他就冲昏了头脑，企图在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向这个庞大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就分散了他的兵力。去年十月向莫斯科进攻的失败，结束了苏德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特勒第一个战略计划破产了。红军制止了德军去年的进攻，并在冬季举行了全线的反攻，是为苏德战争的第二阶段；希特勒转到了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此期间，希特勒撤消了他的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自己充任总司令，决定放弃全面的进攻计划，搜索欧洲全力，准备向南线作局部的但被认为是打击苏联要害的最后进攻。因为这一进攻带着最后一次的性质，关系法西斯的存亡，希特勒就集中了极大的兵力，连在北非作战中的一部分飞机坦克都抽调过来了。从今年五月进攻刻赤和塞瓦斯托波尔起，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希特勒调动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附以飞机坦克的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作空前剧烈的进攻。他企图迅速攻下两处，达到切断伏尔加和夺取巴库两个目的，然后北攻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并令日本法西斯集中兵力于满洲，准备在斯大林格勒攻下后进攻西伯利亚。希特勒妄想把苏联力量削弱到足以使德军主力从苏联战场上解脱出来，以便移到西线对付英美的进攻，并可掠取近东资源，打通德日联系，同时，日军

主力也可从北面解脱出来,以便西进南进对付我国和英美,而无后顾之忧,这样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但是这个阶段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希特勒遇到了苏联制其死命的策略。苏联采取了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的方针。五个月的战争,使德军既没有打进高加索油田,也没有打下斯大林格勒,迫使希特勒顿兵于高山与坚城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损失甚大,陷于僵局。现在已是十月,冬季就要到来,战争的第三阶段快要结束,第四阶段快要开始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

拿希特勒在第一阶段上的情况和第三阶段作比较,就可知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目前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方面,实际上均已停止了德军的进攻,希特勒已到再衰三竭之时,他对斯大林格勒、高加索两处的进攻已经失败。他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整个冬季中所整备的一点兵力,已经耗竭了。在苏德战线,距冬季不到一个月了,他须赶快转入防御。整个顿河的以西以南是他的最危险的地带,红军将在这一带转入反攻。今年冬季,希特勒因被死亡所驱迫,将再一次整备他的军队。他或者还可能搜索他的一点残余力量装备出几个新的师团,此外则乞援于意、罗、匈三国法西斯伙伴,向他们勒索一些炮灰,以应付东西两线的危局。但是,他在东线须应付冬季战争的极大消耗,他在西线须准备对付第二条战线,而意、罗、匈等国则将在希特勒大势已去的这种悲观情绪中,一天一天变成离心离德。总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

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四十八天中，红军的保卫斯大林城，和去年保卫莫斯科市有某种相同。这就是说，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计划也像他的去年计划一样，归于失败。其不同点，则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虽然接着举行了冬季反攻，可是还要遭到今年德军的一个夏季进攻，这是因为一则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尚有余勇可贾，二则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缘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则形势将和去年完全两样。一方面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欧洲人民也将准备着起义响应。另一方面，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的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的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1942年11月6日)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1943年2月21日)

毛泽东

斯大林同志、联共中央和红军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同志与中国人民热烈地庆祝红军成立的二十五周年与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

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奋斗，特别是经过了二十个月的反法西斯侵略的奋斗，红军节已经由国际劳动群众的“狂欢节”发展为全人类的“狂欢节”。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经验，一致公认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红军近三个月来的攻势，在全世界到处都引起欢呼和赞美。全世界到处都在研究着红军胜利的军事和政治教训。红军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规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红军从十一月十九日在伏尔加河上的危城发动反攻，三个月后就一跃而至六百多公里以西的第聂伯河附近。红军将希特勒匪徒完全驱出国境，只是时间问题了。自从红军开始对德战争，世界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由于红军的胜利，新世界的未来面目也更加明朗，更加确定了。一切形式的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已经在全世界永远失去存在的余地。民族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已经成为新世界的确定不移的原则，我们中国人民欢迎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欢迎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为争取这个新时代的团结和努力。与红军的胜利同时，英、美在北非，美国在太平洋，也都得到了重要的胜利。英、美正在积极准备

实践欧陆第二条战线的诺言。对于中国,美、英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对于这个新时代的首要任务就是更加团结自己,准备像红军驱逐德国侵略者一样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红军和红军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万岁!

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万岁!

中、苏、英、美的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根据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解放日报》刊印

(录自《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1943年3月16日)

毛泽东

一 时 局

日本最近从满洲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最近国民党电台与延安联络,这是国共关系好转的表示。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二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由于日本新的进攻,国民党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内援。现在谈判仍然未停,说谈判要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在日本新的进攻中投汪的增多,日本已决定扶汪打蒋的方针,现将华北、华中等伪政权统一起来。

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

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

整个世界形势和历史的发展对国民党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但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

二 工作方针

中央的工作方针，是研究与指导，要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之目的。

研究问题：

(一) 国际

英、美、苏、德、意、日六大国，主要是研究六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项。

去年对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绩，其他无成绩，今年要有成绩。

(二) 国内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根据地，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权，军事是军事建设、民兵建设，经济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

去年研究成绩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

(三) 历史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政治（范文澜），军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陈伯达），文化（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

中共党史开始研究：二十二年的路线问题；政治局同志座谈；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

(四) 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

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指导问题：

方式——报纸、电报、党务广播、口头报告。

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

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

去年工作有成绩，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绩，经过报纸与党务广播传到全国去。

今年要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方针中还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现在财经、妇委、职委、文委的工作方针都在转变。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三 工作任务

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前方是战争、生产与教育；后方是生产与教育。这种方针要向全体同志说明。公开说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但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要说明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现在华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保存骨干不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军队的骨干。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为了保存骨干必须坚决实行精简政策，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这就是战争的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就是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要切实实行。

第三就是生产的任务。

用这些方法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
记录稿刊印

(录自《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1941年

……

1941年6月21日

在周恩来从重庆发给延安(毛泽东)的电报中曾指出,蒋介石坚定地宣布德国将进攻苏联,而且还说出了日期——1941年6月21日。

各方面关于进攻即将开始的传闻很多。

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早晨致电莫洛托夫,请他们同斯大林谈谈局势以及对各国共产党作必要的指示。

莫洛托夫:“情况不清楚。在玩一个大把戏。并非一切取决于我们。我将同斯大林谈谈。假如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会打电话。”

1941年6月22日

晨7:00,我被紧急召至克里姆林宫。

德国进攻苏联。战争开始了。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中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

斯大林对我说:他们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没有想进行什么谈判就向我们进攻了,像强盗般卑鄙地进攻。在向基辅、塞瓦斯托波尔、日托米尔和其他地方进攻和轰炸之后,舒伦贝格出来宣称,德国认为它受到集结在东部边境的苏联军队的威胁,因而采取了反击措施。芬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同德国人在一起。保加利亚同意代

表德国在苏联的利益。——只有共产党人能够战胜法西斯分子……

在斯大林和其他所有人身上都显示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

修改将由莫洛托夫在广播电台宣读的政府声明。

向军队作指示。

关于宣布动员令和战时状态的措施。

设立了联共(布)中央和指挥部在地下的办公地点。

斯大林说,各国外交代表应撤离莫斯科,应被送至别处,例如去喀山。在这里他们可能会从事间谍活动。

商谈了我们的工作。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不应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苏联人民在进行反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这是粉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它奴役了一系列国家的人民并企图继续奴役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们把书记们和领导人员召至共产国际。我阐述了当前我们的立场和任务。

我们给美国、英国、瑞典、比利时、法国、荷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共产党发了指示。

在组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宣布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

1941年6月23日

研究了宣传工作特别是通过广播进行宣传的组织工作。

在战争条件下改组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措施。

常务领导机构:格·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爱尔科利。

1941年7月2日

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送交了关于向中国同志援助款项的建议,由于当前我们的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具有特殊意义,请求提供200万美元。

1941年7月3日

斯大林发表历史性讲话阐明局势并号召为粉碎敌人进行无情的全民战争。

收到通知,我们关于给中国同志 100 万美元援助的请求已获批准。

1941年7月4日

从国际纵队和政治流亡者(包括各校学生)中的志愿者选拔了 850 名军事和政治工作人员。

向南斯拉夫发出了反对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胆怯和叛变的立场的指示。目前,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奴役者统一战线必须同使敌后混乱的游击队活动结合起来。

索非亚消息:按照德国人的指示在国内开始了大规模逮捕。4000 名共产党员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逮捕在继续进行,被捕者的总数将达一万人。

1941年7月5日

关于转移共产国际执委会档案的问题。

同科拉罗夫和亚·吉尔吉诺夫博士谈话:保加利亚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站在苏联一边的,人民有反德情绪。鲍里斯国王独自按照德国人的指示发号施令。政府是他手中的驯服工具。鲍里斯将竭力使保加利亚卷入反苏战争。

1941年7月6日

在莫洛托夫处(同德·扎哈罗维奇一起)。

谈我们提出的问题:

(1)我们提出的建议已被通过(关于建立英俄工会委员会的建议除外——条件尚未成熟。在现阶段,这样做只能使英国人产生各种不必要的怀疑)。

(2)我们应在德国战俘中进行政治工作。

(3)必须用各种语言搞非官方的广播。已获准进行此项工作。

(4)由克里普斯提出的关于派遣多列士、马尔蒂、莱蒙的建议未遭反对。

莫洛托夫通知：已向英国政府发出苏联政府的声明。

(1)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在本国国界之内恢复独立的波兰国家，把在苏联境内的某些城市的领土划给它。

(2)在苏联领土上建立上述国家的中心(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中心)。

(3)用苏联的装备建立各国自己的军团。

向林德罗特发出有关挪威人和丹麦人的下列指示：

- 被占领国的共产党人应立即着手组织民族统一阵线，为此须同所有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力量(在挪威也包括同诺伊格尔斯沃尔德的拥护者)进行接触。这一民族阵线的任务是动员国内居民中所有的阶层为反对德国占领而斗争。建立民族阵线的运动应在争取民主和民族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奴役)的口号下进行。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提领导权的问题。

- 在被占领国群众性的政治斗争必须同一切可以扰乱敌人后方、扰乱部队和物资供应和运输的可行的直接行动联系起来。应尽一切努力指引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占领军的积极斗争。

1941年7月7日

向纽约(给美国、加拿大、拉美国家)和伦敦发了统一指示：

(1)关于被占领国中的民族阵线；

(2)民族阵线同瓦解敌人后方的直接行动以及游击运动的结合；

(3)关于建立各国反对希特勒奴役的统一战线(为反对法西斯德国而斗争的苏、英、美和其他国家政府)运动。

通知毛泽东，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

1941年7月8日

组织用德、波、塞、保、罗、匈、斯(洛伐克)语的专门广播。

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的子女们(近 800 人)撤退。

1941 年 7 月 9 日

向中国发去我们的共同指示。建议中共中央讨论这一指示、作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结论并把有关此问题的决定通知我们。

1941 年 7 月 10 日

最后确定向相应国家转移的政治流亡者中的保加利亚、波兰和德国小组的人员组成。

1941 年 7 月 11 日

把准备转移至相应国家从事党的和游击队工作的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共产党人小组名单和参考材料寄给梅尔库洛夫。

共产国际执委会少儿组同母亲们、儿科医生们、护士们、保育员们和其他服务人员于今日启程去高尔基城。

1941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

公布关于苏英之间签订共同对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协议的消息。

1941 年 7 月 16 日

写信给莫洛托夫,谈给中国共产党秘密送援款事宜。

1941 年 7 月 18 日

收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它通报了中国同志们将尽全力反对日军从华北转移去进攻苏联的决定。

他们请求获得弹药,以便开展更大规模的行动。

就上述问题我致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浏览了有关地下广播的材料以及 3 本供德国士兵阅读的小册子。

1941 年 7 月 19 日

迪阿斯来我家。他表达了对爱尔科利政治上的不信任。他的怀疑的根据是爱尔科利在西班牙的工作情况。多洛雷斯也宣称对爱尔科利不能充分信任。她感到,在他身上有一些陌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尽管她无法具体地提出证据(以前格拉姆什一家对

此也曾提出过警告)。

商定目前只在广播和其他宣传方面使用爱尔科利,把一些不特别机密的工作交给他做。

把通过我们的系统从国外收到的有关被占领国中反希特勒行动的材料送交莫洛托夫和什切尔巴科夫。

1941年7月20日

斯大林担任国防人民委员!

关于中共中央的电报莫洛托夫向我转达了下列意见:

“我们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路线。关于弹药现暂勿作出许诺。”

按此意思向中共中央作了答复。

询问了毛泽东来自重庆的有关八路军和中央军之间发生新冲突的消息有何根据,以及在同国民政府的相互关系中采取了哪些措施。

1941年7月21日

同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林彪和军事小组)座谈。

对莫斯科的第一次空袭(5:30)(约有200架法西斯飞机,击落17架)。

重要目标未受损。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亦未受损。

在政治局的防空洞中从10:15躲至3:30。那里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马林科夫、什切尔巴科夫、什维尔尼克、米高扬、朱可夫等。

斯大林:现在向保加利亚人民发出呼吁是不合适的。

莫洛托夫:很快将同波兰人签订协议。那时,波兰军团的问题也将解决。

1941年7月23日

收到联共(布)中央关于在受威胁地区建立地下党支部和让人们准备参加游击活动的密信。

1941年7月24日

同第二组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座谈。

1941年7月25日

向纽约发了电报,发电原因为缺少旅美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支持苏联的发言,以及墨西哥共产党人支持苏联的积极性差。

打电报给斯德哥尔摩,让林德洛特不要去警察局。假如他被捕,整个帮展开进攻作准备。

面对法西斯的进军而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的英美两国人民支持苏联。在所有国家,反希特勒战线的力量都在增长。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彻底胜利的现实前景属于苏联方面,属于反希特勒战线方面。尽管如此,各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在战争的现阶段苏联处境仍然困难。红军和苏联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需要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一切方式的全面和迅速的支持。这将减少前线的伤亡、减少被占领国家千百万人的苦难并将加速法西斯敌人恶魔般的战争机器的毁灭。在被占领国家必须更加积极地开始破坏行动、罢工、游行,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则开展游击运动并争取成为全民战争,不应有任何沮丧。一切为了粉碎希特勒,一切为了苏联的胜利,一切为了拯救人类摆脱法西斯恶魔的奴役!

格·季米特洛夫

1941年11月3日

1941年11月5日

同莫斯科(波斯克里奥比舍夫)通话,谈斯大林对共产国际问题的答复。

“莫斯科的局势稳定。在各战线上亦如此。昨天和今天,我军没让任何一架敌机飞越莫斯科上空。”

1941年11月6日

在古比雪夫文化宫举行十月革命24周年庆祝会。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也举行这样的会议。斯大林作报告(由莫斯科播出)。

(报告是一份极好的文件!)

在古比雪夫的庆祝会上我被选入荣誉主席团,在莫斯科——未被选入。

1941年11月7日

在莫斯科和古比雪夫举行检阅。

斯大林在红场讲话。

在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讲话。

在国内、军内和国外的人们产生了庄重的感觉。

我(正如昨天一样)今天也没出席检阅。没有必要突出共产国际!

1941年11月8日

我们驻土耳其的武官基列耶夫(同情报局的西罗金一起)详细地通报了土耳其情况。

1941年11月10日

就苏哈列夫、斯卢茨克尔和舍维尔科夫在乌法的工作问题对他们作了详尽指示。托苏哈列夫把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指示的信件带给爱尔科利。

同乌布利希、阿克尔曼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今后在德国战俘中的工作。

1941年11月11日

伊利乔夫和博尔沙科夫来我处。

我们商定把在比利时、法国和瑞士(把他俩的手下人和当地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结合起来。

1941年11月14日

莫洛托夫来电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有必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例会。我给毛泽东寄出了指示。

1941年11月17日

收到毛泽东回电,称他们将参加会议。

1941年11月27—30日

听取了(情报机关的)基斯连科关于延安和八路军情况的报告。

同科若夫商定在莫斯科应提出哪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加以解决。

1941年12月4日

索尔金从莫斯科打来电话,通报各方情况,并传达了莫斯科委员会让我们给他们派一位游击技术指导员去工作一段时间的要求。

1941年12月5日

发表了斯大林和西科尔斯基重要的原则性声明(苏波友好互助声明)!

1941年12月6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塔拉索夫通报伊朗局势。

1941年12月7日

潘菲洛夫和伊利乔夫(情报局)汇报: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侦察工作的问题,应当具体研究并把建议提交给斯大林同志。

关于把武器运送到南斯拉夫问题,应尝试利用缴获的德国物资。

12月须派遣一个波兰小组(诺沃特科、莫洛耶茨、芬德尔等)到华沙附近。

商定古比雪夫的情报局和我们在乌法的人的联络问题。

1941年12月8日

日本向美、英宣战。

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同维辛斯基和洛佐夫斯基谈日本的军事行动问题。他们尚不清楚莫斯科的立场。

1941年12月9日

向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发电报谈伊朗问题(恢复共产党等)。我建议不要恢复共产党,而是在休莱曼·米尔扎(民主人士)的人民党中工作并执行如下路线:

- (1)为伊朗的民主化而斗争;
 - (2)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
 - (3)加强伊朗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
 - (4)完全清除法西斯主义在伊朗的间谍活动、终止反苏宣传。
-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应为建立工会和农民组织而工作。

1941年12月11日

广播宣传会议。

决定根据下列原则制定具体措施:

- (1)把国际电台和干扰小组的力量联合起来,把国际电台(电台的编辑部)作为广播宣传的主要基地;
- (2)在新闻局、塔斯社和国际电台之间建立最紧密的联系,以便对广播宣传工作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 (3)建立(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参加的)评论员小组;
- (4)在广播委员会有一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际电台问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合作问题的常驻全权代表。

责成萨克辛、斯捷潘诺夫、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和费恩伯提出决议草案。

1941年12月12日

莫洛托夫很晚从莫斯科打来电话:“我同斯大林同志谈了你们关于伊朗的电报。我们同意您所建议的提法。”

“……前线的情况不错……”

我问:“我们是不是该回莫斯科了?”

莫:“还不行。不过,会回来的!”

关于对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尽管是用缴获来的德国武器)进行

武器援助问题,莫洛托夫说:“不应该这么做!”

(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 群众工作

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节译)

(1938年5月1日)

各国无产者和劳动者：

5月1日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今年5月1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检阅具有特别的战斗意义。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来还没有出现如此紧张的国际形势。人类的1/4已经卷入战争。一些法西斯政府把本国人民群众掠夺一空，使之备受奴役后，正覬覦别国的领土。它们向其他国家的人民发动掠夺性的军事进攻，想以此安抚本国人民的激愤，它们在军事冒险中寻求摆脱国内困难和挽救法西斯制度破产的灵丹妙药。法西斯战争贩子正把人类拖入一场新的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大厮杀。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正在远东进行着反对中国人民，争霸亚洲、争霸太平洋的侵略战争。古老的文化名城遭到破坏，几千个村庄被焚，几万名中国和平百姓惨死于日本刽子手的屠刀之下。

但是，四万万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不是刽子手们能够摧垮的。中国人民正越来越紧密地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给日本侵略者以惨重的打击。中国人民在保家卫国，同时它也用自己的胸膛掩护着亚洲各国人民，鼓舞着各殖民地人民进行反对奴役者的斗争。

德、意干涉者大军在西班牙为非作歹，它们不能战胜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于是就无耻地向和平居民进行报复，用飞机投弹炸死了数以千计的妇女和儿童。西班牙人民为国家独立，为反对英国反动的保守党集团暗助的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力量

而神奇般地英勇斗争已近两年了……西班牙人民正在为自由而战,它保卫着整个先进的、进步人类的事业。

……

法西斯歹徒如此嚣张,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燃起了战火,是谁负有罪责?英国保守党反动集团应该负责。他们在日本军国主义进攻中国时,丝毫不动声色,只是坐待日本军力耗尽以提出瓜分中国的问题。

……

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也应负责任。正是因为它向德国法西斯主义投降,才使后者得以巩固其势力……

对于西班牙人民流下的鲜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对于中国遭到的强盗般的侵略和奥地利被军队占领,应负罪责的不仅仅是法西斯歹徒,而且还有那些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的人。

工人弟兄们!

统治阶级说,为了维持和平你们应当甘心让西班牙人民受到摧残,让中国和奥地利受到奴役。他们是在无耻地欺骗你们。不能用听任战争祸首掠夺和杀戮别国人民的办法去避免战争。要防止战争,靠的是采取坚定的政策遏止法西斯强盗。

……

无产者兄弟们,为了发挥你们的力量,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应该消除你们组织总部里的变节行为。应该使你们的斗争不致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间谍席特林分子的破坏。

……

法西斯主义的托派布哈林分子的间谍们,正与第四国际特务组织席特林之流狼狈为奸,他们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肢解苏维埃国家,让苏联各族人民受到法西斯奴役。正是它们的余孽为法西斯干涉者在西班牙开辟了战场,并包抄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后方。正是它们接受日本侦察队的任务在中国进行破坏和特务

工作。

.....

共产国际以千百万工人的名义,为了保卫西班牙人民,再次呼吁社会主义国际和工会国际一起建立国际工人统一战线。

援助西班牙共和国,保卫中国——这就是说要反对世界大战,保卫你们的家园,维护你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免遭法西斯屠夫们的侵犯。如果哪些国家的人民坐视西班牙共和国或中国受到摧残,那么它们就是用自己的手在本国为法西斯统治做了准备,就会把自己所受的资本主义奴役的锁链拉得更紧。

同志们!

五一节那天走上街头去吧!站到实际帮助西班牙人民的国际工人统一战线的战斗行列里去吧!

把武器给西班牙人民!

法国无产者,巴黎公社社员的光荣后裔,你们应要求立即解除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包围,把全力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国际运动领导起来!

.....

美国无产者,你们应要求对于破坏普遍和平的法西斯分子实行遏止政策,实行无愧于林肯和华盛顿传统的政策。要求立即取消对西班牙和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

德、意、日的工人们!不要让你们国家的人民无形中成为法西斯政府杀人计划的工具。要通过你们坚决的言行,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破坏法西斯歹徒的掠夺性战争!

各国反法西斯战士们!要力争德、意干涉者撤出西班牙,力争日本侵略者撤出中国,力争德国法西斯匪帮撤出奥地利!应要求对法西斯歹徒实行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制裁!

劳动者们,快与工人阶级结成反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强大的人民阵线!

欧洲、美洲、亚洲各国人民，与伟大的苏联人民结成国际和平阵线去反对法西斯强盗和掠夺性战争的发动者！

无产者们！

资本主义国家统一的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联盟是不可战胜的。你们与强大的苏联人民联合起来就是消灭法西斯的保证。

打倒人类的刽子手——法西斯主义！

打倒战争贩子！

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反法西斯、反战的人民阵线万岁！

社会主义和平与自由的堡垒苏联万岁！

资产阶级国家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联盟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载《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

1938年第5期，第109—112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①

(1938年8月16日—23日)

关于将来工作的决议

(一)此次大会,南中美国家有很多代表出席,为以前所未有,因此必须推广和加强南中美国家青年间的合作,和这些国家青年与世界青年合作。

(二)此次大会,殖民地国家代表之多亦超出往昔,因此对于这些国家的青年,要予以特殊的帮助,并使更广大的殖民地青年参加世界青年大会的运动。

(三)为要推广世界青年大会的运动,特授权于理事会,向现在还未和大会正式合作的大团体接洽,以期得到他们的合作。理事会应特别注意向社会主义青年国际(该国际已有友谊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国际天主教组织,和国际职工青年团体接洽之必要。

(四)这次大会,有几个重要国家仍无代表出席。必须再次努力,以期获得这些国家青年的合作。

① 第二次世界青年拥护和平大会于1938年8月15日—23日在纽约州鲍肯西市瓦萨大学举行。五十四个国家的五百名代表带着五大洲四亿青年人的心愿参加大会。代表团由各种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工会、学生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组成。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由其总书记莱蒙·雨奥率领。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代表苏联青年向大会主席团发了贺电。大会通过了保卫和平的决议(即著名的瓦萨公约,旧译华沙条约)、关于世界青年拥护和平运动基本任务的决议,致德、意、日青年书。

(五)为要表现大会对和平的深切愿望,与对受战争灾祸的青年,表示深切同情,必须帮助这些青年和减轻他们的痛苦。

原载《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4日。

瓦萨和平公约^①

(1938年8月23日)

出席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之五十四国青年代表团,深切感觉其增进人类福利之重大责任,深知战争与军阀主义乃传统的暴戾力量,这种力量破坏文明与人类性格之一切可以珍贵之物;深信若果依照各国人民的和平与民主的公意,推行国际间的法规和建立人民间的正义,则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愿意贡献其所能于保全现存的和平,和恢复有些地方被侵略者破坏了的和平,以建树全世界永久和平之基础。

相信世界青年大会的运动,已证明青年对于不分国界、种色、宗教信仰,为和平而合作的深切愿望,证明世界青年一方面完全互相尊重信仰的差别,同时却能获得共同行动的实际办法,因此,特在凯洛格和平公约十周年纪念时,缔结这一庄严的公约:

第一条 我们誓要发挥一切国家的青年间友爱与协作的精神,努力帮助自己国家之青年,亲密团结,并与其他各国之青年联合一致,不分种族,信仰与政见,使之联合于世界青年大会运动领导之下。

第二条 我们严厉摒斥任何侵犯别国之政治独立或领土主权之侵略战争。

第三条 我们誓尽一切力量,以保证自己国家内的青年不参

^① 原件注明:签名者有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智利、中国等四十七国代表团。

加侵略他国的战争。

第四条 我们同意,在环境有必要时,尽力促本国当局采取与其他国共同行动,以预防侵略,以停止既发之侵略,对受破坏条约及侵略危害之国家,则予以有效之援助,并且使本国不参加任何侵略,无论参加的形式为供给侵略者以战争原料,或财政援助,皆要避免。

第五条 我们郑重宣称,轰炸不设防城市及平民,乃违反人道及国际间信守法规,我们将积极动员全世界舆论力量,指斥此种行为,并援助对被难者之救济运动。

第六条 我们认为:如果在国际方面和在各国国内,正义公道不得建立,若果有些正在寻求自由的国家及殖民地之自决权不得到承认,则无永久和平之可能,因此我们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改正对各国人民之不公平现象,不问其为何种族,抱何种信仰及政见,在我们各自国家内建立政治的社会的公道,并提倡立刻成立国际的机构,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间的分歧。

原载《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4日。

(摘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为纪念国际青年日向各级青救会发出的号召

(1938年8月25日)

纪念国际青年节,边区青救〔会〕号召全边区青年各级青救会为完成以下任务而奋斗。

一、在国际青年节以前要广泛地宣传解释国际青年节的意义和今年我们纪念它的任务。

二、在9月4日以乡为单位开青年群众大会,各城市内举行全市青年群众大会,举行游艺晚会,可能时举行提灯。

三、9月4日要把代表大会前的战斗任务作一初步总结,具体检查其执行程度。

四、9月4日至9月11日为“冲锋周”,在这一周内要以突击的精神,战斗的热情,为完成代表大会前的任务而奋斗。

同志们!立刻动员起来,组织革命的竞赛,为完成这些任务而奋斗吧!

原载《新中华报》,1938年8月25日,第2版。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青年爱国者

(1938年9月6日)

B. 罗戈夫

在中国解放战争的第一年里，青年运动席卷全国。在每一支军队和每一支游击队中，青年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青年最大的组织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它联合了五十万学生。1936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有来自三十二个组织的六十名代表参加。大约两年以后，1938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来自七十三个组织的一百二十三名代表参加。现在，全国学生联合会拥有八十五个最大的组织。在日本军阀破坏了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厦门、长沙、广州的数百所中学和几十所大学之后，青年大批参军，参加各种支前组织，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和参加已经建立的政治部的工作等等。现在，军队里仅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就超过五万人。大约还有七万名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在农村工作，他们经常向广大群众讲解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

有几十支由学生组成的游击队在敌后作战。著名的爱国者、北平中国大学教授杨秀峰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就是由男女大学生组成的。东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赵东领导的北平游击队，它的成员大部分也是大学生。

青年的战斗组织是“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组织是在1935—1936年华北抗日运动的高潮中产生的。1935年12月，北平两次大学生示威游行之后，建立了北平，天津的青年抗日组织，

其纲领有三个要点：争取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国内团结；争取民主。战前，在1936年春，当共青团在全国范围内被取缔之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斗争的唯一青年组织。先锋队的队伍发展得很快。先锋队刚成立时总共只有一百零八人，战前它已联合了七千人，而现在则拥有两万多人。

仅八路军贺龙的师里，就有“先锋队”成员两千多人。日军占领北平之后，约两千名先锋队成员离开了北平，他们为河北省无数游击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自己的队伍中培育了数以百计的英雄。嗜血成性的日本军阀在它所占领的中国城市和乡村中，怀着野兽般的仇恨到处搜索先锋队队员。在太原，勇敢的毛浩（译音——编者）和天才的青年作家江奋（译音——编者）英勇地牺牲了。在山东，“敢死队”中的三十名先锋队队员全被日本人野蛮地折磨致死。他们被捆在马上，刺穿双眼，挖出内脏。

英雄的中国共青团的战斗传统，为1937年4月12日在边区首府延安建立的“西北民族救亡青年协会”奠定了基础。协会把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的青年，八路军和过去苏区青年俱乐部的青年战士，以及来到边区抗日军事学校学习的几千名青年都联合起来了。协会现有两万多名成员，其中一半以上是英勇的八路军战士。

“上海民族救亡协会”是上海最强大的一个青年组织。现在，它在艰苦的秘密条件下进行工作，主要是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工作。当中国军队离开上海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上海民族救亡学生组织”。进行宣传、办青年夜校、为战争募捐、出版爱国书籍，是学生在敌占领区的主要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个组织的成员便从三千名增加到五万名。

爱国主义运动的巨大高涨，也在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两省显现出来。这两个省十分热情地对青年进行了普及军事的教育。广

西省当局还建立了几个为前线培养专业工作者的青年军营，军营的学员中有两千名姑娘。

在中国民族战争的第一年，青年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青年为争取自己国家的民族解放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徐正明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世界青年和平大会运动 基本任务的决议(节录)

(1938年10月10日)

第二次世界青年和平大会是在国际局势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西班牙的战争、中国的战争、希特勒为使捷克斯洛伐克亡国灭种在世界反动势力支持下玩弄的阴谋)进行的。这次大会对于在一个国家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几百万爱好和平的青年群众的活跃积极而有战斗力的运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青年人中间有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越来越坚定的通过积极斗争保卫世界免遭法西斯侵略者统治的决心。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它通过瓦萨公约的签署从思想上大大明确了青年应当怎样开展保卫和平运动。第二次世界青年和平大会的顺利进行,再次证明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所有非法西斯青年组织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可能而且必须合作的路线是正确的,证明青年共产国际已经开始成功地实施这一重要任务。

为了在各国开展这个青年和平运动,为了将其变成一个真正的、积极的、有数百万青年群众参加的有战斗力的运动,应该完成以下任务:

一、在每个国家进行大量的思想工作,说明瓦萨和平公约的意义。应该清楚地了解,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签订瓦萨和平协

定这件事本身,并不意味着所有代表都将为实践这个协定而坚持不懈地工作。首先应该明白,各国较多的青年组织和群众不会自动接受瓦萨协定。为了把青年争取过来,让他们拥护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通过的指出青年应该怎样保卫和平的纲领,需要做许多工作。

……

还应该借助这项说服工作认真促进青年克服在争取和平运动中最大的言行不一这个缺点。克服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首先应表现在给各国(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因受侵略而被害的人以援助,在于给战争挑拨者和绥靖主义者造成一种气氛,使他们无法施展其旨在直接或间接发动战争的行为,应该使他们感到自己是过街老鼠,使他们在各国从政治上到道义上都受到唾弃。

二、……应该经常致力于使世界青年和平运动委员会及其在各国的机构,同时也成为一切要和平的青年组织自由合作的中心。这个中心应该经常给予群众性青年和平运动的发展和力量的联合以经常积极的帮助,而绝不应当用机械的或官僚主义的集中化去取代各国的运动形式。

三、应当继续努力,巩固参加青年和平运动的各青年团体间的合作。

……

即令德、意、日三国的青年代表没有参加纽约的大会并且反对这个运动,但不能认为这三国青年已无助于和平事业。

首先应该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利用一切手段,甚至利用反对这个大会的几家法西斯报纸和法西斯广播电台广为宣传大会精神。

……

因此,在纽约举行的动员了几百万青年男女的这次大会,为青年共产国际和共青团开创了群众性争取和平斗争的新前景。

青年共产国际和共青团的任务更加艰巨了,而战线也同时扩大了。所以,青年共产国际和下属的共青团应该尽一切努力扩大我们在一个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对运动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这些任务的完成与我们干部队伍的发展和青年团能否采取正确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

因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 一、加强干部队伍,开展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 二、加强思想斗争和实际斗争,以反对近几年内在某些国家表现出的取消主义倾向;
- 三、加强思想斗争和实际斗争,以反对那种因否定党的纪律原则而认为青年团应向共产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和那些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主张可以不听党的意见和不要党的领导的人。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
第2卷,第218—219、220、221、222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季米特洛夫就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关系致青年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信

(1938年10月14日)

……^①共产党与青年团之间现有关系的巩固,首先应通过派相应的党员去积极参加团的工作和领导青年团;另一方面,要通过青年的领导同志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工作与生活,但不得忽略或轻视团特有的基本任务。共青团的领导人经常是宁愿从事一般的政治活动和议会活动,而不愿履行本团在青年运动中的基本义务和任务,这种现象通常是共青团的严重缺点。必须采取严肃措施,必须使青年运动的领导干部克服这个病症。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
第2卷,第222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① 删节号系《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编者所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节译)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1 周年

(1938 年 11 月 7 日)

各国无产者和劳动者!

今天,苏联人民庆祝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 21 周年,庆祝英勇斗争的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胜利的第 21 周年。

当苏维埃共和国各族人民臻于建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满怀信心向共产主义前进之际,资本主义世界正在一片绝望的战争狂热中挣扎。

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这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强盗战争实际已经开始了。战火已在地球上的各个地区肆虐。法西斯屠夫正在西班牙和中国干着卑鄙的勾当。已有五亿多人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战火有向更多地区蔓延之势,它将把更多国家的人民卷入战争。亿万人民受到法西斯强盗的威胁。

.....

工人们,劳动者们!

现在,当几百万人自问摆脱慕尼黑阴谋造成的处境之出路何在时,我们共产党人说:投降政策并没有拯救也拯救不了和平。它已导致了战争。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满洲和中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就是这种对法西斯主义实行让步政策的血的标志。这种政策削弱和平的力量,增强法西斯侵略者的势力,帮助它发动新的破坏力更强的战争,使惨绝人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大火日愈迫近。拯救和平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坚决打击法西斯侵

略者的道路。

谁不为和平而斗争，他就不能防止战争！

……

当法西斯主义已开始瓜分欧洲，当它摧残和屠杀别国人民时，工人阶级当今的任务就是把被奴役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受到异国统治威胁的人民的防卫领导起来。一个民族并不是指一小撮法西斯分子与掠夺和出卖人民的反动的金融家、大工业资本家，一个民族指的是几百万工农劳动者，是忠于祖国、热爱自由和保卫国家独立的人民。无论是在其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西班牙和中国，还是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受到异国法西斯进犯威胁的一切国家里，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团结、发动和带领人民去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工人阶级是一个民族的中流砥柱，是民族自由、尊严和独立的堡垒。

……

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了保卫英勇的西班牙人民……

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了英勇的中国人民，用武器和贷款支持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实行经济制裁。不给日本侵略者任何军事物资，不给他们任何贷款。

……

社会主义的堡垒、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堡垒苏联万岁！

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万岁！

武装捍卫国家自由的西班牙人民万岁！

为国家独立而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万岁！

各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万岁！

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全世界联合阵线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载《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38年第10期,第119、121—122、124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节译)

(1939年5月1日)

工人和劳动人民!

50年前的5月1日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工人运动史上无产阶级首次在全世界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国际力量高呼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共产党宣言中不朽的口号走上了街头。

50年来,工人阶级的力量壮大了。它已与不共戴天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次激战,打败过资产阶级,自己也遭到过失败,又象神奇的勇士更猛烈地打击敌人。1917年国际无产阶级的突击队苏联工人阶级成了世界1/6土地上的主人。同时,国际无产阶级取得了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胜利,把阶级敌人打得一蹶不振,它破坏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社会主义之星从未象现在这样光辉灿烂。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天才接班人,各国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这一页的名称为——在苏联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逐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

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经受着无数的苦难,他们的今天是危机、失业和贫困,是一小撮法西斯暴虐之徒对他们的凌辱,是监狱和集中营,是法西斯统治者反对各国人民自由与独立的一系列残

暴行为,是法西斯强盗们制造的血腥的帝国主义大屠杀。

西班牙人民反对入侵的外国法西斯强盗的斗争已进行三年了……

在远东,日本军国主义枉费心机企图奴役四万万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正在勇猛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从后方打击敌人,把日本人占领的城市包围在炮火圈之内,用持久战消耗敌人兵力。中国人民的忘我斗争使日本劳动群众革命化,动摇着日本军队。日本侵略者的闪击战失败了,他们也无力达成有利于自己的“和平”。侵略者企图染指英法殖民地,正绝望地硬着头皮去反对英法。

法西斯主义象一头疯狂的野兽在欧洲乱闯。

……

无产者!

我们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因为我们有千百万人。工厂的烟囱是否冒烟,矿山和高炉是否开工,火车和轮船是否通行,劳动人民是否将养活一小撮寄生虫——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工人阶级是人民的战斗先锋队,它表达的是工人阶级今天的利益和整个劳动人类的终极利益。但是我们,工人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要增强自己的力量和统一,我们需要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它象粮食、空气和水一样,是我们不可以须臾离开的。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借助统一战线将其发挥出来,我们才能把一切人民的力量,把整个劳动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我们需要统一战线,是因为我们想永远消灭法西斯主义,消灭掠夺性战争和资本主义奴役。

现在国际工人阶级行动的统一取决于谁呢?取决于社会主义国际和职工国际。如果它们的领袖愿意,到明天统一就将是既成事实……

共产国际代表各国工人阶级的意愿建议社会主义国际和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立即就建立反对战争祸首和战争贩子的统一战线开始谈判,建议社会主义国际采取统一行动纲领……

……

各国工人们！

5月1日这一天你们要和德、日、意的无产者一道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祸首，为推翻法西斯专政去游行示威。

你们要和英法工人一道为反对战争贩子，坚决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和对他们实行经济、政治、军事制裁去游行示威。

你们应向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提出要求：帮助西班牙共和国的人民，帮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阿比西尼亚的爱国者和奥地利的民主主义者摆脱异国统治。

你们应要求向中国提供军援和贷款。

你们要为争取全世界劳动人民与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去游行示威。

你们要为苏联的符合各国人民愿望的和平政策去游行示威。

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共产国际号召你们站到工人阶级优秀儿女浴血斗争和胜利的伟大的旗帜下来，站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来！

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的战斗节日——五一节万岁！

打倒法西斯，反对掠夺性战争！

打倒资本主义！

共产国际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载《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39年第5期，第98、99、101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为保卫祖国而斗争的中国妇女

(1939年3月8日)

冀 玲

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起,中国妇女就积极地投入了争取祖国自由的斗争。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国妇女始终同男子一起并肩保卫自己遭受日本强盗侵略的国家。中国妇女的英勇业绩,必将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史册。

在浙江西部地区,目前有一支游击队正在蔡一芳(译音)——一位英勇的中国妇女的指挥下开展斗争。这支游击队是蔡一芳在1937年底建立起来的。当时,该队仅有队员三百人,现在已发展到一千五百人。1938年3月20日,蔡一芳曾率部在日军后方打埋伏仗,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辉煌战果。这次伏击,共打死日军七十人,俘虏十二人,缴获步枪一百三十支及大量弹药。蔡一芳对游击队员说:“我们将用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武器去打击日本人”。她说话是算数的。就在这年4月,她的游击队向大溪镇发动了一次夜间袭击,共击毁日军装甲车三辆,破坏公路一条。7月,蔡一芳又率领游击队在太湖地区烧毁满载日军的汽艇五艘。8月13日,蔡一芳在杨家山一次夜间侦察中遇到日军巡逻队。她缴了一个巡逻队员的枪,并将他击毙;同时还俘虏了另一名巡逻队员。

中国和欧洲几家报刊曾多次报道过华北一支游击队的女领导人江通文(译音)的事迹。她今年已六十高龄。中国人都习惯地称她为“江婆婆”。她的女儿江莉仁是一位年轻姑娘,曾和弟弟一起参加过东北的抗日运动。1938年,江莉仁来到河南,最初她在一

所中学念书，同时帮助母亲组织游击队。这年2月，江通文的游击队已发展到五千人。2月17日，江的队伍有二百名队员北上抵达黄河边，她的女儿也在这支队伍中。游击队很快就被一千名日军包围。战斗开始了。这时，游击队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中弹牺牲。江莉仁立即拿起这位指挥员留下的枪，迅速投入战斗。在战斗中很多队员都牺牲了，而江莉仁却设法隐藏下来。人们认为江莉仁也在敌后牺牲，于是就在她念过书的一所学校举行追悼会。可是就在开追悼会时，她却突然出现在追悼会上，并且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演说。

前不久，有两位全付武装的姑娘在丰津(译音)车站附近打埋伏，袭击路过这里的日军。她俩共打死日军七人。后来两位姑娘都被捕了，日本人把她们带到城里。这两位姑娘临死前曾在刑场上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中国有一个妇女组织叫《中国妇女救国会》，参加的妇女有几百万人。全国各省、市甚至乡村几乎都有它的分支机构。

《中国妇女救国会》的总部设在一个窑洞里。窑洞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型地图，图上绘着华北八千个建有妇女救国会分支机构的村庄的标记。在晋察冀边区，现有六百万妇女，主要是农村妇女参加妇女运动，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游击队作战。

参加了妇女救国会的那些妇女，常常为战士们缝衣做鞋，为伤员准备绷带，保护公路，有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妇女经常协助游击队破坏日军的公路、电线和电话线。

京汉铁路沿线的妇女今春举行了一次独特的竞赛活动：看谁在一个晚上推倒日军的电线杆最多。这次竞赛的优胜者是两位十七岁的姑娘，她俩在一夜间分别推倒了三十六根电线杆。

妇女们在打击日本奸细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主动和勇敢。她们的警惕性很高，许多日本特务都是在她们的监视下被抓获的。

目前，妇女救国会正在城乡广大妇女中间进行广泛的政治教

育工作。大约有二十万农村妇女在学习文化知识。

爱国妇女组织在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妇女同男子一样参加投票选举。有很多妇女被推举担任了乡甚至县的行政职务。一些妇女救国会还在后方为一些孤儿办起了规模较大的儿童保育院。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姑娘在各类学校——政治学校、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学习。例如,八路军办的军政大学,就专门设立了一个妇女班,该校第三期毕业的姑娘达四百人,第五、六期毕业的妇女人数将有显著增加。

游击队中也有不少女大学生。女学生吴京玲(译音)和苏珊(译音)在苏州建立了一支游击队。南京大学学生秦其兰(译音)是开封附近一支游击队的侦察员。后来她被日本人逮捕。在狱中,她高唱爱国歌曲,并在关押她的牢房的墙上写了四个大字:“战斗到底!”。后来日本人把这位英勇的姑娘杀害了。

中国还有几个为支援前线而建立起来的著名的妇女组织,这就是所谓“战地服务队”。例如,在女作家胡兰熙(译音)领导下,由十九名年约十九——二十三岁的上海女工组成了一支前线服务队,该队同上海、武汉及其它战线的中国军队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她们常常帮助靠近前线的农民收割庄稼、照料伤病员,并在战士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党员女作家丁玲的领导下,一支由四十名姑娘组成的宣传队在八路军中开展活动。

丁玲在《今日中国》杂志上讲述了宣传队在黑洋洞城的活动情况,黑洋洞是一座小城,不久前才从日军手中夺过来的。中国人攻克这座小城后,宣传队便在城市的一幢旧楼上设立了战士俱乐部。战士们在这儿阅读杂志、下棋、谈心。“战地服务队”的妇女在俱乐部为战士们演剧、举行座谈会、讲演会和教唱革命歌曲。丁玲的宣传队还把自己的群众文艺工作和宣传工作普及到城市居民中去。丁玲写道,宣传队最“困难的问题”是孩子们的问题。孩子们总是

把宣传队团团围住。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从远在五十至六十公里以外的农村来到这里。他们都想参加“战地服务队”。这些孩子不仅有才能,而且很勇敢。有一个名叫李江玲的小女孩,是她的父亲亲自带她来参加宣传队的,因为家里实在无法留住她。后来宣传队要离开这座城了,这位老农来和女儿告别时对孩子说:“去吧!将来你们赶走了敌人回家时,你到有游击队的山区来找我。要记住,我们全家的未来,中国的未来都寄托在你身上”。

中国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手中,掌握在勇敢的中国青年手中,掌握在千百万为自己祖国的解放而英勇斗争的中国妇女手中。

(刘积高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青年 共产国际成立二十周年的宣言(节录)

(1939年11月)

**致城乡工农青年！
致学生青年！**

二十年前，1919年11月，年青的无产者们响应列宁缔造的共产国际的号召，建立了全世界革命的青年组织——青年共产国际。

青年共产国际的二十年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奋斗的二十年！

青年共产国际的二十年是为工人青年的团结，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派，为青年权利而斗争的二十年……^①

英、法、德帝国主义者又为主宰世界争斗起来了，他们想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原料产地、产品、黄金储备和奴役殖民地人民，因此，他们要求青年去流血，去卖命。

所以现在在欧洲进行的战争对于青年如此宝贵的自由事业乃是一种罪恶。这场战争不是正义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的例子表明，青年们在涉及自己手持武器为之勇敢而忘我奋斗的正义事业时，是从不动摇的。但是目前这场战争，从发动和进行战争的各资

^① 删节号系原书所有。下同。

本主义大国这方面说，是一场非正义的反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①

……

青年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并肩战斗吧！

青年工人们！你们要结成为伟大的反战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冲锋陷阵的队伍！

一切青年人和无产者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斗团结——这是时代的要求。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种团结！……

青年工人们！各国的战争贩子都试图以最卑劣的沙文主义毒害你们的心灵。按照帝国主义者的策谋，荒谬的民族主义应当让军火大亨们把腰包装得更满。这行不通。无产阶级青年对外国的、对战壕里的阶级兄弟不抱有任何仇恨。无产阶级青年心中燃烧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火焰……

青年劳动者！在共产国际光荣的旗帜下作为它最忠实的助手奋斗了二十年的青年共产国际号召你们奋起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打倒再次想用青年的血巩固其统治与财富的资本主义！

青年劳动者！莫让你们本已困苦的生活为了剥削者而更加恶化！勇敢地加入争取和平的阵线吧！

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堡垒、世界无产阶级和青年的骄傲与希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共产国际在评价这次战争时，强调交战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帝国主义意图，认定交战双方进行的都是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和反动的战争。然而对战争初期就已表现出来的民族解放倾向，当时并未予注意。后来法西斯侵略的扩大不仅使人民的义愤更加强烈，引起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反抗奴役者的愿望，而且引起了统治阶级中反希特勒倾向的增长及其力量的改组。随着战争中解放因素的增加，战争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后，从对抗法西斯侵略联盟的国家这方面说，战争向正义的、解放战争转化的过程已告完结。——原注

望——伟大的苏联万岁！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
第2卷，第247—249页。

（摘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

(1940年5月1日)

全世界工人和劳动人民！

在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险恶环境中，劳动人民迎来了5月1日这个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如今战火烧遍了欧亚两洲，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对于各国工人来说，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具有此等重要的意义。

欧洲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它尚远未有穷期。战场正在继续扩大，帝国主义统治者强使从属于他们的殖民地人民参战……

在远东，日本进行侵华战争已近三年了，它想把这个四万万人口的大国变为殖民地，它因战争遭到破产，财力枯竭，就急欲把掠夺者的“和平”强加给中国人民，以便腾出手来参与进一步瓜分世界……

资本主义的恶棍们正把各国人民拖入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性大厮杀。

……

无产者和劳动人民！

是谁曾帮助并正在帮助资产阶级夺走你们和你们子女的最后—块面包，用资产阶级专政的恐怖手段扼杀你们？是谁与资产阶级一起策谋了现在这场血腥罪行？

是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头目们。

……

但是,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党的走狗绝对不会得逞。不管统治阶级如何猖獗,他们绝逃脱不了因这场战争应向人民负的罪责……

前线和后方的几百万人民暂时只是在小心地议论共产党人大声疾呼的内容。现在不是英雄们单枪匹马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是有千千万万的先进无产者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高擎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神圣旗帜……

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不断发展扩大。印度先进工农为国家独立而坚决斗争。伟大的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

工人们,共产国际号召你们站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荣旗帜下,站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旗帜下,因为只有在这面旗帜下你们才会取得胜利。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打倒资本主义反动势力!

各国人民要和平!

和平、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万岁!

各国无产者的兄弟联盟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载《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40年第5期,第10、13—15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的青年爱国者

(1940年9月1日)

李锡声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一次对中国青年的演说中讲道，青年人，应该善于作战：

“……第一，要用武器去消灭敌人；青年人应该学会使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刺刀……。第二，要以我们人民的数量去打击敌人，青年人应该为军队动员人力……。第三，要以军队的高度政治工作去打击敌人；青少年应该为部队造就和培养有政治觉悟的战士……”。

中国的青年爱国者积极地响应了朱德的号召。解放战争一开始，优秀的中国青年就奋起捍卫国家的独立，他们与成年人一起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各条战线上并肩作战。

战争期间，中国青年善于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和发现优秀的英雄战士和指挥员，如英雄飞行员李文达（译音），他在战斗中击落敌机十二架，后来壮烈牺牲；又如勇敢的上海女侦察员王为敏（译音）和一一五师指挥员共产党员林彪，以及成百上千的忠于人民的爱国者，他们都是这样的英雄。

在数百万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中，绝大多数战士都是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三岁的青年人。

整个中国军队都是由年轻人组成的，青年人担任指挥员、政治委员的现象并非罕见。空军飞行员几乎全部是青年人。

中国青年的组织工作方针主要是为人民革命军培养后备队。

为此,中国建立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军事体育小组和俱乐部,青年人在这里锻炼身体、学习射击和军事知识。

……这里全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站成一行的青年尤如一条狭窄的长带向前伸展。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全套行军用品。原来这是培养青年的陕西军校在进行行军操练,培养青年在山区条件下作战的能力。这时,派出去的巡逻队给指挥部送来情报,不久“战斗”就开始了……。

华南地区的青年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广东、广西的青年正在进行全面的军事训练。为了给前线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现已建立了几个军营。许多姑娘在军营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军营培养出来的男女青年都作为义勇军参加了中国军队。这里让我们举出几个实例来说明一下。

南口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四千多人报名参军,仅两天时间就有一千五百人参加志愿军。在广西部队和其它一些部队还建立了特殊的“学生军”,由志愿军中的大学生组成。

青年战士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机智灵活,有勇有谋。国民革命军第六八八团在歼灭日军第八纵队的战斗中,敌人突然包围了团部青年通讯员李开敏(译音)。这时他迅速地钻进一个山洞。日本人用一个排的兵力包围这个山洞,而这个排的士兵中有一些是被傀儡政府拉来当兵的中国人。李开敏在洞内向这些中国兵大声喊道:“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同时向日军开枪。日军共向他发起四次进攻,每一次都被他顽强地打退了。日军无法抓住他,也无法打死他。这次战斗中,李开敏共打死日军十人,最后敌人被迫撤退。

有一次一个连的中国战士被日军包围。全连战士和指挥员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进行了多次反击。经过激烈的肉搏战他们终于冲出去了。战斗中一名青年战士负了重伤。虽然这个战士伤势严重,流了很多血,但他仍然带着身上的所有军用品尽力和同志们一

起撤出战斗。过了十天,当他的伤口还未痊愈时又毅然返回前线。

对人民无限热爱,对民族解放事业无限忠诚,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充满必胜的信心,——这就是人民革命军中为自由中国而战的青年英雄爱国者们的显著特征。

(刘积高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美国青年代表大会致全世界青年书 (节录)

(1941年7月6日—9日)

我们代表美国青年向全世界青年致意。纵有千难万险,我们兄弟般的国际大联合必定会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违背本国受奴役人民的意愿所进行的这场毁灭性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

英国和美国青年!我们向你们——在保卫人类和你们的国家、保卫你们本国独立和各国人民独立的前沿阵地浴血奋战的人们,向你们——为反对那些破坏文明和进步的人而斗争的你们说——英勇战斗吧!我们告诉你们,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希望和意愿都同你们在一起……

……

中华民族正在受难,中国青年正在抗击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我们向中国青年,向进行抵抗的日本青年郑重声明,为了有效地援助你们勇敢的军队,我们将加倍努力,争取完全禁止从我国给日本运送军用物资。

为自由而战的受奴役的殖民地国家的青年们,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坚信,你们要求平等和独立是正确的。我们将要得到的世界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自由。

……

我们齐心协力,定能保证有一个光明的新未来。青年们定将为共同的自由与民主事业贡献出一代人的全部力量,今天我们会在国际青年代表大会上,让我们共同铸造一个大团结的新局面。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
第2卷,第259—260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 青年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决议^①(节录)

(1940年11月1日)

一、在1936年日内瓦会议和1938年纽约会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年运动,目前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南斯拉夫拥有强大的基础,在中南美各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也有相当强大的基础。这个运动与保加利亚、瑞士、瑞典、南非等一系列国家有联系,而且与中国青年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最后,要强调指出,各国的青年运动均有其特性,应该说,在日内瓦确立的又经纽约〔会议〕发展起来的国际青年的合作,在战争后的一年也还继续存在。

二、这场青年运动受到国际合作精神的激励,它的存在是青年共产国际在争取青年和培养各国青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中的重要武器。这场(苏联青年也参加的)运动一向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持有正确立场并对其表示同情,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向表示同情。将来,这个运动是各国人民争取进步的重要成分。

三、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就必须使各国的运动在解决一切政治与组织问题时有完全的、绝对的独立性,同时要建立一个国际合作和交换各国运动经验的中心……

这个中心应有以下任务:

^① 本件原文系法文,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公布的是经节选的俄译文。删节号是俄译者所加。

1. 用英、西、葡、法、德、汉文(如需要也可用其他文种)出版一种月刊简报;

2. 尽可能广泛地建立联系,特别是与欧洲国家(如法国、巴尔干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殖民地(如印度、荷属印度、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建立联系……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
第2卷,第250—251页。

(摘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书记处 关于解散青年共产国际的决定

(1943年6月1日)

鉴于在战争条件下无法召开代表大会或全会,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的决定^①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完全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的决定。

二、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沿着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本国青年一代的道路,已经从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转变为全民的群众性青年组织,许多国家的青年团正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考虑到这种情况,青年共产国际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国际中心已经过时了。

据此,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书记处决定:青年共产国际作为国际青年运动的中心,予以解散。

三、注意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多数支部已经同意^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的决定,而且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参与议决,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相信这个决

① 即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见《解放日报》(1943年5月27日),《共产国际》(俄文版)1943年第5—6期合刊,第8—10页。

② 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做出决定,拥护这个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的全文于1943年5月27日刊登于《解放日报》上。

定完全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观点。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
第2卷，第279—280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拥护世界和平大会通电

(1938年2月20日)

伦敦世界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并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与人民：

日寇猖狂，肆行侵略，不仅欲灭亡中国，尤欲为世界霸王，撕毁国际神圣和平条约，以暴力加诸我爱好和平之中国人民。所到处烧杀掳掠，横暴凶残，为历史以来所未有，近且发表狂谬宣言，否认我国民政府，疯狂野蛮。不但我中华人民难以忍受，更非世界正义所能容忍。世界反侵略运动大会，拥有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与人民，为人类公理、世界和平之堡垒，我们深信当能在此隆重庄严之援华制日大会，通过援助我中国人民之决议，予侵略者以致命打击。我边区全体妇女儿童，誓以最大决心拥护世界和平，在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自卫抗战到底，务以全力打击此破坏世界和平之罪恶的侵略者，以赤血争得中华民族之解放，以抗战来保护世界和平。最后我们谨以至诚，敬祝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与人民万岁！

中国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

原载《新中华报》，1938年2月20日第2版。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队部 致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贺简

(1938年8月13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队部敬向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与会诸君致兄弟的敬礼！

世界青年大会的开幕，象征着全世界青年的大团结。我们坚信：团结就是力量，这个团结的力量，将会为全世界青年创造出和平自由幸福的青年生活！

我们中国青年正生活在反日本法西斯军阀的苦斗当中。

我们要向全世界青年伙伴控诉：

我们和平的文化生活被破坏了！日本强盗残暴地占据了我们的世界著名的清华大学，轰炸了我们的南开大学，摧毁了我们无数的文化机关。我们的工厂、田庄被强夺了！成千累万的工农青年，被逼迫着离开安宁的生活，踏上饥饿和死亡线上，我们的青年妇女，更遭受到可耻的强奸和侮辱，对于这些非人的暴行，我们要求全世界青年伙伴予以极大的注意。

我们要向全世界青年伙伴报告的，就是我们中国青年，在抗战的烽火前面，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阶层地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在工厂，在农村，我们积极地加紧战时后方生产，在前线，在敌人占领地区，我们激烈地进行血肉的搏斗！

我们认为：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在中国或者西班牙，呼吸之间，都和整个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今天，法西斯强盗疯狂地企图灭绝全人类的文化与和平，血腥的风，吹遍了西方的

西班牙和东方的中国,负有保卫文化保卫和平的青年战士,必须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团结是锐利的武器!运用这武器,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也就是在战斗中西班牙青年和中国青年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全世界维护文化爱好和平的青年战士的主要任务!

我们向全世界伙伴呼吁:中国青年站在抗日的最前线,担负了反法西斯的急先锋,急任务,这是世界青年运动中光荣的成绩。中华民族能够战胜日寇,也就是给世界和平以极有力的保证。

我们恳切地翘望着这次大会的收获,是全世界青年的强大的巩固的组织之具体的形成。这就是和平的旗帜!法西斯魔鬼们将会在我们胜利的旗帜面前发抖!

我们更急迫地期待着世界青年伙伴,在反法西斯的共同行动上,给我们抗战中的中国青年以积极的援助!推动广泛的援华运动,要求本国政府实行强硬外交,甚至武力阻止正在进行而且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

中国的东南部,已经进入血腥的战斗中了,谨代表在东南区战斗中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体队员,预祝大会顺利地进行和圆满的成功。

原载《青年团结》创刊号,1983年8月24日。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致 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电

(1938年8月15日)^①

世界青年大会主席团并转

各国亲爱的代表们！

当你们集合全世界青年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热烈的讨论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加紧进攻我国中心——武汉三镇，中日战争进至异常紧张激烈的时候。一面是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追求世界的和平，一面是进行毁灭世界文明的血腥的侵略战争。这真是个如何强烈的对照啊！而在这个强烈的对照中，却正显出这次世界青年和平大会的庄严与伟大。

告诉你们：我们中国的学生青年，在和平的队伍中，将始终是最忠实坚决的一员。过去我们曾为反对日本侵略而进行艰苦的奋斗，今后我们将更在保卫祖国保卫武汉的血战中，用最积极的行动来响应大会的号召，支持大会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工作。

我们对于大会详细的报告和具体提议，将由本会出席代表陆瑾女士、林家曜君及其他中国代表团诸君直接向大会提出；但我们还要特别通知你们一个痛心的消息，就是曾经代表中国学联出席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及世界学生国际代表大会，在中国青年中最为你们所熟悉的本会领导者陈柱天君，已于今年7月12日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滥施轰炸之下了。陈君的死，我们相信你们当更能

^① 发表日期。

亲〔痛〕切地感到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如何残暴地虐杀青年，法西斯侵略者对于整个人类是如何严重的一个威胁！

朋友们！多少的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法西斯侵略者的残暴行为是不能自动停止的。倘要用所谓“现实主义”的退让办法祈求法西斯恶魔的“手下留情”，那完全是不可能的幻想！他们向中国和西班牙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还没有结果，日本侵略者又在张鼓峰向苏联寻衅，希特勒则更是目光闪闪地时时在向捷克觅取新的进攻机会。

朋友们！让我们全世界的青年赶快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热情汇成正义的巨流，无情地扑灭法西斯侵略者所散播的战争的火种吧！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民主、自由、和平、博爱的新时代的文明而讴歌而战斗吧！现在文明与野蛮已到最后决战的时候，这正是我们下一代人类文明的承继者所应担负的责任。谨致

为世界和平而战的敬礼！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总务郑代玘，组织部长张鉴英，秘书蒋南翔。

原载《新华日报》，1938年8月15日第2版。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致 世界青年大会贺电

(1938年8月16日)

纽约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主席团暨全体代表!

谨代表本队向诸位代表致国际主义的兄弟敬礼! 深信大会必能团结世界青年后辈的力量, 继续扩大对我国和西班牙人民的援助, 给日德意侵略者以坚决的打击, 而捍卫世界和平。

紧握你们的手!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李昌

8月16日

原载《新华日报》, 1938年8月17日。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致世界青年大会函

(1938年8月)

大会主席团及各国反战青年代表：

我们仅代表西北青救会的二十万会员和广大的西北各界青年们向你们敬致最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我们中国青年现在正为了民族解放和青年的自由与幸福在英勇的苦战中。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行将开幕，消息传来，不胜激动欢欣。不论在过去或在当前，在许多困苦、颠沛、暗淡的日子，我们总是从此世界的青年朋友那里得到最大量的帮助和深厚的同情。现在诸位代表了属于各个民族，各个宗教，及各种政治立场的千万万的世界青年们，来商讨青年们保卫文化，保卫和平，保卫自由和保卫青年的伟大事业。我们坚决相信，由于你们世界青年的统一，足以保证为和平与进步的斗争胜利和最后消灭一切虐杀青年的残暴行为。

我们自己正处在这一斗争当中，故我们对于它的胜利特别具有坚强信心。

我们相信在大会会议当中，如何援助中国青年反对日本军阀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正如援助西班牙、阿比西尼亚、奥大〔地〕利和捷克的青年斗争的问题一样，定会得到大会的慎重注意。因为他们正在为了世界和平和青年一代的未来而流着血，并且，在这一斗争中，他们的命运如何，将与全世界的青年们休戚相关，无可躲避。必须采取切实办法！全世界青年一致的政治行动已不容再缓。援助此等国家青年们为和平斗争就是拯救人类文明。我们

因此特向大会呼吁，发动各国青年采取下列手段来援助中国：

一、昭告世界人士日本军阀在华的一切罪行。破除一切由于日本武断宣传产生的误会。

二、设法停止卖给日本军火武器，军用原料及借款。费厄泼列必将助长侵略。

三、全世界的抵制日货运动，全世界的政治运动，抗议日军轰炸不设防城市，施用达姆弹、毒瓦斯，屠杀非武装人民，及破坏轰炸医院、教堂、文化机关之举。

四、帮助中国得到医药、军火武器、飞机、高射炮、借款、志愿兵及各种专门人才。

五、捐募款项：救济难民灾民，援助学生教授游击队（如杨秀林教授之游击队，赵侗同学之游击队）。

六、派遣青年学生代表团来华考察日本军阀罪行，考察中国青年英勇抗战情形及中国青年当前之问题等。

其次，我们向大会的工作和世界青运提出下面的意见：

一、世界青年大会号召和推动各国建立与举行民族青年大会。

二、估计到德、意、日侵略国家便必定禁止本国青年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但这并不妨碍而且应该使侵略〔国〕青年自动的组成参加大会的支部。

三、创办世界青年大会领导的机关杂志，并用英、法、俄、德、西班牙、中国、日本等国文字出版，以便藉以领导和推动国际青年为和平和反战的运动，以后做为讨论和交换意见与斗争经验的工具。

我们深感抱歉的是由于本国战局紧迫和各种困难，未能派遣代表参与大会，但是在争取自由与和平争取世界的幸福与前途的战线上，我们是永远跟着全世界的青年们肩靠肩地巩固地站在一起的齐步前进。

我们预祝大会的胜利，坚信诸位百折不挠和一致的努力，必能

使大会获有伟大成绩与空前的意义,大会的一切决议,我们誓竭至诚拥护和彻底实现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

主 席 冯文彬

组织部长 黄 华

宣传部长 乔 木

原载《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关 于国际青年日宣传大纲

(1938年8月25日)

一、国际青年节是青年反战反法西斯的日子。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苦痛，摧残了无数的青年，使他们成千成万地死在战场，失去了家庭，残废、流浪，就这样的，把他们的青春献给了帝国主义战争。

全世界劳苦青年的革命组织少共国际成立后，就正式确定这一天为国际青年节，在这一天，全世界都在准备并且检阅自己的力量，为反战而斗争！

自从法西斯在德意得到政权以后，法西斯就在各国抬起头来，法西斯摧毁了民主自由，压迫工人阶级，把成千万的青年妇女赶回〔出〕了家庭，变成奴隶，使千万青年在残酷的军事统治训练下，失去了自由，变成战争的工具。在日本法西斯的奴役下，多少青年抛开娇妻到中国来送死！在德、意、波兰、奥地利多少青年处在战争的恐怖里、苦工营的拷打里和异民族的压迫下，但法西斯不管这一切，仍然拼命制造着战争！

法西斯就是战争，是青年的仇敌！

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在这一天检阅我们的力量，为反战反法西斯而奋斗！

二、今年的国际青年节是处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前夜！

看吧！德国一天天地更猖狂地准备着战争！吞并了奥地利，更虎视眈眈地向着捷克进攻，西班牙战争在德、意干涉下，已经进行了两年！在远东日本强盗企图灭亡中国。

德、意、日法西斯无时无刻不在挑拨战争，侵略其他民族。在“反共产”的旗帜下，进行武装进攻苏联阴谋，制造新的战争！因此摆在全世界青年面前的任务，就是以革命的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协助中国！援助西班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

三、保卫大武汉是每一个青年的任务！

自从九江失守以后，保卫武汉已是十分火急的事情！每一个青年组织都应该动员自己的青年参加武装战争！参加保卫大武汉的一切必要的行动！

保卫西北！保卫边区！保卫西北抗日根据地！这是西北青年，边区青年的神圣任务！

四、纪念国际青年节，建立全国青年统一战线！

要使青年真正统一起来，只有在民主的原则下自由联合组成最高的领导机关，而不妨害各个团体之独立系统之下，才会统一起来。最近西安的不幸事件是值得惋惜的，在国难如此严重形势之下我们该加倍努力！为建立青年统一战线而斗争！

五、纪念国际青年节，迎接西北青年代表大会和边区青年代表大会。

西北青救会定在10月10号召开西北青年代表大会，并请全国各团体青年派代表出席。准备成立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所以这次大会对青年统一运动，是起着决定的作用，西北青年代表大会的成功将是青年统一战线的成功，同时边区青救会也定在10月2号召开边区青年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边区青救会。青年同志们，为援助大会顺利的成功而奋斗吧！大会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原载《新中华报》，1938年8月25日。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延安青年纪念国际青年日大会宣言

(1938年9月1日)

国际青年节，这个反战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日子！

首先大会向祖国和西班牙的前线上一切英勇苦斗着的青年战友伸出慰问的手，并且向一切和法西斯搏斗死难的青年战友致沉痛的哀悼。你们是在西班牙的前线，在长白山和黑龙江畔，在长江两岸，在华北平原，在德、意、日的监牢里，法场上光荣地牺牲了。但是你们的血给我们带来了和平，你们的血，昭示了我们，只有斗争，才有和平！你们的血，从东方，从西方，一齐汇流在一起，汇流成今天全世界反战反法西斯的怒潮！

大会向你们宣布：全延安的青年一定会追着你们的血路，扬起反战反法西斯的巨旗，英勇地向前迈进！

第二，大会正当着世界青年和平大会胜利的闭幕，边区和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召开。我们知道，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不仅是打击了战争的野兽法西斯，而且无疑地使得全世界青年反战反法西斯的阵线有进一步的发展；而边区和全国代表大会正是中国青年统一战线成功的一个关键！我们向世界青年和平大会的闭幕致热烈的庆贺；同时也向边区和全国青代大会的召开给予无限的同情与赞助！

第三，大会正当着全国抗战的紧急关头，所以大会号召全国青年为保卫大武汉，坚持三年抗战的胜利而奋斗！

大会号召一切在后方的青年立刻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参加武装的战斗，只有武装的战斗才能最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大会号召一切流亡的青年,立刻组织起来,参加到各种抗战工作部门里,为打回老家而奋斗!

大会号召一切在敌人占领区的青年,你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被禁止说祖国的话,你们的父母、姊妹、兄弟被屠杀蹂躏,立刻团结起来吧!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保卫自己而奋斗吧!

大会号召全世界有血气爱好和平的青年,更有力地来援助中国吧!中国的胜利就是世界和平的胜利!

最后大会认为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只有全国青年的团结和统一!任何的磨擦、分裂,都是对于抗战有害的。所以对于促进全国青运统一的边区和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号召全国青年,应给以热烈的注意和积极的援助!

边区和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成功,就是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基石!

延安市国际青年节纪念大会

原载《新中华报》,1938年9月15日第2版。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任务

——冯文彬在边区青年代表大会的报告大纲(节录)

(1938年10月3日)

一、目前政治形势(从略)

二、青年运动现状。

1. 一年来的概状:边区青年是全国青年的一部分,每个边区青年都该注意全国青年运动的状况。这样,才能使边区青年运动加速发展,成为全国青运的模范。

去年我曾经说过,边青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变过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改组,是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为号召与团结更多的青年,是为组织更多青年去与日寇斗争。

根据历史的发展,从青救筹备会到现在可分三个时期:

①青年团的改造至抗战开始:这是开始转变的时期,是由狭隘的共产主义运动转变为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青年运动。

②自筹备会至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这个时期是开展时期,冲破了只用政党形式的组织,按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而组织各种形式的青年组织。由于我们工作的方式与方法的改变,全国的青运是有着极大的发展。根据统计,全国青年有组织的,有基础的已经有五十多万(从前只有十余万),自然,与全国青年数目比较起来,相差太远了。

全国青运,是还在开展着。这些组织,有国民党领导的,有共产党领导的,有宗教性质的,有统一战线的。就组织方面说来:有综合性的职业性的——有半军事的,有全国性与地方性的——等等。这些团体虽然在领导上或性质上有些不同,但他们的总的目的与方向是同一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③第三时期: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这时情形有些变化。首先由于我们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与立场,各方面的青运皆有了极大的进展。各地的青运是表现得更活泼、更勇敢。其次是青年思想上的进展,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前进书报杂志在青年中广泛地推行着。末了,是国际的影响。由于国际学生代表团的来到中国,世青大会的开幕,法国、西班牙青年统一战线的建立,给中国青年做了榜样,鼓励了中国青年的前进。

今天,青运是有了很好的发展,一天天地在向前进步。自然,也有坏的一面,个别的部分的地方也会有着相反的现象——如西安、武汉、贵州等地的逮捕青年等。某些顽固分子阻碍,弄得不必要的磨擦。但这些在抗战中是会克服的。

当然,今天的环境是更复杂、更困难。可是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我们不应抱着老一套不放手,我们应该依据具体的、各别的环境及其发展,而灵活地应用与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与方法。

原载《新中华报》,1938年10月10日。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中共中央关于 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

(1939年2月20日)

为了开展全国各地的妇女工作，中央有如下决定：

一、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决消灭党的一切组织与党员中对于妇女及妇女运动所存在的那种陈旧的、庸俗的及中世纪的态度的各种残余，纠正一切对于妇女工作的轻视、忽视与消极的态度。

二、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认真的经常检查与帮助其工作，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内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其中的工作人员，不应经常调动，以造成真正熟悉妇女运动的干部，使妇女运动的经验能够不断的积蓄起来。

三、动员全党女干部与女党员，起来担任妇女工作，鼓励她们，使她们对于妇女工作发生兴趣，相信妇女自己的力量，帮助她们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并用同志的态度耐心的纠正她们的弱点与可能发生的错误。

四、注意于女党员的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

五、很好的根据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关于“三八妇女节”及一般妇女工作的指示，准备将要到来的“三八节”工作及切实开展一般的妇女工作。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

《解放》周刊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 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

(1939年3月3日)

一 目前妇运的总方针

根据党六中全会的决议,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坚持抗战,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目前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以便坚持抗战到底与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缩短到抗战胜利去的过程,抗战建国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

二 现阶段妇运的特点

一、目前客观环境特别有利于妇运的开展,由于:

第一,日寇的加紧进攻,烧杀抢夺,尤其是对于妇服许多弱点缺点,那末,再好的客观条件,也不能变成为抗战的力量,对于抗战是莫大的损失!

目前妇运的主要困难和阻碍是:

第一,最大多数的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生活上处于非人的地位;

第二,不仅在敌人占领区内,敌寇对中国同胞——尤其是妇女的任何解放运动,加以最野蛮的摧残;同时,即在敌未占领区域的许多地方,还有不少顽固、落后、反动的力量;障碍和反对妇女运动

之开展；

第三，宗法社会的传统和家庭困苦情形烦琐事务的压迫，使妇女大众很少参加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可能。

中国妇女要打碎这三条捆在自己身上的铁练〔链〕，首先要靠自己的力量。要有力量，必须使自己壮健起来；壮健起来的要素，是克服本身的弱点和缺点，是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组织。

目前妇运本身的主要弱点和缺点是：

第一，最大多数的妇女仍是无组织，少觉悟；

第二，妇女干部的缺乏和许多知识妇女本身甚至有轻视妇女工作的倾向，尤其是有一部分人特别轻视妇女基本大众——劳动妇女中工作的有害倾向的存在；

第三，妇女本身的团结不够，特别有一部分上层妇女，为私有财产、党派偏见、或奢侈享乐的腐化性所限制，不能把抗战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致她们之中不仅有些人至今不热心抗战和动员妇女，而且还时时对动员劳动妇女抗战的工作，加以仇视和阻碍；

第四，许多地方的妇女运动，至今还未得着共产党的有力领导，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妇女干部异常缺少，同时也由于全党对妇女工作注意得非常不够。这是党中央在其最近指示中已经指明了的。这些弱点和缺点能否克服和克服的程度，首先要看我们共产党——中国工人和劳动者的先锋队的各个党部和每个党员以及一切先进战士在妇运方面的努力如何而定。

三 对目前工作的意见

一、建立广大妇女群众的抗战建国工作的统一战线问题——一切妇女工作的干部必须注意在抗战建国的基本原则下，团结各党派、各阶级的妇女群众，同时，不仅须注意下层妇女的思想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上的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须注意上层妇女统一战线之建立和有系统地吸引上层妇女参加抗战及妇运的工作，因

为根据中国社会环境的特点,及过去工作的经验,这种上层妇女的参加运动的积极和统一战线的建立,时常大大地便利于妇运工作的开始和发展,以及广大妇女群众统一战线的建立;为达到建立妇女统一战线的目的,不应轻视或放弃任何性质任何形式的实际工作的机会与可能,如慰劳、救护、自卫、宣传、教育、保育儿童、办合作社、开手工厂、帮助军队服务等实际工作,都应看作是组织和接近妇女大众以及建立妇女上下层统一战线的机会。

二、妇女大众的组织问题——虽因地域、习惯、客观可能和妇女主观接受程度各有不同而异其趣,但原则上应向着达到使各地组织的群众性、统一性、和民主性的目标前进,不管开始时用何种姿态出现,主要地要使这一组织形式和工作内容,能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所爱护,和乐意于参加组织生活和工作。同时,统一组织绝不应了解为组织和工作的单纯化,相反地,只有广大妇女加入到种种不同的组织和工作中去,才能把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能力和志趣的妇女组织起来。所以各地除现存的妇女会、妇联会、妇教会、新运总会及其分会,或其他名称的妇女组织应大量发展会员外,并在这些基本组织的周围,把会员和非会员组织在各种不同的战时工作队中,这样来建立会员的日常生活和吸收积极分子入会。没有基本组织的地方,也只有经过发展各种工作形式的妇女小组(会或队等)来达到统一组织的目的。应当反对那些脱离群众,借统一为名,而拒绝广大妇女群众于任何组织之外,或借统一为名而实行并吞以至封闭解散各种妇女团体的言论和行动。加入现存的一切公开合法的妇女团体,有必要与可能的地方,建立各种各样适合当地当时妇女需要的新的妇女团体,是当前重要的任务。“组织就是力量”,谁妨害和轻视这个工作谁就是动员妇女抗战和争取妇女解放的罪人!

三、妇女大众的教育问题——要动员妇女抗战,要达到妇女解放必须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准、政治觉悟和培养她们的工作能力。

一方面向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建议,要求给妇女大众设立免费教育的学校,同时,用群众自己的力量和热诚,尽可能地设立识字班,夜校,小组,救亡室,话剧团等,以便经常的进行广泛的识字启蒙运动,启发妇女的民族意识、民主思想和基本的政治觉悟。设立各种训练班,同时,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培养与提拔妇女干部和领袖。利用一切机会灌输抗战常识、社会科学、防空防毒、医药卫生、救护保育等常识;同时必须尽可能地使妇女受职业教育,妇女受武装训练,学习射击等等。同时,在妇女中用说服教育的方法逐渐达到充足,破除迷信及改变恶习惯,还是重要的工作之一。

四、妇女大众的生活改善问题——极端痛苦的妇女生活是动员妇女时最大障碍之一,相当改善妇女生活是抗战和妇运的需要。

第一,在消极方面是赈济、慰劳、募捐,向政府或地主资方要求减租减息改良待遇及津贴抚恤,实行有钱出钱和合理负担的原则等,都依不同条件和可能程度而定。

第二,积极方面是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运动,如学习耕种,开办手工厂,参加合作社、互助社及设法办保育院,解决一部分人的育儿困难等事。这些虽主要的要看所在地的政府能否实行初步的民权民生政策,但同时也看群众的组织和力量如何而定;用群众自己的力量和互助,不仅能达到自己生活的初步改善,而且可以帮助妇女的教育和团结工作。

第三,改善妇女生活,必须首先注意到改善抗日军人家属的生活,要求和督促政府澈底实行《优待出征军人家属条例》;发动群众优待、尊敬、帮助、慰劳抗属,组织和教育抗属,是目前妇女工作主要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应发扬和学习陕甘宁边区和冀察晋边区等的工作经验。

第四,必须注意妇女的家庭问题,适当的帮助她们解决困难,正确的处理她们的家庭纠纷,也是妇女团体的任务。要恰当的运用冀察晋边区的经验:提出“家庭和睦”的口号(或其他口号),和陕

甘宁边区经验：经过群众同意和大会奖励模范婆婆，批评（必要时处罚）打媳妇的婆婆，开婆媳的联欢会，家庭座谈会等，此外如拜寿聚餐、新婚晚会，或遇模范老人死时，发动群众吊孝，送纸，必要时募捐抚恤其家属及治丧等机会教育与团结妇女。

但妇女团体和妇女干部，绝不应过于干涉她们的家庭细事，而应熟悉她们的情况，尽力帮助她们排难解纷，同时应耐心的利用家庭日常生活问题，启发她们的思想觉悟和引导她们注意政治问题。

五、提高妇女地位问题——与一切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行动和言论作坚持的严肃的恰当的斗争，用以逐渐克服封建和顽固的思想制度，是动员妇女的必要条件。要求政府禁止打骂、虐待、侮辱妇女和童养媳，并颁布明令禁止买卖妇女和杀婴的法令，颁布禁止缠足及保护孕妇、产妇和儿童等法令。这里我们不应空口反对“贤妻良母”的口号，而应作新的解释，应创造无数抗日革命的模范妻子（贤妻），模范母亲（良母）以至模范女儿、媳妇、婆婆等。

在进行上述各项妇女工作中，必须注意：（甲）首先动员和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及女学生，培养和训练她们成为妇运的干部，使她们不仅成为在妇女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的主力，而且成为到女工、农妇及家庭妇女中去工作的桥梁和先锋。（乙）妇女工作的范围，不能长期停留在知识妇女方面；应该向广大劳动妇女——目前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中去进行艰苦繁杂的教育工作，动员和组织工作。必须认清：目前关于兵役问题、生产问题及帮助军队和反对敌寇汉奸等问题的有效解决，离开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和组织是不可能的。

四 加强全党对妇女工作的注意

一、只有加强全党对妇女工作的注意和克服党内许多党员轻视妇女工作的现象，才能把妇女工作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才能转变党内工作最薄弱的这一环。共产党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政党，首先

是代表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一切人民利益的政党。因此，共产党对于妇女解放事业的同情忠实和有办法，是任何其他党派所不及的。在苏联，在过去的苏区和现在的边区的事实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中国广大的劳动妇女和一切先进的妇女对于共产党才热烈的爱戴和拥护。但今后须要我们更加倍的注意和努力，如果我们轻视妇女工作，实际上将拖延革命和抗战胜利的到来。因此，忽视妇女工作的党员(不论男女)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

说服和纠正党内外轻视妇女工作的观念和意识，及有些女同志不愿作妇女工作的现象，要在党内进行广泛的教育和转变。女党员除因特殊工作需要外，均应作妇女工作。

二、扩大党在妇女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经常不断的用马列主义教育妇女，大量吸收觉悟积极的女工农妇及女知识分子入党，把这个工作看作各级党部日常重要工作之一。

三、有计划地、大批地培养提拔和保护党和非党的妇女干部，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枢纽，除了党的训练班应尽可能的吸收女党员外，应办专门的女干部训练班。特别注意训练女工、农妇的党员，不要忽视妇女工作的人材，不要轻易调动妇女工作的干部，各级党应指令负责同志特别负责帮助各个女干部和女党员，要更多的关心她们，尽可能地帮助她们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问题(如疾病生育等)，但同时女同志的错误不应“客气”或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应说服教育和进行必要的斗争。

四、各局、各省、县、区委，应设立妇女部，除部长外，设干事；工作多时，部外可设妇女运动委员会，吸收各方面妇女工作干部参加，同时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不论男女)，应有一二人参加此委员会。不论部或委员会开会时，局、省、县、区委负责人必须有人参加。支部则设妇女干事。各省、县党部与省、县妇女部、妇委(以及各重要区和支部)应共同负责定期向中央妇委作报告。

五、尽可能出版通俗的妇女读物，帮助推销先进的妇女刊物，

并经常供给她们稿件。女同志应多练习写作能力,经常给党报(解放、新华、新中华及其他地方报纸等)投稿,应看成各地妇女部和妇委及女同志的日常工作之一。冀察晋和陕甘宁边区的妇委,应负责于短期间把已有的工作经验整理出来(要多写具体例子和经验),供给其他各地,同时今后各局、各省、各县、区妇委应负责经常不断的记载各地的妇女工作经验。以纠正过去各地参加妇女工作的同志不愿写文章报告,以致工作经验不能交换不能积累的缺点。

这一指示信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和通过的,希望各级妇委接信后除本身讨论外,并立即提到各级党部(直到支部)详细讨论,按照各地不同条件具体执行,并请速将你们讨论的结果和意见告诉我们。

致同志的敬礼,并祝健康和努力!

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

三月三日

根据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

《解放》周刊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 与“五一”工作的决定

(1939年4月12日)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过去现在都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地位。抗战以来,工人阶级虽然遭受空前的牺牲,但是他们英勇参战,忍受饥寒退出日本工厂,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日夜维护交通运输,积极生产保障军队与居民的供给,购买公债,募捐慰劳等等,这些都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最觉悟的并且是抗战中重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许多地方对于工人组织之歧视,由于许多厂主资本家只顾私利,不明大义,对工人运动之压制,由于工人内部统一运动的努力不够,还由于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工作还未达到必需的程度,所以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组织工人阶级并发挥其力量到最高度,是争取抗战胜利最重要工作之一。

第二,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基本的方针是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在统一运动中把工人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战争的各方面工作,在抗战中去解决工人失业饥饿与改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以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

第三,组织工人的方式上,应该依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运用一切可能去参加或组织各种工人的团体,进行各方面组织与教育工人的工作。

一 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党必须运用各种方法与方式加强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组织工人阶级,教育他们,善于保持力量,蓄

积力量，巩固和扩大已有的阵地，准备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二 在某些将被敌人占领的城市产业中，党应该在短时期内准备动员最大部分的工人去参加乡村的游击战争，留下的应该只是必要的与可能存在继续工作的力量，以便继续在群众中工作。

三 在华北及一切可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应该尽可能的把工会组织起来，吸收最大多数的工人于工会之内，与农民及一切抗日团体结成亲密的关系，使工会成为抗日政权下有力的团体。

四 对于各地抗日各党派所领导的工会，我们党应该赞助他们，领导工人去参加这些工人团体，赞助他们的扩大与充实，尽我们一切可能去提高这些工人的政治觉悟。

第四，在准备今年“五一”的工作中，各地党部应该根据这一决定，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参加或组织“五一”的大会、纪念会、座谈会，解释“五一”的意义与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组织工人及领导工人参战的各种工作。

第五，为了开展职工运动，在党的组织上应该：

一 立即建立与健全各级党委员会下的职工部与职工运动委员会，或民运部中的职工科，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职工部与职委应成为地方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部门之一。

二 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用最大力量去建立工厂支部，发展工人党员，经常吸收因日寇进攻而由城市工厂散到乡村中的觉悟的工人入党，吸收乡村中觉悟的雇农入党。

三 加强对工人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注意培养工人干部，吸引工人干部来参加适当的工作，并经常在政治上、工作上教育他们。

四 各地党部应经常的向中央作该处职工运动的报告，“五一”的工作报告，必须迅速送来，使中央有可能根据各地具体情形

给各地和全国职运以指示。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

根据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解放》周刊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

(1939年11月1日)

(一)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在投降与反共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否则也是不可能的。抗战以来,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工作,有了相当广大的发展,因此扩大了党的武装力量,创造了游击根据地,生长了全国的进步因素,坚持了两年多的抗日战争。但同时严重的存在着几种错误倾向,这就是:(甲)注重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许多党的领导机关,或者根本不把群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内,不去指导下级如何做群众工作,或者讨论与指示的很少。许多支部,许多党员,脱离群众,有根本不做或不知如何做群众工作的。(乙)在初步发展了群众工作的地方,许多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深入群众工作的讨论与指导,使群众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中央责成各级党部,立刻纠正这些错误现象,使全体党员懂得,共产党只有进一步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当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在可能发生的不利于党与抗战的突然事变中,不使党与抗战遭受意外的损失。

(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用全力研究并指导下级直至支部如何在当地进行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工作,利用政府已经颁布的纲领法令及当地习惯许可的方式,尽

其可能的使党的支部与当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接近起来,把他们一步一步的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进行各种有利于群众同时有利于抗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生活改善运动,那怕是从极微小的改善开始,也是好的。对于下级地方政府机关(保甲与联保)地方文化机关(小学及教育会)地方经济机关(合作社等)地方武装力量(自卫队及民团)应尽其可能使之掌握在共产党员,左派人员与公正士绅的手中。这一切,必须在同当地左派人员与公正士绅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当地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在估计到可以长期保存党的力量积蓄党的力量而不破坏的条件下进行。在国民党区域,必须使党的群众工作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才能进行,才有效果;而党的组织工作则须使之极端秘密起来,才能保存,才能巩固,必须使党的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严格区别而又适当联系,极力避免过去内战时期白区工作失败经验的重复。因此,一切国民党区域的共产党,必须有步骤的,有深远计划的,既不懈怠又不冒进的利用一切公开合法可能而不使党的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相混同的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与群众生活改善工作。以群众工作之好坏,作为判断当地党的工作之好坏的主要标准。一切不了解群众不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党部与党员,都不是好的党部与党员。关于沦陷区域工作,除应依照沦陷区特殊环境之外,原则上适用上述规定。

(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实行。在政治改革方面,必须实行民选制度,凡一切阻碍民众运动发展的人首先是地主阶级,必须在群众拥护的基础上,有步骤的排除于各级政府机关之外,而采取孤立他们的政策。只有工人农民抗日知识分子,及

不阻碍群众运动的人才能加入政府办事。尤须注意区，乡，村三级政府的整理，因为地主及坏分子，最易冒称抗日，躲藏于区，乡，村三级政府机关之中。这样使政权民众化，并不妨碍我们与一切公正士绅及还能帮助抗日的地主商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统一战线，例如鼓励他们捐钱捐粮捐枪帮助抗日及和他们保持必要的连络等。所有各级政府的组织成份及其政治经济设施，各级党部必须认真加以检查。至于地方民众团体必须由党员领导深入群众内面去发动为着群众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依照自动自愿原则，将最大多数群众一步一步的组织于工会，农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儿童团体及民众武装团体（自卫军少先队）之中，为参加抗日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而斗争。这些民众团体，负有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积极性的重大责任。当地党部，必须认真检查民众团体的工作。党的支部，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工作，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委员与政治部，有积极帮助上述政府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责任，并须教育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不得有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不得有不尊重地方党政机关不尊重地方民众团体的行为，必须纠正把党政机关与群众团体看成军队办差机关的错误观念。地方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必须在一定时期之中总结群众工作的经验，以其结果指导下级的群众工作。

（四）在目前时期中，共产党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根据上述方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之下，一步一步的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克服投降反共危险具有最后决定的意义。对于巩固共产党，对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有深入群众，并领导群众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有可能。中央希望各

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对此加以严重注意。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 给各级党部的指示

(1940年2月1日)

自从去年“三八”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全国妇女运动指示和中央妇委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给各级党委信发表以来，我们党在妇女工作方面，确实有了相当的转变，各级党委内妇委或妇女部的成立，各级党委中负责同志担任妇女工作，出版《中国妇女》月刊，创办中国女子大学，妇女党员有相当的增加。各地妇女工作有相当开展，都是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同时，许多地方妇委工作还是有名无实的现象，许多地方女党员的数量还是很少，许多地方对于培养女干部工作还是注意得不够，对建立和扩大各界妇女统一战线的工作还作得不够，对深入广大劳动妇女中工作还进行得不够，许多地方党部对妇女工作经验还很少认真总结，都证明党在妇女工作中还有极多的弱点，因而使妇女工作还未得到应有的成绩。中央为使全国妇女工作继续开展，对今年三八节工作有下列指示，望各级党委及妇委一致切实认真地执行：

(一)进行广大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讨汪运动和促进宪政运动，把这些运动与各阶层妇女的切身利益要求联系起来，号召她们反对助汪为虐的女汉奸陈璧君等，在努力开展反汉奸要民主的群众运动中，建立最广泛的各阶层的妇女为抗战为宪政而奋斗的统一战线。

(二)尽力吸收先进的知识妇女和进步的女工农妇入党，增加女党员的数量，大胆地提拔妇女干部参加各种革命工作，注意培养

大批妇女干部。

(三)在广大妇女群众中,广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今年各地“三八”大会上,应通过告世界妇女和日,英,法,德,意,及苏联妇女的简短函电,建立中国妇女和国际妇女反帝反战的亲密联系。

(四)今年三八节中央决定在延安进行下列工作:(甲)举行妇女生活展览会;(乙)开妇女运动大会;(丙)奖励学习生产工作抗属中的模范妇女及热心妇女儿童工作者;(丁)慰劳抗属;(戊)群众大会和晚会等。在八路军新四军驻军区域中的地方党,望斟酌当地的情况尽量举行类似延安举行之“三八”各项或某几项工作,其他地方的党委,则应在三八节用各种适当的方式,实行鼓励努力工作和学习的女干部女党员。

(五)各级党委须将今年“三八”工作情形及一年来妇女工作经验教训总结,迅速向中央妇委报告。

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一日

根据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新中华报》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五一”工作的指示

(1940年4月16日)

中央对于“五一”工作有以下的指示：

一、处于投降分裂危险的严重关头的今天来纪念“五一”，应当使五一节成为工人阶级检阅和总结自己执行抗战任务和继续组织与发挥力量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斗争的节日。

二、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党的力量去加强敌我后方中心城市职工运动，把教育和组织大城市中的工人看成中心工作，为展开中心城市职工运动，必须克服一切轻视职工运动的倾向。

三、物价与工资剪刀式的发展使工人生活陷于极痛苦状态，目前改良工人生活成为迫切的中心问题，党应在团结抗战原则下力谋工人生活改良。

四、采取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以达到改良生活的目的，应避免提出过高过多的条件以便易于胜利，并随时严防汉奸托派顽固派利用工人的愤闷情绪作破坏抗战的阴谋煽动。

五、应利用现有合法的组织形式去团聚广大工人群众，一切斗争活动均以维持合法存在与积蓄力量培养优秀工人干部为主。

六、必须在工人中揭破日寇汉奸汪精卫托派及顽固分子引导工人到分裂和反共道路上的阴谋，党应力谋工人组织的团结与统一。

七、在游击区与边区区域应广泛的动员工人到八路军新四军去扩大与巩固工救会，发扬生产热忱提高生产。

八、在各种党和非党的学校和训练班中特别注意培养工人干

部的工作。

九、各地党应以此指示布置“五一”工作并检查一年来执行去年四月十二日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定的程度报告中央。

中央书记处

四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加强 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

(1940年6月7日)

(一)从抗战以来,华北及战区几十万青年参加了军队,百余万青年已组织了青年救国会,并开始以青年的力量,建立了青年营、支队、纵队,这是一个成绩。但由于青年救国会组织还不很健全,故有组织的动员青年参战还很不够,在文化教育运动中青年救国会的推动作用还很不够,青年救国会还没有成为很有生气的活跃的组织。为了广大的有组织的动员青年参加军队,为了加强各青年团体在文化教育运动中的作用,为了使青年救国会成为有生气的活跃的组织,中央提出在华北及战区青年工作中以下列四项为当前的中心工作:甲、建立青年半武装(不脱离生产的及半脱离生产的)及武装组织(正规军的补充性的);乙、加强青年中的文化政治教育,并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国民教育及文化运动;丙、改进青年生活,提倡青年服务以提高青年社会地位;丁、积极参加瓦解敌伪军工作。

(二)为了更有利于有组织的动员广大青年参加军队参加战争,因此:

1. 在现有自卫队内的青年队除军训及军事指挥仍属原来军事部门外,其政治训练及教育工作在已有健全的青年救国会的地区内均可由青年救国会负责。在尚未建立自卫队的地区内,青年应单独组织普遍的半军事性的组织。

2. 在青年队中组织青抗先、模范少队等类的先进分子组织,

加强他们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动员他们参加战争并逐渐的不断的吸收他们加入正规军。

3. 成立属于正规军的青年营、青年支队、青年纵队,军队机关和部队,应派遣必要的军事干部及老部队为骨干,使之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由青年救国会负责动员青年加入军队,并派遣政治文化娱乐干部。军事指挥和行政上仍归军事机关和正规军司令部,但应使之成为能够吸引青年参加工作的正规军。

(三)青年救国会的一切工作必须深入到乡村。其支点放在青年武装及民族革命室和小学校。从工作中去健全村的青年救国会,并定期民主的改选村青年救国会。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的工作作风。

(四)青年救国会要团结全体青年:

1. 吸收青年工人,贫农参加青年救国会的组织和活动,但又不应该排斥地主商人的子弟。

2. 吸收青年妇女参加青年救国会的组织和活动,同时不要减弱妇女救国会而应帮助妇女救国会。

3. 积极团结小学教员,组织小学教员联合会,吸引进步的小学教员参加区村青年救国会的领导。

4. 吸收乡间游离知识分子青年参加各种工作,并协助政府建立相当正规的中等学校。

5. 青年救国会应积极的注意影响敌占区及大后方的青年。

(五)各级青年救国会应当大胆的吸收非党的青年干部参加各种工作,非党青年干部之比例一般的应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六)加强青年工作是全党的责任,因此各级党必须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

1. 定期检查和讨论青年工作。

2. 区党委及其以下的各级青委均转入青年救国会中去工作,取消原有党团合并于青委。青委书记应参加常委,如原有青委书

记不合参加常委资格者，应暂时由党常委之一兼任青委书记。上级青委可与下级青委有工作上的联系。

3. 分区委以上的青年干部，在今后相当时期内一般的不要抽调作别的工作，同级党调动同级青委主要干部时，须与上级青委协商。分局及区党委的党校应酌办比较长期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培养县、区级的青年干部。

4. 在各个根据地区内，应按工作需要规定青年工作的经费，并由青年救国会高级机关统一支付。

(七)党的青年工作干部应该认识青年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安心于自己的工作，要使人看重青年工作的地位基本上要靠自己的努力与工作的成绩。

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 关于纪念国际青年节的通知*

(1941年8月1日)

(一)今年国际青年节是处在德意法西斯向苏联进攻,日本法西斯继续进攻中国的紧张局势下,因此纪念今年国际青年节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纪念今年的国际青年节的任务首先是在于加强青年的国际教育和国际青年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三)中国青年应当在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内的亲日亲德派分子,加强中国青年的团结,加强中国青年与世界反法西斯青年的联系,同情和援助苏联等等的口号之下进行今年的国际青年节。

(四)在根据地内^①应做下列一些工作:

①发动青年及青年团体向苏联青年及红军写信,加强与苏联青年的联系。

②用根据地内青年团体名义写信给英美青年团体及远东殖民地国内的青年,号召他们援华,号召他们反日反德,并为他们自己民族独立而斗争。

③加强和检查瓦解敌伪军工作,向日本青年写信发传单送礼

* 《新华日报》也于1941年9月7日登载了这个《通知》,除标点及个别词句外,文字与《解放日报》相同。

① 《新华日报》此处为“在边区及游击根据地内”。

物,并建立瓦解敌伪军和日本青年联系的经常工作。

④分区的检阅青抗先,加强青抗先的工作,动员青年参加军队和扩大青年的武装组织。

⑤在国际青年节召开青年群众大会,组织运动会及晚会等。

(五)今年国际青年节规定在9月7日举行。

(六)各地将纪念国际青年节的工作随时报告中央青委。^①

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8月17日。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① 《新华日报》未登载此第(六)条。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筹备会 致世界青年团体书

(1941年11月27日)^①

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学联、并转苏英美各国青年团体及全世界一切拥护人类文明、爱好民主自由的各国青年团体和学生团体：

由中国西北青年救国会及延安市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的发起，我们将于1942年的1月5日^②，在延安召开中国青年的反法西斯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将有全中国各地区各职业界的各种青年代表。

我们愿意以这个庄严热烈的青年反法西斯大会，来表示我们中国青年对野蛮残暴的法西斯强盗的抗议，来检阅我们中国青年的反法西斯阵容，来向苏英美以及全世界各国站在反法西斯战线上的青年兄弟姐妹们声援！

亲爱的朋友们，法西斯强盗所制造的空前的罪恶战争，把全世界的和平人们拖向毁灭的途程，尤其是全世界青年，不得不首先被驱使到残酷的战神的魔掌下，流血、牺牲。法西斯强盗吞噬了无数千万青年的身命，法西斯强盗在〔努〕力扑灭整个人类的青春！

但也正是由于法西斯强盗的罪恶进攻，更使我们认清了自己的神圣责任：为了开辟我们未来的光明前途，为了争取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全世界的青年，必须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宗教信仰

^① 《新华日报》注明日期为“11月29日”。见1941年12月1日的《新华日报》。

^② 据《新华日报》1942年1月10日载，此次大会实际是在1月4日至6日举行的。

仰，象一个人似地亲密地团结起来，合力把横暴的法西斯主义深深地埋葬！这是值得我们欣幸的，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青年统一战线，已经空前广泛有力地形成了。

因此，我们相信此次中国青年的反法西斯大会，是一定能够得到你们的同情和赞助的。并且热烈地盼望着：我们这次大会能够获得你们的指示。

此致
反法西斯的青年的敬礼！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筹备会
于中国延安

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30日第4版。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延安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 告世界各国青年书

(1942年1月6日)

世界各国的青年们：

在战争的烽火烧遍了整个地球，侵略阵线与反侵略阵线，已到生死决斗关头的今天，中国青年向为反对法西斯奴役而艰苦奋斗着的全世界青年，致送热烈的战斗的敬礼！

德意法西斯强盗挑动了西方的战争，日本法西斯强盗挑动了东方的战争，这次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残酷战争，完全是德日意法西斯强盗制造出来，硬加到我们头上来的。只有消灭了强盗的法西斯主义，才能消灭贻人类以莫大祸害与痛苦的战争，才能为我们年青一代，开辟光明的未来。

消灭法西斯主义！这是今天全世界青年唯一的神圣任务。

我们向英苏的青年致敬！你们反对法西斯祸首纳粹匪徒的英勇战斗，不但保卫了自己的祖国，而且也保卫了全世界青年的光明前途，全世界青年的心，是朝着你们的。

我们向美国青年致敬！你们一贯地坚决站在反法西斯的岗位上，热烈地援助民主国家，热烈地援助中国，你们这种伟大的侠义精神，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青年的尊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青年，已经面对同一敌人，我们将和你们携手前进，争取反法西斯的共同胜利。

我们向所有对日德意宣战各国的青年致敬，你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你们将一定得到胜利！

我们向法西斯强盗奴役下的各国青年敬致慰问，中国青年对你们所受的灾难，表示无限同情！但你们的灾难，只能和侵略的法西斯主义一同消灭，请你们加紧反法西斯的战斗，以争取自己的解放。

我们向德意日及参加法西斯阵线的各国青年敬致忠告：你们和世界其他各国的青年，同样都是世界未来的主人翁，人类文明的承继者，我们全世界各国的青年，彼此都是朋友，不是敌人！战争制造者法西斯强盗引导我们的青年走向自相残杀的战场，这是全世界青年的公敌！请你们立即掉转枪头，和我们一同前进，打倒罪恶的法西斯强盗！

最后，我们正式宣言：中国青年竭诚拥护今年1月1日在华盛顿签字的“二十六国联合宣言”，因为这是战胜法西斯强盗最有力的武器。我们竭诚拥护莫斯科、伦敦、墨西哥先后举行的国际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因为这是国际青年团结的光辉榜样。

我们高呼：

国际青年团结万岁！

全世界反侵略阵线胜利万岁！

延安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

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1月11日。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的 建设和延安整风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 怎样进行党的宣传

(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决议)

—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之出版,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生活中的最大的事件。由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出现,于是党就得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新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党史读本,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历史。在这中间,叙述了和归纳了共产党的伟大经验,而这种经验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党所未曾有过的,而且现在也是没有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在解决关于精通布尔什维主义的任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是说,用社会发展规律和政治斗争规律的知识来武装党员的事业中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提高党与非党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警觉性的工具,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的工具。

在创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联共(布)中央是以下列任务为出发点的:

(一)必须给党以关于党史的统一指南,这个指南是正式的、由联共(布)中央审查过的、对联共(布)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而不容许有任何随意的解释。由于联共(布)中央所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出版,于是就使在从前出版的

许多党史教科书中所含有的、在党史叙述方面的随意态度和紊乱现象,使对于党理论和党史最重要问题的庞杂的歧异观点和随意解释,从此终止。

(二)在创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联共(布)中央提出任务要消灭那在宣传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分离的有害现象,这种现象是在最近几年内形成的,其结果,就是人们竟把列宁主义当作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党史而独立的学说来讲授,却竟然忘记:列宁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长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基础,而不知道列宁主义的这个基础,就不能了解列宁主义。

在创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联共(布)中央提出任务要给予这样一个关于联共(布)理论和历史的指南,在这个指南中,把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被人勉强分割的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列宁主义,重新统一成为一个整体,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应和党的政策联系起来,就是说,要给予这样一个指南,在这个指南里,应表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之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完整性和继承性,应表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致,并叙述列宁及其学生以综合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新经验为基础而添加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新成份。

(三)有些旧教科书,首先就围绕着历史人物来叙述联共(布)党史,其目的是以人物及其履历来教育干部。而“简明教程”则与此相反,它是以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为基础来叙述党史,其目的是首先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教育党的干部。

在创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联共(布)中央是以根据历史事实来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任务为出发点的。联共(布)中央认为:这样来叙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最适合于事业利益的,因为根据历史事实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要好些,自然些,使人容易了解些;因为联共(布)党史本身,就是行

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力,是已被实践考验过,已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经验上考验过的;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在与实践发生最密切联系中,是以综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为基础而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四)在创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联共(布)中央提出任务要使马克思主义作品摆脱那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史许多问题方面的简单化和庸俗化。

这种庸俗化和简单化,是表现在——例如——流行到最近时期的、显然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早已被党所斥责的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上,当时,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曾被某些假理论家和宣传家从半“社会革命”党人立场上来解释。

对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问题的不正确解释,也是这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表现。

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现代战争性质问题的观点,不了解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间的区别,把布尔什维克看成是某种“和平主义者”的不正确观点,——都曾得到过广泛的传播。

直到最近期间,在历史科学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庸俗化,是与所谓包克罗夫斯基“学派”联系着的,这个“学派”歪曲地解释历史事实,它违反着历史唯物主义,从今天的观点、而不是以历史事件所处的条件的观点来分析历史事实,因此也就曲解了真实的历史。

由于用反历史观点来伪造真实历史的结果,由于用反历史观点来企图点缀历史以代替确实地叙述历史的结果,于是在我们的宣传中,例如有时竟把党史描写成为一帆风顺的胜利道路,似乎没有经过任何暂时的失败和退却,——而这显然是与历史真理相矛盾的,因此也就妨碍了正确教育干部的事业。

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糊涂见解,还表现在对于苏维埃国

家所抱的不正确观点之流行上,还表现在降低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和意义上,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掌握在工农手中的、用来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保卫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胜利品不受资本主义包围势力所侵犯的主要武器。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使这种以及与此类似的庸俗卑鄙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象,从此终止,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恢复了起来。

(五)在创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联共(布)中央提出任务要具体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和意义,这个理论用科学方法来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理论教导我们运用这些规律来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这个理论也如任何一种科学一样,是不断发展着和不断完善着的,这个理论是不怕以合乎新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个别陈旧原理和个别陈旧结论的。

联共(布)中央所持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干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不通晓布尔什维主义,不克服自己的理论落后性,那他们就会寸步难行,因为,为要执行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有各部门工作的任务,就要求实际工作者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就要求在解决实际活动问题时善于以理论为指南。

如果以为通晓理论只是一小部分工作人员所能胜任的任务,那就错误了。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乃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正是在现时,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当社会主义已在苏联胜利的时候,已造成了无限的可能性,使我们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能够顺利地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党史,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为着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只要有志愿,有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的的决心和坚毅性格就够了。如果——举例来说——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这类的科学是可以顺利通晓的,那末,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之可以完全通晓,就更加不容怀疑了。

(六)在创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联共(布)中央提出

任务要帮助那些从事理论和宣传工作的干部来改造自己的工作，来改善工作的质量，来开始消灭自己的理论落后性，来消灭自己思想修养中的缺点和缺陷，并把宣传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

联共(布)中央所提出的这一切任务，都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解决了。

二

宣传工作的基本缺点是什么呢？

必须向着那个方向来改造党的宣传工作和理论工作呢？

(一)党宣传工作方面的基本缺点，就是党的宣传工作缺乏必要的集中领导，并因此而造成宣传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与无组织状态。

党宣传工作方面的手工业方式和无组织状态，首先就表现于：党组织竟选定那经过小组进行的口头宣传为宣传工作的基本形式，却竟然忘记：小组宣传方法多半是党在不合法存在时期，因自己当时工作条件关系而不得不采用的；而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之下，当布尔什维克党握有如报刊这样强有力的宣传工具的时候，却已造成完全新的条件和可能性，来无限制地扩展宣传工作的范围和集中对于宣传工作的领导。

党组织竟不去利用这些可能性，却继续拘守着旧的宣传形式，而没有考虑到以下一点：就是小组在现今条件之下，已不能成为使我们的干部学习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方法；应当作为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的，乃是已由老辈布尔什维克亲身经验所考验过的方法，即独立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和理论的方法，而党则应当在这方面来帮助干部，其帮助方法，就是利用报刊，利用组织集中的熟练的疑难解答来解答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的方法，利用讲演，利用报告等等。

党组织既选定那经过小组进行的口头宣传为宣传工作的基本

方法,于是就倾心于一种错误的图谋——把一切共产党员都合并到小组之中,专门注重在数量上扩张党的学习小组网,贪求把一切而毫无例外的共产党员都笼统地而且一定要“包括”在党的学习小组之中。

在贪求小组数量时,党组织竟把主要环节——宣传工作质量——抛弃不顾了。

由于小组之繁多,既使党组织没有可能来切实监督宣传工作,结果就使得党组织抛弃了对于宣传工作的领导,把自己的活动变成主要是搜集关于党的学习小组所“包括”的共产党员,小组人数及出席情形的文牍主义的统计材料。其结果,就使小组变成了各自为政的、不受监督的、听凭己意来进行工作的组织。

其次,由于小组之繁多,结果就使宣传员干部全为理论修养薄弱、而且往往是政治上没有常识和未经考验的人来充任,这些人不仅不能帮助党员和非党员通晓布尔什维主义,而且只能以有害的简单化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叙述,并使自己的听众弄得糊涂起来。

在贪求宣传员数量时,党组织竟抛弃了对于宣传员干部的训练和补习的理论领导,并抛弃了对于宣传员在小组中工作的监督。党组织没有把宣传员工作的领导集中起来,借以保证提高在宣传员中工作的质量,却在这方面也采取了贪求数量的错误方针,以在企业中设立大批党研究室,以设立宣传员课堂讨论会、宣传员短期训练班等等方法而分散了帮助宣传员干部的事业。既贪求这些机关的数量而不顾其质量,其结果就使党研究室和宣传员课堂讨论会得不到必要的党的领导,而宣传员课堂讨论会和党研究室之缺乏熟练的指导员干部,又使它们的工作质量减低,使其中工作情形不能令宣传员满意,于是就把出席课堂讨论会和党研究室的事情变成形式上的义务。

党组织既把出席小组变成党员所必尽的义务,又把党员看成

是不能独立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久的初等小学生，于是就采取许多行政手腕来吸收党员参加小组和把他们留在小组中，就以注重琐细小节态度去监视和限制共产党员在小组中的工作。

在小组工作中，流行着一种不正确的、阻碍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发展的小学校式的方法，这种方法表现在为一切小组规定“划一的学习日”，为小组工作规定划一条规，把谈话方法和活泼的同志辩论方法摒弃于小组以外。

除此而外，党组织还倾心于一种官僚主义的有害的事情——“监督”每个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的人并强迫他来报告他所读过的东西。

由于在宣传工作中有这些不正确立场的结果，于是那些在几年当中都必须在同样的小组中学习，而在自己家里研究马克思列宁著作时又得不到应有帮助的共产党员们，就失去其对理论修养的兴趣，而出席小组上课，就往往变成繁重的负担。

既然违背了自动加入小组的自愿原则，既然用官僚主义行政手段而机械地强迫式地把党员列入小组，既然不正确地把小组看成是党教育的唯一形式，于是就破坏了党员们对于自己能够用独立读书方法来顺利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心。因此也就损害了共产党员们深刻而独立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事业，损害了党的干部的思想发展。

必须恢复共产党员们确信自己有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和能力的信心。

必须打破那种有害的成见——以为只有在小组中才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其实，独立读书方法却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时的主要方法和基本方法。

(二)过分夸张小组工作和一般口头宣传而使报刊宣传受到损害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在组织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方面的有害的脱节现象，其表现，就是无论在州委、边委、各民族共产党中央，

无论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宣传部和报刊部都是各自独立存在着。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中,报刊——杂志、报纸、小册子,应当成为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武器,而口头宣传则应当占着辅助的协助的地位。报刊能够使某一真理,一下子就成为一切人的所有物,因此,它比口头宣传要有力得多。而把宣传工作的领导分裂于两部之间,结果就减低报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的作用,因此也就缩小了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规模,造成手工业方式和无组织状态。

党的宣传鼓动部,既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口头宣传方面,既贪求小组数量,于是就没有利用党的报刊来进行宣传工作,而结果就使自己没有切实领导宣传工作的可能。

而同时,报刊部既没有必需数量的熟练宣传员干部——因为他们差不多完全去作口头宣传了,——也就没有能力经过报刊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三)在党的宣传事业中最重要缺点,就是党组织对我们的干部,对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的政治修养事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事业的轻视,而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就是党的、青年团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合作社的、商业的、工会的、农业的、教育的、军事的干部,就是说,党的机关的、国家机关的、集体农庄机关的干部,而工人阶级和农民就是运用这些干部来管理苏维埃国家的。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的实践,既主要是集中于包括工厂工人,于是就忽略了那些担任指挥工作的干部——由昨天的工农所组成的我们的苏维埃的、党与非党的知识分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指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铲除对我们苏维埃知识分子以及对这些知识分子关于列宁主义政治教育的需要所抱的这种野蛮的反列宁主义的轻视态度。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首先就是为供给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工作人员、青年团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干

部,为供给我们全体城乡党与非党的知识分子而写的。

我们忙于实际工作的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的担任领导工作的列宁主义干部,在理论方面是很落后的。在创作党史读本时,联共(布)中央是提出任务要开始来铲除我们干部的这种理论落后性和政治落后性的。

联共(布)中央所持的出发点是:“……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我们善于把我们党的干部自上而下地在思想上加以训练并且在政治上加以锻炼,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外环境中自由地识别方向;如果我们善于使他们成为完全成熟的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能够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那末,我们便把我们的一切任务解决十分之九了”(斯大林)。

联共(布)中央所持的出发点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所要求的,是理论知识,即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工人运动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以及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来运用这些规律的本领。

我们的一切干部组成为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大军。苏维埃知识分子是与工人阶级和农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这是完全新的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所没有的。

无论那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非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不可,至于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则更非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不可了。在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的年代里所成长的知识分子,是由国家机关的干部所组成的,而工人阶级就是运用这些干部来执行自己的内外政策的。这是被提拔来担任指挥职务的昨天的工农和工农子弟。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知识分子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在这里,国家指导着一切经济的和文化的部门,农业也包括在内,所以在这里,每个国家工作人员,为要自觉地和有成效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就应当了解国家的政策,了解国家在国内外的任务。

因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苏维埃知识分子的任务,乃是布尔什维克党最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联共(布)中央认定:虽然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国家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可是,那种对我们的知识分子所抱的轻视态度,至今尚未被铲除,而这种态度乃是把在革命以前时期所流行的对待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态度最有害地搬过来对待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而在革命以前时期,知识分子则是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

这种轻视知识分子的态度,就表现于忽略了在思想上教育干部的工作,忽略了在知识分子——职员、教员、医生、学生、集体农庄知识分子等人中所进行的政治工作,却以轻视倨傲的态度对待党与非党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成为第二等人,那怕这个知识分子是因自己有功劳而被提拔来担任苏维埃国家领导职务的昨天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这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的态度,乃是野蛮的、流氓式的、危害苏维埃国家的态度。必须了解:正因为忽略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在我们的干部中间的政治工作,所以在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既然落到党的政治影响以外和没有思想的锻炼,就在政治上脱离正轨,误入迷途,而成为外国侦探机关及其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走狗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走狗们的俘虏。

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铲除这种对知识分子所抱的“马哈叶夫”式的反列宁主义的态度。

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苏维埃知识分子。

苏维埃国家政权,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能有成效地领导国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对苏维埃知识分子进行这种教育的工具。

三

联共(布)中央决议：

(一)认为贪求在数量上用党的教育网小组去包括共产党员而损害宣传工作质量的实践,是不正确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结果是分散力量并降低宣传工作的水平。

(二)责成各级党组织去消灭那种在党宣传工作方面的组织上的手工业方式,树立在宣传工作领导方面的必要的集中,并这样来改造党宣传工作的组织工作,以便保证提高宣传工作的质量、宣传工作的思想水平。

(三)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

按下列标准来分别研究联共(布)党史：

对于下级干部(其中有颇大一部分人是修养不够的同志),最好是按照党史下列三个基本阶段,缩小范围来研究党史读本:(1)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由第一章至第四章);(2)布尔什维克党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由第五章至第七章);(3)布尔什维克党之执掌政权(由第八章至第十二章)。

对于中级干部——这环节是由较有修养的同志所组成的,而且是我们干部为数最多的环节。联共(布)中央则介绍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全部,按照读本所包含的十二章来分章研究。

对于高级干部,就是说,对于最有修养的同志,则最好是按照每章所有各节来分节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同时并按原著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相当著作。

(四)因为独立研究法应当成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方法,所以责成各州委、边委以及各民族共产党中央要缩减党教育小组的数量。

现时在每个大企业中、机关中和高等学校中都有几十个、有时

甚至几百个小组,可是在处事得当的条件下,却原来以在每个大企业中,在每个大机关中,为下层干部设立大约两、三个小组,为中等水平的人们设立两、三个小组,为最发展的和最有修养的人们设立一个高级小组,而在高等学校中则设立几个中级小组和高级小组,较为适当。

在农村区域,在有愿意在小组中来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人,并有熟练的宣传员时,可以为农村知识分子——党积极分子和苏维埃积极分子、教员、商业——合作社工作人员、集体农庄积极分子等等,设立几个小组。

在缩减小组数量时,必须根据这样的任务为出发点,就是要以真正熟练宣传员来保证这些小组工作之进行。

(五)消灭那种以强迫手段把共产党员列入党教育小组的行政式的官僚主义的实践。

向每个共产党员解释:参加小组,乃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事情。

(六)小组工作应当以活泼谈话和同志辩论为基础。应当将那种妨碍党与非党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教育的、有害的小学校式的行政式的方法,官场习气和公式主义,从小组中坚决摒除出去。宣传员应当以同志态度来解释组员所感到兴趣的问题。

必须消减那种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式限制小组工作的办法(划一的党学习日,在工作完结后马上举行两点钟的功课,拒绝提出组员所感到兴趣的实际问题等等)。每小组的功课表应当由组员和宣传员根据当地条件来共同规定之。每次上课时间之多少,应当以组员认为彻底讨论所提出问题而需要的时间多少为转移。

小组工作应当这样来组织:就是不要使上课时间延长得过长。必须避免现在小组所有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给党史前几个题目以无限数量的时间,而在党史中有最重要意义的十月革命后的时期,则留下没有加以认真研究。

党史研究小组,应当这样来组成:就是要保证小组参加者的普

通知识和政治修养,多少是相等的。按照修养程度,最好是以分别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标准而成立以下三种小组:

(甲)为我们下级干部而设立的小组,这种小组以缩小范围来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以较通俗的形式来叙述理论问题;

(乙)为中级干部而设的小组,这种小组按每章为单位来完全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丙)为最有修养的同志们而设的小组,这种小组按每章所有各节为单位来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同时参读原著。

(七)采取举行讲演的办法。讲演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方法。准备充分的和内容丰富的讲演,对于那些独立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同志们,应当是重大的帮助。同样,必须举行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以及个别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讲演。最好是在讲演后,讲师能答复听讲者所提出的问题。应实行组织一种收取少许入场费的公开讲演。

(八)消灭那在领导宣传员工作方面的手工业方式和无监督现象,这种现象之表现,就是贪求笼统设立党研究室和宣传员课堂讨论会。责成党组织在两个月以内研究和重新审查所有一切党研究室,缩减其数量,通常只留下党的市委和区委所附设的党研究室,以帮助宣传员和为那些从事政治自修者解答问题。企业中和机关中的那些没有熟练解答员的党研究室,应当缩减之,或者改为供给自修者享用的阅览室和图书馆。责成党组织缩减宣传员课堂讨论会数量,把宣传员课堂讨论会工作集中于联共(布)各大城市区委、市委、州委和边委之下。

在设立宣传员课堂讨论会时,党组织应当保证它们以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和在政治上经过考查的指导员。联共(布)各市委、州委和边委,应当经常监督宣传员课堂讨论会的工作内容。

联共(布)党史宣传员课堂讨论会的工作,应当以适应联共

(布)党史三种基本研究形式为基础,同时,应当使宣传员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进程,比小组研究进程早得多。

课堂讨论会不能是为宣传员施行“注入式教育”的地方。宣传员课堂讨论会里的功课,应当这样来组织:就是要保证课堂讨论会每个参加者都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要进行对于理论问题的活泼讨论,要保证对于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进行同志的辩论。

(九)责成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去把我们党最熟练的宣传员、讲师、报告员、解答员们统一起来,这些人应当在理论杂志上,在中央报纸上发表文章,应当在各地方作讲演和做报告,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方面给各地方党组织以切实帮助。

认为必须收集和有系统地在报刊上公布那些最优秀宣传员的经验,他们的授课情形,他们的解答和讲演。

责成各市委、各州委、各边委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实行定期召集宣传员和报刊工作人员会议,来讨论宣传工作的基本问题。

(十)铲除那种忽视报刊意义的态度,而报刊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和全苏联的宣传讲坛。

提高报刊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上的作用。为着这个目的而责成“真理报”、“红星报”、“青年团真理报”编辑部以及各共和国的、各边区的、各州的党和青年团报纸编辑部,去有系统地在这些报纸篇幅上登载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的文章,登载最优秀宣传员的解答和讲演,登载对于读者“问题”的“回答”。在“真理报”、“红星报”、“青年团真理报”以及各共和国的、各边区的、各州的党和青年团报纸编辑部内,设立宣传科,而由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主持,并吸收最优秀宣传员来参加编辑部宣传科的工作。

认为必须改造“布尔什维克”杂志,使它成为党的理论机关杂志和全苏联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疑难解答处,它应当在自己篇幅上解答党员和非党员所感到兴趣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

责成联共(布)中央党的宣传鼓动部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来

保证出版一些通俗小册子,以帮助宣传员,特别是帮助那些研究党史的下层积极分子,并且要制定党史参考书出版计划。

(十一)把那种轻视苏维埃知识分子的态度,那种轻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来在思想政治上教育苏维埃知识分子的任务的态度,斥责为野蛮行为和流氓行为。责成党组织去恢复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的态度,并在知识分子中,在职员、学生和集体农庄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认为党组织在宣传方面的首要和主要任务,就是要铲除党与非党的知识分子干部的理论政治落后性,要保证多方帮助苏维埃知识分子通晓布尔什维主义,研究联共(布)党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十二)指出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在理论上很落后的事实,其表现就是:他们在理论上薄弱;他们不敢大胆提出迫切的理论问题;读死书和咬文嚼字习气之流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庸俗化和鄙陋化;理论思想之落后;没有充分从理论上来综合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部门中所积蓄起来的巨大实际经验。号召理论战线上的一切工作人员去坚决而迅速地纠正理论战线上这种不可容忍的落后,去消灭这种不敢大胆提出能够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论问题的害怕心理,去消灭这种咬文嚼字态度,读死书习气,烦琐观点,以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个别原理庸俗化和鄙陋化的现象。

(十三)要铲除思想工作方面的无人管理状况,这种状况特别是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工作之不能令人满意上,该学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成俄文时,犯了许多曲解原意和不正确传达原文的错误,并且在“列宁全集”几卷的附录、注释和评注中,犯了暗害性的最粗暴的政治错误。

(十四)责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在最短期内纠正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译本中所犯的曲解原意的地方,并且纠正在“列宁全集”——例如第十三卷——的附录和注释中所含有的

最粗暴的政治错误。

责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加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再版的工作。

(十五)指出我们的理论杂志之与我们党生活及斗争的迫切问题隔离的事实,指出它们那种闭门幽居习气和学究主义的趋向。

责成各理论杂志编辑部去改造自己的工作,务须在自己篇幅上提出理论问题,综合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满足我们干部的理论需求,研究新的理论问题,进行关于理论问题的创造性的辩论。

(十六)除了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所规定的关于党内领导工作干部的政治再训练办法以外,还实行下列各种关于党的熟练宣传员干部训练和再训练的办法:

(甲)在下列中心城市里设立以一年为期的宣传员和报纸工作人员再训练班:(1)莫斯科,(2)列宁格勒,(3)基辅,(4)明斯克,(5)罗斯托夫,(6)梯比里斯,(7)巴库,(8)塔什干,(9)阿拉木图,(10)诺沃西比尔斯克。在这些中心城市里设立的以一年为期的宣传员再训练班,应当不只是供应本州和本边区,而且应当供应邻近的州、边区和共和国。以一年为期的宣传员再训练班的课程大纲,应和“列宁训练班”的大纲相当,其功课内容,应当以发展宣传工作的技能和发展独立深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技能为本旨。

所有宣传员一年再训练班学生名额总数规定为一千五百人至两千人,同时,必须使在这个总数中,约有一半是报纸工作人员。

(乙)在联共(布)中央之下,附设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学期三年,以培养党的高度熟练的理论干部为目的。

(十七)在一般高等学校中,应以深刻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来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因此:

(甲)在高等学校中,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这个统一科目来代替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几个独立科

目,而在教授计划中原来用作研究社会经济科目的钟点总数,则仍然保存之。在高等学校中,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应当从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开始,并应当同时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政治经济学讲授工作,应当在研究联共(布)党史以后进行。

(乙)在高等学校中成立一个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来代替现有的几个独立的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列宁主义教研室和联共(布)党史教研室。

(丙)在那些有哲学系、历史系、文学系的大学校和高等专门学校中,则保存该各系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讲授。

(丁)委托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和全苏联高等学校事务管理局到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学年开始时选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的领导者并将其名单提交联共(布)中央批准。责成各民族共产党中央,联共(布)各边委、州委和市委挑选在理论上有所修养的和政治上经过考查的人员来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教员。

(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之下,附设半年再训练班,以再训练一般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教员。

四

为根本改善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领导起见,联共(布)中央决议:

(十八)将联共(布)中央、各民族共产党中央、联共(布)各边委、各州委的党宣传鼓动部和报刊出版部合并起来,而成立统一的宣传鼓动部。

(十九)把全部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进行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以及全部群众政治鼓动工作(党报;宣传鼓动书籍的出版;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对于宣传工作的思

想内容的监督;挑选和分配宣传员干部,党的干部的政治训练和再训练;组织群众政治鼓动),都集中于宣传鼓动部。

宣传鼓动部应以实际实现联共(布)中央本决议为其工作基础。

(二十)为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质量,认为必须使党组织今后在宣传事业上所依靠的干部,通常都是已被解除其他任何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将能以自己全部精力从事宣传工作,并始终不倦地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宣传的熟练程度。

因此,委托联共(布)各州委和各边委挑选最优秀宣传员来担任经常的宣传工作。

(二十一)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应由党机关从最熟练的职业宣传员和党的作家当中挑选出来。

在联共(布)中央,各民族共产党中央,联共(布)各州委、各边委和各市委宣传鼓动部中,应设立讲师团。

(二十二)因为缩减小组数目,以及因为缩减企业中和机关中的党研究室而在城市中会解放出一部分宣传工作人员之故,特责成各州委、各边委以及各民族共产党中央把这些工作人员当中最有修养的同志调到农村区域去加强宣传工作。

(二十三)把市党委和区党委现有文化宣传部改组为宣传鼓动部。认为在现时没有文化宣传部的那些区委中也必须成立宣传鼓动部。特规定:区党委中的宣传鼓动部之成立,应由联共(布)中央根据熟练工作人员挑选情形,并根据州委、边委、民族共产党中央之请求,而为每区分别解决之。

把市的党研究室和区的党研究室归并于市党委和区党委的宣传鼓动部之内,以便使党研究室主任同时又是宣传鼓动部的副部长。

(二十四)特规定:州委、边委、民族共产党中央、专区委、市委和区委的宣传鼓动部部长,须由联共(布)中央批准之,而这些委员

会的宣传鼓动部其余负责工作人员,则由各该州委、边委和民族共产党中央的常务委员会批准之。

责成各州委、边委以及民族共产党中央在两个月以内,把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挑选完毕并批准之。

(二十五)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的工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事业有密切联系,所以认为必须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移交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管辖之。

(二十六)联共(布)中央责成所有各级党委来认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事业,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切身事业。各级党委务须切实领导宣传事业,深刻考查其内容。州委、边委和民族共产党中央应当担负起领导责任去根据本决议改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全部组织工作。

中央向所有各级党组织指出:为要根据中央本决议精神来改造全部宣传事业,就要求党机关予以特别的注意和关心;中央警告各级党组织:务须避免那种以机械形式主义态度处置宣传工作改造事业的危险,务须避免任何笼统唾弃整个过去宣传工作经验的企图。

为改善对于党宣传事业的领导起见,特规定:在每个市委、每个省委、每个边委、每个民族共产党中央内,都应有一个专门从事于宣传鼓动工作的组织和内容问题的专门书记。

联共(布)中央责成各区委、各市委、各州委、各边委以及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应向党积极分子和全体党员解释本决议。

联共(布)中央着重提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出版,应当成为我们的干部——党的、青年团的、苏维埃的、工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工作人员,即全体苏维埃知识分子干部——为消灭自己的理论落后性而努力的转变之起点。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使我们党和苏维埃人民生活中开始了新的雄伟的思想政治高涨。

我们的干部,既然通晓这以社会发展规律知识武装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会成为真正不可被战胜的,并更加有成效地在这个理论旗帜下,在列宁、斯大林党领导下,引导全体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真理报”,第三一五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出版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内的译文略加修改后刊印)

(录自《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问题的决议(节录)^①

(1940年3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一致,看到党内有受过锻炼经过战斗考验的干部,但同时也提请党的领导注意以下各点:

首先,党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的原则(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困难的环境中进行斗争造成的)。然而,党在11年之内没有举行过代表大会,也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党的代表会,结果党中央委员会增聘了80%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吸收无产阶级分子进入领导机关的决议未能执行(现存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只有11%的工人)等等。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于考察干部和提拔他们进领导机关的问题也没有给予应有注意。组织干部的工作——调查、考察、提拔和教育等,各项都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过去有大量叛徒混入党的领导机关就说明,在选拔领导干部时没有保证必要的审查,警惕性也不够高。

针对上述种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应当把下列各点列为党最重要的任务: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性,遵守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务必把经过考验的新干部特别是工人中的干部提拔起来担任领导工作,格外注意对他们进行培养和马列主义教育,让他们经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2)为了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宜设立干部部,由它去挑选、考察、提拔党的领导干部,然后经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批准。干部部长应由中央书记处的某位书记担任。

3)鉴于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和选举领导机关,应该认真注意选拔经过考验的正派的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

4)中央政治局应设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来审查现有关于某些中央委员活动的材料。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1939年8月25日)

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来,特别自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决定以来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吸收了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建立了全国的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的基础。但正因为是在短时期内党得着了猛烈的发展,所以党的组织很不巩固,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是有严重的错误与缺点存在的。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因此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使党的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之区别,在某些地方模糊起来。使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有了一些机会来进行破坏我党的阴谋。这些办法都是错误的。这些现象都是党的严重弱点。同时,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危险是存在与发展着,严重的困难的任务是放在党的面前。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为此,中央政治局特有以下决定:

(一)估计到党的组织的现状与目前环境,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只有在某些个别地方与某些个别部门根据环境与上级指示有必要时才许可进行一些发展工作,但仍须注意发展党的

已有经验,进行个别的慎重的经过审查的征收新党员,纠正追求数目字与采用突击方式的错误,只求精不求多。尤其在我后方地区更应注意,一切已有相当数量党员的地方一律停止发展,进行巩固工作。

(二)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但是这种审查,不应当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而应当是个别的详细的慎重的审查与洗刷。这种审查工作,必须自上而下的进行,应由各局各区党委各省委首先审查各级干部,保证党的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在经过考验与忠实可靠的干部手中。对于那些实际上是同情者,但已经加入党的分子,则劝告他们停止党的组织关系,变成党外同情者。再则党的一切工作,必须深入下层党员群众。支部工作必须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必须发展。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必须加以整理,以求得在巩固党的工作中收到最大的效果。

(三)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各级党部必须根据具体环境与党员政治文化程度,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教育工作。

(四)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中央特别指出:团结新老干部,提拔和教育新干部,建立新老干部间和协的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关系,对于巩固党有一等重要的意义。老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去教育新干部,去领导与巩固新干部。新干部必须虚心的向老干部学习,重视实际经验,接近工农群众,锻炼自己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任何新老干部间的相互的对立,轻视或歧视,都是有害的,应当加以纠正。对于使干部实行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必须有专门的计划和经常的进行,以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准与工作能力。

(五)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党内的锄奸教育与党的警惕性,必须大大提高,使保卫党的任务与反奸细的斗争,成为全党的工作。同时各级党部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保卫工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成立专门部门训练保卫工作的干部。在审查党员特别是审查干部的经常工作中去发现和洗刷混入党内的敌探奸细托派分子,叛徒和堕落分子。对于反奸细斗争的麻木不仁的忽视态度和宽大为怀姑息观念,以及可能发生的张惶失措现象,都是极端有害的,应当迅速的加以纠正。

(六)为着巩固党,必须加紧党的秘密工作,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正确的联系。一方面党的公开机关与秘密组织,必须严格地划分和清楚的分离;公开党员与秘密党员必须明白的分工,而不应由公开党员兼任党的秘密工作。他方面秘密党员必须有很好的群众联系与合法地位。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与各种规则,必须严格的遵守,任何自由行动与疏忽懈怠都是有害的,应该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七)为着巩固党,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尽一切的努力来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所准备来克服目前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中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澈底的胜利。

1939. 8. 25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

(1940年1月3日)

一、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其主要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基本原则,大致规定如下:

甲,初级课程: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

乙,中级课程:联共党史。马列主义。

丙,高级课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

丁,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经常研究。

戊,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

三、右列课程,可作为初级党校、中级党校、高级党校的一般标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得增减伸缩之。在职干部则依其水准及其他具体条件来选择学习课目。但每人同时以学习一门为原则。

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应设法翻印中央出版的关于上述各课程的教科书与参考材料,同时编辑各种适合于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

五、必须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与学校中,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与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学习和教育的工作。

六、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

七、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提高其质量,轮流征调干部入学,其因环境关系不能办党校者,必须征调干部送中央、中央局或区党委所办学校学习。

八、凡不识字的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必须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

九、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

十、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

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

根据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共产党人》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

(1940年2月15日)

一、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

二、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可依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以下几种党校和训练班:

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书)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

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

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

三、中级党校训练期间由半年至一年,区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二星期至二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

四、党校课程可依学生程度并参考本年一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之。

五、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因此整个党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均应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

六、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党校各种组织形式、会议以及课外活动,均应力求简单,以保证学生每日有八小时的学习时间,使学生在此时间内多多读书,而在此时间外,能多多休息。平均每日上课一次,约三小时,其余均为自修时间。平均每周上课五次,每周所上课目以不超过三种为适当限度。

七、教学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之目的。

八、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小组会的集体研究只是帮助个人学习的辅助办法。自习为主的原则,无论低级和高级学校都是适用的,但低级的班应更多取得教员的帮助。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生,应引导与帮助他们去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九、党委必须慎重的选择教授人材,学校中须有必要的专任教员。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的经常的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在教员力量一般缺乏的现在情况下,可采用各班合并上大课的办法。

十、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为了这个目的,学校可专门指定一天为党日(每星期内五天上课,一天党日)。

十一、以学生程度及上述教学诸原则,学校应制定教育计划及教授提纲或大纲经当地党的领导机关审查之。

十二、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长由党委的负责人兼任,校长下设一总支委管理校内一切日常工作,总支委可分设教育科(管理教务)、组织科(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总务科。党委须派一得力干部担任总支书记。各班可成立一个支部,支委人数可依班的大小决定之。总支委及支委的基本工作,均为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

十三、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的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

十四、对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学生,首先应以消灭他们的文盲为主要的任务。只有在能看普通文件或普通信件识字近一千者,才能称为文盲之消灭。

十五、为了培养更高级的干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须有计划的尽可能的派送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送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

十六、以上办法一般适用于抗日民主的地区,在沦陷区及国内顽固分子、反动分子、反共分子的统制区,则应依照秘密工作的条件来办理短小精干的干部训练班。

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

根据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共产党人》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

(1940年3月20日)

中央书记处一月十三日^①《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已经一般地提到了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的学习等问题。兹更对于在职干部教育补充以如下的指示：

一、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可分四类：

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

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

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

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

二、上述各类干部的课程，大致上可依如下的不同的次序：

甲类 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

乙类 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但文化课须提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报。

丙类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

丁类 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普通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

三、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党报为主要材料)；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

^① 此时间有误，应为“一月三日”。

四、凡课本提纲、参考材料已由中央出版的,一律使用,不足的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解决之。

五、各课的进度,由各区党委、各省委及师政治部或军区政治部斟酌具体情形规定之。

六、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

七、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

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

八、凡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在可能条件下可将军队中和地方组织中(秘密组织除外)的同类干部集中上课,由党内适当的负责同志担任教员。党的领导机关可指定各科学习顾问(一人或一人以上)以便指导和帮助学习。

九、教学的原则,参看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

十、必须使所有在职干部了解,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法。在小组会和大课的前后,必须有充分的自习(预习或复习)。

十一、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

十二、各级党的组织须为在职干部解决必要的物质资料(书籍等),在经常预算内须列入在职干部所必要的费用。

十三、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今年五五为第一届节日。

十四、各级宣传部的报告须列入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省及区党委以上宣传部的报告,须寄中央一份。

中央书记处

三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共产党人》

第六期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

(1940年10月20日)

一年多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已经发动了最大多数在职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组织成为经常性。干部中党的认识、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比以前提高了一步,从而工作的效能也比以前有了进步。在教育制度上,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建设,如:小组与大课之相辅而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事的确立,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的采用,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一般大讲演的举行与教育干部中策略教育的开始等等。在学习方法上,我们有过许多创造,并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在今年五月总检查中,曾经发现了许多模范的学习小组。总之,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正在继续展开和不断的前进。

这并不是说,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已经进行得很圆满,没有什么弱点了。弱点确还存在着。最重要的是:策略教育不够,许多干部至今没有养成自习与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学习不深入,学习指导在许多环节中还相当弱。这些重要的弱点,使得教育的质量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

目前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加倍提高学习的质量。延安有着一切便利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实现这个任务。为此,必须解决以下的问题和执行以下的办法:

(一)坚决实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的指示。必须有计划的进行中央负责同志的大讲演,高级干部会议的传达,并认真的讨论

这些会议的报告。必须在全体支部中或小组中认真的有计划的进行党的决议、决定及党报重要文章的讨论。必须在各种大课中充实策略教育的内容。必须加强时事政治的研究,必须在成绩考查中把时事政治及策略教育列为重要标准之一。必须在干部中普遍纠正那种轻视策略学习、轻视时事政治研究及忽视党报的观点。

(二)为了提高学习的质量,学习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以求学习的深入,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咬得烂、懂得透。必须首先完成教育计划中已经规定的课程及教员指定了的参考材料(包括策略教育的课目在内),对这些材料或课本必须自己阅读与思考。应当纠正那种什么报告都听,什么研究会都参加,而自己并不阅读与研究的敷衍习惯,应当纠正那种好高骛远的偏向。应当纠正某些环节中教育干事或指导员自由规定庞大的学习计划、讨论提纲与参考书目,使学习干部弄得头昏眼花的形式主义。同时,教员亦必须估计到学习干部的接受程度与学习时间,在讲授的和参考材料的范围及分量上给以适当的选择,以免去学习干部“吃不开”的现象。文化程度太低,上大课“跟不上”的,必须首先努力于文化程度的提高。

(三)充实和加强学习的指导。除开各种大课的指导员外,还必须添设策略教育指导员,此项指导员应由行政上负责干部充任。大课指导员必须尽量提高指导的质量,指导能力弱的,应设法更换。中宣部、政治部宣传部及边区中央局宣传部,必须经常检查、帮助所属系统的指导员,并定期的分别召集各科指导员会议,以交换经验与总结工作。今后必须纠正学习指导方面的自流现象。

(四)及时的解答疑问和争议,是活跃学习和引导干部到独立思考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改善这方面工作,今后可采用以下的办法:甲,首先请指导员解答或请本机关负责干部及有研究的同志解答;乙,在甲项办法中不能解答时,然后送中宣部教育科转交顾问团解答,教育科与顾问团必须迅速的给以处理;丙,关于有

重要意义的解答,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之。

(五)必须开始研究和总结正在进行的每一门功课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并公布之。进行办法可以是:一方面征求担任各该项功课的所有教员(不限于大课教员)的意见,又一方面征求各学习小组的意见,然后指定有研究的同志写成文章。

(六)以后关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应该着重于教学质量与研究方法的方面,其他方面的检查均应服从于这主要目的。同时,应当注意于各个独立研究小组(或研究会)的检查,把它们中的优良经验传播出去,以便在下一期计划中,在水平较高的干部中推广这种学习方式,而使大课变成专为水平较低的干部而设的方式。

(七)在职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妨碍他们现在所担任的实际工作,相反的,只有当这种学习能够提高他们对实际工作的兴趣与能力时,才有意义。担负专门技术工作或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应把提高自己的技术与文艺素养的学习算在在职干部学习的范围之内。对于他们,需要在学习马列主义一般理论与精研技术及文艺的时间上有适当的调剂。必要时,可暂时减少其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时间或分量,或在一定时间内推迟这方面的学习。至于非党同志,凡不愿参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者,不得勉强。

(八)责成本部教育科,政治部宣传部及边区中央局宣传部迅即协商具体办法以执行本决定,并依据本决定精神,于最近进行所属系统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并作出必要的具体的结论。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四〇年《共产党人》
第十二期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 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

(1940年10月25日)

大后方党组织之着重提出干部教育,是在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三九年延安大规模进行在职干部教育以后。然而直到现在没有普遍的进行,除开个别地区外,还少经常的、系统的进行。其所以如此,大致有四个原因:一、秘密党的环境,不容易进行;二、部分干部对于学习在提高党的质量上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一部分干部文化水平有困难;三、若干地方书籍和材料缺乏;四、许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能充分注意研究和解决这些原因所提出来的许多实际问题。

中央书记处今年一月三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及三月二十日《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所提到的干部教育方针和学习原则,以及今年八月《中宣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对于大后方党的教育仍是适用的,仍需继续执行。

但为要使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能够有组织、有计划的普及,除开干部的主观认识与积极性外,中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秘密环境所给予干部教育的困难,并用何种方式与方法去进行教育,才与秘密的环境适合的问题。事实也是这样:有些地方因为环境困难,而停止了干部教育或很少进行这种教育;另外一些地方则常常采用同秘密工作条件不适合或不甚适合的方法去进行教育。

为着适当的解决这个问题,特提出如下的意见:

一、在秘密党的环境中,为着便于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干

部的教育可以在性质上分为三类。即：甲、党的建设和党的策略的(包括实际工作的)教育；乙、一般政治的和理论的教育；丙、文化教育(包括文字及自然社会的常识)。

二、关于党的建设、党的策略及党的工作等，党内秘密性的教育，只能经过党的秘密组织的系统来进行。但秘密训练班的方式及一切超过工作上必要关系的方式，一般的不宜采用，因为这种方式有害于党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大致上适宜的方式可有下列几种：

甲、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干部，必需以个人阅读与研究为主要方式，每天或每周划出一定时间放在学习上；并由他去帮助与自己有直接工作关系的其他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学习。

乙、由上级负责干部分别的(按自己管理的系统)教育下级某一负责干部(不是训练班的方式，而是教育其主要负责人，或文化水平较高的某负责人)，然后经过他去教育其他的同级负责干部。在上、下级干部因工作关系接头时，上级负责干部同样可利用机会给下级干部进行一定问题的教育。

丙、区委委员中应当吸收可靠的优秀的当地知识分子党员参加，以便进行区委自我教育；如确实找不到适当的知识分子参加，那么，只好由上级负责干部一次一次的教育区委书记，然后经过他去传授给其他委员。

丁、在不妨碍秘密工作规律的条件下(如不带材料，不作笔记以及采用社会化的方式等)使党的小组会起学习小组的作用，或于每月间划出一定次数的党的小组会，作为学习讨论会，或于每次小组讨论会议抽出一定时间交换学习意见。

三、关于一般政治的或理论的教育，应该尽量利用公开的、合法的(多半是非成文的)、现成的条件(如公开的图书馆，公开合法的书籍及报纸杂志等)与方式(如不定型的学术座谈会与演讲会等，注意定型的方式在今天环境中不易保存)。但这些条件与方式

的利用,不可超过可能的限度,最要是比可能利用的限度还利用得更少些,以便利用得更久些,同时要利用许多可能使这些条件和方式成为更合法,或几乎完全合法的。例如:不仅利用公开的进步的书籍刊物,而且还可利用国民党的书籍刊物;又如座谈会或讲演会中不仅有进步的内容,而且有国民党的内容;不仅有进步的分子参加,而且有国民党员参加等等。应当着重指出,研究国民党所允许出版的东西,以认识大后方的各种具体情况,以认识国民党的一切措施,对于在大后方工作的同志,更其是必要的。过去在这方面的忽视必须纠正。

在这方面经过党内秘密组织系统的方式,一般的只当作辅助的方式,只有在真正没有可能利用上述条件和方式的情况下,才采用经过党内秘密组织系统的方式。

四、关于认字教育及自然常识、社会常识的教育,主要地应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如识字班,农校,补习班,民众图书馆等等,动员和责成党内文化水平低的干部积极参加进去学习。在没有这类教育组织的地方,应该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把它建立起来。

五、各省委宣传部,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的方针上述的方式及各地方的具体情况(主观的和客观的)给他们指出一个大体的教育计划;所谓大体的计划,就是让他们在坚持执行上级计划时有机动的余地。

六、关于教育材料的处理,可采用如下的方式:

甲、关于秘密进行的课程,须制订研究大纲,对参考材料则宜选精采用(或利用现成的读本,或编成简要的本子)。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甚至只有比较详细的研究提纲,不用参考材料。

乙、关于能利用公开合法方式进行的课程,则一般只发给研究提纲,并指定必要的参考材料就可以了。

七、秘密党的干部教育,由于客观的困难条件,特别表现出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因此,无论干部本身和领导机关都需要有

更多的灵活性、忍耐性和坚持精神,不如此则不会有成绩。希望大后方的全体干部及领导机关深刻的注意到这一点,尤其各级宣传部必须认真的建立这方面的工作。

八、此指示所指出的教育方式,加以必要修改和补充,亦可适用于一般党员的教育。

九、一切大后方的干部教育材料,以不妨碍党的隐蔽政策和不妨碍党的工作为原则。

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出版的
《六大以来》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宣传部关于 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 几个问题的指示

(1940年10月26日)

估计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的现况,及其所处的战争环境,如要在那些地区切实的开展在职干部教育,须注意处理和解决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过去各地区的教育计划,多是各自为政,没有一定的标准,而计划又多只有科学的规定,没有课程的指出,从而计划的实施常表现自流的现象。以后各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应以今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及八月十三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为标准,而依据各地的干部状况及教育进度灵活制定之。计划中宜规定课程标准,以便有所依循。为了适应战争的环境,计划宜短小精干,时间不太长,才便于实行。

(二)战争环境中所使用的教材,一般的宜采用教科书式的读本,附以研究大纲,不另指定参考材料,读一本算一本。每行每句读懂,不懂者质疑。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读本,则参考材料须选精采用,随同研究大纲一起印成袖珍本,以便利于携带与阅读。

(三)由于实际斗争的要求,在敌后根据地的在职干部中,实际策略的研究与教育进行的较多。今后应使实际策略的教育更有系统性与原则性,同时这种教育可以利用干部会议及党的小组来进

行,而使学习小组更多的去进行一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四)估计到中、下级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并且由于紧张战争环境,生活不安定,工作繁忙和流动,为要保证他们有效的进行学习,则专任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的设立,是一个决定的条件。各根据地党的组织须尽量做到:每个县委(包括县级机关)和每个区委(包括区级机关)有一个专任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为了解决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各中央局、分区〔局〕及区党委须物色这种教育干部,并在自己的党校中设专门的班次来培养这种干部。如有可能,这种干部派出帮助某级在职干部学完一种学科后,仍然调回继续训练,而派出另一批干部去代替他们。各根据地高级党组织必须注意大批的训练和保存这样的干部。

(五)展开在职干部教育的另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就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在一方面保持自己学习上的积极性与经常性,在又一方面积极去推动和帮助其他干部的学习。过去许多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特从新提起大家的注意。

十月二十六日

根据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共产党人》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改造我们的学习^①

(1941年5月19日)

毛泽东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

①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

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

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①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②,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多,为害相当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

① 富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② 边币是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①。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①。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

^①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做到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

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

(1942年1月26日)

(一)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这些同志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

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的澈底的十分认真的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澈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中宣部^①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① 原件缺最后一页。“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中宣部”几字,是根据另一文本补订的。

整顿党的作风^①

(1942年2月1日)

毛泽东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

^①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

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现在我来讲一讲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

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念。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其次讲一讲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

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践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

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

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

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我来讲一讲宗派主义的问题。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

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不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

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

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的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

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

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

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反对党八股^①

(1942年2月8日)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①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

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

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讲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

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问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

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亅”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亻”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

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奇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

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 ABCD，小 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 and 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

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

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

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雇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痼疾,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 and 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

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有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

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 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 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

(1942年2月11日)

在去年中央政治局多次的讨论到遵义会议前,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后,同时指出这种错误的残余,到今天还存在于党的许多部门,干部、党员中,未能肃清。中央在这一时期内接着发表了关于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决定,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十一月二十日^①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宗派主义的演说、今年二月一日又在中央党校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学风(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反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党八股)的演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党八股的演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这些决定演说及指示的主要内容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这些决定演说指示发出后,曾引起了党内的注意和讨论,但是中央的这一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并没有贯彻到整个党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在宣传教育部门中没有把

^① 此日期有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时间是1941年11月6日。

贯澈党的这一思想作为自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因此,提醒各级宣传部,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中央的这一思想,务必把目前一切宣传活动和工作的,以宣传解释党中央这一思想为中心,务必在这一思想之下改造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干部学校教育,检查在职干部教育,检查报纸刊物,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澈中央的这一思想。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流毒于党,就造成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离开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搬用教条公式,死记书本上的理论,在抽象空洞的理论内打圈子,不注意研究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不能解答在实践生活中所提出的实际问题,轻视对于周围客观环境客观事物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夸大局部,否认经验,自以为是,于是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损害党损害革命。

宗派主义流毒于党,就是造成党内的排内性和排外性,打击干部夸大干部的错误以提高自己,责人严责己宽,在党内闹独立性,个人突出,风头主义,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在新老干部等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团结,在这部门与那部门工作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在党员与非党员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关系上,不注意关心和了解非党员干部,不能好好的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党员包办,党气凌人,甚至轻视排挤非党人士,结果就会造成党内不团结党外脱离群众两种危险现象。

党八股流毒于党,就是使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最后藏身之所,夸夸其谈,长篇大论,引证抄袭,毫无创见,模仿一套,到处运用,这样就束缚党员思想,失去生动活泼的气象,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感觉。

各级宣传部必须根据上述中央的决议及毛泽东同志的演说澈底改造宣传教育工作,广为宣传解释,贯澈党的路线和思想,今后

各级宣传部的活动和工作,务必与整个党委的活动和工作密切联系和配合,高级宣传部(包括区党委以上的)要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策划如何把党的每个政策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贯彻于全部党的工作中、指导党的思想、要能及时的反映党内各种倾向,找到纠正的正确办法。如果把宣传部的工作看作单纯的编报编写写文章传单等工作是非常不正确的观点,如果把宣传教育工作看作是搬运和贩卖抽象的空洞理论更是非常有害的观点,必须把宣传部的工作接近党的实际活动。各级宣传部对中央及各地高级党委各项政策和决议,务必贯彻始终,宣传解释,检查反映,不要离开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去空空洞洞的宣传,也不要只空空洞洞的宣传一顿,而不去切切实实的检查反映,这样的宣传工作是离开实际的也就得不到效果。各级宣传部务必改变本身工作的作风,要在宣传教育部门工作中造成一种新的作风,这就是活的,生动的,与实际相联系的工作作风。各级宣传部必须将上述中央决议演讲指示所进行的情形,反应结果,随时报告中央宣传部,并将进行中所发生的疑难及问题随时向中央宣传部提出,我们并准备随时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问题。

中央宣传部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口头政治报告(节录)

(1945年4月24日)

毛泽东

三、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个性与党性。这个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作,经济上要这样作,文化上也要这

样作。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讲到我们党内,这一点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党这个军队同人民的其他军队比较有许多特点,它是先进的部队,是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性,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奋斗。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们的党,他不受调动,他干这样工作也好,干那样工作也好,往东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

我们党现在是不是统一了?历史决议案上写着空前的统一,这是说比较过去要统一,没有讲党是完全统一的。有的同志讲:“放下来没有问题,提起来问题很多。”这句话有道理。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使党推向前进的运动,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

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是解决了生产问题,没有生产党也不能前进。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

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还有到杨家湾小学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女同志,在清凉山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医生,他们和老百姓结合得很好。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从前有一段时间《解放日报》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进医院,周扬同志也告诉我,鲁艺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刚抬头就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东西吃。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历史问题也比较恰当地解决了。但是还有问题。那天在预备会议上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讲起来讲得很好,做起来不兑现,他讲的他自己也不执行,那就不对。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有的性质。比如讲政策上的统一,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及各部分的纲领、整风、生产等,应在这些原则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共同的。至于每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工作也各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的不同。在军事工作方面又有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的不同,党务工作方面也有根据地、沦陷区等各种工作地区的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上人们也不相同,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总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个。它们各循其自己的轨道,按着一定的次序走,它们都是从太阳星云分裂形成的,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一样。太阳上没有人,我们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人,现在不能讲,我没有调查过。从前古时候地球上也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空气,自从有了空气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闹独立性,你们晚上抬头看,有时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闹独立性。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党内几部分干部的问题。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我们对这几部分同志要特别注意。

(一)理论工作者。我们整风讲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反,好像理论工作者就不那样吃得开了。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此我们党内要学习理论,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

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

(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理论工作者。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

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三)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一到根据地里头,他们就感觉吃不开。根据地里的首长多得很,看起戏来,首长总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长、中首长、小首长,这些同志心里憋气。审干的时候又找了他们的麻烦。“你是哪里来的?上海?西安?”“有没有问题?”看了又看,有点不相信。“你住在哪一个旅馆?”“有没有介绍信?”因为我们根据地都要介绍信,以为在上海住旅馆也要介绍信,你说没有介绍信,那就怪得很。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这些同志对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作风问题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我在报告里头已经写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

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至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有没有对本地干部和本地军队处理得不恰当的呢?如果有,应当承认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如我在陕北应当承认的一样。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同时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东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见。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们历史上的大纠纷。这一次开完大会之后,还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树声,出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讲过这些话。不要怕多讲,不要怕讲得舌敝唇焦,现在看来,舌也没有敝,唇也没有焦,我们说得还不够。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

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你们看,就是用脚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还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围绕太阳转几转人就增加了几年寿命,年纪愈长,包袱愈大,年纪老的同志们不要怪我这样说,我今年也五十二岁了,地球走的路也变成了我们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作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为此目的,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

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五)经济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在军队里面有后勤工作,在整个根据地、解放区有广大的经济工作,有广大的同志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对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们提倡、宣传得不够,使得许多同志感觉到,在这些部门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没有地位。我曾经讲过,延安有一个同志告诉我,要他做总务处长,他不愿意当,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不起。人家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做一般工作。为什么他说做一般工作呢?是因为做总务工作吃不开,现在我们应当使他们吃得开。有些同志认为,做军队工作、党务工作吃得开,在军队里面是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开,做后勤工作还是吃不开。因为他们吃不开,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们吃得开。

(六)民运工作干部,工、青、妇干部。这些干部也感觉吃不开。有人把他们叫做“杂牌军”,其实都是“中央军”,没有什么杂牌军。大城市打开以后,广大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都要开展起来。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现在留下的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不多了,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我们要照顾他们,尊重他们。同样,没有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的干部也不行。

(七)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我们现在还叫他们是新干部,好像老干部就是万里长征来的,那就没有几个大人,不过一两万而已。同志们,在座的多数同志是老干部,因为你们富有经验,领导正确,所以被选为代表,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做

工作的同志,数目虽小,没有他们却不行,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把经验当做包袱,那就不好,要轻轻快快。对同志们讲一个数目吧!现在,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一百一十几万,北伐和内战时期入党的顶多还有两万人,我们算一下,总共一百二十来万。这两万人的眼睛,不要只看着自己,还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几万。否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味道大得很,在镜子前照子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这样不好,我们年纪比较老,并不十分漂亮,还是他们比较漂亮,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在抗战时期入党的大多数是青年同志,当然年纪大的也有。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没有我们不行,没有他们也不行。两万人的眼睛要看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要尊重他们,不要使他们感觉这两万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候,先要想几天几夜,跟你谈话时到底怎样讲法。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抗战时期很长,对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不要笼统地叫新干部,因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党外干部。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全中国,我们的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

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

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他下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

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一个的？是张三、李四的？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选自《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节录)

(1945年5月31日)

毛泽东

(十二)理论工作问题

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我们还应经常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外国党的宣言、纲领一类文章,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

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录自《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

联共(布)中央审定

一九三八年

(根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年版刊印)

导 言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经历了长远光荣的过程,从俄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初出现的那些狭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发展成了现在领导着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家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

联共(布)是在革命前俄国工人运动基础上,由那些与工人运动相联系并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成长起来的。联共(布)过去和现在都是以马列主义革命学说为指南。联共(布)底领袖们在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条件下,继续发展了马恩学说,把它提到了新的阶段。

联共(布)在工人运动内部是与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即与社会革命党人(更早以前是与他们的前辈——民粹派)、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及各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作原则斗争中,在党内则是与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派别,即与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民族主义倾向者及其他反列宁主义集团作原则斗争中发育和巩固起来的。

联共(布)是在与工人阶级底一切敌人,与劳动群众底一切敌人,即与地主、资本家、富农、暗害者及间谍作革命斗争,与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底一切雇佣走狗作革命斗争中巩固和锻炼起来的。

联共(布)底历史是三次革命,即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底历史。

联共(布)底历史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的历

史,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粉碎外国武装干涉者的历史,是在我国建成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

研究联共(布)底历史,就能领会我国工农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丰富经验。

研究联共(布)底历史,研究我党同马列主义底一切敌人作斗争,同劳动群众底一切敌人作斗争的历史,就能帮助精通布尔什维主义,就能提高政治警觉性。

研究布尔什维克党底英勇历史,就是用通晓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规律的知识武装起来,用通晓革命动力的知识武装起来。

研究联共(布)底历史,就能巩固确信列斯党伟大事业最终胜利的信心,确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信心。

本书就是对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的简要叙述。

第一章 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 工人政党而斗争

(一八八三至一九〇一年时期)

(一)农奴制度的废除和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工人运动的初步。

沙皇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要比其他各国较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工厂还是为数甚少。当时,贵族地主的农奴经济占着主要地位。工业在农奴制度下不能有真正的发展。农业中强迫农奴劳动的生产率极为低微。当时全部经济发展进程都要求把农奴制度消灭。沙皇政府既因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遭到军事失败而势力大减,同时又慑于农民反对地主的“骚动”,乃不得不于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度。

但在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地主还是继续压迫农民。地主把农民掠夺一空,在“解放”农民时割夺了农民先前享用的一大部分土地。于是农民就把这部分土地称为“割地”。农民为了本身的“解放”,被迫向地主缴付将近二十万万卢布的赎金。

自农奴制度废除后,农民不得不在最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租佃土地。农民除了缴纳货币租金,还往往被迫用自己的农具和马匹去替地主白白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这就叫作“工役”或“劳役”。农民往往必须把自己的一半收成作为实物地租交给地主。这就叫作“对分制”。

可见,当时情形几乎完全与从前农奴制度存在时一样,不过此

时农民身分上已是自由,而不能再把他当作物品来实行买卖了。

地主用各种掠夺的方法(地租和罚款),把农民落后经济底脂膏榨取净尽。基本的农民群众因受地主方面的压迫,不能把自己的经济改善。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极端落后,时常有歉收和饥饿发生。

农奴制经济底残余,以及往往超过农民经济收入的苛重赋税和付给地主的赎金,引起农民大众底破产和贫困,迫使农民离乡背井出外谋生。农民进入了工厂。厂主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

压在工农头上的有大群警察局长,巡官,宪兵,警察和乡警,他们都是保护沙皇,资本家和地主,反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体刑一直存在到一九〇三年。虽然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但农民因犯极小过失,因没交纳赋税,仍然遭受鞭笞。工人常受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特别是在工人忍受不住厂主虐待而停止工作,举行罢工的时候。工人和农民在沙俄时代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沙皇专制制度是最凶恶的人民公敌。

沙俄是各民族的监狱。沙俄境内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完全没有权利,经常不断地受到各种鄙视和侮辱。沙皇政府曠使俄罗斯居民把民族边区土著人民当作下等种族看待,正式把他们叫作“异种”,养成鄙弃仇视他们的心理。沙皇政府故意挑起民族齟齬,怂恿此一民族反对统一民族,组织蹂躪犹太人的暴行,在南高加索挑拨鞑靼人与阿尔明尼亚人互相残杀。

民族边区所有一切或差不多所有一切国家职务,都是由俄罗斯官吏充任。各个机关和法庭内一切事务,都是采用俄罗斯语文。禁用各民族语文出版书报,学校里禁用本族语文教课。沙皇政府极力压制一切民族文化表现,对一切非俄罗斯民族实行强迫“俄罗斯化”的政策。沙皇政府是屠杀非俄罗斯民族的刽子手,是拷打非俄罗斯民族的掌刑人。

自农奴制度废除时起,俄国工业资本主义虽然还受农奴制残

余的阻碍，但它已是发展得颇为迅速了。在一八六五至一八九〇这二十五年时期内，单是大工厂工人和铁路工人数量，就由七十万零六千人增至一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即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了。到九十年代末叶，大工厂、矿业和铁路工人数量，单以欧俄五十州来说，就已增到二百二十万零七千人，而按全俄总共计算，则已增到二百七十九万二千人。

这已是现代的工业无产阶级，因其集中于巨大资本主义企业而具有战斗革命品质，根本与农奴制时代的工厂工人、小手工业工人及其他一切工业工人不同。

九十年代的工业高涨，首先是与加紧建筑铁路的事实相联结的。在十年以内（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一共建筑了二万一千余俄里长的新铁路。铁路需要有供建造轨道、车头和车箱用的大量金属，需要有不断增加的燃料、石煤和石油，结果就引起了冶金业和燃料业的发展。

在革命前的俄国，也如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工业高涨年代总是由工业危机和工业停滞年代来轮替，因而就使工人阶级受到严重打击，使数十万工人陷于失业和贫困。

虽然俄国资本主义在农奴制废除后有很迅速的发展，但俄国经济发展程度还是要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绝大多数居民还是从事农业。列宁在其有名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一书中，引用了一八九七年全国人口调查册中的重要数字，指明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六分之五，而从事于大小工业、商业、铁路和水运业、建筑业、木材业等等的人口，却只占全人口六分之一左右。

由此可见，俄国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还是个农业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即以小私有的，生产率低微的个体农民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国家。

资本主义不仅在城市方面,而且也在农村中间发展起来。农民这一在革命前俄国人数最多的阶级,日益瓦解,日益分化。在农村里,一方面从最丰裕的农民中间产生出富农上层,即农村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有许许多多的农民陷于破产;农村贫民,即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人数,逐渐增加起来。中农人数一年一年减少下去。

一九〇三年间,俄国约有一千万农户。据列宁在他告农村贫民书的小册子中所作的计算,这个农户总数中至少有三百五十万农户是无耕马的农民。这种贫苦农户通常只耕种着很小一块土地,其余的土地都租给富农耕种,而自己则出外谋生。贫农按其地位说来,极与无产阶级相近。列宁称他们为农村的无产者或半无产者。

另一方面,一百五十万户富农(他们在一千万农户总数中占百分之十五),占有全体农民耕地面积之半数。这个农民资产阶级靠盘剥贫农中农,靠剥削长工日工劳动而愈益发财致富,变成为农业资本家。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就已开始觉醒起来,而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了。沙俄时代的工人生活非常痛苦。八十年代工厂里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二小时半,而在纺织工业中甚至延长到十四以至十五小时。对于女工童工劳动的剥削采用得很广。童工劳动时间虽与成年工人劳动时间相等,但他们所领的工资却也如女工一样,要比成年男工所领的少得多。工资水准异常低微。大部份工人每月只能领得七八个卢布。就是五金制造厂和铸铁厂里工资最高的工人,每月至多也只能领得三十五个卢布。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所以工人残废及死亡的现象极为常见。根本没有什么工人保险;工人要获到医药救助,非得付钱不可。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工人宿舍每间矮小的“黑屋子”里,都住有十个至十二个工人。厂主时常故意少算工人的工资,强

迫工人在厂主开设的店铺里用昂贵得多的价钱购买食品，并用勒收罚款的手段劫掠工人。

于是工人就来彼此商定，共同向厂主提出种种要求，以期改善本身困苦不堪的生活状况。他们往往抛弃工作，即宣布罢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发生的那些罢工，通常是由厂主勒收非常苛刻的罚款，给工人支付工资时实行愚弄欺骗以及减低工资定额等事实引起的。

在举行最初一批罢工的时候，工人常因忍耐不住而毁坏机器，打破厂屋窗上的玻璃，捣毁厂主所开设的店铺和工厂账房。

当时先进工人已开始明白，为要同资本家进行顺利斗争，便需要组织起来。于是就有工人协会相继出现。

一八七五年，在敖德萨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这个最初的工人组织只存在过八九个月，后来便被沙皇政府摧残下去了。

一八七八年，在彼得堡由木匠哈尔士林和钳工奥布诺尔斯基领导组织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协会纲领上指出，协会任务是与西方社会民主工人政党相近。该会所提出的终极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极不公平的制度”。协会组织者之一的奥布诺尔斯基曾在外国住过一些时候，他在那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以及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底活动。这件事实在“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纲领上有了反映。协会认为自己最近的任务是要为人民争取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权利等等）。限制工作时间，也是该会所提出的最近要求之一。

协会会员计有二百人，同情者数目也与此相等。协会开始参加工人罢工斗争，并领导了这种斗争。后来，这个工人协会也被沙皇政府摧残下去了。

然而，工人运动还是继续发展起来，蔓延到许多新的区域中去。八十年代发生过很多次的罢工。在五年以内（一八八一至一

八八六年),就发生过四十八次以上的罢工,其中有八万工人参加。

一八八五年,在奥列哈沃、祖也沃城莫罗作夫工厂中爆发了大罢工。这次罢工在革命运动史上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当时在这个工厂里约有八千工人。工作条件一天一天坏下去:从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间,工资一共减少过五次,而在一八八四年那次,一下子便把工资定额减低了四分之一,即减低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厂主莫罗作夫又用各种罚款方法剥削工人。据罢工后在法庭审讯时所查出的消息来看,厂主从工人所挣得的每一卢布工资中,都要用罚款方式扣去三十个至五十个哥比。工人忍耐不住这种劫掠,乃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宣布罢工。这次罢工是预先准备好了的。领导罢工的是先进工人莫依先科,他前是“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会员,且已具有革命工作的经验。在罢工前夜,莫依先科协同其他几个最觉悟的织布工人拟定了向厂主提出的许多要求,并把这些要求提交工人秘密会议通过。工人所提出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停止抢劫式的罚款。

这次罢工是被武力镇压下去了。有六百多工人被捕,其中有几十个被交付法庭审判。

一八八五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城几个工厂里,也举行过同样的罢工。

次年,沙皇政府慑于工人运动的增长,不得不公布了关于罚款的法律。在这一法律上载着:所罚的金钱不应落入厂主的私囊,而应用在工人本身的需要上。

工人有了莫罗作夫工厂及其他各处罢工底经验,就明白他们经过有组织的斗争可以争得很多的东西。工人运动从自己队伍中开始提拔出许多坚决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能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同时,因为国内工人运动的增长,再加上西欧工人运动的影响,于是在俄国就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组织开始成立起来。

(二)俄国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境内的传播。

当马克思主义团体尚未出现以前,在俄国已有民粹派进行过革命工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底敌人。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出现于一八八三年,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因进行革命活动受沙皇政府追究,被迫逃亡国外,侨居日内瓦时所组织的“劳动解放”社。

普列汉诺夫先前本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在国外认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抛弃民粹主义思想而变成了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点上进行过很多工作。它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著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等书译成俄文,在国外刊印并将其秘密散布于俄国内地。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及该社中的其他参加者,还写过许多解释马恩学说,解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

无产阶级底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他们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乌托邦者)底臆造,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崩溃下去,正如农奴制度已经崩溃一样;资本主义造成了本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他们指明,只有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只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才能把人类从资本主义下,从剥削制度下解救出来。

马克思与恩格斯教导无产阶级认识本身的力量,认识本身的阶级利益,并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马克思与恩格斯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底规律,并科学地证明说,资本主义社会底发展以及这个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引到资本主义底崩

溃,引到无产阶级胜利,引到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与恩格斯教导说,摆脱资本权力并把资本主义财产变为社会公有财产,不是用和平手段可以达到的;为要达到这步,工人阶级必须用革命强力反对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以便压倒剥削者底反抗,并建立无阶级的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与恩格斯教导说,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先进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才能把一切不满意资本主义的势力集合到自己周围,并引导他们去冲击资本主义。但为要战胜旧世界而创立无阶级的新社会,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即马克思与恩格斯称为共产党的工人政党。

而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即普列汉诺夫所主持的“劳动解放”社,也就进行了传播马恩观点的工作。

当“劳动解放”社在国外用俄文出版刊物,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时候,俄国还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思想上为这个运动开拓道路。当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广社会主义运动道路上所遇到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在先进工人和同情革命的知识份子中最为流行的民粹主义观点。

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已成为能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的强大先进力量了。但民粹派却不了解工人阶级底先进作用。俄国民粹派错误地认为主要的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他们认为单靠农民“骚动”,就能把沙皇和地主政权推翻。民粹派不知道工人阶级;他们不了解农民单靠本身力量不和工人阶级联盟,不受工人阶级领导,是不能战胜沙皇制度和地主的。民粹派不了解工人阶级是社会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

起初,民粹派企图掀起农民去作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为着这一目的,革命的知识青年就穿起农民衣服,跑到农村中去工作,

即当时所谓“到民间去”。由此就有“民粹派”这一名称。但农民并没有跟着他们走，因为农民也是他们所没有真正知道，没有真正了解的。大多数民粹派份子被警察逮捕了。于是民粹派就决定不要人民，单用自己的力量去继续其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结果便作出了更严重的错误。

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社开始来准备谋刺沙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党人果然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炸死了。但这并没有使人民获得丝毫益处。刺杀个别人物，是不能把沙皇专制制度推倒，不能把地主阶级消灭的。一个沙皇刚被刺死，另一个沙皇，即亚历山大第三，又代之而起。在亚历山大第三统治下，工农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了。

民粹派所采取的这种用谋刺个别人物，用个人恐怖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手段，是于革命有害的错误手段。个人恐怖政策所持的出发点，就是把所谓积极“英雄”与消极“群氓”对立的荒谬民粹主义理论，以为“群氓”应等待“英雄”建立丰功伟绩。据这一荒谬理论所说，只有个别卓越人物才能创造历史，而群众、人民、阶级，或如民粹派作家们所鄙薄称呼的“群氓”，则不能作出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就拒绝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进行群众的革命工作，转而采取个人恐怖的斗争手段。民粹派强迫当时最大革命家之一哈尔士林停止组织革命工人协会的工作，而专门去干恐怖活动。

民粹派用其谋刺压迫者阶级个别代表人物的这种于革命无益的行动，转移了劳动群众实行与压迫者阶级作斗争的视线。他们阻碍了工农革命自动性与积极性的发展。

民粹派妨碍工人阶级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阻碍创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事业。

虽然民粹派的秘密组织已被沙皇政府击破，但民粹主义观点在同情革命的知识份子中却仍保持了很久。民粹派余孽拼命抵抗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妨碍了组织工人阶级的事业。

因此,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只有同民粹主义作斗争,才能成长和强固起来。

“劳动解放”社开展了反民粹派错误观点的斗争,指出民粹派学说及其斗争方式对于工人运动的莫大害处。

普列汉诺夫在其反民粹派的著作中指出,虽然民粹派也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民粹派观点却与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

普列汉诺夫是给了民粹派错误观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第一人。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对民粹派观点施行一针见血的打击,同时就光辉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民粹派受到普列汉诺夫严重打击的基本错误观点,究竟是什么观点呢?

第一,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种“偶然的”现象,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在俄国发展起来,因此无产阶级也不会增长和发展起来。

第二,民粹派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中的先进阶级。他们妄想不要无产阶级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知识份子所领导的农民以及他们所视为社会主义胚胎和基础的农民村社,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第三,民粹派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进程都持着错误而有害的观点。他们不知道,不懂得社会底经济政治发展的规律。他们在这方面是些完全落后的人。照他们的意见,历史不是阶级所创造,不是阶级斗争所创造,而只是个别杰出人物,即所谓“英雄”所创造的;群众、“群氓”、人民和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这种“英雄”走的。

普列汉诺夫反对和揭露民粹派的时候,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根据这些著作学习和养成的。普列汉诺夫所著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史

观发展问题等书，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胜利打下了基础。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中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底基本问题。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论一元史观发展问题一书，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宁指出，根据这本书“养成了整整一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三四七页）。

普列汉诺夫在他反对民粹派的著作中证明说，像民粹派那样提出问题，即问资本主义应否在俄国发展，是很荒谬的。因为，——普列汉诺夫用事实证明说，——俄国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离开这条道路。

革命家底任务并不是阻止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即使他们想要这样做，也是做不成功的。革命家底任务是要倚靠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产生的强大革命力量，即倚靠工人阶级，发展其阶级意识，把它组织起来，帮助它建立自己的工人政党。

普列汉诺夫把民粹派第二个基本错误观点，即否认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能起先进作用的观点，也击破了。民粹派把无产阶级在俄国出现的事实看作是一种“历史上的不幸”，撰文指摘过“无产阶级化的溃疮”。普列汉诺夫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它完全适用于俄国而证明说，虽然农民在人数上占主要地位，无产阶级在人数上比较少，但革命家却正应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寄托于它的增长。

为什么正应寄托于无产阶级呢？

因为无产阶级虽然现在人数尚少，但它是与最先进经济形式，即与大生产相联结，因而也就是具有远大前途的劳动阶级。

因为无产阶级是一年一年增长着的阶级，是政治上发展着的阶级，并且它由于大生产中的劳动条件而容易组织起来，它由于自己所处的无产者地位而成为最革命的阶级，因为它在革命中只会失去一副锁链。

农民却不是这样。

农民(此地是指个体农民而言。——编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它是与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即与小生产相联结,因而也就是没有,并且也不能有远大前途的劳动阶级。

农民不仅不是增长着的阶级,反而一年一年分化为资产阶级(富农)与贫民(无产者,半无产者)。除此而外,他们由于本身散漫而不如无产阶级那样容易组织起来,他们由于自己所处的私有主地位而不如无产阶级那样乐于走入革命运动。

民粹派认为俄国到达社会主义的途径不会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他们所视为社会主义胚胎和基础的农民村社。然而村社不是,并且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底基础或胚胎,因为在村社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富农,即剥削贫农、雇农以及经济力量薄弱中农的那些“土豪”。当时有名无实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和间或实行过的按人口重分土地的办法,并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享用土地的是村社里拥有耕畜、农具和种子的社员,即丰裕的中农和富农。无耕马的农民,贫农以及一般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却不得不把土地让给富农,而自己则去受人雇用,去当雇农。农民村社事实上是掩饰富农凶焰的一种方便形式,是沙皇政府按连环保原则向农民征收赋税的一种便宜工具。因此,沙皇政府没有触动过农民村社。把这样的村社当作社会主义底胚胎或基础,当然是很可笑的。

普列汉诺夫把民粹派第三个基本错误观点,即认为“英雄”、杰出人物及其思想在社会发展中有头等作用,而群众、“群氓”、人民、阶级底作用却很微小这一观点,也击破了。普列汉诺夫责备民粹派为唯心主义者而证明说,正确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底唯物主义。

普列汉诺夫发挥并论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根据这个观点证明说,归根到底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杰出人物底愿望和观念,而是社会生存物质条件底发展,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底变更,是各个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相互关系底

变更，是各个阶级为着自己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不是观念决定人们底社会经济地位，而是人们底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底观念。如果杰出人物底观念和愿望竟与社会底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竟与先进阶级底要求背道而驰，那末这种杰出人物就会变成为无用之物；反之，如果杰出人物底观念和愿望正确表现着社会经济发展底要求，正确表现着先进阶级底要求，那他们就能成为真正杰出的人物。

当民粹派认为大众是群氓，认为只有英雄才能创造历史并把群氓变为人民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便回答他们说：并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也就是说，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进历史。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了解应如何改进这些条件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英雄和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底发展条件，却竟不顾社会底历史要求而胡作乱为，俨然以历史底“创造者”自居，那他们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倒霉人物。

民粹派就是这种倒霉的英雄。

普列汉诺夫所写的作品，他所进行的反民粹派的斗争，很厉害地摧毁了民粹派在革命知识份子中的影响。但在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事业，却还远未完成。这个任务，即澈底打破民粹主义，澈底打破这种马克思主义敌人的任务，是落到列宁肩上了。

自“民意”党被摧残以后，大多数民粹派份子很快就放弃了反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而主张去与沙皇政府调和妥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时，民粹派已变成富农利益底代表人物了。

“劳动解放”社先后拟定了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第一个草案是在一八八四年，第二个草案是在一八八七年），这对于准备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是个很重要的步骤。

但“劳动解放”社也犯有严重的错误。在它所拟定的第一个纲领草案中，还保存有民粹派观点底遗迹，还容纳了个人恐怖的策

略。其次,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能够而且应当引导农民前进,并且它只有与农民联盟,才能战胜沙皇制度。再则,普列汉诺夫把自由资产阶级看作是能够给革命以援助——虽然是不可靠的援助——的力量,至于农民,那他在某些著作中,却完全把他们忽略了;例如,他说:

“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外,我国再没有什么可为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所依持的社会力量”(《普列汉诺夫文集》,第三卷,第一一九页)。

普列汉诺夫底这些错误观点,就是他后来所表现的那些孟什维主义观点底胚胎。

无论“劳动解放”社或当时各马克思主义小组,都还没有实际与工人运动联结起来。这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民主派纲领原理在俄国产生和巩固起来的时期。在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这十年当中,社会民主派还只是表现成为个别狭小的团体和小组,还同群众工人运动没有联系,或是很少联系。当时社会民主派正好似一个尚未诞生,但已在母亲胎胞里发育着的孩儿一样,还处在——如列宁所写——“胚胎发展的过程中”。

“劳动解放”社“只是在理论上创立了社会民主运动和实行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列宁曾这样指出。

在俄国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溶成一体,并把“劳动解放”社所犯种种错误纠正过来的任务,只得由列宁来解决。

(三)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布尔什维主义创始人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列宁,一八七〇年生于西姆比尔斯克城(现为乌里杨诺夫斯克城)。一八八七年,列宁进嘉桑大学肄业,但不久就因参加学生革命运动被捕并被开除学籍。列宁在嘉桑加入了费多塞也夫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自列宁移居萨马拉后,很快就有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组

在列宁周围形成起来。还在那个时候，列宁就以深知马克思主义而使大家惊服了。

一八九三年末，列宁移居彼得堡。列宁在彼得堡最初发表的几次言论，就已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参加者中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列宁因非常深知马克思学说，善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当时的俄国经济政治环境，怀有确信工人事业必胜的热烈坚强的信心，以及卓越的组织天才，所以成了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者。

列宁受到了他所指导的那些小组里先进工人们底热烈爱戴。

工人巴布石金回忆列宁在工人小组里上课情形时说：“我们所听的讲演非常生动而饶有兴趣，我们大家都十分满意这些讲演，我们的讲师底智慧，常使我们惊叹佩服”。

一八九五年，列宁把彼得堡所有一切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当时这样的小组已有二十来个)统一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样，他就准备了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基础。

列宁向“斗争协会”提出了更加密切地与群众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并在政治上加以领导的任务。列宁主张由专在宣传小组内少数先进工人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工作，过渡到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进行迫切政治鼓动的工作。这个向群众鼓动工作方面的转变，对于俄国工人运动以后的发展有严重的意义。

在九十年代，工业曾处于高涨的时期。工人数量增加了。工人运动加强了。从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九年间，罢工工人数目，据很不完备的统计，也不下二十二万一千人。工人运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严重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观点，即认为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能起先进作用的观点，已由实际生活本身所证实了。

在列宁领导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工人为改良劳动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的斗争，与反沙皇制度

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斗争协会”在政治上教育了工人。

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实行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回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本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底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痼疽,工人生活困苦,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苦重劳动,工人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的宣言。一八九五年秋,列宁写了向托尔通厂罢工男女工人号召的传单。这个工厂是英国资本家开办的,他们赚得亿万利润。这里工作日延长到十四小时以上,而织布工人每月所领的工资却不过七个卢布。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了胜利。在很短一个时期,“斗争协会”印发了几十种这样的告各工厂工人的传单和宣言。每种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底精神。工人看见,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一八九六年夏,在“斗争协会”领导下举行了彼得堡三万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基本的要求是减少工作时间。由于这次罢工的逼迫,沙皇政府不得不于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颁布一道法令,把工作时间限定为十一小时半。在此法令未颁布以前,工作时间是根本没有限制的。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但列宁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过革命的斗争。他提出种种意见和指示来帮助“斗争协会”,从监狱里寄出他自己所写的小册子和传单。列宁在监狱里写了《论罢工》的小册子和《告沙皇政府》的传单,在这个传单上把沙皇政府专横暴戾的罪行揭露无余。同时,列宁在监狱里还写好

了党纲草案（用牛奶写在一本医学书籍底字行中间）。

由于彼得堡“斗争协会”给了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俄国其他各个城市与区域中的工人小组也相继统一成为这样的协会了。九十年代中叶，在南高加索有马克思主义团体出现。一八九四年，在莫斯科有“工人协会”成立。九十年代末叶，在西伯利亚有“社会民主协会”产生。九十年代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雅罗斯拉夫里和科斯特罗马等城有马克思主义团体出现，后来这些团体统一成了“社会民主党北方协会”。九十年代下半期，在顿河岸罗斯托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基也辅，尼科拉也夫，土拉，萨马拉，嘉桑，奥列哈沃、祖也沃及其他城市中，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团体和协会相继成立。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底意义，正如列宁所说那样，就在于它是倚靠着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底最初严重萌芽。

列宁在以后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中，始终是根据彼得堡“斗争协会”底革命经验出发的。

自列宁及其最亲近战友被捕后，彼得堡“斗争协会”底领导人员成份大大变更了。新的人物出头露面，他们自称为“青年人”，而把列宁及其战友称为“老头子”。他们开始实行错误的政治路线。他们说，必须叫工人单只进行反对厂主的经济斗争，而政治斗争则是自由资产阶级底事情，政治斗争中的领导权应属于自由资产阶级。

这样的人就被称呼为“经济派”。

这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最初出现的一个妥协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集团。

（四）列宁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列宁所提出的工农联盟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虽然普列汉诺夫在八十年代已经给了民粹主义观点体系一个

基本的打击,但民粹派观点在九十年代初期还博得某部份革命青年的同情。有一部分青年还继续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认为将来在革命中表现主要作用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粹派余孽多方阻碍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极力诽谤他们。于是必须在思想上澈底粉碎民粹主义,以期保证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的传播,保证有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可能。

这一任务是由列宁完成了的。

列宁在其《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一八九四年),澈底揭破了民粹派这些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底真面目。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实际上早已根本放弃了反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自由主义的民粹派主张去同沙皇政府调和和妥协。列宁论到当时的民粹派时写道:“他们简直以为只要向这个政府客客气气地请求一下,那它就会把一切都安排妥贴的”(《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一六一页)。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故意把农村贫民生活困苦、农村阶级斗争以及富农剥削贫民的情形一概抹煞,而赞美富农经济的发展。他们事实上是代表富农利益的。

同时,民粹派又在他们的杂志上拼命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故意颠倒是非,曲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底观点,硬说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农村破产,想“把每个农夫都拿到工厂锅炉里去受煎煮”。列宁在揭破民粹派这种荒谬批评时指出,问题并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底“希望”,而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底真实进程,无产阶级底人数必然要在这个进程中增加起来。但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底掘墓人。

列宁指出,愿意消灭资本家地主压迫,愿意消灭沙皇制度的真正人民之友,并不是民粹派,而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在其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初次提出了认定工农革命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主要手段这一思想。

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许多著作中，驳斥了民粹派基本集团民意党人所运用，后来又由民粹派继承者社会革命党人所运用的那些政治斗争手段，特别是驳斥了个人恐怖的策略。列宁认为这种策略是对革命运动有害的，因为这种策略用单个英雄人物底斗争来代替群众底斗争。这种策略是表示不相信人民革命运动。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底基本任务。列宁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把各个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接着列宁又指出，正是俄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就会把沙皇专制制度推翻，然后俄国无产阶级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结成联盟，就会与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并肩行进，循着直接公开政治斗争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由此可见，列宁早在四十余年以前，就已正确指出工人阶级底斗争道路，认定工人阶级是社会上的先进革命力量，认定农民是工人阶级底同盟者。

列宁及其拥护者所进行的反民粹主义的斗争，结果是在九十年代就把民粹主义思想澈底粉碎了。

列宁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也有极大的意义。如在历史上所常见的一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中通常总有一些暂时的“同路人”混入。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便是这样的“同路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经广阔传播起来了。于是，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就穿起一套马克思主义衣衫。他们常在合法的，即经沙皇政府准许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言论，因此就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也曾进行过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但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个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旗帜来叫工人运动服从和适应资产阶级

社会底利益,资产阶级底利益。他们从马克思学说中抛弃了最主要的东西,即抛弃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最著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极力赞美资产阶级,并号召大家“承认我们不文明而去向资本主义领教”,而不要去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

列宁认为在反民粹派的斗争中可以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成立暂时协定,利用他们去反对民粹派,例如共同出版过一本反民粹派的文集。但列宁同时又非常激烈地批评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他们那种自由资产阶级的本性。

后来,这些“同路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俄国资产阶级底主要政党)党员,而在国内战争时期则已成了激烈的白卫份子。

除彼得堡,莫斯科,基也辅等处的“斗争协会”外,在俄国西部各民族边区也有社会民主派的组织出现。九十年代,有马克思主义份子从波兰民族主义党中分化出来,而成立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九十年代末叶,有几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组织成立起来。一八九七年十月,在俄国西部州区有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简称崩得)宣告成立。

一八九八年,有几个“斗争协会”,即彼得堡、莫斯科、基也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等城“斗争协会”和崩得,作了初次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尝试。为了这一目的,它们便于一八九八年三月在明斯克召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大会的只有九个代表。列宁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因为当时他已被流放于西伯利亚。大会上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不久便被破获了。用大会名义发表的《宣言》,有许多地方还不能令人满意。《宣言》上忽略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根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且把无产阶级在反沙皇制度及反资产阶级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也忽略过去了。

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和《宣言》中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底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底意义，也就在于它作了超过很大革命宣传作用的这种正式手续。

虽然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举行过了，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还是没有建立成功。这次大会没有把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统一起来，没有在组织上把它们联成一气。各地方组织底工作还没有共同一致的路线，还没有规定出党纲和党章，还没有一个中央统一的领导。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所以各地方组织中的思想分离现象开始增长起来，结果就造成了使机会主义“经济派”容易在工人运动中加强的条件。

只是赖有列宁及其所组织的《火星》报多年紧张的工作，才把这种分离现象克服，把机会主义动摇思想击破，而准备好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础。

(五)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列宁火星报的出现。

列宁没有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当时住在西伯利亚流放所，即住在他因“斗争协会”案在彼得堡受禁很久以后被沙皇政府放逐到那里去了的寿山斯克村。

但列宁就是在流放所，也继续进行了革命工作。列宁在流放所写完了极重要的科学著作《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一书，结果便把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事业完成了。同时他在那里又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底任务这本有名的小册子。

当时列宁虽与直接革命实际工作隔离，但他终能与实际工作者保持着某种联系，从流放所同他们往返通信，向他们询问种种消息，向他们贡献种种意见。当时列宁特别操心的是“经济派”问题。他比谁都更加明白，“经济主义”是妥协主义，亦即机会主义底骨

干；“经济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获得胜利，就会使无产阶级底革命运动受到破坏，使马克思主义遭到失败。

所以从“经济派”最初出现时起，列宁就开始向他们实行猛击。

“经济派”认为工人只应进行经济斗争，而政治斗争则应让自由资产阶级去作，工人应当帮助自由资产阶级。列宁认为“经济派”这样宣传，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就是否认工人阶级需要有独立的政党，就是企图把工人阶级变为资产阶级底政治附庸。

一八九九年，一部分“经济派”份子(普罗科坡维奇，枯斯科娃及其他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发表了自己的宣言。他们公开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并要求放弃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工作，要求放弃工人阶级底独立政治要求。“经济派”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底事情，而工人则只要进行反对厂主的经济斗争就行了。

列宁一读到这个机会主义文件，就把被流放于附近各处的马克思主义者召集起来开会商议，于是以列宁为首的十七个同志就通过了一个揭露“经济派”观点的激烈抗议书。

由列宁起草的这个抗议书，马上就在全俄各地马克思主义组织中间传播起来，因而大大促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事业。

俄国“经济派”所宣传的观点，也就是外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伯恩斯坦派，即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信徒们所宣传的观点。

因此，列宁反对“经济派”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

反对“经济主义”而为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奋斗的任务，基本上是由列宁所组织的秘密刊物火星报执行了的。

一九〇〇年初，列宁和“斗争协会”中其他几个会员，从西伯利亚流放所回到俄罗斯本部来了。列宁立意创办一个规模巨大的全

俄马克思主义秘密机关报。当时俄国已存在有许多细小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和组织，但它们彼此还没有连成一气。当时，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自上至下地腐蚀着党；当时，思想上的分离是党内生活底特征”，所以创办全俄秘密报，是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底基本任务。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把各个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彼此连成一气，并准备好建立真正政党的基础。

但这样的报纸不能在沙俄境内出版，因为如果在警察压迫极严的沙俄境内出版这样一个报纸，那它经过一两个月就会被沙皇密探发觉而受到破获的。因此列宁决定到国外去创办这个报纸。于是这个报纸就在国外实行用最薄最结实的纸张刊印，而秘密运到俄国内地散发。有几期《火星》报是在俄国境内巴库，基申涅沃，西伯利亚等地秘密印刷所里翻印过的。

一九〇〇年秋，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到国外去与“劳动解放”社中的同志们磋商创办全俄政治报的问题。这个意见，列宁早在流放期中，就已十分周详地考虑过了。列宁从流放所回来的途中，曾为这个问题在乌发，普斯可夫，莫斯科及彼得堡等地举行过好几次会议。每到一处，他都和同志们约定好秘密通信的密码，以及寄送刊物的地址等等，并同他们讨论了将来斗争的计划。

沙皇政府感觉到，列宁是它最危险的敌人。沙皇的暗探祖巴托夫宪兵上校在秘密呈报中写道：“现在革命当中再没有比乌里杨诺夫更大的人物了”，因此他认为最好是设法把列宁刺死。

列宁到国外后，就与“劳动解放”社，即与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及查苏利奇商定了共同出版火星报的事情。整个出版计划，从头至尾都是列宁拟定的。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火星报第一期在国外出版了。在报头下面载有这样一句名言（题词）：“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这一句话是从十二月党人（注一）在西伯利亚流放所答诗人普希金贺词的回信中摘引来的。

果然,列宁所点燃的“火星”,后来真正燃成了伟大的革命火焰,而把贵族地主的沙皇帝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烧成灰烬了。

简短的结论

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工人政党,首先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那些错误而有害于革命事业的观点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只有在思想上击破民粹派观点以后,才能扫清创立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基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给了民粹主义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列宁在九十年代完成了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他把民粹主义澈底击破了。

一八八三年成立的“劳动解放”社,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点上进行过很多工作,它在理论上创立了社会民主运动,实现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迅速增长起来。在八十年代中叶的时候,工人阶级已走上进行有组织斗争的道路,已走上举行表现于有组织罢工的群众发动的道路。但当时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还只从事于宣传,没有了解必须到工人阶级中去进行群众鼓动,因此它们也就没有同工人运动实际联系起来,没有领导过工人运动。

列宁所组织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八九五年),在工人中进行了群众鼓动,领导了群众罢工,因而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工人中进行群众鼓动并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阶段。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最初的萌芽。自彼得堡“斗争协会”成立后,所有一切主要工业中心和各个边区都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一八九八年,举行了第一次——虽然没有成功——把各马克

思主义社会民主组织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尝试，即召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这次代表大会还没有把党建立起来，因为还没有规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造成一个中央统一的领导，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彼此还几乎没有任何的联系。

为了把各个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统一和结合成为一个党，于是列宁就提出并且实现了创办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全俄报，即《火星》报的计划。

“经济主义者”是在这个时期反对建立工人统一政党的主要敌人。他们否认必须成立这样一个政党，而拥护各个团体底零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列宁及其所创办的《火星》报，就是对准他们开火的。

《火星》报最初几期的出版(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间)，就是实行过渡到新的时期，即将各个零散的小组和团体真正组成为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期。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成。 党内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与 孟什维克派组织的出现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时期)

(一)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间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十九世纪末欧洲爆发了工业危机。这次危机很快就蔓延到了俄国。在危机年代(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间)倒闭的大小企业计有三千多家。被开除工作的有十万多工人。在业工人底工资大为减低。工人先前用顽强的经济罢工从资本家那里争得的一点让步,又被资本家夺去了。

工业危机和失业苦痛并没有把工人运动停止,也没有把它减弱。恰巧相反,工人斗争更加带有革命性质了。工人开始从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最后,工人又转到游行示威,提出关于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提出“打倒沙皇专制”的口号。

一九〇一年间,彼得堡城奥布哈夫兵工厂里发生的五一罢工变成了工人与军队间的流血冲突。工人们只能用石头和铁块去反抗沙皇的武装军队。工人们底顽强抵抗是被击破了。接着就来了残酷的压迫:约有八百个工人被捕,有许多人被关进牢狱或被判处苦役徒刑。但英勇的“奥布哈夫防卫战”给了俄国各地工人很大的影响,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同情的浪潮。

一九〇二年三月,在巴土姆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运

动,这些行动都是由巴土姆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巴土姆的示威运动激动了南高加索全境的工农群众。

同年,在顿河岸罗斯托夫城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开始罢工的是铁路工人,接着就有很多工厂中的工人参加进来。罢工激动了全体工人。在城外一连开过几天群众大会,到会工人达三万之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朗诵了社会民主党发表的宣言,许多人出来发了言。警察和哥萨克军队没有能力驱散这几万群众的工人集会。有几个工人被警察打死了,第二天送葬时举行了一个巨大的工人示威。沙皇政府只是从邻近城市调来大批军队后,才把这次罢工镇压了下去。罗斯托夫工人底斗争,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顿河区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

一九〇三年的罢工运动规模更大。这年在南俄各处都发生过群众政治罢工,蔓延到南高加索一带(巴库、梯弗里斯、巴土姆)和乌克兰各大城市(敖德萨,基也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罢工性质更加坚决持久,更有组织了。现在与过去工人阶级发动不同之处,就是现在的工人政治斗争差不多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领导的了。

俄国工人阶级已挺身奋起来同沙皇政权作革命斗争了。

工人运动对于农民发生了影响。一九〇二年春夏两季,在乌克兰(坡尔塔瓦州与哈尔科夫州)和窝尔加河一带有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农民放火焚烧地主房屋,夺取地主土地,杀戮他们所仇恨的地政官(注二)和地主。虽然政府派遣了军队来镇压这些起义的农民,向他们开枪射击,有成千成百的农民被捕,有许多农民领导者和组织者被关进牢狱,但革命的农民运动还是继续高涨着。

工农的革命发动表明俄国革命日益成熟,日益迫近了。

学生的反政府运动也在工人革命斗争影响下加强起来。政府为对付学生示威罢课而封闭学校,把成百的学生关进牢狱,最后还想出了把不肯屈服的学生送去当兵的手段。全国各大学学生为回

答政府这种举动,便于一九〇一年末和一九〇二年初实行全国总罢课。参加这次罢课的达三万人。

工农革命运动的增长,特别是政府对学生施行的压迫,遂使自由派资产者和那些把持着所谓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地主们也只好动作起来,提出“抗议”,反对当时压迫他们在大学里念书子弟的那个沙皇政府所采取的“极端行动”。

地方自治派的自由派份子是利用地方自治局来做他们的据点的。所谓地方自治局,就是专管有关乡村居民的纯粹地方性事宜(修筑道路,建造医院及学校)的地方管理机关。自由派的地主在地方自治局里占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与自由派的资产者有密切的联系,差不多和他们打成了一片,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田产上已开始从半农奴制经济过渡到更为有利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两部分自由派当然是拥护沙皇政府的,但他们同时却反对沙皇政府底“极端行动”,因为他们担心正是这种“极端行动”会使革命运动加强起来。他们害怕沙皇政府底“极端行动”,但他们更害怕革命。自由派抗议沙皇政府底“极端行动”,是想一举两得:第一,“开导”沙皇;第二,给自己戴上“大不满意”沙皇制度的假面具,以期博得人民的信任,使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离开革命,因而削弱革命。

诚然,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运动对于沙皇制度底存在并没有任何危险,但它毕竟是表明沙皇制度“永存”柱石情形不妙的一种征兆。

由于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运动的结果,在一九〇二年成立了资产阶级的“解放”社,而这个“解放”社就是后来俄国主要资产阶级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底骨干。

沙皇政府眼见工农运动日益汹涌泛滥于全国,于是拼命设法来制止革命运动。用武力对付工人罢工示威的事实日益常见,枪弹和皮鞭已成为沙皇政府回答工农发动的通常工具,监狱和流放所已有人满之患。

沙皇政府除加紧施行高压手段外，还企图用其他较为“灵巧”的不带高压性的办法来引诱工人离开革命运动。于是就来企图建立一种受宪警监护的伪工人组织。这种组织当时被称为“警察社会主义”的组织，或祖巴托夫组织（是以建立了这些警察工人组织的宪兵上校祖巴托夫得名）。沙皇暗探局（注三）经过自己的探子来极力欺骗工人，硬说沙皇政府自愿帮助工人来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祖巴托夫份子向工人说：“既然沙皇自己站在工人方面，那你们又何必从事政治活动，何必进行革命呢”。祖巴托夫份子在几个城市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一九〇四年，加邦牧师也按照祖巴托夫组织的样式，并为着同样的目的而建立了一个名为“彼得堡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的组织。

但沙皇暗探局想控制工人运动的企图，是没有什么成功的。沙皇政府采取这种办法，并没能把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对付下去。工人阶级继长增高的革命运动把这种警察组织扫除了。

（二）列宁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经济派”

底机会主义立场。火星报为列宁计划而斗争。

列宁所著“做什么？”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底思想基础。

虽然一八九八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已宣告了党底成立，但党还是没有建立成功。当时还没有党纲和党章。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不久便被破获，并且再也没有恢复过，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去恢复它。不仅如此。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思想上的分离和组织上的涣散更加厉害了。

如果说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年时期是战胜民粹主义并在思想上准备建立社会民主党的时期，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时期是试图——虽然没有成功——把各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统一成社会民主党的时期，那末一八九八年以后的时期，便是党内思想上组织上混乱状态更加厉害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战胜民粹主义的事实和工人

阶级所进行的革命发动,既已证明马克思主义者立场正确,结果就使革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愈益表示同情。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种时髦了。于是知识界中的大批革命青年都纷纷加入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们在理论上很少修养,在组织和政治上没有经验,只是从当时充满出版界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机会主义作品中获得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模糊的,大部分是不正确的观念。这种情况,就使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的理论和政治水准降低,使其中渗进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情绪,使思想上的分离,政治上的动摇和组织上的混乱状态更加厉害起来。

工人运动愈益增长以及革命时机显然逼近的情势,都要求成立一个能领导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但当时党底各个地方机关,各个地方委员会、团体和小组底情形非常不好,它们的组织上的涣漫和思想上的分离程度非常厉害,致使成立这样一个政党的任务极感困难。

其所以困难,不仅是因为当时建党工作必须在沙皇政府残酷迫害的炮火下进行,组织中的优秀工作人员常被沙皇政府抓去,抛到流放所,监狱及苦工处去。其所以困难,还因为当时大部分地方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除了本地狭小的实际工作外,根本不愿过问什么别的事情,根本不懂得党内缺乏组织上和思想上统一的害处,却习惯于党的组织上的涣散与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并认为没有统一集中的政党也是可以过得去的。

要建立集中的政党,就必须把各个地方机关中这种落后性,因循惯习和狭隘实际主义消灭。

但还不不仅如此。当时党内存在有很大一群人,他们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在俄国有《工人思想》报,在国外有《工人事业》杂志),他们在理论上辩护党内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分离,甚至往往赞美这种情形,认为建立统一集中工人阶级政党是个不必要和捏造出来的任务。

这些人就是“经济派”及其信徒。

要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就必须打破“经济派”。

于是列宁就来着手执行这些任务和实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

关于究应从何处着手建立统一工人阶级政党这一问题，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要建立党，必须从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开始，以为召集这次代表大会就能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起来，把党建立成功。但列宁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在召集代表大会以前，首先必须把党底目的和任务问题弄清楚；必须知道我们所想建立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党；必须在思想上与“经济派”分开；必须诚恳而公开地告诉党，关于党底目的和任务问题存在有两个不同的意见，即“经济派”底意见和革命社会民主派底意见；必须在刊物上开始进行广大的宣传来拥护革命社会民主派底观点，正如“经济派”在其机关刊物上进行宣传来拥护他们自己的观点一样；要让各个地方组织能在这两派中间作一个自觉的选择。只有做了这番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才可以召集党代表大会。

列宁直截了当地说：

“在统一以前，并为统一起见，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七八页）（注四）。

因此，列宁认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应从创办一个进行宣传鼓动来拥护革命社会民主派观点的全俄战斗的政治报着手，创办这样的报纸应是建党工作的第一步。

列宁在他那篇有名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拟定了一个具体的建党计划，后来他又在自己的名著《做什么？》一书中把它加以发挥。

“据我们的意见，——列宁在该论文中说道，——创办全俄政治报，应是活动底出发点，应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组织^①的第

^① 是指建党而言。——编者。

一个实际步骤,最后应是我们所能借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这个组织的基本线索……没有这个报纸,就不能有系统地进行原则坚定的各方面的宣传与鼓动,这种宣传与鼓动一般就是社会民主派底经常和主要的任务,而在现时更是特别迫切的任务,因为现时在最广大的居民阶层中间已唤起了对于政治,对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同上,第一一〇页)。

列宁认为这样的报纸不仅会成为思想上团结党的工具,而且会成为组织上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为党的工具。这个报纸底代办员和通信员网既是各个地方组织底代表,就会成为使党能在组织上环绕着它而统一起来的骨干。因为——列宁说道——“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这个代办员网,——列宁在同一论文中说,——就会成为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组织底骨干,这个组织应充分巨大,能够包括全国;应充分广阔周备,能够实行严格而细密的分工;应充分坚定,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折”和意外情形下,都始终一贯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应充分灵活,一方面,在敌人将一切力量集中于一个地方而拥有优越势力的时候,善于避免与这个敌人作公开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这个敌人底迟钝性,在敌人最难料到能受攻击的地方和时候突然攻其不备”(同上,第一一二页)(注五)。

火星报就应成为这样的报纸。

而火星报也就确实成了这样的全俄政治报,结果就准备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

讲到党本身底结构和成份时,列宁认为党应由两部分所组成:(一)人数不多,经常进行工作的基干领导工作人员,其中所包含的主要是革命职业家,即除了党的工作外,再不必从事其他任何业务的工作人员,他们具有最低限度必要的理论知识、政治经验、组织技能,以及巧于和沙皇警察作斗争的艺术,巧于避开警察的艺术;(二)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为数甚多而备受千百万劳动者同情拥

护的党员群众。

“我认定：——列宁写道，——（一）无论那一个革命运动，若没有一种稳定而能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巩固起来；（二）自发卷入斗争……的群众愈广大，这样的组织也就愈加迫切需要，这种组织也就应当愈加坚固……；（三）参加这种组织的，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四）在专制制度的国度内，我们愈缩小这种组织底组员成份，一直缩小到只许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在反政治警察的斗争艺术上受有专门训练的人参加，则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捉拿’；（五）则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里有机会参加这个运动，有机会在运动中间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列宁全集》，第四卷，第四五六页）（注六）。

讲到当时所应建立起来的党底性质及其对于工人阶级的作用，以及党底目的和任务时，列宁认为党应当是工人阶级底先进部队，应当是工人运动底领导力量，应当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党底终极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最近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要推翻资本主义，就必须预先推翻沙皇制度，所以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阶级，发动全体人民去和沙皇制度斗争，开展人民革命运动去反对并推翻沙皇制度，因为沙皇制度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第一个严重障碍。

“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最近的任务，——列宁说，——是比其他任何一国无产阶级所有一切最近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就是说，不仅是把欧洲反动势力底最强大堡垒打破，而且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把亚洲反动势力底最强大堡垒打破，结果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同上，第三八二页）（注七）。

再则：

我们应当记着：为了个别要求去同政府作斗争，夺取个别让步，这还只是和敌人发生的小小的接触，这还只是小小的前哨战，

而决战还在前面。我们面前横着有一座强有力的敌人炮台,从那里向我们放出雨滴般的炮弹来杀害我们的优秀战士。我们应当夺得这座炮台,而只要我们能将觉醒着的无产阶级所有一切力量,都拿来和俄国革命者所有一切力量统一成为俄国所有一切生动而忠诚的份子所向往的一个党,那我们就一定能夺得这座炮台。只有那时才会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阿列克塞也夫底伟大预言:“待到千百万工人大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的时候,兵士刀枪所护卫着的专制桎梏就会被打成粉碎的!”(同上,第五九页)。

这就是列宁在沙皇专制俄国条件下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计划。

“经济派”马上就向列宁的计划开火了。

“经济派”认为反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斗争是所有一切阶级底事情,首先是资产阶级底事情,所以这个斗争对于工人阶级是不关重要的,因为工人底主要利益是需要进行反对厂主的经济斗争,以谋增加工资,改良劳动条件等等。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底主要和最近任务不是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不是推翻沙皇制度,而是组织“工人与厂主及政府作经济斗争”,并且他们所谓与政府作经济斗争就是要求改善工厂法。“经济派”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就能“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经济派”已经不敢来正式否认工人阶级需要有政党了。但他们认为党不应是工人运动底领导力量,不应去干预工人阶级底自发运动,尤其不应去领导它,而应跟着它走,研究它,并从它中间吸取教训。

其次,“经济派”认为觉悟成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理论底组织和指导作用是很渺小,或差不多是很渺小的;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把工人提到社会主义意识底水准,反而应该去适应并降到工人阶级中等阶层以至更落后阶层底水准;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

意识，而应该等待工人阶级自发运动自己凭靠本身力量养成社会主义意识。

讲到列宁所提出的建党组织计划时，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是等于强制自发运动。

列宁在《火星报》上，特别是在其名著《做什么？》一书中，猛击了“经济派”底这种机会主义哲学，结果便把它打成粉碎了。

（一）列宁指出，引诱工人阶级离开反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斗争，把它的任务局限于反对厂主及政府的经济斗争而毫不损伤厂主及政府，就是使工人永久陷于奴隶的地位。工人与厂主及政府的经济斗争，只是为了把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条件改善一下的工联主义斗争，但工人斗争底目的不仅是要改善工人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条件，并且是要根本消灭那迫使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和忍受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当工人运动道路上还站着有沙皇制度这一只极力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恶狗时，工人就不能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不能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党和工人阶级底最近任务是要扫除沙皇制度，以便打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列宁指出，赞美工人运动底自发过程而否认党底领导作用，把党底作用归结为事变登记者底作用，这就是宣传“尾巴主义”，就是把党变为自发过程底尾巴，变为运动中的消极力量，变成只能观望自发过程和指靠自流趋势的力量。进行这种宣传，就是企图把党消灭，亦即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政党的地位，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武器的地位。而当工人阶级面前站立着这样的敌人，如拥有一切斗争工具的沙皇制度，以及按现代方式组织起来，并由其本身政党领导来与工人阶级作斗争的资产阶级的时候，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武器的地位，就等于叛卖工人阶级。

（三）列宁指出，崇拜工人运动底自发性而降低觉悟性底作用，即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理论底作用，那就是：第一，讥笑

趋向觉悟性如趋向光明一样的工人；第二，使党蔑视理论，亦即使党蔑视其认识现在和预察将来的武器；第三，完全和最终地滚到机会主义泥潭中去。

“没有革命的理论，——列宁说，——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底作用”（《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页）（注八）。

（四）列宁指出，“经济派”认定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能从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中产生出来，就是欺骗工人阶级，因为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是从自发运动中，而是从科学中产生出来的。“经济派”否认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替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清扫道路，使其容易灌输和注入到工人阶级中去，因而就是埋葬必须把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的思想，就是帮助资产阶级。

“对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列宁说，——对于觉悟成分”作用，即社会民主党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九〇页）（注九）。

往下又说：

“问题就只能是这样：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呢，还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呢。这里没有什么中间的道路……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与任何离弃，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同上，第三九一至三九二页）（注一〇）。

（五）列宁把“经济派”所有这些错误总结起来，就得出结论说：“经济派”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主张社会革命，能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政党，而是想建立一个主张“社会改良”，打算保存资本主义统治的政党，因此“经济派”就是贩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良主义者。

（六）最后，列宁指出，“经济主义”不是在俄国偶然产生的现象，“经济派”是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在西

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拥护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观点的修正派为其同盟者。当时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派已日益巩固，他们在“自由批评”马克思的大旗下要求“修正”，即修改马克思学说（由此就有“修正主义”这一名称），要求拒绝革命，拒绝社会主义，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俄国“经济派”同样也是进行着这种拒绝革命斗争，拒绝社会主义，拒绝无产阶级专政的路钱。

以上就是列宁在其《做什么？》一书中所发挥的基本理论原理。

因《做什么？》一书传播的结果，于是在它出版一年后（它是一九〇二年三月出版的），即到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经济派”底思想立场所剩下的已经只是一种不堪回想的印象，而“经济派”这一称号在党内大多数工作人员听来，已成为一种侮辱人的名字了。

这就是说已把“经济派”在思想上完全打成粉碎，已把机会主义，尾巴主义，自流主义的思想体系完全打成粉碎。

但列宁所写《做什么？》一书底意义，还限于此。

《做什么？》一书底历史意义，就是列宁在他这部有名的著作中：

（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先澈底揭示了机会主义底思想根源，指出这种根源首先是在于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而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二）把理论、觉悟性和党是自发工人运动革命化因素和领导力量底这种作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

（三）灿烂地论证了认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

（四）英明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底思想基础。

在做什么？一书中所发挥的理论原理，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思想体系底基础。

火星报既拥有这样的理论财富,就能够开展,并且确实开展了为实现列宁建党计划,聚集全党力量,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捍卫革命社会民主党,反对“经济派”,反对所有一切机会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而进行的广阔运动。

火星报底最重要任务是制定党纲草案。大家知道,工人党底党纲是工人阶级斗争目的和任务用科学方法归纳起来的简括说明。党纲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底终极目的,以及党在达到这一终极目的的道路上所应争取的种种要求规定出来。因此,制定党纲草案在当时不能不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当拟制党纲草案时,火星报编委内部有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及其他编辑员之间的严重意见分歧发生。这些意见分歧与争论几乎弄到列宁和普列汉若夫彼此完全破裂。但破裂在当时还没有发生。由于列宁坚持的结果,终于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最重要的条文加进了党纲草案,并在党纲草案中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党纲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全部条文,也是由列宁提出的。列宁当时已经主张土地国有,不过他认为在斗争第一阶段上所必须提出的要求是将“割地”,即将地主在“解放”农民时割去的那一部分农民土地归还给农民。普列汉诺夫反对土地国有。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党纲问题上的争论,部分地决定了后来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的意见分歧。

(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纲党章的通过和统一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上的意见分歧和党内两个政派,即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出现。

这样,列宁原则的胜利以及《火星》报为列宁组织计划奋斗的成功,就准备好了建立党,或如当时所说建立真正党所必需的一切基本条件。《火星》报的方针已在俄国各个社会民主组织中获得了

胜利。现在已经可以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了。

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公历七月三十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开幕。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外秘密召集的。大会最初几次会议是在布鲁塞尔举行。但后来因比国警察要求大会代表离开比境，于是大会只好移到伦敦去举行。

参加这次大会的计有四十三名代表，代表着二十六名组织。每个委员会都有权选派两名代表，但有些委员会却只选出了一名代表。所以四十三名代表一共拥有五十一票表决权。

大会底主要任务，就是要“根据《火星》报所提出所拟定的那些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来建立真正的党”（《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一六四页）（注一一）。

大会成份是不一致的。大会上没有明显的“经济派”代表出席，因为他们已经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在这个时期已很巧妙地改头换面了，所以终能派出几个代表混进代表大会。此外，崩得代表也只是口头上与“经济派”有所不同，其实他们是拥护“经济派”的。

所以出席大会的不仅有拥护《火星》报的份子，而且也有反对《火星》报的份子。拥护《火星》报的有三十三人，即占大多数。然而并非所有自命为火星派的人都是真正的列宁火星派份子。大会代表分成了几个集团。拥护列宁的人，即坚定的火星派份子，共有二十四票。有九个火星派份子是拥护马尔托夫的，他们是不稳定的火星派份子。有一部分代表动摇于《火星》报和反火星派之间，他们在大会上共有十票。这就是中派。公开的反火星派份子，共有八票（三个“经济派”份子和五个崩得份子）。当时火星派内部一发生分裂，《火星》报底敌人就能占得上风的。

由此可见，代表大会上的情形是异常复杂的。列宁费了许多力量，才保证《火星》报路线在大会上获得了胜利。

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党纲。讨论党纲时引起大会上机会主义份子反对的主要问题，乃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机会主义者

在其他许多纲领问题上也是不赞成大会上革命份子底意见的。但他们却决定主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实行开火,理由是说国外许多社会民主党党纲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因此也就可以不把这一条文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纲。

同时,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把农民问题上的要求载入党纲。这些人根本就不想革命,所以他们对工人阶级同盟者的农民采取歧视态度,对之表示嫌恶。

崩得份子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民族自决权。列宁始终教导说,工人阶级必须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在党纲上规定这个要求,就是主张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抛弃,而助长民族压迫。

列宁对于这一切反对意见,都给了一个致命的打击。

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所提出的党纲。

这个党纲分为两部分,即分为最高限度纲领和最低限度纲领。最高限度纲领上所说的是工人阶级党底主要任务: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限度纲领上所说的是党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前,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所应实现的最近任务: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工人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农村中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把地主夺去的一部分农民土地(“割地”)归还给农民。

后来,布尔什维克已用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来代替了归还“割地”的要求。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党纲,是工人阶级政党底革命纲领。

这个党纲一直保存到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时为止,此时,我们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已通过了新的党纲。

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之后,就来讨论党章草案。大会既已通过了党纲,既已建立了党在思想上统一的基础,当然也就要通过党章,以便把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组织涣散和党内缺乏坚

强纪律等现象完全消灭。

但是，如果说通过党纲时的情形还算比较顺畅，那末党章问题却在大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厉害的意见分歧，是在讨论党章论党员资格的第一项条文时开展起来的。谁得为党员，党底成份究竟应是怎样，党在组织方面究竟应是个有组织的整体，还是一种没有定形的东西，这便是讨论党章第一项时所发生的问题。当时有两个条文互相对立：一个是由列宁提出而为普列汉诺夫和坚定火星派份子拥护的条文；另一个是由马尔托夫提出而为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不稳定火星派份子，托洛茨基以及代表大会上所有一切公开机会主义份子拥护的条文。

列宁的条文是说：凡承认党纲，在物质方面帮助党并参加党内某一组织者，皆得为党员。马尔托夫底条文虽认为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做党员的必要条件，却不承认参加党内某一组织是做党员的条件，竟认为党员也可能不是党内某一组织中的一员。

列宁把党看作是有组织的部队，其中各个成员并不是自行列名入党，而是由党内某一组织接收入党，因此他们必须服从党底纪律；而马尔托夫却把党看作是一种组织上没有定形的东西，其中各个成员都是自行列名入党，他们既不参加党内任何一个组织，因此也就不必服从党底纪律。

由此可见，马尔托夫底条文是与列宁底条文相反，而为那些不稳定的非无产者份子大开入党之门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资产阶级知识界中有些暂时同情革命的份子，他们有时甚至也能对党给予某种不大的帮助。但这些人决不会加入组织，不会服从党的纪律，不会执行党的委托，不会担当由此发生的危险。马尔托夫及其他孟什维克份子却主张承认这样的人为党员，主张给予他们影响党内事务的权利和机会。他们甚至主张让每个罢工者都有自行“列名”入党的权利，虽然当时参加罢工的也有非社会主义的份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

于是,马尔托夫份子所想有的并不是列宁以及列宁份子在大会上所力争的那种一元性,战斗性和组织严密的党,而是成份复杂、组织涣散和没有定形的党,这样一个党单只因为它成份复杂和不能有坚强纪律,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战斗性的政党。

不稳定的火星派份子从坚定火星派份子方面脱离出去,他们同中派结成联盟,再加上有公开机会主义者来同他们合并,于是就使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占得了优势。大会表决党章第一项时,由二十八票的多数对二十二票并在一票放弃表决权下通过了马尔托夫所提出的第一项条文。

自火星派因党章第一项问题发生分裂时起,大会上的斗争已更加剧烈起来。大会快要结束,已临到选举全党领导机关,即选举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委和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了。可是,在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以前,却因有几件事变发生而使大会上的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由于党章的关系,大会讨论到了崩得问题。崩得想在党内获得一种特殊地位。它要求承认它为俄国各地犹太工人底唯一代表。接受崩得这一要求,就会要在党组织里按民族标准区分工人,而把工人阶级统一的阶级的地域组织放弃。大会否决了崩得派在组织问题上所持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于是崩得份子便退出了大会。接着,两个“经济派”份子也退出了大会,因为大会拒绝承认他们那个旅外协会为党底国外代表机关。

七个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就使势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列宁派的改变。

党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向来就是列宁最为重视的问题。列宁认为必须把坚定澈底的革命者选进中央委员会去。马尔托夫份子极力想使机会主义动摇份子在中央委员会里占得优势。大会多数在这个问题上拥护了列宁底意见。选进中央委员会的都是拥护列宁的份子。

根据列宁底提议，当选为《火星》报编辑员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三人。马尔托夫在大会上要求把《火星》报原先六个编辑员一律选进《火星》报编委，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拥护马尔托夫的份子。大会以多数否决了这个提议。列宁所提出的三人全当选了。于是马尔托夫就提出声明，说他不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这样，大会就以其对于党中央机关问题的表决确定了马尔托夫派底失败和列宁派底胜利。

从此时起，拥护列宁的人，因他们在大会进行选举时获得多数选票而开始称呼为布尔什维克；而反对列宁的人，则因他们当时获得少数选票而开始称呼为孟什维克（注一二）。

我们把第二次代表大会底工作总结起来，便可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大会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主义”，即对于公开机会主义的胜利；

（二）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因而确立了统一政党底范围；

（三）大会揭示了组织问题方面存在有严重意见分歧的事实，这种分歧把党分成了两部分，即分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前者坚持着革命社会民主党底组织原则，后者滚到了组织涣散的泥潭，滚到了机会主义泥潭；

（四）大会表明党内旧有的机会主义者“经济派”刚被党击溃，新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又代之而起；

（五）大会在组织问题上没能胜任，表现过动摇，有时甚至让孟什维克占得了优势，虽然大会到结束时已有所改正，但它毕竟不仅没能把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揭破，不仅没能使他们在党内陷于孤立，并且没能向党提出这样的任务。

后一情况，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间的斗争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加尖锐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孟什维克首领们底分裂行动和第二次代表大会闭会后党内斗争的尖锐化。孟什维克底机会主义。列宁所著“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底组织基础。

第二次代表大会闭会后,党内斗争更趋尖锐了。孟什维克拼命设法破坏第二次代表大会底决议,夺取党底中央机关。孟什维克要求让他们加入《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能在编辑部里占得多数,在中央委员会里与布尔什维克人数相等。因为这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根本相抵触,所以布尔什维克否决了孟什维克底要求。于是孟什维克就瞒着党而暗中成立了他们以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反党派别组织,并“发动了如马尔托夫所写的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他们所采取的反党斗争手段,就是“捣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阻碍所有一切”(列宁语)。他们在十分之九是由那些脱离了俄国实际工作的侨外知识份子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旅外同盟”中盘踞起来,并从那里来对党,对列宁以及列宁主义者开火射击。

普列汉诺夫给了孟什维克很大的帮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原是同列宁一道走的。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却为孟什维克实行分裂的要挟吓倒了。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同孟什维克“和解”。把普列汉诺夫拉到孟什维克方面去的,是他过去那些机会主义错误的货色。普列汉诺夫本人很快就由一个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调和的人变成孟什维克了。普列汉诺夫要求把所有先前被代表大会否决了的孟什维克编辑员都加进《火星》报编辑部里去。列宁当然不能同意这点,于是就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以期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巩固起来,并从这个阵地上去打击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违反着代表大会底意志,独自一人把先前的孟什维克编辑员补选到《火星》报编辑部里去。从此时起,即从《火星》报第五十二期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

了自己的机关报，并经过《火星》报来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

从此时起，党内就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自从《火星》报转入孟什维克手里时起，它就成了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变成了宣传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首先是宣传组织问题上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的机关报。孟什维克同“经济派”以及崩得份子结合起来，就在《火星》报上开始向他们所称呼的列宁主义大举进攻。普列汉诺夫没能在调和立场上支持下去，不久也加入了这种进攻。这本来是势所必然的：谁主张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谁也就不免要滚到机会主义那里去。在新《火星》报上出现了雪片似的声明和论文，说党不应当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说党内必须容许不必服从党机关决议的自由团体和个人存在，说必须让每个同情于党的知识份子、“每个罢工者”和“每个示威者”都有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权利，说要求党员服从党底一切决议就是“形式官僚主义的”态度，说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就是“机械地镇压”党员意志；说要求全体党员——无论首领或普通党员——一样服从党底纪律，就是任党内建立“农奴制”，说“我们”在党内不是需要有集中制，而是需要有使各个份子和各个党组织都有权不执行党决议的无政府主义“自治制”。

这就是放肆宣传组织上的放荡性，宣传破坏党性和党纪律，赞美知识份子个人主义，辩护不守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行为。

孟什维克显然是要党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倒退到组织涣散状态上去，倒退到小组习气上去，倒退到手工业方式上去。

当时必须给予孟什维克一个坚决的回击。

于是，列宁就在其有名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一九〇四年五月出版）给予了他们这样一个回击。

以下就是列宁在这本书里所发挥而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基础的基本组织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部队。但工人阶级有很多部队,所以并非工人阶级任何部队都可称为工人阶级的党。党与工人阶级其他部队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党不是一个平常的部队,而是工人阶级先进的部队,觉悟的部队,马克思主义的部队,它拥有通晓社会生活,通晓社会生活发展规律,通晓阶级斗争规律的这种知识武装,所以它善于引导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底斗争。因此,决不能把党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正如不能把部分和整体混淆起来一样;决不能要求让每个罢工者都能自行宣布为党员,因为谁要是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谁就会把党底觉悟性水准降低到“每个罢工者”底水准,谁就会把党为工人阶级先进觉悟部队的这种作用消减。党底任务并不是要把自己的水准降低到“每个罢工者”底水准,而是要把工人群众,把“每个罢工者”提高到党底水准。

“我们是阶级底党,——列宁写道,——因此差不多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候,在内战时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密切地接近于我们党;可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是整个阶级都能升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底觉悟程度与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注一三)和‘尾巴主义’了。还没有过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曾怀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职工组织(较为原始,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底觉悟程度所了解的组织)都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是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与趋向于它的一切群众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底经常责任是要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水准,那就只是欺骗自己,故意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了”(《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页)(注一四)。

(二)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进觉悟的部队,而且同时又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有其为党员所必须遵守的纪律。因此,党员

一定要参加党内某一个组织。如果党不是本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不是个组织的体系，而不过是一些自行宣布为党员，但不参加党内任何一个组织，因而也就没有组织起来，不必服从党决议的份子所构成的总和，那它就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意志，永远不能实现自己党员行动上的统一，因而也就会无法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党只有当自己全体党员都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斗争，把它引向一个总的目标。

孟什维克提出一种反驳意见，说这样一来，许多知识份子，譬如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学生等等，就会要留在党外，因为他们不愿意加入党内某一个组织，这或是因为他们经受不起党底纪律，或是因为他们如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说那样，觉得“加入某一地方组织是有失自己体面的事情”。但孟什维克所提出的这种反驳意见是不攻自破的，因为党并不需要经受不起党纪律和害怕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工人并不害怕纪律和组织，所以他们一决定来做党员，就会乐意加入组织。只有怀着个人主义心理的知识份子才会害怕纪律和组织，因此他们确实是会留在党外的。但这正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因为这样一来，党就能免除不稳定份子流进党内来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当时，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高涨时期，是特别厉害的。

“如果我说，——列宁写道，——党应当是组织底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整体），那末……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要身为阶级先锋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要它只容纳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份子……”（《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三页）（注一五）。

其次：

“在口头上，马尔托夫底条文是拥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底利益，但在事实上，这个条文却是效劳于害怕无产阶级纪律性和组织

性的那个资产阶级智识界底利益。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阶层的智识界,其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同上,第二一二页)(注一六)。

复次:

“无产阶级是不害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焦心于要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只因他们在党组织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智识份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修养”(同上,第三〇七页)(注一七)。

(三)党不只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超出于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其使命是要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党既是由本阶级中具有先进理论,具有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 and 革命运动的经验武装的优秀份子所组成的最高组织形式,就完全能够领导——并且应该领导——其余一切工人阶级组织。孟什维克力谋缩小和降低党底领导作用,结果就会削弱党所领导的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组织,亦即削弱无产阶级并解除其武装,因为“无产阶级在为政权斗争中,除组织而外,再没有别的武器”(同上,第三二八页)(注一八)。

(四)党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与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联系之体现。党若不与非党群众发生联系,不增加这种联系,不巩固这种联系,那末,无论它是怎样优秀的先进部队,无论它组织得怎样好,也是不能生活,不能发展的。党如果闭关自守而与群众隔绝,丧失或即使稍微减弱自己与本阶级的联系,那它就一定会丧失群众方面的信任和赞助,因而也就会不免要陷于灭亡的。党要想过着丰满的生活并且向前发展,就应当增加自己与群众的联系,并求得本阶级千百万群众底信任。

“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列宁说,——就必须取得正是本阶级底拥护”(《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二〇八页)。

（五）党要正常地动作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就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就需要有统一的党章，需要有统一的党的纪律，需要有由党代表大会所体现，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中央委员会所体现的统一领导机关，需要使少数服从多数，各个组织服从中央，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没有这些条件，工人阶级底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就不能实现其领导本阶级的任务。

当然，因为当时党在沙皇专制制度条件下处于秘密存在的地位，党的组织不能建筑在从下而上的选举制基础上，因此党不得不具有极秘密的性质。但列宁认为这是我们党生活里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就会立刻消失，那时党就会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党，而党的组织就会建筑在民主选举制原则上，建筑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

“从前，——列宁写道，——我们党还不是正式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部分团体底总和，所以在这些团体间，除掉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同上，第二九一页）。

列宁责备孟什维克为组织上的虚无主义者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容许党底权力和党底纪律加在他们头上。列宁当时写道：

“这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具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奴隶束缚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之下实行分工，便发出可怜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对把人们变成‘机轮和螺丝钉’（而他们认为变得特别吓死人的，就是变编辑员为同事），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底组织章程，便装出看不起人的样子，发出鄙视的（向‘形式主义者’发出的）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同上，第三一〇页）（注一九）。

(六)党要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就应当在实践上实行统一的无产阶级纪律，即全体党员——无论是首领或普通党员——都必须同样遵守的纪律。因此，党内不应有什么不必服从纪律的“上等人”和必须服从纪律的“平凡人”之分。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保持党底完整性和党队伍底统一性。

“马尔托夫及其伙伴根本缺乏合理的论据来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列宁写道，——这最好是用他们自己所说“我们不是农奴！”一语来说明…这样就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底心理，他们把自己看作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的“上等人物”…在智识份子个人主义者看来…任何一种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都好像是农奴制”(同上，第二八二页)。

其次：

“随着我们真正政党之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战士底心理和爱耍无政府主义辞令的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底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来履行党员责任”(《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三一二页)(注二〇)。

列宁总结对于意见分歧的分析，并判定孟什维克底立场是“组织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时，认为孟什维主义底基本罪过之一就是看轻了党组织底意义，不承认党组织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武器。孟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底党组织对于革命胜利没有严重意义。列宁反对孟什维克底这种意见，而认为单靠无产阶级底思想统一，还不足以获得胜利，——为要获得胜利，还必须用无产阶级“组织底物质的统一”来“巩固”思想上的统一。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无产阶级，——列宁写道，——在为政权斗争中，除组织而外，再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里的无政府竞争制底统治所分散，既然被那替资本作的奴隶式的工作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完全贫困、粗野和退化的“深渊里”，所以无产阶级

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有组织底物质统一把它巩固起来，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底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俄国沙皇专制已经衰颓的政权，亦无论国际资本正在衰颓的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同上，第三二八页）（注二一）。

列宁就是用这样一段预言来结束他这本书的。

列宁在其有名著作《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所发挥的基本组织原理，就是如此。

这本书底意义首先就是它反对小组习气而捍卫住了党性，反对捣乱派而捍卫住了党，粉碎了组织问题上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而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底组织基础。

但这本书底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历史意义，就是这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破天荒第一次阐明了关于党的学说，说明党是无产阶级底领导组织，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便无法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获得胜利。

列宁所著《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在党工作者中间传播的结果，就使大多数地方组织都团结到了列宁周围。

可是，各地方组织愈加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孟什维克首领们底行为也愈加狠毒。

一九〇四年夏，孟什维克因有普列汉诺夫帮助和两个腐化布尔什维克克拉辛和诺斯可夫叛变而夺得了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当时已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孟什维克是力图造成分裂的。布尔什维克失去《火星》报和中央委员会之后，处于很困难的地位。必须创办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必须组织新的代表大会，即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便建立新的党中央委员会并打破孟什维克。

于是列宁，布尔什维克，就来执行这一任务。

布尔什维克展开了为召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一九〇四年八月，在瑞士境内由列宁领导举行了共有二十二个布

尔什维克出席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告全党书,它成了布尔什维克为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奋斗的纲领。

在三个区域(南方区,高加索区,北方区)内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代表会议上选出了党多数委员会常务局,它负责进行了实际筹备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

一九〇五年一月四日,布尔什维克所办的前进报第一期出版了。

这样在党内就形成了两个彼此隔绝的政派组织,即布尔什维克派的组织和孟什维克派的组织,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机关报。

简短的结论

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时期,由于革命工人运动的增长,俄国各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组织也增长和巩固起来了。在坚决反对“经济派”的原则斗争中,列宁的《火星》报所进行的革命路线获得了胜利,思想上的分离和“手工业方式”被克服下去。

《火星》报把各个零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连成一气,并准备着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一九〇三年召集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建立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火星派方针最终胜利而进行的斗争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两个集团,即布尔什维克集团与孟什维克集团。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是在组织问题上开展起来的。

孟什维克和“经济派”接近起来,并在党内代替了他们的地位。孟什维克底机会主义立场暂时还只表现在组织问题上。孟什维克反对建立列宁式的战斗的革命党,而主张建立涣散的,无组织的,尾巴主义的党。他们在党内进行分裂路线。他们在普列汉诺夫帮

助下夺得了《火星》报和中央委员会，并利用这些中央机关去谋实现其分裂主义的目的。

布尔什维克眼看孟什维克造成分裂的危险，就采取办法来约束分裂派，动员各个地方组织去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出版自己定名为“前进”的机关报。

这样，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夜，在已开始了的日俄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就表现成为两个彼此隔绝的政治集团。

第三章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七年时期)

(一)日俄战争。俄国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彼得堡城里的罢工。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工人在冬官前举行的示威。示威群众遭受枪杀。革命的开始。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了加紧夺取太平洋上统治权,瓜分中国的斗争。沙皇俄国也参加了这个斗争。一九〇〇年,沙皇军队协同日德英法等国军队用空前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起义。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已强迫中国把辽东半岛连同旅顺口要塞割让给俄国。俄国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建筑铁路的权利。俄国在北满建筑了中东铁路,并为保护该路而调兵入境。北满被沙皇俄国用武力占领了。沙皇政府底势力已伸展到高丽。俄国资产阶级已拟定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

沙皇政府在远东方面进行侵略的时候,却碰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当时日本已很迅速地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企图在亚洲大陆施行侵略,首先是侵占中国领土。日本也如沙皇俄国一样力图把高丽和满洲据为己有。日本当时已梦想占领库页岛和远东区。英国害怕沙皇俄国势力在远东加强,所以暗中援助日本。日俄战争逼近了。寻找新市场的大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地主阶层,推动沙皇政府去进行这次战争。

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战而先行开始了战争。日本在俄国境内布设有精密的侦探网，所以它知道它在这个战争中的敌人将是没有任何准备的。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用不宣而战的手段突然向俄军要塞旅顺口实行袭击，并使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受到严重的损失。

日俄战争从此开始了。

沙皇政府本来打算这次战争能帮助它巩固其政治状况，帮助它阻止革命。但是它失算了。战争更加动摇了沙皇制度。

武装恶劣，训练不良，由一些庸碌无能而贪污腐败的将军所领导的俄国军队，遭受着接二连三的失败。

资本家、官吏和将军们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盗窃之风盛行一时。军队的供给很坏。正当缺乏炮弹的时候，而军队所领到的却是一车箱一车箱的神像，好像是在故意讥笑他们一样。兵士们沉痛地说：“日本人用炮弹打我们，而我们却用神像打他们”。专车不是用去运送伤兵，而是用去运输沙皇将军掳得的财物。

日军包围了旅顺口要塞，接着便把它占领了。沙俄军队遭到多次失败之后，就在潘阳附近被击溃下去。沙俄三十万大军在这次会战中死伤和被俘人数，计达十二万之多。接着，沙俄从波罗的海派去解放旅顺口之围的舰队，也在对马海峡全被击破和消灭了。在对马海峡遭到的失败实等于全盘覆灭：沙皇派去的二十艘军舰中被击沉和消灭的有十三艘，被俘的有四艘。战争结果是沙俄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缔结可耻的和约。日本占领了高丽，从俄国手中夺得了旅顺口和半个库页岛。

民众不愿意这次战争，并认识到这次战争对俄国的害处。为了沙皇俄国的落后，人民支付了重大的代价。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这次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孟什维克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堕落到护国主义，即主张保护沙

皇、地主和资本家“祖国”的立场上去。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却与此相反,认为沙皇政府在这次掠夺战争中失败是有益处的,因为它会削弱沙皇制度而加强革命。

沙皇军队失败的事实向广大民众揭示了沙皇制度底腐败性。民众仇视沙皇制度的义愤与日俱增了。旅顺口的陷落是专制制度陷落的开始——列宁这样写道。

沙皇本想用战争来扑灭革命,但他所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日俄战争加速了革命。

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压迫,因有沙皇制度压迫而变本加厉。工人不仅感到资本主义剥削和苦役劳动的痛苦,而且感到全体人民没有权利的痛苦。因此,觉悟的工人力求领导城乡一切民主份子反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农民因缺乏土地,因受许多农奴制度残余的束缚而呻吟喘息,遭受着地主和富农的盘剥。沙俄境内各族人民受着双重压迫:一方面受到本族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另一方面受到俄罗斯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间的经济危机已经加深了劳动群众的困苦,而战争又使其更加尖锐了。战争中的失败使民众憎恨沙皇制度的心理更加厉害起来。人民底忍耐已经临到极限了。

由此可见,引起革命的原因是绰有余裕的。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巴库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组织得很好的巴库工人大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胜利,工人和煤油厂主订立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

巴库罢工成了南高加索及俄国许多区域革命运动高涨底开端。

“巴库罢工是全俄一二两月光荣发动底信号”(斯大林语)。

这次罢工好像是大革命风暴将临时的雷前闪电。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公历二十二日)的彼得堡事件,就是革命风暴的开始。

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即现在的基洛夫工厂）中的工人开始举行罢工。这次罢工的开始是因为工厂内开除了四个工人。普梯洛夫工厂中的罢工迅速扩大起来，彼得堡其他各工厂也相继加入。罢工便成为总罢工了。运动汹涌地增长起来。沙皇政府决定在运动开始时便把它扑灭下去。

早在一九〇四年间，即普梯洛夫工厂罢工以前，警察机关已利用奸细加邦牧师在工人中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即所谓“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这个组织在彼得堡各区都设有自己的分会。当罢工开始时，加邦牧师在他这个“大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挑衅的计划，让全体工人在一月九日集合起来，举着教堂旗帜和沙皇像片，和平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陈述本身疾苦的请愿书。他说，沙皇一定会出来接见人民，倾听和满足人民底要求。加邦出来为沙皇暗探局卖力，引起枪杀工人的惨剧，把工人运动淹没于血泊中。但这种警察式的计划，结果却反转过来反对沙皇政府了。

请愿书是在各工人会议上讨论过，并加进了些变更和修改。布尔什维克也在这些工人会议上讲过话，不过他们没有公开说明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由于他们的影响，在请愿书上加进了言论出版自由，工会自由，召集立宪会议来改变俄国国家制度，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教会与国家分离，停止战争，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等要求。

布尔什维克在这些会议上发言时，向工人指明说，自由决不是可以用向沙皇请愿的方法获得，而是要拿起武器去夺取的。布尔什维克警告过工人，说工人会受到枪击，但他们没能阻止住群众往冬宫请愿的游行，有很大一部分工人还相信沙皇会帮助他们。群众被强有力的运动所笼罩了。

彼得堡工人在请愿书上写道：

“我们，彼得堡城里的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

母,特来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生活困苦,备受压迫,被迫担负苦重不堪的劳动,受着欺压侮辱和非人的待遇……我们已再三忍耐,但是我们日甚一日地被推入贫困、无权和愚昧的深渊中去,专横暴政压制着我们…我们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们已经活到了可怕的时刻,我们宁死也不愿继续忍受这种难堪的痛苦”。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清晨,工人们向着当时沙皇所在的冬宫前进。工人们带着全家眷属——妻子儿女和老弱父母——去见沙皇;他们手无寸铁,只是抬着沙皇像片,举着教堂旗帜,唱着祷告歌向前走去。街道上总共聚集了十四万多人。

尼古拉第二并没有和他们讲友爱。他下令枪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这一天有一千多工人被沙皇军队击毙,有两千多工人受伤。彼得堡的街道上染遍工人底鲜血。

布尔什维克是和工人们同去了的。他们中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被逮捕。布尔什维克当时就在沾满工人鲜血的街道上向工人解释谁是这种凄惨暴行底罪人,以及应该怎样同他作斗争。

一月九日从此称为“流血星期日”。工人在一月九日受到了血的教训。工人对沙皇的信仰已在这天受到了枪杀。工人已经明白,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获得权利。到九日傍晚时分,各工人区域已在开始建筑街垒了。工人们说:“沙皇痛打了我们,我们也只好把他痛打一顿!”。

沙皇流血罪行的噩耗马上传遍了全国。全体工人阶级,全国人民,都充满着义愤和忿怒。每一个城市里的工人都用罢工来抗议沙皇的罪行,并提出本身的政治要求。工人现在已是喊着“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走上街道了。在一月间,罢工人数达到很大的数字——四十四万人。一个月內参加罢工的人数超过了过去整整十年的罢工人数。工人运动升涨到了极大的高度。

俄国革命开始了。

(二)工人的政治罢工和示威。农民革命运动的增长。

“波将金”铁甲舰上的起义。

一九事变以后，工人底革命斗争已具有更加尖锐的政治性质。工人群众已开始由经济罢工和同情罢工转到政治罢工，转到游行示威，在某些地方甚至开始转到武装抵抗沙皇军队的斗争。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里加和巴库等有大量工人集中的巨大城市中，罢工进行得特别顽强而很有组织。五金工人在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前列行进。先进工人队伍用自己的罢工振作了觉悟程度较低的阶层，发动了整个工人阶级去作斗争。社会民主党底影响迅速增长了。

五一游行示威在许多地方引起了群众与军警的冲突。在华沙城内因示威群众受到枪击而死伤者达数百人之多。工人响应波兰社会民主党底号召，用总罢工来抗议华沙惨案。罢工和游行示威在五月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全俄各地参加五月罢工的工人共计二十余万。巴库，洛兹，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城的工人，都卷入了总罢工。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同沙皇军队冲突的事件日益加多了。在敖德萨，华沙，里加，洛兹及其他许多城市中，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冲突。

在波兰巨大的工业中心洛兹城内，斗争进行得特别激烈。洛兹工人在街道上建筑了几十座街垒，同沙皇军队进行了一连三天的巷战(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这里的武装发动与总罢工汇合起来了。列宁认为这些战斗是俄国工人所进行的第一次武装发动。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所举行的罢工，是夏季罢工中特别出色的一次。这次罢工从一九〇五年五月末开始一直坚持到八月初旬止，即几乎继续了两个半月之久。参加罢工的约有七万工人，其中有许多是妇女。这次罢工是由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领导的。差不多每天都在城外泰尔克河畔举行数千工人的集会。在

这些工人大会上讨论了工人自己的需求。在工人大会上常有布尔什维克出来发言。为着镇压罢工，沙皇当局命令军队驱散工人，向工人开枪射击。有几十个工人被打死，有数百工人受伤。城内宣布戒严了。但工人还是继续坚持，拒绝复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忍饥挨饿，但并不表示屈服。只是到了极端疲惫的时候，工人才不得已去上工。罢工斗争锻炼了工人。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中作出了勇敢、坚持、坚定和同心协力奋斗的模范。在这次罢工中，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城的工人受到了真正的政治教育。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城的工人在这次罢工时建立了工人代表会，它实际上是俄国最初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一。

工人底政治罢工掀动了全国。乡村也跟着城市发动起来了。从春天起便开始了农民的骚动。一群一群的农民起来反对地主，毁坏他们的田庄、糖厂和酒厂，焚烧地主楼房和庄院。许多地方的农民夺取过地主的土地，大批砍伐过地主的森林，要求把地主土地转交给人民。农民把地主的麦子和其他各种粮食夺来分给饥民。地主们惊惶万分，不得不逃往城市。沙皇政府调遣兵士和哥萨克去镇压农民起义。军队开枪射击农民，逮捕“祸首”，拷打和折磨他们。但农民并不停止斗争。

农民运动在俄国中部，在窝尔加河流域以及南高加索一带，特别是在格鲁吉亚方面，日益广阔地开展起来了。

社会民主党人愈益深入农村。党中央发出了告农民的宣言：《农民们，请听我们说》。特维尔，萨拉托夫，坡尔塔瓦，契尔尼郭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梯弗里斯及其他许多州区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发表过告农民的宣言。社会民主党人在乡村中召集大会，成立农民小组，建立农民委员会。一九〇五年夏天，有许多地方发生过社会民主党人所组织的农业工人罢工。

但这还只是农民斗争底开始。当时农民运动还只普及到八十五县，即约近沙俄欧洲部分总县数七分之一。

工农运动的发展以及俄国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所遭受的多次失败，使军队受到了影响。沙皇制度所倚靠的这个支柱动摇了。

一九〇五年六月，在黑海舰队“波将金”铁甲舰上爆发了起义。这艘铁甲舰当时停泊在离敖德萨不远的地方，而敖德萨城内正发生着工人总罢工。起义的水兵将他们最仇恨的军官们惩办之后，便把铁甲舰开到了敖德萨。“波将金”铁甲舰转到革命方面来了。

列宁对于这次起义极为重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这一运动，使其能与工农群众及地方驻军的运动汇合起来。

沙皇派了一批军舰去镇压“波将金”舰，但这些军舰上的水兵却拒绝对自己的起义同志们开炮。几天之内，在“波将金”铁甲舰上飘扬着革命的红旗。但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〇五年，还不是像后来一九一七年那样是领导运动的唯一政党。当时在“波将金”舰上有许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虽有个别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起义，但起义还是没有受到正确和充分缜密的领导。有一部分水兵在决定的关头表现了动摇。黑海舰队中的其他军舰没有来响应这艘起义的铁甲舰。革命的铁甲舰因为缺乏煤炭和粮食，不得不开到罗马尼亚岸边去向罗马尼亚当局投降。

“波将金”铁甲舰上的水兵起义，结果是失败了。后来落入沙皇政府毒手的水兵被交付法庭审判，一部分被处死刑，一部分被流放到苦工处去了。但起义这一事实本身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波将金”铁甲舰上的起义是海陆军中的第一次群众革命发动，是一大队沙皇军力第一次转到革命方面来的事件。这次起义使工人和农民，特别是海陆军兵士群众自身更加认识，更加了解海陆军必须与工人阶级联合，必须与人民联合的思想。

工人进到群众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农民运动的加强，人民与军警的武装冲突，以及黑海舰队中的起义，——这一切都证明人民武装起义底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形使自由资产阶级不得不认真行动起来。它害怕革命，同时却又拿革命去恐吓沙皇。它极力想

同沙皇妥协来反对革命,同时又“为人民”要求些小小的改良来“安慰”人民,分裂革命势力,借以防止“革命惨象”。自由派的地主们说道,“必须割点土地给农民,不然他们就会割死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准备去与沙皇分掌政权。当时,列宁论到工人阶级底策略与自由资产阶级底策略时写道:“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资产阶级窃取政权”。

沙皇政府继续用凶残手段镇压工农,但它不能不明白,单用压迫手段是对付不了革命的。因此,它除了压迫手段外,还采取随风转舵的政策。一方面,它用自己的奸细去唆使俄国各族人民互相摧残,造成蹂躏犹太人的事件,挑拨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互相残杀。另方面,它又答应召集缙绅会议(注二二)或国家杜马(注二三)一类的“代表机关”,并委托大臣布里根拟定一种不让杜马拥有立法权力的杜马草案。所有这些办法的采用,都是为了拆散革命势力,使人民中间温和阶层脱离革命。

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布里根杜马,以期打破这套嘲弄人民代表机关的把戏。

反之,孟什维克却决定不去打破召集杜马的计划,而且认为必须去参加这个杜马。

(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底策略基础。

革命把社会上各个阶级都发动起来了。革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引起的转变,推动它们离开旧日的惯常地位,使其不得不重新布置自己的力量来适应新的环境。每个阶级,每个政党,都在努力制定自己的策略,自己的行动路线,自己对其他阶级的态度,自己对政府的态度。甚至沙皇政府也不得不定出一种新的,在它看来迥非寻常的策略,即答应召集所谓布里根杜马的“代表机关”。

社会民主党也必须定出自己的策略。其所以必须这样作，是因为当时有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是因为当时在无产阶级面前摆着有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社会民主党应否参加这个政府，对农民态度怎样，对自由资产阶级态度怎样等等问题。社会民主党必须定出一个统一而周密的马克思主义策略。

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底机会主义立场和分裂行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经分裂成为两个政团。虽然当时的分裂还不能认为是完全的分裂，虽然这两个政团形式上还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政党，但事实上它们当时却很像是两个不同的党，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机关报。

当时孟什维克除了他们和党内大多数在组织问题上的旧分歧之外，还加上了一些关于策略问题的新分歧，于是就使分裂更其加深了。

由于没有统一的党，结果也就没有统一的党的策略。

如果立刻来召集当前一届，即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借以规定统一的策略并责成少数诚恳执行大会决议，服从大会多数底决定，那也许可以找到摆脱当时状况的出路。布尔什维克当时向孟什维克建议的正是这样的出路。但孟什维克根本就不愿听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语。布尔什维克认为使党继续缺乏党所批准而为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策略是一种罪恶，于是就决定来担负起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发起责任。

所有的党组织，不论是布尔什维克的或孟什维克的，都被邀请参加代表大会。但孟什维克却拒绝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决定召集自己的代表大会。他们把自己的代表大会叫作代表会议，因为他们所有的代表人数很少；但实际上这是个代表大会，即孟什维克底党代表大会，因为这次会议底决定是全体孟什维克所必须执行的。

一九〇五年四月,在伦敦召集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二十四个代表,代表着二十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全党所有一切大的组织,都派有代表参加。

代表大会认定孟什维克是“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而加以申斥之后,就进而讨论规定本党策略的问题。

当时与代表大会并排举行的,是在日内瓦召集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

“两个代表大会——两个政党”,——列宁这样评断了当时的情形。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双方所讨论的实际上同样是关于策略的问题,但双方对于这些问题却通过了完全相反的决议。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各自通过的这两个不同的决议中,可以看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彼此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彼此间存在有如何深刻的策略分歧。

以下就是这些分歧底基本要点。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底策略路线。代表大会认为虽然目前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虽然它在目前不能越出资本主义所容许的范围,但首先愿意这个革命完全胜利的却是无产阶级,因为这个革命胜利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组织起来,在政治上提高自己的地位,获得政治上领导劳动群众的经验和技能,并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只有农民才能拥护无产阶级这种预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策略,因为农民没有革命底完全胜利,就不能推翻地主而获得地主的土地。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底天然同盟者。

自由资产阶级不愿这个革命完全胜利,因为它需要沙皇政权来作对付它所最害怕的工农群众的皮鞭,所以它会努力保存沙皇政权,只是想将沙皇政府权力稍微限制一下。因此,自由资产阶级将设法在立宪君主制度基础上用同沙皇妥协的办法来结束革命。

只有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只有身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能保证其与农民的联盟，只有使自由资产阶级陷于孤立，只有由社会民主党来积极参加组织反沙皇制度的人民起义事业，只有因起义胜利的结果而成立能于铲除反革命根蒂并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临时革命政府，只有社会民主党不拒绝在顺利条件下参加这个临时革命政府而把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底策略路线。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所以只有自由资产阶级才能做革命底领袖。无产阶级不应与农民接近，而应与自由资产阶级接近。这里主要的是不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吓退自由资产阶级，不要给自由资产阶级以退出革命的口实，因为自由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时，革命就会削弱下去的。

也许起义会获得胜利，但社会民主党在起义胜利后却应当隐退，以免吓退自由资产阶级。也许由于起义的结果会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但社会民主党绝对不应参加这个临时革命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会是社会主义性的政府，而主要的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和采用革命行动可以吓退自由资产阶级，这样便会破坏革命。

从革命底前途方面着想，最好是召集缙绅会议或国家杜马一类的代表机关，工人阶级可以从外面逼迫这个代表机关，以便把它变成立宪会议，或推动它去召集立宪会议。

无产阶级有其纯粹是工人的特殊利益，所以它应该去管自己的这种利益，而不应妄想充当资产阶级革命底领袖，因为这个革命是一般政治的革命，所以它有关于一切阶级而不仅有关于无产阶级。

简括说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底两个策略，就是如此。

列宁在其有历史意义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中，对孟什维克策略给了一个典型的批评，同时又给布尔什维克策略作了一个天才的论证。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〇五年七月，即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后两个月。照书名来看，也许会觉得列宁在这本书中只讲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底策略问题，并且只是指俄国孟什维克而言。其实，他批评孟什维克策略时，同时也就揭露了国际机会主义底策略；他论证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策略并区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同时也就规定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策略底基础。

以下便是列宁在他所著《社会民主党任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中所发挥的基本策略原理。

(一)始终贯澈于列宁这本书中的基本策略原理，就是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领袖，能够而且应当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领导者的思想。

列宁承认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正如他所说那样，这个革命“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底范围”。但他认为这个革命不是上层的革命，而是使全体人民、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动作起来的人民革命。因此，列宁认为孟什维克企图减少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的意义，企图降低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作用，想使无产阶级脱离这个革命，就是叛卖无产阶级底利益。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列宁写道，——并不是要他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要他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要他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而是要他最努力地参加，最坚决地为澈底无产阶级民主制，为澈底完成革命而奋斗”(《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五八页)(注二四)。

“我们不应当忘记，——列宁往下又写道，——现在除了完全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度…外，便没有，而且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同上，第一〇四页)(注二五)。

列宁预察到革命可能有两种结局：

(一)或者结局是彻底战胜沙皇制度，推翻沙皇制度并建立民

主共和制度；

（二）或者是在力量不够的时候，结局就会是沙皇与资产阶级牺牲人民利益而实行的妥协，就会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宪制，甚至多半是一种讥讽宪制的把戏。

无产阶级愿意达到最好的结局，即澈底战胜沙皇制度。但这种结局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革命底领袖和领导者时才能实现。

“革命底结局，——列宁写道，——将依工人阶级究竟是会成为资产阶级底一个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助手，抑或是会成为人民革命底领导者这一点来决定”（同上，第三二页）（注二六）。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可能避免替资产阶级当助手的命运，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领导者。据列宁底意见，这种可能有如下述。

第一，“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是最先进和唯一澈底革命的阶级，所以它负有在俄国全面民主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同上，第七五页）（注二七）。

第二，无产阶级有其不依赖资产阶级而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使它能团结成为“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力量”（同上，第七五页）（注二八）。

第三，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愿意使革命获得澈底胜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同上，第五七页）（注二九）。

“资产阶级是利于——列宁写道，——倚靠某些旧制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利于要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扫除一切旧制残余，而留下其中某些残余，即是要这个革命成为不完全澈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的…资产阶级是利于要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方面必需的种种改革办法实现得缓慢些，渐进些，多所顾忌和不坚决些，经过改良而不是经过革

命…要这些改革尽量少去发展小百姓,即农民和特别是工人所具有的革命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否则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把枪枝从右肩移到左肩’,即是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所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所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扫除了农奴制度的基础上所产生的那些民主机关,掉转去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反之,工人阶级是利于要在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必需的种种改革办法恰恰不是经过改良主义道路,而是经过革命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主义道路是一种迁延迟缓而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在这些部分腐烂过程中最感受痛苦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道路,是迅速开刀,直接割去腐烂部分而使无产阶级最少受到痛苦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与君主制度相适应的卑污龌龊、腐败不堪和臭气薰腾的机关,最少让步,最少顾忌的道路”(《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五七至五八页)(注三〇)。

“因此,——列宁往下又写道,——无产阶级也就站在最前列为共和制度而斗争,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不要吓退资产阶级的愚蠢意见”(同上,第九四页)(注三一)。

为要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可能变为现实,为要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底领袖和领导者,列宁认为至少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要无产阶级有一个愿意彻底战胜沙皇制度而且自愿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这是领导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为领导者没有被领导者,就不成其为领导者;领袖没有被率领者,就不成其为领袖。列宁认为农民就是这样的同盟者。

第二,就是要把那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并希图由自己来充当革命唯一领导者的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陷于孤立。这也是领导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为这种思想根本不容有两个革命领导者存在。列宁认为自由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只有无产阶级,——列宁写道,——才能成为为民主制澈底

奋斗的战士。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在为民主制奋斗中获得胜利的战士”(同上，第六五页)(注三二)。

往下又说：

“农民除包含有很多半无产者份子外，同时又包含有小资产阶级份子。所以它也不稳定，而使无产阶级必须团结成为一个阶级性十分严格的党。但农民底不稳定性与资产阶级底不稳定性根本不同，因为现在农民与其说是需要绝对保存私有制，不如说是需要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虽不会因此而停止其为小资产阶级，但它能成为完全和最急进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启发农民的革命事变进程不会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中断得太早，那末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在上述的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与共和国底堡垒，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想有，他们所希望而且是他们所真正必需的一切”(同上，第九四页)(注三三)。

列宁驳斥了孟什维克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即以为布尔什维克这样一种策略“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事业，因而减弱革命发展规模”的意见，并把这种反对意见估计为“叛卖革命的策略”，“变无产阶级为各资产阶级可怜走卒的策略”。列宁当时写道：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就不会说革命底发展规模将因资产阶级退出而减弱。因为在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资格来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时，俄国革命底真正广大发展规模才会开始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的那种真正尽量广大的革命发展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一贯进行到底，就应当倚靠于能把资产阶级必不可免的不澈底性麻痹起来，即恰巧是能做到”迫使它退出去

“的力量”(《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九五至九六页)(注三四)。

列宁在他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中所发挥的认定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底领袖这一基本策略原理，认定无产阶级应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现领导权(领导作用)的这一基本策略原理，就是如此。

这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策略问题的新方针，而与从前在马克思主义者武库中存在过的策略方针根本不同。从前，例如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始终是落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不管有意无意，总是充当了资产阶级底助手，而农民则始终是充当了资产阶级底后备军。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认为这样的情形多少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同时又声明说，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尽可能坚持其最近的阶级要求，并应当有其本身的政党。现在，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照列宁底方针说来，情形已经改变成这样，就是无产阶级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底领导力量，资产阶级已被排出于革命领导之外，而农民则已变成了无产阶级底后备军。

有人说普列汉诺夫“也曾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但这是一种误会。是的，普列汉诺夫确实向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献过媚眼，而且不嫌在口头上予以承认，但事实上他都根本反对这个思想。无产阶级领导权底意义就是无产阶级在实行工农联盟这一政策的条件下，在实行孤立自由资产阶级这一政策的条件下实现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反对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主张与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反对工农联盟的政策。其实，普列汉诺夫底策略方针是孟什维克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方针。

(二)列宁认为胜利的人民武装起义，是推翻沙皇制度和争取民主共和制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列宁与孟什维克相反，他认为“全面的民主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了”，认为“组织无产阶

级去举行起义”已成为“党在目前的主要和必要的迫切任务之一”，并认为必须“极力设法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直接领导起义的可能”（同上，第七五页）（注三五）。

为要引导群众去实行起义，并使起义本身成为全民的起义，列宁认为必须提出这样一种口号，必须向群众发出这样一种号召，实现这种口号和号召就能尽量发扬群众革命自动性，就能组织他们去实行起义，就能瓦解沙皇制度底政权机关。列宁认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对策略问题的决议就是这样的口号，而他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就是为拥护这些决议而作的。

他认为这样的口号是如下述：

（一）采用“群众政治罢工，因为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在起义进程中，都能有重要的意义”（同上，第七五页）（注三六）；

（二）组织“立刻用革命手段来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其他的迫切要求”（同上，第四七页）（注三七）；

（三）“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以便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一切民主改革”，一直到没收地主土地为止（《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八页）（注三八）；

（四）武装工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两点：

第一，就是用革命手段在城市中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在乡村中实现民主改革的策略，这种实现就是既不顾及政府，也不顾及法律，而是藐视政府和法律，打破现行法律并用无所顾忌的手段自动建立新秩序。这是新的策略的手段，采用这种手段就能麻痹沙皇制度底政权机关，并发扬群众底积极性和自动创造精神。在这一策略基础上也就成长了城市中的革命罢工委员会和乡村中的革命农民委员会，前者后来发展成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后者发展成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第二，就是采用群众政治罢工，采用总政治罢工，这种罢工后

来在革命进程中对于群众的革命动员发生了头等重要的作用。这是无产阶级手中很重要的新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从前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中未曾有过,而后来则为大家公认了的。

列宁认为人民起义获得胜利时,就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来代替沙皇政府。临时革命政府底任务是要巩固革命底成果,镇压反革命底反抗,并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底最低限度纲领。列宁认为不实现这些任务,便无法澈底战胜沙皇制度。但为要实现这些任务并澈底战胜沙皇制度,则临时革命政府就不应该是一个平常的政府,而应该是获得了胜利的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专政的政府,应该是工农革命专政。列宁依据马克思说“在革命后,任何一种临时国家制度都要有专政,并且是要有坚强果敢的专政”这一著名原理而得出结论说,临时革命政府要想保证澈底战胜沙皇制度,就不能不是工农专政。

“革命澈底战胜沙皇制度,——列宁写道,——就是实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样的胜利也就会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凭藉于军事力量,凭藉于群众武装,凭藉于起义,而不是凭藉于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为无产阶级与农民所立刻需要和一定需要的改革,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以及沙皇制度方面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无法打破这种反抗,就无法击溃反革命企图。但这当然不会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会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如果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的话)触动资本主义底基础。它至多也只能实行利于农民的根本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澈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度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盘剥式的特效,不仅从乡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去;奠定认真改善工人生活状况,提高其生活水准的基础;最后——是按先后次序来讲,而不是按重要性来讲——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的变

革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这样一种胜利，无论对俄国或全世界将来的发展，都会有极大的意义。除了已在俄国开始的革命底这种澈底胜利而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底革命毅力提得这样高，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了”（同上，第六二至六三页）（注三九）。

至于社会民主党究应怎样对待临时革命政府以及社会民主党可否参加这个政府，那末列宁完全坚持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其中说道：

“依实力对比关系以及其他不可预先确切判定的因素为转移，我党代表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无情打破一切反革命企图，而捍卫工人阶级底独立利益；这样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就是党对于自己的代表施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决不移地保存社会民主党底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取毫不调和的敌视态度；无论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得在极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间进行宣传，使其了解，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武装无产阶级为保护、巩固和扩大革命胜利起见，必须经常逼迫临时政府”（《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三七页）（注四〇）。

孟什维克反驳道，因为临时政府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愿意重犯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那种错误，就不能去参加这样的政府。列宁反驳这种意见时说道，孟什维克在这里混淆了两件不同的事情，于是就暴露自己没有能力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问题：当时法国所讲的是社会党人在国内缺乏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参加反动资产阶级政府，所以当时社会党人不应该去参加这样的政府，而现在俄国所讲的却是社会党人在革命剧烈高涨的条件下参加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资产阶级政府，所以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并且在顺利条件下应该去参加这样的政府，以便不仅是“从下面”，从外面，而且是“从上

面”，从政府内部去打击反革命。

(三)列宁在力主争取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制度时，并没想要停留在民主阶段上，并没想把革命运动底发展规模局限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范围内。恰巧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会开始。列宁知道这点，所以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极力设法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所以需要工农专政，并不是要在革命战胜沙皇制度以后便把革命结束，而是要尽量延长革命状态，澈底消灭反革命残余，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并在这个时候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启发起来，组织成为一支伟大的军队，然后就开始径直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讲到资产阶级革命底发展规模，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赋予这个发展规模以怎样的性质时，列宁写道：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底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底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底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底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底任务，而新火星派(指孟什维克而言。——编者)

在其一切关于革命发展规模的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狭隘到极点了”(同上，第九六页)(注四一)。

往下又说：

“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完全自由，为澈底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度而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革命无产阶级底政策，事实上就应当是如此；工人在革命时期中应当用以贯澈和决定每个策略手段和每一实际步骤的阶级口号，就是如此”(同上，第一〇五页)(注四二)。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不明的地方，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

出版以后两个月的时候，又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解释道：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恰巧是依照我们的力量为标准，依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底力量为标准，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主张不停顿的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页）（注四三）。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相互关系问题上的新方针，这是认为到资产阶级革命终结时就要在无产阶级周围重新配置力量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在规定这个新方针的时候，列宁所依据的是：第一，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致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提出的不停顿革命的著名原理；第二，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致恩格斯的信上所说的认定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配合起来的著名思想。马克思在这封信上说道：“德国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但马克思底这些英明思想，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没有得到发挥，而第二国际方面的理论家又极力把它们埋葬起来，付诸遗忘了。于是就有一个任务落到了列宁肩上，就是要叫这些被人忘掉了的马克思原理重见天日，并将其完全恢复过来。但列宁恢复这些马克思原理时，并没有局限于——并且也不能局限于——把它们简单重复一下，而是把它们继续发展，改造成了一个严整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而加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新的成分，即认为无产阶级与城乡半无产者份子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底条件这一原理。

这个方针粉碎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策略立场，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农民群众包括贫农群众在内一定会离开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会有一个长久的停顿时期，延长到五十年至一百年，也许更久的“沉静”时期到来，那时无产阶

级将“和平地”受着剥削，而资产阶级则会“合法地”赚得金钱，一直继续到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到来时为止。

这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认定社会主义革命不会是由孤独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全部资产阶级来实现，而是由身为领导者，拥有半无产者民众，如千百万“被剥削劳动群众”为同盟者的无产阶级来实现。

依照这个理论，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其余被剥削劳动群众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而工农民主专政则应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准备基础。

这个理论推翻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那种流行理论，他们否认城乡半无产者群众有革命能力，他们的出发点是认定“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外，我国再没有什么可为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所依持的社会力量”（这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段足以代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的言论）。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是单独去反对全体资产阶级，是没有同盟者而单独去反对一切非无产者阶级和阶层。他们不愿意顾到一事实，就是资本不仅剥削着无产阶级，而且剥削着千百万城乡半无产者群众，这些群众备受资本主义压迫，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因此，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欧洲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认为只有等到无产阶级因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结果而在民族中占大多数，在社会上占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条件才算成熟。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把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这种反无产阶级的腐败方针根本推翻了。

当时在列宁这个理论里还没有作出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

国家获得胜利的直接结论。但这个理论已包含有一切或几乎一切早晚作出这种结论所必需的成份。

大家知道，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即经过十年以后，便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以上就是列宁在其有历史意义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中所发挥的基本策略原理。

列宁这部著作底历史意义，首先就在它从思想方面击破了孟什维克底小资产阶级策略方针，武装了俄国工人阶级去继续扩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去对沙皇制度举行新的进攻，并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必定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前途。

但列宁这部著作底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莫大的意义就在它用新的革命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我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用以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个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策略底基础。

（四）革命更进一步的高涨。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罢工。沙皇政府的退却。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出现。

一九〇五年秋，革命运动已普及到全国各地。运动汹涌增长起来了。

九月十九日，在莫斯科有印刷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浪潮泛滥到彼得堡及其他许多城市。在莫斯科本城里，印刷工人罢工得到了其他生产部门工人底援助，于是就变成了总政治罢工。

十月初，在莫斯科通嘉桑的铁路上开始举行罢工。过了一天以后，莫斯科各铁路枢纽上都实行罢工了。罢工浪潮很快就普及到全国一切铁路。邮政局和电报局停止了工作。全俄各城市工人举行着有成千成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决定停止工作。一个一个的工厂，一个一个的城市和一个一个的区域，都相继卷入罢工。

下级职员,学生,知识份子,如律师,工程师和医生,也响应了罢工工人。

十月政治罢工扩展成了全俄罢工,几乎所有一切直至最遥远区域为止的区域,几乎所有一切直至最落后工人阶层为止的工人,都被卷入进来了。单是参加这次总政治罢工的工业工人就有一百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很多铁路工人和邮电职员等等参加。国内全部生活陷于停顿。政府力量已被麻痹了。

工人阶级领导了民众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群众政治罢工口号产生了应有的结果。

十月总罢工表示出了无产阶级运动底力量和威势,使骇得魂不附体的沙皇只好颁布十月十七日宣言。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宣言上,向人民答应施行“保证公民自由的坚固不移的原则:切实保障个人身体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同时又答应召集立法杜马,吸收人民中一切阶级来参加选举。

这样,布里根的谏议杜马便被革命力量扫除了。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原是正确的。

虽然如此,但十月十七日宣言终究是一种欺骗民众的手段,是沙皇所玩弄的诡计,是沙皇所需要的一种休战机会,以便麻醉轻信者,赢得时间,聚集力量,然后再向革命实行打击。沙皇政府口头上答应给予自由,但实际上却一点切实东西也没有给出。除了空口允诺之外,工农还没有从政府手里得到过丝毫东西。十月二十一日所实行的并不是预期中的政治大赦,而是很少一部分政治犯的赦免。同时,政府为了拆散人民力量,还组织过许多蹂躏犹太人的流血惨剧,使成千累万的人牺牲了性命;而它为了摧残革命努力,又成立了匪帮式的警察性的团体:“俄罗斯人民同盟”和“米哈依尔、阿尔汉格尔同盟”。在这些团体中间起重大作用的是反动地主、商人、牧师和迹近盗匪的流氓份子,所以人民称之为“黑帮”。黑帮份子在警察协助下,公开打杀先进工人、革命知识份子和学

生，放火焚烧群众开会和公民集会的场所，枪杀集会群众。沙皇宣言所产生的结果还不过如此而已。

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评论沙皇宣言的歌谣。

“沙皇大吃一惊，颁布了宣言：

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

布尔什维克向群众解释说，十月十七日宣言是一种陷阱。他们指斥了政府在颁布宣言所采取的是一种挑衅的举动。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武装起来，准备武装起义。

工人更加努力来实行成立战斗队了。他们已经明白，用总政治罢工在十月十七日争得第一个胜利以后，还必须继续努力，继续斗争，以求推翻沙皇制度。

据列宁估计，十月十七日宣言是实力对比关系暂时处于某种均势的表现，当时无产阶级和农民虽已迫使沙皇发表了一个宣言，但他们还无力推翻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则已不能单用旧的手段维持统治，所以不得不在口头上允诺“公民自由”和“立法”杜马。

当十月政治罢工沸腾的时候，在同沙皇斗争的火焰中，工人群众底革命创造力造成了新的强大武器，即工人代表苏维埃。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由各工厂代表组成，它是世界上从所未见的工人阶级群众政治组织。一九〇五年初次产生的苏维埃，是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底雏形。苏维埃是人民借以表现其创造精神的新的革命的形式。它纯粹是由革命民众打破沙皇制度一切法律和规则而创立起来的。它是奋起反对沙皇制度的广大民众自动性底表现。

布尔什维克认定苏维埃是革命政权底萌芽。他们认为苏维埃底力量和意义完全取决于起义底力量和成功。

孟什维克不承认苏维埃是革命政权底萌芽机关，也不承认它是起义机关。他们把苏维埃看作是民主化的市政公所一类的地方自治机关。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三日(公历二十六日),在彼得堡所有一切工厂里进行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当天夜间就举行了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随彼得堡之后,在莫斯科也有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最大工业和革命中心的苏维埃,是沙皇帝国首都中的苏维埃,本应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起决定的作用。但它因为受到恶劣的孟什维克的领导,以致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大家知道,当时列宁还不在彼得堡,他当时还留在国外。孟什维克利用列宁不在此地而乘机混入了彼得堡苏维埃,并夺得了其中的领导。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无怪乎黑鲁斯达列夫,托洛茨基,巴乌斯等孟什维克份子能把彼得堡苏维埃引上了反对起义政策的道路。他们不仅不设法使兵士来与苏维埃接近,不仅不设法使两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反而要求把兵士撤出彼得堡。苏维埃并没有把工人武装起来,并没有准备他们去实行起义,却竟裹足不前,反对准备起义。

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在革命中起了完全另一种作用。莫斯科苏维埃从成立时起,就执行着澈底革命的政策。莫斯科苏维埃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由于布尔什维克努力工作的结果,在莫斯科除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还成立了兵士代表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成了武装起义的机关。

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间,在许多大城市和几乎在所有一切工人中心都建立有工人代表苏维埃。曾经设法组织海陆军兵士代表苏维埃,并使其与工人代表苏维埃统一起来。有些地方还成立过工农代表苏维埃。

苏维埃底影响是极大的。虽然它们往往是自发产生出来,尚未完全形成,成份上尚很涣散,但它们的行动却很像是政权机关底行动。苏维埃用夺取手段实现了出版自由,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号召人民拒绝向沙皇政府纳税。在个别场合,它们还没收过沙皇

政府底金钱来供革命需要。

(五)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的失败。革命的退却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四次(统一的)党代表大会。

一九〇五年十月与十一月间,群众革命斗争继续猛烈发展起来。工人罢工运动继续着。

一九〇五年秋,农民反地主的斗争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农民运动推广到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在萨拉托夫、唐波夫、契尔尼郭夫、梯弗里斯、库泰依斯及其他几州中发生过真正的农民起义。但农民群众底攻击尚嫌不够。农民运动还欠缺组织性和领导。

在许多城市——梯弗里斯,海参崴,塔什干,撒马尔汗,库尔斯克,苏胡姆,华沙,基也辅,里加等城——驻军中的兵士骚动,也加强起来了。在喀琅施塔得要塞上以及停泊于塞瓦斯托坡里港的黑海舰队水兵中爆发了起义(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但这些起义因为彼此分散,所以都被沙皇政府镇压了下去。

在某些部队和军舰上发生起义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军官虐待过分和饮食恶劣等等(如所谓“豌豆暴动”)。有许多起义的海陆军士兵还没有明白觉悟到必须推翻沙皇政府,必须努力组织武装斗争。实行起义的海陆军士兵还过份柔和,常犯错误,竟把他们在开始起义时逮捕的军官释放,听信长官诺言和劝告。

革命已经紧紧接近到武装起义了。布尔什维克号召群众实行武装起义反对沙皇和地主,向群众解释武装起义必不可免。布尔什维克毫不停手地准备武装起义。在海陆军士兵中进行了革命工作,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军事组织。在许多城市中组织了工人战斗队,在战斗队员中施行了枪械教练。组织了在国外购置枪械并将其秘密运到俄国的工作。参加组织这种运械工作的有党内著名的工作人员。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宁回到了俄国。这时列宁避开沙皇宪

兵暗探耳目,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上的准备。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论文,成了党在日常工作中的指令。

当时斯大林同志在南高加索进行了巨大的革命工作。斯大林同志揭穿并击破了反对革命和反对武装起义的孟什维克。他坚强果敢地准备工人去作反对专制制度的坚决战斗。在沙皇宣言发表的那一天,斯大林同志在梯弗里斯群众大会上向工人说道:

“为着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着这点,就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也还是武装”。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城召集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还是同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内,但实际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政党,各有其独立的中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见了。在此以前,他们还只有过书信上的联系或经过其他同志来维持的联系。

从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底决议中必须指出的有两个决议:一个决议是关于恢复当时实际上已分裂成两个党了的党底统一问题的,另一个决议是关于抵制第一届杜马,即抵制所谓维特杜马问题的。

因为此时在莫斯科已经开始了武装起义,于是代表会议就依列宁底意见而把自己的工作匆忙结束,各个代表都回到各地去亲身参加起义。

但沙皇政府也没有昏睡。它也在准备来作坚决的斗争。沙皇政府因同日本媾和而减轻了自己的困难状况,就来对工农群众实行进攻。沙皇政府在农民起义蔓延的许多州区里宣布了军事戒严,颁布了“必须就地正法”,“不要吝惜子弹”的残暴命令,并下令逮捕革命运动底领导者和驱散工人代表苏维埃。

于是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和受他们领导而与广大工人群众紧相联系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就决定立刻实行准备武装起义。十二月五日(公历十八日),莫斯科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苏维埃提议

宣布总政治罢工，并在斗争进程中把它变为起义。这个决议在许多工人群众大会上得到了拥护。莫斯科苏维埃估计到工人阶级底意志，于是一致决定开始总政治罢工。

莫斯科无产阶级开始起义时已成立有自己的战斗组织，其中约有一千个战斗队员，大半都是布尔什维克份子。在莫斯科许多工厂中也组织有战斗队。起义者方面总共约有两千战斗队员。工人预期着防军保持中立，并打算把一部分防军争取过来。

十二月七日（公历二十日），在莫斯科开始了政治罢工。但这次罢工没能扩展到全国各地，因为彼得堡方面没有予以充分援助，这种情况从最初时起就减弱了起义胜利的机会。尼古拉铁路（即现在的十月铁路）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条铁路上的交通没有停止，所以政府能够把近卫团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去镇压起义。

莫斯科本城防军曾经发生过动摇。工人开始武装起义时是有几分指望获得防军援助的。但革命者放过了时机，沙皇政府把防军中的骚动镇压下去了。

十二月九日（公历二十二日），在莫斯科有第一批街垒出现。接着在莫斯科许多街道上都筑满了街垒。沙皇政府运用大炮来轰击。它调来了超过起义者方面数倍的军队。几千武装工人进行了一连九日的英勇斗争。沙皇政府只是从彼得堡，特维尔和西方边疆调来了几团军队之后，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各区的起义领导机关在战斗开始的前夜不是已被破获，便是已被隔绝。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也被破获了。武装发动变成了彼此没有联络的各个区域的起义。各个区域既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又缺乏全城共同的斗争计划，所以主要是局限于防御。这是莫斯科起义力量薄弱的基本根源，同时也是这次起义遭到失败的一个原因，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那样。

莫斯科的起义在红色勃列斯尼亚区中进行得特别顽强而残酷。红色勃列斯尼亚区是起义底主要堡垒和中心。这里集中有布

尔什维克所领导的最精良的战斗队。但红色勃列斯尼亚终被枪炮压倒,街衢变成血泊,房舍化为灰烬。莫斯科的起义是被镇压下去了。

起义不仅在莫斯科城内发生过。其他许多城市和区域中也发生过革命起义。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莫托维里哈(皮尔姆),诺沃罗西斯克,索尔莫沃,塞瓦斯托坡里和喀琅施塔得等城市,都爆发过武装起义。

俄国境内各被压迫民族,也曾奋起进行武装斗争。格鲁吉亚差不多全境都蔓延着起义。在乌克兰的顿涅茨矿区一带,即在哥尔洛夫克,亚力山大洛夫斯克,鲁干斯克(现在的沃罗希洛夫格拉)等城,都发生过大规模的起义。在拉脱维亚一带,斗争带有很坚持的性质。在芬兰方面,工人成立过赤卫队,并举行了起义。

但所有这些起义,也如莫斯科起义一样,都被沙皇政府用惨无人道的残暴手段镇压下去了。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十二月武装起义给了不同的估计。

在武装起义以后,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公然对党提出责备,说“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孟什维克硬说起义是不需要而且有害的事情,说在革命中用不着起义,说胜利是不必用武装起义,而可用和平斗争手段达到的。

布尔什维克指斥了这种叛卖性的估计。他们认为莫斯科武装起义底经验恰巧证明工人阶级武装斗争有获得胜利的可能。列宁回答普列汉诺夫“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种责备时,说道:

“恰巧相反,本来需要更坚决、更努力和更采取攻势地动用武器,本来需要向群众解释说: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还必须进行毫不畏惧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五〇页)(注四四)。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起义是革命底最高点。沙皇专制政府在十二月间打败了起义。从十二月起义失败时起,便开始了革命逐渐

退却的转变。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了逐渐退落的时期。

沙皇政府急忙利用这次失败来澈底粉碎革命。沙皇的刽子手和狱吏开展着他们的血腥工作。讨伐队在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肆行猖獗。

但是革命还没有被压倒下去。工人和革命农民是缓缓地退却的，是且战且退的。一批批新的工人加入斗争。一九〇六年有一百余万工人参加罢工。一九〇七年参加罢工的有七十四万。农民运动在一九〇六年上半年推广到沙俄一半左右的县份，下半年所推广到的县份仍占总县数五分之一。陆海军中的骚动仍然继续着。

沙皇政府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并没有局限于采取高压手段。它用高压手段获得第一批成功之后，便决定用召集新的所谓“立法”杜马的手段来给革命一个新的打击。它打算用召集这样一个杜马的手段来引诱农民离开革命，并以此来消灭革命。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沙皇政府颁布了召集新的所谓“立法”杜马的法令，以表示与布尔什维克用抵制手段扫除了的那个旧的“谘议的”布里根杜马有所不同。沙皇政府颁布的选举法，当然是反民主主义的。选举不是普遍的。半数以上的居民，例如妇女和二百万以上的工人，根本就被褫夺了选举权。选举是不平等的。选民被分成四部分，即当时所谓选民团：土地所有者选民团（地主），城市选民团（资产阶级），农民选民团和工人选民团。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选举实际上不是秘密的。选举法保证一小群地主资本家在杜马中能比数千百万工农占到绝大的多数。

沙皇是想利用杜马来引诱群众脱离革命。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农民还相信经过杜马可以获得土地。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欺骗工农，仿佛不必经过起义，不必经过革命而可以达到人民所需要的制度。在反对这种欺骗人民的手段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根据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底决定来宣布并实行了抵制第

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

工人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时,要求把党底力量统一起来,把无产阶级政党统一起来。布尔什维克根据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关于统一问题的著名决议,赞助了工人所提出的这一要求,并问孟什维克提议召集全党统一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受到工人群众方面的逼迫,不得不同意实行统一。

列宁是主张统一的,但他所主张的是不会把革命问题上的分歧掩盖起来的统一。调和派(波格丹若夫,克拉辛等人)使党受到很大的害处,因为他们力图证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并没有什么严重分歧。列宁极力反对调和派,而认为布尔什维克必须带着自己的政纲去参加代表大会,使工人能明白认识布尔什维克所站的立场,以及统一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实行的。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制定了这样的政纲,并把它交给了党员们去讨论。

一九〇六年四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斯托哥尔摩(瑞典)召集了称为统一大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有一百一十一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代表着五十七个地方党组织。此外,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崩得代表三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三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组织代表三人。

布尔什维克组织因为在十二月起义时和起义后遭受破坏,所以不是全体都能派遣代表出席。况且,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的“自由时光”接纳了许多根本与革命马克思主义不相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例如,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当时梯弗里斯城内产业工人很少)所选派的大会代表人数,竟与最大无产阶级中心的彼得堡组织所选派的代表人数相等。因此在斯托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就由孟什维克占得了多数,虽然是不大的多数。

大会成份既是如此,所以大会对许多问题也就通过了孟什维主义性质的决议。

在这次大会上只发生了形式上的统一。其实布尔什维克和孟

什维克仍然是各自保持着原有的观点，各有其独立的组织。

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最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对时局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组织问题。

虽然孟什维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占了多数，但他们终究不得不采纳列宁所提出的论入党条件的党章第一项条文，以免丧失自己在工人中间的影响。

在土地问题上，列宁捍卫了土地国有的主张。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只是在革命获得胜利时，只是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在此场合实行土地国有，就能使无产阶级容易联合农村贫民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土地国有就是无偿地夺取(没收)全部地主土地而转交给农民享用。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号召农民去进行反对沙皇地主的革命。

孟什维克却采取了另一种立场。他们坚持了土地市有的纲领。依照这个纲领，不是把地主土地交归农民村社支配，甚至不是把它交归农民村社使用，而是把它交归市政局(即地方自治机关或所谓地方自治局)支配。农民必须按各人的能力来租佃这种土地。

孟什维克所提出的土地市有纲领是个妥协主义的，因此是对革命有害的纲领。它决不能动员农民去作革命斗争，它并不打算把地主土地所有权完全消灭。孟什维克的纲领是要革命半途而废。孟什维克不愿意发动农民来参加革命。

代表大会以多数表决通过了孟什维克的纲领。

在讨论对时局估计和国家杜马问题决议时，孟什维克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反无产阶级的本性，机会主义的本性。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斯大林同志回答孟什维克时直截提出问题如下：

“或者是无产阶级底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底领导权——这就是现时摆在党内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

至于讲到国家杜马，孟什维克所提出的决议案是极力替它吹

嘘的,说它是解决革命问题,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的最好的工具。反之,布尔什维克则认为杜马是沙皇制度底一种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是沙皇制度用来掩盖其腐朽机体的一种帷帐,而当它一感到这种帷帐对它不便时,那它就会立刻将其抛弃的。

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有三个是布尔什维克,有六个是孟什维克。选进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尽都是孟什维克。

当时看得很清楚:党内斗争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的斗争更加剧烈起来了。在那些形式上已经统一的地方组织里,往往是由两个报告人来作关于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一个是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另一个是代表孟什维克的。讨论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以后,各地方组织中的大多数党员,在大多场合都是站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的。

实际生活愈益证明布尔什维克立场正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孟什维克的中央,愈益暴露出自己机会主义的本性,暴露出自己完全没有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能力。一九〇六年夏秋两季,群众革命斗争又重新加强起来。在喀琅施塔得和斯维亚波尔格有水兵举行起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加剧了。孟什维克的中央提出了机会主义的口号,但群众并没有跟着这些口号走。

(六)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召集。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

沙皇政府觉得第一届国家杜马不够驯顺,乃于一九〇六年夏将其解散。沙皇政府变本加厉地压迫人民,在全国各地开展着讨伐队的蹂躏行动,并宣布在最短时期内召集第二届国家杜马。沙皇政府公然骄横起来。它眼看革命浪潮正在低落,已经不害怕革命了。

布尔什维克应当决定参加或抵制第二届杜马的问题。当讲到抵制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通常是说积极的抵制，而不是说简单的和消极的拒绝参加选举。布尔什维克认为积极的抵制是一种革命手段，其目的是要叫人民防范沙皇把人民由革命道路引上沙皇“宪制”道路的企图，是要打破这种企图而组织人民去重新进攻沙皇制度。

对布里根杜马实行抵制的经验，证明抵制“是由事变完全证实了的唯一正确策略”（《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七页）（注四五）。这次抵制是有成效的，因为它不仅叫人民防范了沙皇宪制道路的危险，而且在杜马还没有产生以前就把它撕破了。这次抵制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向上高涨时期并且是倚靠着这种高涨实行，而不是在革命低落时期实行的，原来撕破杜马只有在革命高涨条件下才可做到。

抵制维特杜马，即抵制第一届杜马，是在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当沙皇已经获得胜利时，即在可以推想革命往下低落时实行的。

“可是，——列宁写道，——那时当然还没有根据把这个胜利（指沙皇胜利而言。——编者）看作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起义，还由一九〇六年夏天许多分散的局部的军事起义和罢工所继续着。抵制维特杜马的口号，就是为集中和综合这些起义而斗争的口号”（《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二〇页）。

对维特杜马实行的抵制，虽然也会大大破坏了这届杜马底威信，并减弱了一部分人民对杜马的信仰，但它却没能把杜马撕破。其所以没能把它撕破，是因为这次抵制，如现在所已看得清楚的，是在革命退落、低落的环境中实行的。因此，在一九〇六年间抵制第一届杜马，是没有成效的。关于这一点，列宁在他有名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

“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抵制‘国会’，使革命无产阶级获得了

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因为它表明了,在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国会内的与国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条件下,善于拒绝国会内的斗争,有时是有益处,甚至是必要的……一九〇六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已经是一个错误,虽然这个错误是个不大的,容易改正的……凡评论个人的话,加以相当修改,亦可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是能迅速而容易地纠正这种错误的人”(《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二至一八三页)(注四六)。

讲到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时候,列宁认为由于环境变迁和革命低落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应当把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重新审查一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六页)(注四七)。

“历史已经表明,——列宁写道,——当杜马召集起来时,就有可能从它内部和在它周围进行有益的鼓动;和革命农民接近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在杜马内部是有可能进行的”(同上,第二九页)(注四八)。

由此可见,不仅要善于在革命高涨时坚决实行进攻,在最前列实行进攻,而且要善于在已经没有高涨时正确实行退却,在最后而实行退却;要善于适应业已改变的环境来改变策略,不要慌忙错乱地实行退却,而要有组织地、镇静地、毫不慌张地实行退却,以求利用最小一点可能来使干部免遭敌人底打击,改编队伍,积蓄力量并准备重新向敌人实行进攻。

所以布尔什维克就决定参加第二届杜马的选举。

但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并不是要像孟什维克所作的那样在杜马中间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进行正常的“立法”工作,而是要利用它为鼓吹革命的讲台。

反之,孟什维克的中央却号召党去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选举协定,在杜马中拥护立宪民主党人,把杜马看作是能镇慑沙皇政府

的立法机关。

大多数党组织都表示反对孟什维克中央所采取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要求召集新的党代表大会。

一九〇七年五月，在伦敦召集了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各民族的社会民主组织在内)计有十五万党员。这次大会共有三百三十六个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有一百零五名；孟什维克有九十七名。其余的人所代表的是各个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即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及崩得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是由上次代表大会接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企图给自己造成一个单独的中派集团，即半孟什维克的集团，可是谁也没有跟着他走。

布尔什维克因为得到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底拥护，所以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稳定的多数。

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发生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间的斗争。代表大会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黑帮党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给了布尔什维主义估计，并规定了对于这些政党所应采取的布尔什维主义策略。

代表大会采纳了布尔什维克底政策，并决定要去与“俄国人民同盟”、保皇派、贵族联合会等黑帮政党，以及“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人)、工商业党和“和平复兴”党作无情的斗争。所有这些政党都显然是反革命的政党。

讲到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民主党时，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同它进行坚决揭露性的斗争。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揭破立宪民主党虚伪骗人的“民主主义”立场，并坚决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妄想领导农民运动的企图。

至于说到所谓民粹派的或劳动派的政党(人民社会主义者，劳

动团(注四九),社会革命党人),那末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揭破他们冒充社会主义者的企图。同时,代表大会又认为可以去同这些政党成立单个的协定,以便一致和同时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这些政党当时尚是民主派的政党,并代表着城乡小资产阶级底利益。

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孟什维克就已主张召集所谓“工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底计划是要召集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参加的代表大会。这个“工人”代表大会应该建立一个又像是“非党的党”,又像是“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纲的工人党。列宁揭破了孟什维克这种极有害的企图,认为他们是想把社会民主工党取消而将工人阶级先进部队溶合到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代表大会严厉地斥责了孟什维克所提出的“工人代表大会”口号。

在代表大会工作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是工会问题。孟什维克主张工会“中立”,即反对党在工会中的领导作用。代表大会否决了孟什维克底提案,而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上指出,党应力求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工会。

第五次代表大会表明布尔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表现过因胜而骄,夸功自满的态度。列宁所教诲给他们的并不是这点。布尔什维克知道,往后还要同孟什维克作斗争的。

斯大林同志在其一九〇七年发表的一个代表底札记一文中,把这次代表大会底结果估计如下:

“事实上把全俄先进工人在革命社会民主派旗帜下团结成为一个全俄的党,——这就是伦敦代表大会底意义,这就是它的一般内容”。

斯大林同志在这篇论文中举出了说明代表大会成份的具体材料。原来,布尔什维克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主要是从各大工业中

心区域选出的（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等），而孟什维克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则是从手工业工人和半无产阶级份子占大多数的小生产区域，以及几个纯粹农民区域中选出的。

“很明显的，——斯大林同志在作代表大会总结时指出，——布尔什维克底策略是大工业无产者底策略，是阶级矛盾特别明显和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那些区域底策略，布尔什维主义是真正无产者底策略。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的，孟什维克底策略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村半无产阶级份子底策略，是阶级矛盾不很明显和阶级斗争颇为模糊的那些区域底策略。孟什维主义是无产阶级里半资产阶级份子底策略。数目字就是这样说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第十一至十二页，一九三五年版）。

沙皇解散第一届杜马以后，本想得到一个更为驯顺的第二届杜马。但第二届杜马也没有符合这种期望。于是沙皇就决定将这个杜马也实行解散，并按更坏的选举法来召集第三届杜马，希望这届杜马会是更为驯顺的。

第五次代表大会闭会后不久，沙皇政府就举行了所谓六三政变。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计有六十五个代表，都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新的选举法颁布了。工农权利更被削小。沙皇政府继续实行进攻。

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加紧用流血手段对付工农群众。成千累万的革命工人和农民惨遭讨伐队枪毙或绞杀。革命家在沙皇牢狱里受尽苦刑。工人组织，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受到特别残酷的追究。沙皇暗探拼命搜寻当时匿居芬兰的列宁。你们想摧残革命底领袖。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列宁冒着极大的危险，才侥幸逃出毒手，再度亡命国外。

艰苦的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到来了。

这样，第一次俄国革命结果是失败了。

促成这点的有如下几种原因：

(一)当时在革命中还没有工农反沙皇专制的坚强联盟。农民虽然奋起进行过反地主的斗争,并愿意同工人结成联盟去反对地主,但他们还没有了解不推翻沙皇是不能推翻地主的,还没有了解沙皇与地主是一致动作的,并且有很大一部分农民还信任沙皇,还对沙皇御用的国家杜马抱有一种希望。因此,有许多农民不愿同工人结成联盟去推翻沙皇制度。当时农民相信妥协主义社会革命党人,还要比相信真正革命家布尔什维克的程度更大。其结果就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没有充分的组织性。列宁指出：

“…农民动作得过于散漫,无组织和没有充分采取攻势,而这也就是革命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五四页)。

(二)很大一部分农民不愿同工人一起去推翻沙皇制度的这种心理,在军队底态度上也有了反映,因为军队大多数都是由身穿军服的农民子弟组成的。虽然沙皇军队个别部队中也发生过骚动和起义,但大多数兵士却还是帮助沙皇镇压了工人底罢工和起义。

(三)工人也动作得不充分齐心协力。先进的工人阶级队伍在一九〇五年开展了英勇的革命斗争。但较为落后的阶层,即工业发展最弱州区的工人,居住在乡村中的工人,却发动得比较迟慢。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动在一九〇六年特别加强起来,但这时工人阶级先锋队却已大为削弱了。

(四)工人阶级是革命中先进的基本的力量,但当时工人阶级党内部还没有必要的统一和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阶级党——分成了两派,即分成了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进行着澈底的革命路线,并号召工人去推翻沙皇制度。孟什维克却以其妥协主义的策略来阻碍革命,淆乱颇大一部分工人底意识,分裂工人阶级。因此,工人在革命中并非始终都是行动得齐心协力,而工人阶级既然还没有本身队伍底统一,当然也就不

能真正成为革命底领袖。

（五）西欧帝国主义者帮助沙皇专制政府镇压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外国资本家害怕丧失其投在俄国的资本和巨量的收入。此外，他们还害怕俄国革命一旦胜利时，其他各国工人也会同样奋起实行革命。因此，西欧帝国主义者就来帮助刽子手沙皇。法国银行家贷给了沙皇一笔巨款来镇压革命。德皇曾整饬数万大军来准备随时用武装干涉援助俄皇。

（六）一九〇五年九月缔结的日俄和约大大帮助了沙皇。战争中的失败和革命汹涌增长的事实，使沙皇不得不急忙签订和约。战争中的失败削弱了沙皇制度。而和约的缔结却巩固了沙皇底地位。

简短的结论

第一次俄国革命是我国发展中整整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革命由十月总政治罢工向上升涨为十二月武装起义，利用了沙皇因在满洲战场上遭受失败而实力削弱的情形，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并从沙皇那里夺得了接二连三的让步；在第二个时期，沙皇因与日本媾和而得以恢复元气，就来利用自由资产阶级在革命面前发抖的心理，利用农民犹豫动摇的态度，投给他们一点表现于维特杜马的小惠，并转而实行向工人阶级进攻，向革命进攻。

在区区三年的革命时期（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时期），工人阶级和农民受到了他们在三十年寻常和平发展时期所不能受到的丰富的政治教育。革命时期的几年，把和平发展条件下几十年内所弄不清楚的事情都弄清楚了。

革命暴露出沙皇制度是人民底死敌，沙皇制度是只有坟墓才能使它腰直的驼背子。

革命证明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想同人民而是想同沙皇联盟，自

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力量,同这种力量去实行妥协就等于贩卖人民。

革命证明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领袖,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立宪民主主义自由资产阶级推开,而把农民从它的影响下救拔出来,把地主消灭,把革命进行到底,并扫清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末了,革命证明劳动农民虽然表示动摇,但他们毕竟是能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唯一严重力量。

在革命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着,即布尔什维克底路线和孟什维克底路线。布尔什维克所持的方针是要扩展革命,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实现工人阶级领导权,孤立立宪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同农民实行联盟,成立工农代表所组成的临时革命政府,使革命达到胜利的结局。反之,孟什维克却持着收缩革命的方针。他们主张改良和“改善”沙皇制度而反对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主张自由资产阶级领导权而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同立宪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联盟而反对同农民联盟,主张召集所谓全国“革命势力”中心的国家杜马而反对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于是孟什维克就滚进了妥协主义的泥潭,成了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的向导,事实上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办。

布尔什维克原来是党内和国内唯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自然,既有这样严重的意见分歧,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事实上便分成了两个政党,即分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并没有把党内实际状况改变丝毫,只是把党内形式统一的局面保存起来和把它稍微巩固了一下。第五次党代表大会朝着党内实际统一方面前进了一步,并且这种统一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旗帜下实行的。

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在总结革命运动时指斥了妥协主义的孟什

维克路线，接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于是这次大会就再次证实了已由第一次俄国革命全部进程证实了的事情。

革命表明布尔什维克善于依照环境要求去实行进攻，善于在最前列进攻并引导人民去实行冲击。但除此而外，革命又表明布尔什维克善于在环境不利，革命向下低落时有条不紊地实行退却，布尔什维克已经学会毫不张惶，毫不燥急地正确实行退却，以求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并针对着新环境重新布置力量，然后再去向敌人进攻。

没有善于正确实行进攻的本领，便不能战胜敌人。

没有善于正确实行退却，毫不张惶毫不慌乱实行退却的本领，便不能在遭受失败时避免破灭。

第四章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独立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时期)

(一)斯托雷平的反动。反政府派智识阶层中的腐化。消沉颓废。一部分党员智识份子转入马克思主义敌人营垒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他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驳斥修正主义者而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底理论基础。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把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了。于是这天在历史上就称为六三政变日。沙皇政府颁布了新的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法,于是它就违背了自己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发表的宣言,因为这宣言上是说沙皇政府非经杜马同意不能颁布新法令的。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底代表们被判处苦役,被流放于辽远边区。

新选举法使地主和工商资产阶级在杜马中代表人数大大增加起来,而使本来很少的工农代表人数减少了几倍。

第三届杜马按其成份说是个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在总共四百四十二个杜马代表中,右派(黑帮派)占一百七十一席,十月党及其同类的党派占一百一十三席,立宪民主党以及与其相近的党派占一百零一席,劳动派占十三席,社会民主党占十八席。

右派(其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在杜马开会时坐在右席上)所代表的是最恶毒的工农敌人,即农奴制的黑帮地主,他们常用鞭打和枪杀大批农民的手段镇压农民运动,唆使凶徒蹂躏犹太人,殴打示威工人,放火焚烧群众在革命时日集会的场所。右派主张用最残暴的手段镇压劳动群众,拥护无限制的沙皇政权,反对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颁布的沙皇宣言。

在杜马里与右派接近的是十月党人,或称“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人所代表的是大工业资本以及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底利益(一九〇五年革命开始后,立宪民主党内很大一部分大地主份子转到十月党方面去了)。十月党人与右派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承认——而且也只是口头上承认——十月十七日宣言。十月党人完全拥护沙皇政府底对内对外政策。

“立宪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所占的议席,要比它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所占的少,因为有一部分原先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的地主已转到十月党方面去了。

第三届杜马中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即所谓劳动派。杜马中的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派(布尔什维克)之间。列宁指出,虽然劳动派在杜马中十分脆弱,但他们却代表着群众,即代表着农民大众。劳动派在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派中间动摇不定,原是小私有主阶级地位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即工人民主派,应该“帮助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使他们脱离自由派底影响,团结民主派营垒去反对革命立宪民主党人,而不仅是反对右派分子…”(《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四八六页)(注五〇)。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进程中,尤其在革命失败之后,立宪民主党人日益暴露出他们是种反革命的力量。他们愈益抛弃自己的“民主”假面具,而表现为十足的保皇党人,即拥护沙皇制度的人。一九〇九年间,有群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著作家出版了一部“路票”

文集,立宪民主党人在这文集中代表资产阶级感谢沙皇镇压了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向刑棍绞架的沙皇政府匍伏跪拜,直言不讳地写道:必须“替这个政权祝福,因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狱来替我们(即自由资产阶级)挡开人民底横暴”。

沙皇政府即将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并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摧残下去,就来加紧对无产阶级底政治和经济组织实行攻击。苦役牢房、大狱和流放所中已经充满了革命家。革命家在监狱里受到残酷的鞭笞,受尽拷打和残害。黑帮的恐怖猖獗到极点。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有几千个革命家惨遭杀害。当时一般人把绞杀叫作“斯托雷平的领带”。

沙皇政府在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时候,不能局限于采用高压手段,局限于实行讨伐,枪毙,监禁和判处苦役徒刑。沙皇政府眼见农民轻信“皇帝爷爷”的心理消失下去,殊觉惶恐不安,于是就来大施手腕,打算培植出一个人数众多的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作为自己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斯托雷平颁布了一道新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而另立田庄。斯托雷平土地法令上认定村社土地使用制可以随便破坏。每个农民都能把自己享有的份地变成自己的私产,实行退出村社。农民可以出卖自己的份地,而他们从前是没有权利这样来作的。村社必须为每个退出村社的农民分出位置在一个地方的土地(单独田庄,独家农场)。

富农已有可能用贱价向贫弱农民收买土地。在该法令颁布后几年以内,有一百万以上的贫弱农民完全失去土地而陷于破产了,富农单独田庄数目靠掠夺贫弱农民土地而增加起来。这种田庄有时简直成了十足的大地产,广泛地采用着雇佣劳动,即雇农劳动。政府强迫农民把村社中最好的土地分给富农庄主。

如果说从前在“解放”农民时抢劫农民土地的是地主,那末现在掠夺村社土地的便是富农,他们领得最好的地块,用贱价向贫农

收买份地。

沙皇政府发给富农大量借款来收买土地和成立单独田庄。斯托雷平想把富农变成小地主，变成沙皇专制制度底忠实卫士。

在九年（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五年）以内退出村社的农户，总共有两百万以上。

斯托雷平政策把少地农民与农村贫民状况弄得更加困苦不堪。农民中的分化日益加剧。农民开始同富农庄主发生冲突。

同时农民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在沙皇政府以及地主立宪民主党国家杜马存在时是无法取得地主土地的。

起初，在退出村社而另立田庄的现象盛行时期（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间），农民运动有过相当的低落，但到一九一〇和一九一一年间以及较晚的时候，农民反对地主和富农庄主的运动却已在村社农民同单独庄主发生冲突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了。

工业方面的情形也是在革命以后起了很大的变化。工业集中，即工业规模扩大和集合于一小群日益增大的资本家手中的过程，大大加强了。资本家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已开始成立同盟，以图提高国内商品价格，把赚来的额外利润用作鼓励商品输出的基金，使商品可以输到国外市场去廉价销售，借以夺得国外市场。这样的同盟，这样的资本家联合（垄断组织），就是所谓托辣斯和新迪卡。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托辣斯和新迪卡数量愈益增多。大银行数目也愈益增加；大银行在工业中的作用愈益加强。外资更加源源不绝地流入俄国。

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工业经过几年停滞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煤铁和石油产额已经提高，织物和沙糖生产已经扩大。谷物出口额大大增加了。

虽然俄国当时在工业方面已有若干进步，但它同西欧相较仍然是个落后的国家，并且是个依赖于外国资本家的国家。当时俄

国还不能生产机器与机床,必须从外国输入这些东西,当时俄国还没有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矿质肥料制造业。当时俄国在武器制造方面也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

列宁指出俄国金属消费很低是俄国落后底标志时写道:

“在农民解放以后半世纪中,俄国钢铁消费量增加了五倍,但俄国终究还是个异常落后的国家,贫困的和半野蛮的国家,其现代生产工具的设备劣于英国四倍,劣于德国五倍,劣于美国十倍”(《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五四三页)。

俄国经济政治落后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俄国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本身都依赖于西欧资本主义。

这表现于俄国国民经济中如煤炭、石油、电气工业和冶金业等最重要部门都操于外资掌握,沙俄所用的机器和装备品几乎完全要从国外输入。

这表现于重利盘剥的外债,沙皇政府每年要从人民身上榨取数万万卢布来缴付这种外债的利息。

这表现于俄国与“协约国”缔结的许多秘密条约,据这些条约规定,沙皇政府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拿出数百万俄国兵士到帝国主义战线上去帮助“协约国”作战,以保证英法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利润。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宪兵和警察,沙皇奸细和黑帮凶徒用盗匪手段袭击工人阶级的现象特别流行。当时用高压手段扰害工人的不仅有沙皇卫兵。工厂主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们在工业停滞和失业人数增加的年代特别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工厂主采用大批开除工人的手段(同盟歇业),把积极参加罢工的觉悟工人列入“黑名簿”。凡加入了本工业部门厂主同盟的企业,都拒绝雇用落入了这种“黑名簿”或“黑名单”的工人。工资定额在一九〇八年间降低了百分之十至十五。工作日到处延长到十小时以至十二小时。抢劫式的罚款制度又盛行起来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败，使革命同路人陷于瓦解和腐化。这种腐化和颓废情绪在智识界中间显得特别厉害。同路人是在革命汹涌高涨时期从资产阶级方面跑进革命队伍的，他们一到反动时期就离开党了。其中有一部分人跑进了公开反对革命的营垒，另一部分人则盘踞在工人阶级保全下来的合法团体中间，极力引诱无产阶级离开革命道路，拼命破坏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底威信。同路人离开了革命，极力迁就反动势力，想与沙皇制度和睦相处。

沙皇政府利用革命失败的局面，把那些贪生怕死和钻营私利的革命同路人招去替它当走狗，即替它当奸细。沙皇暗探局派遣许多无耻叛徒到工人组织和党组织中去当内奸，哄他们从内部进行侦探工作并出卖革命家。

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大举进攻。有一大群时髦作家涌现出来，实行“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辱骂革命，讥笑革命，赞美叛变行为，借口“崇拜个性”而鼓吹淫乱。

在哲学方面“批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加紧起来，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用冒牌“科学”论据巧加掩饰的宗教流派出现。

对马克思主义实行“批评”，已成为一种时髦了。

这班老爷们在色彩上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一样：引诱群众离开革命。

党内有一部分智识份子也受到了颓废和犹疑心理的浸染，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来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稳稳站立过。其中有波格丹诺夫，巴查罗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是在一九〇五年归附布尔什维克的），尤史克维奇，瓦连廷诺夫（两人都是孟什维克）一类的著作家。他们从两方面同时开展“批评”，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底哲学理论基础，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底科学历史基础，即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批评与普通批评不同的地方，就在这种批评不是公开诚实的，而是在“拥护”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幌子下，用暧昧和骗人的手段进行的。他们

说：我们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们想把马克思主义“改善”一下，想使它抛弃某些基本原理。其实，他们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极力想摧毁马克思主义底理论基础，虽然他们口头上是用一种虚伪辞句否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并继续用两面派态度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虚伪的批评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欺骗党内普通工作人员，并且确实能把他们引入迷途。这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批评愈虚伪，则它对党也愈加危险，因为它愈益与反动势力反对党和反对革命的总进攻密切结合起来。有一部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智识份子，甚至公然宣传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即所谓“寻神派”和“造神派”)。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就摆着一个极迫切的任务：必须对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节份子给予一个应有的驳斥，撕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彻底揭穿，这样来保持住马克思主义党底理论基础。

看来，普列汉诺夫和他那些自命为“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孟什维克朋友们，该会把这一任务担负起来的了。但他们却宁愿撰写几篇带讽刺批评性的小品论文来潦草塞责，接着就躲藏起来，一声不响了。

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在他的名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里(一九〇九年出版)实现了的。

“为时尚不及半载，——列宁在该书中写道，——就出版了四本主要，甚至几乎完全是用来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其中首先就是巴查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伯尔曼，格里峰得，尤史克维奇及苏渥罗夫合著的略论(？本来要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一九〇八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其次就是尤史克维奇著的唯物主义与批判的现实主义，伯尔曼著的现代认识论光线下的辩证法，瓦连廷诺夫著的马克思主义底哲学结构：这些人——虽然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很不相同——都是一致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但他

们同时却又俨然以哲学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论”，——伯尔曼说道，——恩格斯底观点“已经陈旧了”，——巴查罗夫用似乎是指出一种当然定理的口吻随便说道。这样一来，唯物主义就仿佛是被我们的这些勇敢武士驳倒了，他们傲然自得地援引“现代的认识论”，援引“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主义”），援引“现代自然科学底哲学”，甚至是“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底哲学”（《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一—页）。

当卢那察尔斯基为他那些哲学修正主义者朋党们辩护，说“也许我们走错了路，但我们是在探求”的时候，列宁回答道：

“我也是哲学中的“探求者”哩。就是说，我在本书中间（即指《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而言。——编者）是想探求清楚，看看这些假借马克思主义名义拿出一种极糊涂，极错乱，极反动东西来的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同上，第一二页）。但事实上，列宁这本书远远超出了这个简单任务的范围。其实，列宁这本书不仅是批评了波格丹诺夫，尤史克维奇，巴查罗夫，瓦连廷诺夫及其哲学老师阿万那留斯与马赫在其著作里企图用精巧光滑唯心主义来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对立的思想。同时，列宁这本书又还捍卫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用唯物主义观点综合了从恩格斯逝世起，至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问世这整个时期内在科学方面，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最重大最实在的成果。

列宁在他这本书中，给了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及其外国老师们一个应有的批评之后，就得出如下一些驳斥哲学上理论上修正主义的结论：

（一）“日益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精巧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冒充为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在策略问题方面，以及在一般哲学问题…方面所表现的特效”（《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七〇页）；

(二)“马赫与阿万那留斯底全部学派,都…走向于唯心主义”(同上,第二九一页);

(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陷落到唯心主义泥潭中去了”(同上,第二八页);

(四)“不能不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烦琐语句后面看出哲学中的党派斗争,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表现着现社会里各敌对阶级底趋向和思想体系”(同上,第二九二页);

(五)“经验批判主义底客观作用,即阶级作用,完全是替菲德主义者(即排斥科学而崇尚信仰的反动派。——编者)服役,帮助他们一般反对唯物主义,尤其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同上,第二九二页);

(六)“哲学的唯心主义,是…引向僧侣主义的道路”(同上,第三〇四页)。

为了认识列宁这本书在我党历史中的伟大意义,为了了解列宁在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流行的一切修正派和变节份子的斗争中保持了怎样巨大的理论财富,就必须——那怕是很简略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底基础说明一下。

其所以必须这样来作,尤其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底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底理论基础,而这种基础是我们党底每个积极活动家都应该认识,应该领会的。

那末:

(一)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呢?

(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

(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党底世界观。其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说明他们的辩证法时，通常都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底辩证法和黑格尔底辩证法是一个东西。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仅仅从黑格尔辩证法中采取了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并向前发展了辩证法，因而赋与了辩证法一个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马克思说：

“我的辩证法不仅根本上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与它绝对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所称为观念而甚至将其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界底创造主，而现实界不过是思维过程底外部表现。在我看来，恰巧相反，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类头脑中并在人类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言）。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说明他们的唯物主义时，通常都援引费尔巴黑，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底唯物主义和费尔巴黑底唯物主义是一个东西。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从费尔巴黑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向前发展成了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摒弃了它那唯心主义的和宗教的伦理杂质。大家知道，费尔巴黑虽在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但他极力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恩格斯屡次说过：费尔巴黑“虽有其唯物主义的基础，但还没有摆脱旧时的唯心主义羁绊”，“我们考察费尔巴黑底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时，便可立刻看出他实在有一种唯心主义思想”（《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二至六五四页）。

辩证法是导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字，其含义就是进行谈话，

进行论战。古代人所谓辩证法,就是以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个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个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永恒运动着,永恒变化着的现象,而把自然界底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对立势力互相影响出结果。

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根本相反的。

(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基本特征是:

(一)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么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互依赖的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底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是互相密切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

因此,辩证法认为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单独拿来看,把它看作是与其周围现象没有联系的现象,那它就会是不可了解的东西,因为自然界任何部分中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与周围条件没有联系的现象,看作是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它就会是毫无意思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与周围现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现象,把它看作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它就是可以了解,可以论证的东西了。

(二)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的状态,停顿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

因此,辩证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方面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它们的产生和衰亡方面去观察。

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

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那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恩格斯说，

“整个自然界，由其最小单位到最大物体，由沙粒到太阳，由protist（原始的活细胞。——编者注）到人，都是处在永恒的产生和消灭过程中，处在毫不间断的流动中，处在始终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中”（《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八四页）。

因此，——恩格斯说，——辩证法“观察物象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主要是从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结合，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灭方面去观察”（同上，第二三页）。

（三）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什么简单增长的过程，看作数变不会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由不显露的细小数变进到显露的变，进到根本的变，进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和突然地发生，即表现于由一种状态突变为另一种状态，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规律式地发生，即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数变积累而引起的结果。

因此，辩证法认为不应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不应把它了解为过去事物底简单重复，而应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由旧质态进到新质态，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

恩格斯说：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现代的自然科学既提供了进行这种检验的非常丰富而与日俱增的材料，于是就证明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归根到底是辩证式地发生，而不是形而上学式地发生；自然界不是在永远一样的经常重复的循环周里运动着，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给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一个极有力的打击，因为他证明整个现代有机界，植物和动

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长到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底产物”(同上,第二三页)。

恩格斯说明辩证发展过程是由数变进到质变的过程时写道:

“在物理学中…每一种变化都是数转变为质,即某个物体所固有或某个物体所承受的某种运动数量成份改变的结果。例如,水底温度最初对于水底液体状态是不发生丝毫作用的,但当液体水底温度不断增加或不断减少到一定的程度时,这一结合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块…例如必须具有一定最低限度的电力时,白金丝才会开始发光;例如每种金属都有其一定的熔解热度;例如每种液体都有其相当气压下特有的一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能用我们所有的工具造成相当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一定的危机点,我们在这点上施以相当的气压和冷化,就可把它变成为液体…物理学中所谓 constants(即由某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点。——编者注),大部分都不过是这样一些交错点底名称,在这些交错点上,运动底数量增减(数变)引起该种物态底质变,亦即数转变为质”(同上,第五二七至五二八页)。

其次,恩格斯进而讲到化学时说道: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种种物体因数量成份改变而发生质变的科学。黑格尔自己已知道这点…譬如拿氧气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如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我们就会得到臭氧,即得到一种按其气味和作用是与普通氧气显然不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气与淡气或硫黄按各种比例结合起来,那末其中每一种结合都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与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里!”(《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五二八页)。

最后,恩格斯批评着杜林,批评着那大骂黑格尔而暗中又剽窃黑格尔所说无感觉世界转变为感觉世界,无机物世界转变为有机物世界,是转变为新状态的突变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时说道:

“这正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交错线，在这交错线上，纯粹数的数减到一定交错点上就会引起质的突变，例如水液被烧热或冷化时，沸点或冰点便是这样的交错点，在这些交错点上——在通常的气压下——就发生由旧的物态转变为新的物态的突变，亦即数转变为质”（同上，第四五至四六页）。

（四）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所持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所有这些对象或现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底斗争，旧东西与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间的斗争，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间的斗争，便是发展过程底实在内容，由数变进到质变的这一过程底内容。

因此，辩证法认为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不是表现于各现象协和的开展，而是表现于各对象或各现象本身固有矛盾底揭露，表现于在这些矛盾基础上动作的互相对立趋势的“斗争”。

列宁说：

“辩证法本来就是研究对象本身内部矛盾的”（列宁，《哲学笔记》，第二六三页）。

其次：

“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一页）。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底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显而易见，把辩证法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如何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底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如何巨大的意义。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彼此关联，互相制约，那末在估计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当然也就不可如历史家常作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

种成见出发,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运动所产生并与其相联结的那些条件出发。

奴隶制度,就现代的条件来看,是很荒谬的现象,反常的荒诞事情。而奴隶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却是完全可以了解并且合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一步。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是完全可以了解的一种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是前进一步。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就我们苏联现时的条件来看,却是一种荒谬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与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一步。

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那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一笔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其次。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底规律,那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永世不移的”社会秩序,什么私有制和剥削制的“永恒原则”,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替代了封建制度一样。

由此可见,不是要指望社会里已经不再发展的阶层,那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是要指望社会里正在发展,具有远大前途的阶层,那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在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与当时占居民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占很小的少数。但当时无产阶级是个发展着的阶级,而农民却

是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指靠着无产阶级。而且他们并没有弄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已由一个不大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其次。既然由缓慢的数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底规律，那末由被压迫阶级所实行的革命的变革，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现象。

由此可见，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决不能经过缓慢变化，经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底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其次。既然发展过程是经过内在矛盾底揭露，是经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彼此对立势力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末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现象。

由此可见，不是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是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主义政策。

以上便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观察社会生活，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那它是与哲学唯心主义根本相反的。

（貳）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底基本特征是：

（1）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底

体现,而马克思底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各种形态;各现象由辩证法所判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着,而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恩格斯说: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份”(《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一页)。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泰持着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并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造成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活火”,——列宁论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基础的一种很好的说明”(列宁,《哲学笔记簿》,第三一八页)。

(2)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存在或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只是在我们的感觉,观念或概念中存在着,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认为:物质,自然界或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着的客观现实;物质是第一性的现象,因为它是感觉,观念或意识底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因为它是物质底反映,存在底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底产物,即人脑底产物,而人脑是思维底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便不可把思维和物质隔开。

恩格斯说:

“全部哲学底最高问题,都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哲学家就是依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营垒的。凡断定说精神先于自然界存在的…便组成唯心主义的营垒。凡认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的,则属于唯物主义底各派”(《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三二九页)。

其次：

“可以感觉得到的物质的世界，即我们自己所属的世界，是唯一的真实世界…我们的意识与思维，不管它怎样好像是超感觉的东西，总是物质实体器官底产物，即人脑底产物。物质不是精神底产物，而精神本身倒只是物质底最高产物”（同上，第三三二页）。

马克思谈到物质与思维问题时说道：

“决不可把思维与思维着的物质隔开。物质是一切变化底主体”（同上，第三〇二页）。

列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时写道：

“唯物主义一般就认为客观现实的存在（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类意识，感觉和经验等等的…意识…仅仅是存在底反映，至多也不过是存在底近乎正确的（相等的，尽量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页）。

其次：

“物质就是作用于我们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客观现实…物质，自然界，存在和物理现象是第一性的现象，而精神，意识，感觉和心理现象是第二性的现象”（同上，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页）。

“世界底情景就是物质怎样运动着和‘物质怎样思维着’的情景”（同上，第二八八页）。

“人脑是思想底器官”（《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二五页）。

（3）唯心主义否认世界及其规律底可知性，不相信我们知识底确实性，不承认客观真理，并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与此相反，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现在尚未认识，但将来却会由科学和实践力量揭示和认识之物。

恩格斯批评康德及其他唯心主义者所谓世界不可认识和“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意见，而坚持唯物主义认为我们的知识是确实知识的这一著名原理时写道：

“把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遁辞驳斥得最澈底的就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能以亲自制造出自然界某一现象，依它的条件把它产生出来，并使它服务于我们目的的事实来证明我们对于这一现象认识的正确，那末康德的那个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要完结了。在动植物躯体上所形成的种种化学原素，当有机化学还没有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时，便始终是这类的‘自在之物’；而当有机化学已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了为我之物了；例如拿亚里查林，即茜素颜料来说，我们现在并不是从那生长于田野的茜草根上取得它，而是用更便宜得多，更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中取得它。哥白尼底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间被人视为假设，固然是种很可信的假设，但终究是一种假设。可是，当列月尔略根据这太阳系学说底论据，不仅证明一定有一个前此所未知的行星存在，而且已用计算方法确定它在天体中的位置，后来加列果然已发现这个行星时，哥白尼底太阳系学说就被证明了”（《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三三〇页）。

列宁责备波格丹诺夫，巴查罗夫，尤史克维奇及其他马赫信徒为非德主义者（注五一），而坚持唯物主义认为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科学知识是确实知识，认为科学定律是客观真理的这一著名原理时说道：

“现代的非德主义并不否认科学；它只是否认科学底‘过度奢望’，即科学想成为客观真理的奢望。既然有客观真理存在（如唯物主义者所想的那样），既然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上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能提供我们以客观真理，那末任何非德主义就毫无条件地被推翻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〇二页）。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底特征，就是如此。

不言而喻，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如何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底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如何巨大的意义。

既然自然界中各现象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底规律，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生活中各现象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底规律。

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已不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已成为社会底规律性的发展，而社会历史底研究已成为一种科学。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党底实际活动决不应以“卓越人物”底善良愿望为基础，决不应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底要求为基础，而应以社会发展底规律为基础，应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其次。既然世界可能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能认识，科学方面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材料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材料。

由此可见，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怎样复杂，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能利用社会发展规律来供实际的应用。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决不应以什么偶然动机为准则，而应以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中所得出的实际结论为准则。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已由关于人类美满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由此可见，科学和实际活动间的联系，理论和实践间的联系，它们的一致，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底方针。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现象，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

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意识是这客观现实底反映,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底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现象,而社会底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社会底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而社会底精神生活是这客观现实底反映,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见,社会底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来源,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所由产生的来源,并不是要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底物质生活条件中,要到社会存在中去探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这社会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在社会历史各个不同的时期可以看见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在奴隶制度下所遇见的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所遇见的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遇见的又是一种,那就不是由于什么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本身底“天性”和“属性”,而是因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各个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底意识决定人们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们底社会存在决定人们底意识”(《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页)。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为了不致陷入空洞臆想家的地位,那末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底决定力量出发;不应从“伟大人物”底善良愿望出发,而应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现实需要出发。

空想派——包括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陷于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不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需要上，却不顾这种需要并违反着这种需要而把它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

马列主义之所以强而有力和生气勃勃，也就是因为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凭借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需要，无论何时也不脱离社会底现实生活。

可是，决不当从马克思底话中作出结论，说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作用，说它们不反转来影响到社会存在，影响到社会生活物质条件底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底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底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底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上的严重作用和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和理论，它们已经是衰颓，并为社会上那些衰颓着的势力底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同时又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的先进势力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需要，便能获得愈加巨大的意义。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时，才会产生出来。可是，它们既已产生出来，便会成为最严重的力量，能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所提出的新任务，能促进社会前进。在这里也就表现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政治观点和新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组织的、动员的和改造的意义。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出来，正是因为它们为社会所必需，因为若没有它们那种组织的、动员的和改造

的工作,便无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既已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务基础上产生出来,便能扫除障碍,深入民众意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着的势力,因而便利着推翻社会上正在衰颓而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于是,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既已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社会存在发展过程中业经成熟的那些任务基础上产生出来,便能反转来影响到社会存在,影响到社会物质生活,造成必要条件来澈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中业经成熟的任务,并使这社会物质生活可能向前发展。

因此马克思说:

“理论一掌握了群众,便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马恩全集》,第一卷,第四〇六页)。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党,为要有可能去影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并加速其发展,加速其改善,便应凭借于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想,这种理论和思想能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需要,因而能发动广大民众,能动员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决意打破社会反动势力并为社会先进势力开辟道路的无产阶级党的伟大军队。

“经济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陷于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有动员的,组织的和改造的作用,而陷入了庸俗唯物主义,竟把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底作用看成几等于零,因而使党陷于消极无为,陷于萎靡不振的地步。

马列主义之所以强而有力和生气勃勃,就是因为它凭借于正确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把这个理论提到它所应有的高度,并努力来澈底利用这个理论所有的动员的、组织的和改造的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间,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间相互关系问题的。

（叁）历史唯物主义。

现在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究应把归根到底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和政治制度等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了解为什么东西呢？

这“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究竟是什么；它们的特征究竟怎样呢？

首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当然是把环绕着社会的自然界，即地理环境包含在内，因为这个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所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而且无疑是影响到社会底发展。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怎样呢？地理环境是不是决定社会面貌，人们社会制度性质，以及由一个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底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它无疑是能影响到社会底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底变更和发展要比地理环境底变更和发展快得不可计量。欧洲在三千年内已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这同一时期内，欧洲境内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更，便是变更得很少很少，甚至地理学也不肯提到它。而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环境方面一种稍许严重的变更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社会制度中甚至最严重的变更，也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就够了。

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地理环境决不能成为社会发展底主要原因，决定原因，因为在数万年间几乎仍旧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那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更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底增长，居民密度底高低，当然也包含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必要成分，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

口底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

人口底增长当然能影响到社会底发展,促进或延缓社会底发展,但它不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力量,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底增长并不能给我们说明为什么某个社会制度恰巧要由一定的新制度来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个制度来替代;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巧是由奴隶制度所替代,奴隶制度恰巧是由封建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资产阶级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制度所替代。

如果人口底增长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那末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当于它的较高形式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人口密度比美国高至四倍,但美国在社会发展程度上高于中国,因为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而美国却早已达到资本主义发展底最高阶段。比利时人口密度比美国高至十九倍,比苏联高至二十六倍,但美国在社会发展程度上高于比利时,而苏联比之比利时,更是高出一整个历史时代,因为比利时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而苏联却已消灭了资本主义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就应得出结论:人口底增长不是,而且不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主要力量。

(甲)既然如此,那末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这样的力量,据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便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谋得方式,便是社会生活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为要生活,就需要有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为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它们,而为要生产它们,就需要有人

们所利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种种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就需要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合起来,便构成成为社会底生产力。

但生产力还只是生产底一方面,生产方式底一方面,其所表示的是人们对于他们所利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物件和自然界力量间的关系。生产底另一方面,生产方式底另一方面,便是人们彼此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即人们底生产关系。人们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时,也就建立彼此间在生产内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由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着怎样的性质,而它们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制度下,都如社会底生产力一样是生产底必要原素。

马克思说: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着自然界,而且彼此互相影响着。他们如果不用相当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生产。为了实现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经过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才会有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存在,才会有生产”(《马恩全集》,第五卷,第四二九页)。

所以,生产,生产方式是把社会底生产力和人们底生产关系两者都包含在内,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乙)生产底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

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底改造。人们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着各个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粗浅一点说,过着各种不同样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下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有第三种生产方式,依此类推。同时,人们底社会制度,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治制度,也与此适应而各不相同。

社会底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在基本上也就会怎样,社会底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

或者粗浅一点说:人们底生活样式怎样,人们底思想样式也就会怎样。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

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

由此可见,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

由此可见,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并不是要到人们底头脑中,到社会底观点和思想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底经济中去探求。

由此可见,历史科学底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底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底规律。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就应精通生产发展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底规律。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

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时，首先应以生产发展底规律，应以社会经济发展底规律为出发点。

(丙)生产底第二个特点就在生产底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底变更和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底变更和发展上开始。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起初是社会底生产力发生变更和发展起来，然后，人们底生产关系，人们底经济关系也依赖于这些变更并与这些变更相适应而发生变更。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到生产力底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虽然是依赖于生产力底发展而发展，但同时它们又反转来影响到生产力，加速或延缓其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落后于生产力底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底性质及状况，并使生产力有发展余地时，生产力才能尽量发展起来。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底发展，但它们迟早总应而且一定会去适合于生产力底发展水准，适合于生产力底性质。不然，便会有生产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底根本破坏，全部生产破裂，生产危机以及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不适合的实例，它们两者间冲突的实例，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经济危机，那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和生产过程底公共性质，是和生产力底性质极不适合的。这种不适合的结果，便是使生产力陷于破坏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就是那负有使命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并建立起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底经济基础。

反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实例，便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过程底公共性质是完全适合的，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生产

发展过程中决定的要素。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也就应怎样。

生产力底状况所回答的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问题,而生产关系底状况所回答的则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是由全社会支配,这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

以下便是从古代到今日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由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并与此相适应而由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由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口锄等等),并与此相适应而过渡到种植植物,过渡到农业;金属的制造工具继续改良,过渡到冶铁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并与此相适应而有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的分立,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手工业工场生产的发展;由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再进而过渡到机器制,以及现代机器化工业的出现,——这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致而远不完备的情景。同时,生产工具底发展和改善当然是由参加生产的人们所实现,而不是与人们无关,所以,由于生产工具底变更和发展,人们,即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原素,也随着变更和发展起来,他们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更和发展起来。

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变更和发展,于是人们底生产关系,人们底经济关系,也与此适应而变更和发展。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底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相合的。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

弓箭，使人绝对不能单身去和自然界势力及猛兽作斗争。人们当时为要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获鱼类，建筑某种住所，便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便会饿死，便会成为猛兽或邻近部落底牺牲品。公共的劳动也就引起了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以防御猛兽的生产工具是归个人所有。这里并没有什么剥削，也没有什么阶级。

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底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这样的生产关系在基本上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合的。此时人们所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此时所有的已不是那种不知畜牧业为何物，也不知农业为何物的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而是已经出现了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彼此间的分工；此时已有可能在各个人间和各部落间交换产品，已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且真正把生产资料积累于少数人手中，已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把这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已不是社会中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地和自由地劳动，而是由那些被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所剥削的奴隶们底强迫劳动占主要地位。因此也就没有了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的公有制。它已被私有制所替代了。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主。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制度底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底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封建主虽已不能屠杀，但仍可以买卖的农奴。当时除封建所有制外，还存在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制。这样的生产关系在基本上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合的。资

铁和制铁工作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车的散布；农业，园圃业，酿酒业和制油业的继续发展；与手工业作坊并存的手工业工场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底特征。

新的生产力所需要的是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自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觉兴趣的生产者。因此，封建主就把奴隶抛弃，因为奴隶是对劳动不感兴趣和完全没有自动性的工作者；而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私有制在这里已经继续发展了。剥削几乎仍如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阶级斗争，便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特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底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时这里已经没有了私自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因为雇佣工人已免除了人格上的依赖，但他们却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他们为要不致饿死，便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并忍受繁重的剥削。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外，还存在有免除了农奴制依赖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这种私有制在第一个时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企业已由机器化的大工厂所代替了。用农民粗笨生产工具耕作的贵族地产，已由根据农艺学经营和使用农业机械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代替了。

新的生产力所需要的是比闭塞无知的农奴们文化些，伶俐些，能够懂得机器并正确使用机器的生产工作者。因此，资本家宁愿利用免除了农奴制羁绊而有相当文化程度来正确使用机器的雇佣工人。

可是，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规模的时候，便陷入它自

己所不能解决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并减低着商品价格，便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小私有主和中等私有主陷于破产，把他们变成无产者，减低他们的购买力，因而就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便使生产过程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因而破坏了自己本身的基础，因为生产过程底公共性质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资本主义私人性的，即与生产过程底公共性质势不两立的所有制。

生产力性质与生产关系间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暴露于周期的生产过剩危机中，此时资本家因他本身使广大民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便不得不烧毁生产品，消灭已制成的商品，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此时千百万民众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出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复与社会生产力状况相适合，而是已与社会生产力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成熟着革命，其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就是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底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此刻还只实现于苏联的这个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底基础。这里已没有什么剥削者，也没有什么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物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来按劳动分配的。这里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关系底特征，乃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们间同志的合作和社会主义的互助。这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完全相合，因为生产过程底公共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也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周期的生

产过剩危机,以及与此危机相联结的荒谬现象。

因此,生产力在这里是加速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余地。

这就是人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景。

这就是生产关系发展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首先是对于生产工具发展的依赖性,而因为有这种依赖性,所以生产力底变更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与此相适应的变更和发展。

马克思说:

“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其萌芽形式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所独具的特征,所以佛兰格林说人类是制造动物的动物。劳动资料底遗骸对于研究已经消亡的诸社会经济形态,也如动物骨骼底遗骸结构对于研究已消亡的诸种动物底躯体组织一样,有极重要的意义。各个经济时代所由以区别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底尺度,并且是劳动在其中实现的社会关系底指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二一页,一九三五年版)。

其次:

“社会关系是和生产力密切联结的。人们既获得了新的生产力,便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底改变,即本身生活保证方式底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所有一切社会关系。手力的磨坊产生了以绪则连(即封建主。——编者注)为首的社会;蒸汽力的磨坊产生了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恩全集》。第五卷,第三六四页)。

“生产力增长底运动,社会关系底破坏以及思想底产生都是毫不间断地发生着,不动的只是运动底抽象”(同上,第三六四页)。

恩格斯在解释《共产党宣言》内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

*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生产工具而言。——编者注。

说道：

“每一历史时代底经济生产以及必然从它发生的社会结构，便是这时代的政治和思想历史底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是——自从原始公社的土地占有制瓦解时起——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阶段上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被支配阶级与统治阶级间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斗争现今所达到的阶段上，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为要摆脱掉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已非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以及阶级斗争不可了…”（恩格斯为《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

（丁）生产底第三个特点就在新的生产力以及与其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产生的过程，并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发生，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不是由于人们有意自觉活动底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和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定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新辈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已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所工作的结果，因此这新辈人在最初一个时候，应当接受他们在生产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应当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善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要素时，不会觉悟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善将会引起怎样一种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当原始公社社会中某些社员逐渐地摸索式地由石器过渡到铁制工具时，他们当然不知道，当然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一种社会结果；他们并没有了解到，没有意识到，由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是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制度，——当时

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当欧洲年轻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造巨大手工工场企业，以与细小行业作坊并列，因而推进社会生产力时，它当然不知道，当然没有想到它这种革新办法会引起怎样一种社会结果；它并没有意识到，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办法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合，结果会发生一个要把它当时所十分感戴的王室政权以及它的优秀代表所往往梦想侧身其间的贵族都一概推翻的革命，——当时它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成本费，更多拿些商品到亚洲市场以及刚才发现的美洲市场去销售，借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当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丝毫不触动沙皇制度，而听凭地主们宰制农民时，他们当然不知道，当然没有想到生产力这种严重的增长会引起怎样一种社会结果；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没有了解到，这个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发生的严重跃进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合，结果会使无产阶级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端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家并从国民经济中吸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

因此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底社会生产中(即是在生产为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中。——编者注)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页)。

* 着重点是编者加的。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底变更以及由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地进行，而不经什么冲突，不经什么震动。恰巧相反，这样的过渡通常是表现于用革命手段来推翻旧生产关系而奠定新生产关系。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更，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而自发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当新生产力已经成熟时，现存的生产关系及其体现者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了“不可克服的”，只有经过新阶级自觉活动，只有经过新阶级强力行动，只有经过革命才可扫除的障碍。这里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应该用强力把旧生产关系消灭掉的那些新社会思想，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权底伟大作用。在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底新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的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军队，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去用强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而奠定新秩序。于是，自发的过程就让位于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就让位于强力的变革，进化就让位于革命。

马克思说：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团结成为阶级…它借实现革命而把自己变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资格去用强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一九三八年版，第五二页）。

其次：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于国家手里，集中于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量迅速地增加全部生产力”（同上，第五〇页）。

“强力是每一个旧社会在怀孕着新社会时的产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六〇三页，一九三五年版）。

以下便是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为他那部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底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底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底总和就组成社会底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物所借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质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底意识决定人们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们底社会存在决定人们底意识。社会底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物中也就迟或速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经济生产条件方面所发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学精确眼光指明出来的物质变革,去与人们所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术的或哲学的形式,——简言之,思想形式,——分别清楚。正如我们评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揣度为根据一样,我们评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恰巧相反,这个意识正须从物质生活底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现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释,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会抱定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因为我们仔细去看时总可看出,

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九至二七〇页）。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底基本特征。

由此就可看出，列宁打退修正派和变节者谋害的企图时该是为党保持了怎样巨大的理论财富，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出现该是在我党发展史中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

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党组织在反动年代进行工作，要比过去革命开展时期困难得多。党员人数锐减了。党内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特别是知识份子，都因害怕沙皇政府迫害而相继离开了党。

列宁指明，革命政党在这样的時候，应当补习一下。在革命高涨时期，它们已学习过怎样实行进攻；在反动时期，它们应当学习怎样正确实行退却，怎样传入秘密状态，怎样保存和巩固秘密党，怎样利用公开机会，怎样利用各种合法组织，特别是利用合法群众组织来巩固自己与群众的联系。

孟什维克是张皇退却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他们可耻地背弃了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底革命口号，想把无产阶级底革命秘密党取消，想把它消灭。这样的孟什维克就被称呼为取消派。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相反，深信最近几年就会有新的革命高潮到来，认为党必须准备群众去迎接这一高潮。革命底基本任务还没有解决。农民还没有获得地主土地，工人还没有获得八小时工作制，人民深恶痛绝的沙皇专制制度还没有推翻，而且这个沙皇专制制度现在又把人民在一九〇五年从它手里争得的一点点政

治自由都毁灭掉了。所以，一九〇五年革命所由发生的种种原因仍然有效。因此，布尔什维克确信革命运动定会重新高涨，并极力准备去迎接这一高潮，努力聚集着工人阶级的力量。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确信革命新高潮必然到来，还因为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已学会用群众革命斗争手段争取本身应有的权利。在资本实行进攻的反动年代，工人决不会忘记他们在一九〇五年所受到的这些教训。列宁当时引证了各地工人写来的信，信上叙述到厂主又在虐待侮辱工人诸事实时说道：“你们等一等吧，一九〇五年又会到来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政治目标，仍如一九〇五年一样，是要推翻沙皇制度，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贯彻到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过这种目标，而是继续在群众面前提出基本的革命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施行八小时工作制。

可是，此时党底策略已不能仍如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涨时期那样了。例如，党决不能在最近时间号召群众举行总政治罢工或武装起义，因为此时革命运动已经低落，工人阶级已非常疲惫，反动阶级已大大加强。党不能不顾到新的环境。必须用防守策略，即用聚集力量，使干部转到秘密状态，从秘密状态下进行党的工作，配合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人团体内工作的这个策略，来代替进攻策略。

而布尔什维克也就很灵巧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我们善于在革命以前工作了多年。无怪乎人们称我们为坚如铁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成了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袭击遭受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列宁当时这样写道（《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二六页）（注五二）。

布尔什维克为保持和巩固秘密党组织而努力奋斗。但同时布尔什维克又认为必须利用一切公开机会，利用一切公开连环来维

持和保存党与群众的联系，藉以加强党本身的力量。

“当时我们党由反沙皇制度的公开革命斗争转上迂回斗争道路，转到利用一切公开机会，从保险社起，至杜马讲坛止。这是我们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被击破以后实行退却的时期。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必须运用新的斗争方式来聚集力量，然后再去进行反沙皇制度的公开革命斗争”（斯大林语，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录》，一九三五年版，第三六六至三六七页）。

当时保全下来的合法组织就像是秘密党组织的掩护物，是党保持自己与群众联系的工具。布尔什维克为保持与群众的联系而利用了职工会及其他各种合法社会团体：疾病保险社，工人合作社，俱乐部，文化团体及民众会所等。布尔什维克利用国家杜马讲坛来揭露沙皇政府底政策，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并把农民吸收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也正因为党保存了本身的秘密组织，并且经过这种组织领导了其他各种政治工作形式，所以党始终能实现党的正确路钱，并准备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布尔什维克实现其革命路线的时候，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时反对党内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既反对公开反党的取消派，又反对暗中反党的所谓召回派。

自从取消派这一机会主义派开始出现时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同取消派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列宁指出，取消派是自由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办。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黎召集第五次（全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列宁提议指斥了取消派，即指斥了党内一部分知识份子（孟什维克），因为他们企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而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底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的涣散团体”（《联共（布）决议案汇集》，卷上，第一二八页）。

代表会议号召全党一切组织去坚决反对取消派的企图。

可是,孟什维克没有服从代表会议底这一决议,却一天天滚到取消派的立场,滚上背叛革命而与立宪民主党人接近的道路。孟什维克日益公开抛弃无产阶级党底革命纲领,抛弃成立民主共和国,施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孟什维克想以抛弃党底纲领和策略为代价,换得沙皇政府让公开合法冒牌“工人”党存在的允许。孟什维克决定去同斯托雷平政制妥协,迁就斯托雷平政制。所以取消派又被称呼为“斯托雷平工党”。

布尔什维克一方面既与公开反对革命的份子,与这些由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颇特列索夫等人领导,并获得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及其他孟什维克份子帮助的取消派份子斗争,另一方面又与暗藏的取消派份子,与这些用“左的”辞句掩盖着机会主义面目的召回派份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被称为召回派的是先前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他们要求把国家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召回,并主张根本停止在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

一九〇八年,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由此就有“召回派”这一名称。召回派组织了自己的单独团体(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新斯基,波克罗夫斯基和布伯诺夫等人),开始来进行反对列宁及列宁路线的斗争。召回派坚决拒绝在工会及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这样,他们就使工人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召回派使党脱离工人阶级,使党丧失其与非党群众的联系,想在秘密组织里闭关自守,并使秘密组织受到打击,因为他们使秘密组织失去利用合法掩护物的机会。召回派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里和经过国家杜马可以影响农民,揭破沙皇政府底政策,揭破立宪民主党人用欺骗手段引诱农民的政策。召回派妨碍了党聚集力量去迎接新革命高潮的工作。所以,召回派是“变相的取消派”,因为他们力图取消利用合法团体的机会,并且事实上拒绝对广大非党群众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拒绝革命工作。

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编辑部一九〇九年为讨论召回派行动而召集的编委扩大会议，指斥了召回派。布尔什维克声明他们和召回派毫不相干，并实行把召回派从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开除出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都不过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在无产阶级遇到困难时，取消派和召回派就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四）布尔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反党的 八月联盟。

当布尔什维克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坚定路线的时候，托洛茨基却拥护取消派孟什维克。正是在这些年代，列宁称他为“犹达施卡、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奥地利）成立了一个著作团体，创办了一个“非派别组织性的”，其实是孟什维克的报纸。当时列宁论到托洛茨基时写道：“托洛茨基底行为表现他是个最卑劣的野心家和派别组织者…口头上空谈什么党，而行为上却比其他一切派别组织者更坏”。

后来，在一九一二年间，托洛茨基组织了八月联盟，这是所有一切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和派别所结成的一个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联盟。取消派和召回派共同加入了这个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于是就证明他们是同类的东西。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份子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采取了取消主义立场。可是，托洛茨基却用中派主义，即用调和主义把自己的取消主义立场掩饰起来，硬说他是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外，仿佛是想使他们双方互相调解。列宁论到这点时说道，托洛茨基比公开的取消派更卑劣，更有害，因为他欺骗工人，说他是站在“派别组织以外”，其实他是完全拥护取消派孟什维克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培植中派主义的主要集团。

“中派主义，——斯大林同志写道，——是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迁就主义的思想体系，是要在一个共同党内使无产阶

级利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是列宁主义所根本歧视,根本嫌恶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九版,第三七九页)。

在这个时期,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事实上是托洛茨基暗藏的代办,因为他们常常帮助他反对列宁。一九一〇年一月,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及其他暗藏的托洛茨基同盟者帮助下,违反列宁意旨而召集了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会成份因有许多布尔什维克被捕而发生了变更,于是动摇份子就利用机会来通过了反对列宁的决议。例如,在这次全会上竟决定把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实行封闭,并拨款帮助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加米涅夫加入了托洛茨基报纸底编辑部,并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力图把托洛茨基底报纸变成中央机关报。

只是由于列宁力争的结果,中央一月全会才通过了申斥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决议,但在这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坚持了托洛茨基底主张,即反对叫出取消派底真实名字。

结果就是如列宁所预察和预告过的那样:只有布尔什维克才遵照中央全会决议把自己的《无产者》报实行封闭,而孟什维克则继续刊行着他们那个派别组织的取消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斯大林同志完全拥护列宁立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专文。在这篇文章中申斥了托洛茨基帮手们底行为,并认为必须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及李可夫用叛变行动在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中所造成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消灭。同时在该文中又提出了后来由普拉加代表会议实现了的迫切任务:召集全党代表会议,在俄国出版合法的党报和成立领导实际工作的秘密的党中央局。斯大林同志底这篇论文是根据巴库委员会完全拥护列宁主张的决议写成的。

当时为了要同完全由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份子起,以至召回派

和造神派止的反党份子组成的托洛茨基八月反党联盟相对抗，便成立了由主张保全和巩固秘密无产阶级政党者组成的护党联盟。参加这个联盟的有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所领导的少数孟什维克护党份子。普列汉诺夫及其孟什维克护党派，虽对许多问题仍旧持着孟什维克立场，但却坚决表示与八月联盟及取消派意见不合，并力求与布尔什维克成立妥协。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底提议，并实行去与普列汉诺夫成立共同反对反党份子的暂时联盟，因为他认为这种联盟是于党有益，而对取消派有致命危险的。

斯大林同志完全拥护这个联盟。他当时是在流放所。斯大林同志从流放所写信给列宁说：

“据我的意见，联盟（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结成的联盟）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第一，这条路线，并且也只有这条路线，才与俄国工作底真正利益相合，因为这种利益要求把一切真正党性份子团结起来；第二，这条路线，并且也只有这条路线，才能促使合法组织摆脱取消派的压迫，把工人孟克^①和取消派彼此完全隔开，并把取消派驱散，把他们歼灭”（《列宁与斯大林文集》，第一卷，第五二九至五三〇页）。

布尔什维克因巧妙配合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而终于成了公开工人组织中的严重力量。例如，布尔什维克在参加当时公开召集的四个代表大会，即民众大学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工厂医生代表大会和戒酒运动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团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公开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获得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例如，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团在民众大学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揭露了沙皇制度摧残一切文化活动的政策，并指出，俄国不把沙皇制度推翻，就绝对不能有真正的文化高

① 孟克是孟什维克之简称。——编者注。

涨。工人代表团在工厂医生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叙述了工人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并得出结论说,不推翻沙皇制度,便不能认真举办工厂卫生事业。

布尔什维克把取消派从那些保全下来的合法组织中渐渐排挤出去。由于实行同普列汉诺夫护党集团成立统一战线的这种特殊策略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夺得了许多工人孟什维克组织(如在维尔格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等等)。

在这个困难时期,布尔什维克作出了适当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模范。

(五)一九一二年召集的普拉加党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马克思主义政党。

布尔什维克与取消派召回派进行斗争,以及与托洛茨基份子进行斗争时,面临到一个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全体布尔什维克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将其正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所以绝对必须这样作,不仅是因为必须把党内分裂工人阶级的一切机会主义派别铲除,而且还因为必须把聚集工人阶级力量的事业贯彻到底,准备工人阶级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可是,为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就必须把机会主义份子,把孟什维克清除出党。

此时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谁都认定布尔什维克绝对不能继续同孟什维克留在一个党里。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所表现的叛变行为,他们企图取消无产阶级政党而组织一个改良主义新政党的立场,已使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决裂成了必不可免的事情。当布尔什维克还同孟什维克留在一个党里时,他们对孟什维克底行为总归要担负一种精神上的责任。可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如不甘愿叛变党和工人阶级,就绝对不能再替孟什维克底公开叛变行为担负任何精神上的责任。所以,在一个党底范围内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就无异是叛变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因此,布尔什维克必

须把他们和孟什维克事实上的决裂贯彻到底，一直做到在组织上和他們正式决裂，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

只有这样作法，才能重新建立具有统一纲领，统一策略，统一阶级组织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

只有这样作法，才能把已被孟什维克破坏的党内真正统一（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奠定起来。

布尔什维克当时准备召集的第六次全党代表会议正应实现这个任务。

但这个任务还只是事情的一面。同孟什维克正式决裂，把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一个独立政党，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还摆着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当时的任务不仅是要同孟什维克实行决裂而正式形成为一个独立政党，并且首先是要在同孟什维克实行决裂后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即建立一个根本与西欧普通社会民主党不同，不容有机会主义份子插足，而能引导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新式的政党。

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所有一切孟什维克，不分色彩，从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丁诺夫起，到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止，都一贯运用着他们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武库中借来的武器。他们希望在俄国也有一个例如好像德国或法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他们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布尔什维克是个新的，非寻常的，异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当时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究竟是种什么东西呢？他们是种混合物，其中既包含有马克思主义份子，也包含有机会主义份子；既包含有革命之友，也包含有革命之敌；既包含有拥护党性的人，也包含有反对党性的人，并且前者在思想上一天天同后者调和，前者在事实上一天天向后者屈服。为什么要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要同革命叛徒调和呢？——布尔什维克向西欧社会民主党人问道。是为了“党内和平”，是为了“统一”，——他们这样回答布尔什维克说。是同谁统一呢，是同

机会主义者统一么？是呀，正是同机会主义者统一，——他们这样回答说。很明显的，这样的党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布尔什维克不能看不见，自恩格斯逝世时起，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已开始由一种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蜕化成为一种主张“社会改良”的政党，其中每一个党，作为一个组织来说，都由领导的力量变成了自己国会党团底附属品。

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知道，这样的党只能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这样的党决不能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

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政党，而是另一种政党，即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亦即对机会主义者取不调和态度，对资产阶级取革命态度，团结坚强，组织统一，主张社会革命，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布尔什维克想在俄国建立的正是这样的，新的政党。而布尔什维克也就实行来建设这样的政党，实行来准备这样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反对“经济派”，反对孟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份子，反对召回派，反对各种各样唯心主义者直至经验批判主义者为止的全部斗争史，也就是为准备建立这样一个政党而努力的历史。布尔什维克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可供一切想有真正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们效法的政党。布尔什维克从旧《火星》报时期起，就已开始来准备建立这样的党了。他们坚持到底，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地准备了这样一个党。在这一准备工作中起了基本和决定作用的，是列宁所著《做什么？》，两个策略等这样的著作。列宁所著《做什么？》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思想上的准备。列宁所著《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组织上的准备。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准备。最后，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准备。

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政治团体，是像

布尔什维克团体这样准备得深刻彻底形成为一个政党的。

所以，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一个党，乃是一件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的，完全成熟了的事情。

第六次党代表会议底任务，就是要以驱逐孟什维克而宣告布尔什维克新政党正式形成的手续来成就这件已经准备好了的事情。

第六次全俄党代表会议，是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在普拉加召集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党组织底代表。因此，它在形式上也可以说是一次党代表大会。

在代表会议的通告中报导了原被破坏的党中央机关已经恢复，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的消息之后，指出反动年代是党从俄国社会民主派形成为一定组织以来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年代。虽然遭受过极严厉的压迫，虽然受到过外来的严重打击，虽然党内有过机会主义者底叛变和动摇，但无产阶级党终究保全了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组织。

“保全下来的不仅有俄国社会民主党底旗帜及其纲领和革命训条；保全下来的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党底组织，压迫手段虽能破坏和削弱这个组织，但任何压迫手段都不能把它消灭”，——在代表会议通告中这样说道。

代表会议指出了俄国工人运动开始重新高涨的征候，指出了党工作正在活跃起来的事实。

代表会议讨论了各地方代表底报告以后指出：“在所有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工人中间，都在努力进行巩固地方秘密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团体的工作”。

代表会议指出，在所有各个地方组织方面，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在退却时期所采取策略底主要原则——把秘密的工作与党在各种合法工人团体中进行的公开工作配合起来的原则。

普拉加代表会议选出了党底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当选为

中央委员的有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斯泮达梁等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两同志是在本人缺席时被选进中央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流放所。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加里宁同志。

当时成立了领导俄国实际革命工作的中央机关(俄国中央局),由斯大林同志负责主持。在俄国中央局中,除斯大林同志外还有斯维尔德洛夫,斯泮达梁,奥尔忠尼启则和加里宁等同志参加。

普拉加代表会议把布尔什维克过去反对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作了一个总结,并决议将孟什维克驱逐出党。

普拉加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之后,就正式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独立存在的事实。

布尔什维克既已在思想上组织上击溃了孟什维克。既已把他们驱逐出党,就给自己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旧有的党的旗帜。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止,都继续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加有一个写在圆括弧内的添注:“布尔什维克”。

一九一二年初,列宁在致高尔基的信中论到普拉加代表会议工作总结时写道:

“不管取消派混蛋们怎样捣乱,我们终于把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恢复成功了。我想你对此是会和我们同声称快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九页)。

斯大林同志估计普拉加代表会议底意义时说道:

“这次代表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间划定了一条界限,并把全国各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统一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录》,第三六一至三六二页)。

自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而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一个独立政党时起,布尔什维克党已是更坚强更有力了。党是靠清除自身中间的

机会主义份子而巩固起来的，——这就是根本与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新型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底口号之一。第二国际各国党口头上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事实上却容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即公开的机会主义者留在本队伍中间，让他们来瓦解戕害第二国际。反之，布尔什维克却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从无产阶级党内清除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结果便创立了新型的党，列宁的党，即后来争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如果在无产阶级党队伍里留下了机会主义份子，那布尔什维克党就会不能走上康庄大道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就会不能争得政权和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就会不能成为国内战争的胜利者，就会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

普拉加代表会议在其决议中提出了如下的最低限度纲领作为党底当前主要政治口号：成立民主共和国，施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地主土地。

在这些口号下，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他们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时进行的选举运动。

在这些口号下，生长了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工人群众革命运动底新高潮。

简短的结论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时期，是革命工作条件最困难的时期。在革命失败以后，当革命运动陷于低落和群众感到疲乏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从直接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转到用迂回手段进行这一斗争。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的艰苦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为保持自己与群众的联系而利用着甚至极小的公开机会（从保险社和职工会起，至杜马讲坛为止）。布尔什维克始终不倦地聚集着力量去迎接革命运动底新高涨。

在革命遭了失败，反政府派别分崩离析，脱党知识份子（波格

丹诺夫,巴查罗夫等人)对革命失望并对我党理论基础加紧贯行修正主义袭击的艰难困苦环境中,布尔什维克表现自己是党内唯一的力量,只有他们才没有卷起党的旗帜,仍旧保持着确遵党纲的态度,而把那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们底攻击尽行击退(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正因为具有马列主义的思想锻炼,正因为对革命前途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团结在列宁周围的布尔什维克基本干部终能保持住党及其革命原则。“无怪乎人们称我们为坚如铁石的人”,——列宁这样评论布尔什维克道。

孟什维克在这个时期愈益离开革命。他们堕落成为取消派,要求取消,即要求消灭革命无产阶级秘密党,愈益公开抛弃党底纲领,抛弃党底革命任务和口号,企图组织一个单独的改良主义党,即工人所称的“斯托雷平工党”。托洛茨基拥护取消派,虚假地用“党内统一”口号来掩饰自己,事实上主张同取消派维持统一。

另一方面,又有一部份布尔什维克不了解当时必须采取新的迂回的手段去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却要求党拒绝利用公开机会,要求党召回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召回派硬要党去与群众脱离,妨碍党聚集力量去迎接新革命高潮。召回派用“左的”辞句来掩饰自己,其实他们也和取消派一样拒绝进行革命斗争。

取消派和召回派结合成为一个反对列宁的联盟,即由托洛茨基组织起来的八月联盟。

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取消派及召回派的斗争中,在反对八月联盟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并顺利地捍卫着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变,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普拉加举行的代表会议(一九一二年一月)。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实行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永远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联合在一个党内的局面。布尔什维克由一个政治集团形成成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普拉加代表会议创立了新型的党,列宁主义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

普拉加代表会议实行把机会主义者，把孟什维克从无产阶级党里清除出去，是对于党和革命后来全部发展都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假如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把叛变工人事业的孟什维克妥协主义份子驱逐出党，那无产阶级党在一九一七年就会不能发动群众去争取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时期)

(一)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革命运动的高涨。

斯托雷平反动得胜奏捷,为时并不长久。一个除了刑棍绞架而外,可也不愿给人民任何东西的政府,本来是不能稳固的。高压手段已成为家常便饭,再也不能恐吓人民了。工人在革命失败后头几年里所发生的疲倦心理,已在消失下去。工人群众又重新奋起斗争。布尔什维克断定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预见已被证实。一九一一年罢工人数超过十万以上,而在过去几年内每年罢工人数却不过五六万人。一九一二年一月举行的普拉加党代表会议,已指出工人运动开始复兴的事实。但革命运动底真正高涨,却直到一九一二年四五月间才开始发生,当时连拿工人惨遭枪杀的事件激起了广阔的政治罢工浪潮。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连拿(地在西伯和亚)金矿工人举行罢工,沙皇宪兵官下令开枪,工人死伤者有五百名以上。一群手无寸铁,和和平前去与经理处进行谈判的连拿矿工遭受枪击的消息,立刻激动了全国。沙皇专制政府干出这次新的流血罪行,完全是为了取悦于连拿金矿公司老板英国资本家,以图打破矿工经济罢工。英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俄国股东靠极无耻剥削工人而从连拿金矿中取得骇人听闻的利润,——每年在七百万卢布以上。他们只付给工人极低微的工资,他们供给工人恶劣腐烂的食品。连拿金矿公司中的六千矿工因忍受不住这种欺压凌辱,便宣布罢工了。

连拿惨案发生后，无产阶级立刻在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各工业中心和工业区域用群众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来表示抗议。

“我们闻讯，惊愕万分，心肝俱裂，一时竟找不到相当的言词来表示。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抗议，都不能表明我们每个人心热血沸腾情况于万一。不论是眼泪或抗议，都帮助不了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有几个企业中的工人在共同通过的决议上这样写道。

当沙皇大臣马卡洛夫在国家杜马中回答社会民主党党团对连拿惨案所提出的质问而横蛮声言，说“从前如此，将来也会如此！”的时候，工人群众底怒潮更加汹涌了。参加抗议连拿工人流血惨案政治罢工的人数，增到了三十万人之多。

连拿事件有如飓风一般，吹散了斯托雷平政制所造成的“静寂”空气。

斯大林同志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明星报上论到这点时写道：

“连拿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民群运动底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现存政制中的一切弊端祸害，艰苦备尝的俄罗斯所遭受的一切苦痛，都集合到了一件事事实上，即集合到了连拿事件上。正因为如此，所以恰巧连拿的枪声便成了罢工和示威运动底信号”。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份子企图埋葬革命，竟是枉费心机。连拿事件证明革命势力仍然活着，工人阶级中积聚有巨量的革命精力。一九一二年五一罢工有四十万左右工人参加，罢工带有很鲜明的政治性质，完全是在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即成立民主共和国，施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些基本口号是要把广大工人群众以及农民和兵士群众一致团结起来，以使用革命手段同专制制度实行进攻。

“全俄无产阶级所举行的轰轰烈烈的五月罢工，以及与之相连

的游行示威,革命宣言和在工人大众面前的革命演说,都显然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涨的时期”,——列宁在《革命高涨》一文中这样写道(《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五三三页)(注五三)。

取消派被工人群众底革命行动弄得惊惶失措,公然出而反对罢工斗争,骂它为“罢工的狂热”。取消派及其同盟者托洛茨基竟想用“请愿运动”来代替无产阶级底革命斗争。他们劝工人在呼吁“权利”(取消对结社罢工等等的限制)的“请愿书”上签名,然后递给国家杜马。但取消派所募得的只有一千三百个人的签名,而团结到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周围的却有数十万工人。

工人阶级是循着布尔什维克所指示的道路行进的。

当时的国内经济情形如下。

一九一〇年间,工业停滞已经终止,在基本工业部门方面已呈现出生产上的活跃,生产范围的扩大。生铁熔铸量在一九一〇年等于一万八千六百万普特,一九一二年等于二万五千六百万普特,而在一九一三年则已增至二万八千三百万普特。石煤开采量在一九一〇年等于十五万二千二百万普特,而在一九一三年间则已等于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万普特了。

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无产阶级人数也跟着迅速增加起来。当时工业发展底特点,就是生产更加集中于大企业和最大企业。一九〇一年,在有五百名以上工人的大企业里作工的人数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四六.七,而一九一〇年在这样的企业里作工的人数却已等于工人总数百分之五四,即占全体工人一半以上。这样的工业集中速度是空前的。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当时大企业中作工的人数也仅只占全体工人三分之一左右。

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和集中于大企业,既在具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发生,便使俄国工人阶级变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力量。企业中对工人实行的野蛮剥削方式,再加上沙皇卫兵施行的不堪忍受的警察高压制度,就使每次严

重的罢工都含有政治性质。同时，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又使群众罢工具有特别巨大的革命力量。

在工人革命运动前头行进的是彼得堡英勇无产阶级，继彼得堡之后的是波罗的海沿岸边区、莫斯科城和莫斯科州，再其次便是窝尔加河沿岸和南俄各区。一九一三年间，运动已普及到西部边区，波兰和高加索。一九一二年罢工人数，据官方统计是七十二万五千人，而据其他比较完备的统计，则在百万以上；一九一三年罢工人数，据官方统计是八十六万一千人，而据比较完备的统计，则为一百二十七万二千人。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已达一百五十万左右。

这样，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的革命高涨，罢工运动大规模的发展，已使全国接近于一九〇五年革命开始时的局势了。

无产阶级底革命群众罢工运动有了全民的意义。它的目标是在反对专制制度。罢工斗争得到了劳动民众绝大多数底同情。工厂主用歇业手段来报复工人罢工。一九一三年间，莫斯科州内资本家开除了五万纺织工人。一九一四年三月间，彼得堡在一天以内就有七万工人被开除工作。其他企业及其他工业部门中的工人群众用纷纷募捐手段，有时并实行同情罢工来援助罢工及受到歇业抵制的工友。

工人运动高潮和群众罢工把农民群众也唤醒起来加入斗争了。农民重新奋起斗争反对地主，捣毁地主的庄园和富农的田庄。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间，一共爆发过一万三千次以上的农民发动。

军队中间的革命发动也开始了。一九一二年在七尔克斯坦驻军中爆发了武装发动。在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塞瓦斯托坡里军港中酝酿着水兵起义。

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革命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证明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是为了局部的要求，不是为了“改良”，而是为了要

把人民从沙皇制度下解放出来。新的革命显然已经逼近了。

列宁为了更接近于俄国国境,乃于一九一二年夏季从巴黎移居加里细亚(前属奥地利)。这里由列宁主席开过中央委员和负责工作人员两次联席会议:一次是于一九一二年末在克拉科夫城举行,另一次是一九一三年秋在克拉科夫城附近坡罗宁诺镇上举行。在这两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工人运动各项重大问题的决议:论革命高涨,论罢工斗争和党底任务,论巩固秘密组织,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论党刊物,论保险运动的决议。

(二)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出版的日刊《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党巩固本身组织和夺取群众影响的强大武器。它是由斯大林,阿尔敏斯基及坡列塔也夫遵照列宁指示而发起创办的。群众的工人刊物《真理》报,是随着新的革命运动高涨诞生的。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历五月五日),《真理》报第一期出版了。这真是工人的一个盛大节日。为了纪念《真理》报的诞生,于是规定每年五月五日为工人出版节。

在《真理》报创办以前,已有专供先进工人阅读的布尔什维克周报《明星》出版。《明星》报在连拿事件时期起过很大的作用。它登载过列宁和斯大林许多号召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政治论文。但在革命高涨条件下,周报已不能满足布尔什维克党底需要了。必须出版一种供极广大工人阶层阅读的群众政治日刊。《真理》报便是这样的日刊。

在这个时期,《真理》报底作用是异常重大的。它把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夺取到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来。在经常受到警察取缔,被迫缴付罚款,一登载书报检查局所不喜欢的论文和通讯便遭没收的条件下;《真理》报所以能够存在,是全靠有数万先进工人积极支持。《真理》报所以能够缴付巨额罚款,是全靠有工人群众踊跃捐

助。往往有很大一部分被没收的《真理》报仍能落到读者手中，因为先进工人半夜就来到印刷所等候，随身带出大包报纸到外面去散发。

沙皇政府在两年半内把《真理》报封禁过八次，但《真理》报在工人援助下总又用一种新的相似的名称如《拥护真理》，《真理》之路，《劳动真理》等等继续出版。

当时《真理》报每期平均销数为四万份，而孟什维克的光线日报每期销数却不过一万五六千左右。

工人群众认定《真理》报是他们自己的报纸，对它极表信任，细心听从它的呼声。每份《真理》报照例是互相传阅，供应数十个读者，养成他们的阶级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号召他们进行斗争。

《真理》报上所写的是什么呢？

每期《真理》报上都刊载有数十篇工人通讯，其中所记述的是工人生活困苦，工人遭受残酷剥削，资本家及其经理和工头们欺侮工人的种种事实。这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一针见血的尖刻的揭露。在《真理》报上所载的述评中，往往传用忍饥受饿的失业工人因根本无法找到工作而自杀的消息。

《真理》报上经常论到各个工厂和各个工业部门工人底疾苦和要求，记述着工人争取本身要求的情形。几乎每期都讲到各企业中的罢工斗争。凡遇有大规模的长期的罢工发生时，《真理》报便在其他各企业和其他各工业部门的工人中募捐援助罢工工友。募得的罢工基金常达数万卢布，——这在当时要算是很大的数目，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每天只能领七八十个哥比的工资。这种办法在工人群众中养成了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使他们认识到全体工人利益的一致。

每逢有政治事件发生，每逢获得胜利或遭受失败时，各地工人总是写信，送贺词或抗议书到真理报上发表来表示回答。《真理》

报在自己的论文中,根据激底的布尔什维克立场指明工人运动底任务。当时公开刊行的报纸是不能直接号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必须用暗示方法来写述,但觉悟的工人很能了解这种暗示,并把这种暗示解释给群众听。例如,真理报上写到“一九〇五年毫不截短的要求”时,工人们就懂得这里所说的是布尔什维克底革命口号,即推翻沙皇制度,成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施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

《真理》报在第四届杜马选举前夜组织了先进工人。它揭露了孟什维克主张去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主张成立“斯托雷平工党”的叛变立场。《真理》报号召工人投票拥护坚持“一九〇五年毫不截短的要求”的人,即拥护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选举是多级的。首先由工人大会选出初选代表,再由初选代表选出复选代表,只有这种复选代表才能参加杜马工人代表的选举。在实行选举的那天,《真理》报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复选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号召工人投票选举他们。为了免除预定候选人被捕的危险,这种名单是不能预先公布的。

《真理》报帮助了组织无产阶级发动的工作。当一九一四年春彼得堡许多厂主实行大规模歇业抵制,致使工人不宜于实行群众罢工的时候,《真理》报就号召工人采取别种斗争方式,例如在工厂中召集群众大会,在街道上举行示威。当时在报纸上不能公开写明这点。但觉悟的工人能了解这种号召,因为他们读到了列宁用论工人运动方式这一寻常题目所写的一篇论文,说目前必须用工人运动底更高方式来代替罢工,这意思就是号召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

布尔什维克底革命秘密活动与经过《真理》报所进行的公开鼓动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互相配合,就是这样实现的。

《真理》报不仅记述了工人生活,工人罢工及游行示威的情形。同时《真理》报还经常记载农民生活,农民饥饿苦况,农奴地主剥削

削农民，以及富农庄主因斯托雷平“改良”办法施行而把农民最好的土地攫为己有的事实。《真理》报向觉悟工人指明农村中积蓄有怎样多的燃烧物。《真理》报教导无产阶级说，一九〇五年革命底任务并没有解决，新的革命行将到来。《真理》报教导说，无产阶级在这第二次革命中应成为真正的人民领袖和领导者，在这次革命中将有革命农民来做它的强有力的同盟者。

孟什维克极力想使无产阶级抛弃革命念头。他们向工人鼓吹，说再不要去想什么人民，讲什么农民饥饿痛苦，讲什么黑帮农奴地主的统治，而只应去争取“结社自由”，并为此而向沙皇政府呈递“请愿书”。布尔什维克向工人解释，说孟什维克这种放弃革命，放弃与农民联合的宣传，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说要是工人能把农民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做同盟者，那就定可战胜沙皇制度；说像孟什维克这样一种恶劣的领导人，是应被当作革命敌人抛开的。

《真理》报在“农民生活栏”上写了些什么呢？

让我们从一九一三年通讯中举出几个例子来说。

从萨马拉寄来的一篇标题为“土地案子”的通讯上说：布占里玛县诺沃哈斯布拉特村有四十五个农民被控，罪名是说他们在划分村社土地给单独庄主时反抗过清丈官，大部分被控农民都被判处长期徒刑。

从普斯科夫州寄来的一篇简短通讯上说：“蒲斯茨村（离查瓦里叶车站不远）农民对乡警实行了武装反抗。有人受伤。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土地问题上的纠纷。有大队乡警已调到蒲斯茨村，代理抚台和检察长也亲自出巡了”。

从乌发州寄来的通讯上叙述了农民出卖份地的情形，并说饥荒和退出村社法使农民愈益失去土地。例如波力梭夫克村有二十七家农户，共占有五百四十三俄亩耕地。当饥荒发生时，有五户永远变卖了三十一俄亩土地，每俄亩卖价是二十五至三十三个卢布，但土地实际价格却要比这贵三四倍。同时这里又有七户抵押了一

百七十七俄亩土地，每俄亩押了十八至二十个卢布，期限六年，年息一分二厘。如果注意到居民贫困和利率极高的事实，就能确有把握地说，一百七十七俄亩土地中将有一半土地是落到高利贷者手中，因为至多也只有半数债户能在六年当中偿清这样大的一笔数目。

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一文中，很清楚地向工农群众指明有怎样多的地产握在寄生地主手中。仅仅三万个大地主就占有土地约七千万俄亩，而一千万农户总共也只有这样多的土地。每个大地主平均占有土地二千三百俄亩，而农民，连富农包括在内，每户平均不过七俄亩，其中有五百万，即占全体农户一半的贫苦农户，每户不过一至二俄亩。这些事实具体证明，农民遭受贫困和饥饿是因为有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即农奴制度残余存在，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免除这种残余。

《真理》报经过那些同乡村有来往的工人深入到乡村中去，唤起先进农民加入革命斗争。

在创办《真理》报时期，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完全操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了。但杜马党团，刊物、保险社和职工会等合法组织，却还没有完全从孟什维克手中夺取过来。为了要把工人阶级合法组织中的取消派份子驱逐出去，布尔什维克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因有《真理》报努力而胜利完成了的。

《真理》报是为保护党性，为重新建立群众工人革命政党的核心。《真理》报把合法组织团结到布尔什维克党底秘密基干组织周围，引导工人运动走向于一个确定的目标，即准备革命。

《真理》报有极多的工人通信员。它在一年内就刊载了一万一千多件工人通信。但《真理》报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并不限于写信和通讯。每天都有很多工人从企业中跑到编辑部里来访问。党内组织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真理》报编辑部里面。地方党支

部代表常在这里同领导机关接头。各个工厂里的党工作消息往往由这里接收。彼得堡党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底指令往往从这里转达。

由于布尔什维克两年半来为重建群众革命工人政党而与取消派进行坚忍斗争的结果,到一九一四年夏俄国积极工人已有五分之四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真理报派”策略的了。关于这点有如下的事实可以说明:一九一四年捐款次投助工人报纸的七千个工人团体中,有五千六百个捐助布尔什维克刊物,而捐助孟什维克刊物的却只有一千四百个团体。但孟什维克在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有很多“富足的朋友”,他们供给了孟什维克报纸所需要的大部分经费。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呼为“《真理》报派”。随着真理报成长起来的有一整代革命无产阶级,这一代人后来便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真理》报受到数万以至数十万工人的拥护。在革命高涨年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奠定了群众布尔什维克党底坚实基础,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所采取的一切压迫手段都没能把这一基础摧破。

“一九一二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一九一七年胜利底基础”(斯大林语)。

党底另一个全俄合法机关,便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一九一二年间,政府宣布举行第四届杜马选举。我们党对于参加这次选举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和真理报是全俄范围的两个基本合法据点,布尔什维克党利用这两个据点在群众中进行了自己的革命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在自己的口号下独立参加了杜马选举,同时并进地打击了各个政府党和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是在成立民主共和国,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

号下进行这次选举运动的。

第四届杜马选举是在一九一二年秋天举行。十月初，政府因对彼得堡选举进程感觉不满，便企图侵害许多大工厂中工人底选举权利。我们党彼得堡委员会为了回答政府这种企图，曾根据斯大林同志提议号召各大企业工人实行罢工一天。政府因陷于窘境而不得不表示让步，于是工人在选举大会上就有了可能来选举他们所愿意选举的人。工人绝大多数都表决赞成斯大林同志所拟定的给初选代表和杜马代表的《委托书》。在《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上，提到了一九〇五年没有解决的任务。

“…我们认为，——在委托书上说道，——俄国处在临来的广大运动前夜，这一运动也许要比一九〇五年还要深入…这一运动底先锋，也如一九〇五年一样，将是俄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受尽百般痛苦而切身要求俄国获得解放的农民，才能做它的同盟者”。

委托书上说，临来的人民发动必定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须反对沙皇政府，又须反对同沙皇制度谋妥协的自由资产阶级。

列宁对号召工人去作革命斗争的这一《委托书》深为重视。工人们纷纷通过决议来响应了这个号召。

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巴达也夫同志由彼得堡工人选举为杜马代表。

工人选举杜马代表是与其他居民阶层分开举行的(即所谓工人选民团)。工人选民团所选出的九个代表中，有六个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即巴达也夫，彼特罗夫斯基，穆拉诺夫，萨莫依洛夫，沙果夫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后来才发觉他是一个奸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是在工人居民至少占五分之四的巨大工业中心里当选的。有几个取消派的代表却不是由工人选举，即并非由工人选民团中选出。因此在杜马代表里面取消派有七个，布尔什维克只有六个。起初，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在杜马里面组成为一个共同的社会民

主党党团。但因取消派代表处处妨碍布尔什维克代表进行革命工作，所以布尔什维克代表同他们作过一番顽强斗争后，便于一九一三年十月遵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指示退出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而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单独的党团。

布尔什维克代表常在杜马里发表革命演说，抨击专制制度，向政府质问摧残工人和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事实。

他们在杜马里对土地问题也发表过演说，号召农民起来同农奴主地主作斗争，揭露反对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的立宪民主党。

布尔什维克向国家杜马提出了施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案，这个法案当然没有被黑帮杜马采纳，但它终究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布尔什维克的杜马党团始终都与党中央及列宁本人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常从列宁那里领到指示。斯大林同志在彼得堡工作时直接领导过这个党团。

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并没有局限于在杜马内部进行工作，同时他们还在杜马以外加紧努力活动，他们时常巡视各个工厂，到全国各工人中心去作报告，召集秘密会议解释党的决议，成立新的党组织。代表们很灵巧地配合了合法的活动与不合法的秘密工作。

（三）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组织中的胜利。革命运动的继续增长。帝国主义大战前夜。

在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作出了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各种形式和各种表现的模范。它建立了地下组织，印发了秘密传单，在群众中秘密进行了革命工作。同时，它又一天天夺得了工人阶级底各种合法组织。党设法争取职工会，国民会所，夜课大学，俱乐部和保险机关。这些合法组织向来是取消派份子藏身的处所。于是布尔什维克就来为把这些合法团体变成本党据点而坚决奋斗。布尔什维克因很巧妙地配合着秘密工作与合法工作，终于把两个首都中的大多数职工团体夺取过来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三年在彼得堡五金工会管委选举时获得了特别灿烂的胜利：在三

千个五金工人大会上只有一百五十人投票赞成取消派份子。

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这样一个合法组织里的情形也是如此。虽然孟什维克在杜马中有七名代表,布尔什维克只有六名,但孟什维克的七人团主要是来自非工人区域,所代表的还不到工人阶级五分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六人团则是来自国内各个主要工业中心(彼得堡,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斯特罗马,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所代表的要达全国工人阶级五分之四以上。工人认为自己的代表是六人团(巴达也夫,彼特罗夫斯基等等),而不是七人团。

布尔什维克所以能争得各种合法组织,就是因为他们不顾沙皇政府残暴迫害,不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份子造谣中伤,终能保持住秘密的党以及本身队伍中坚强的纪律,坚忍不拔地捍卫工人阶级底利益,始终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与一切工人运动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这样,布尔什维克就在合法组织中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孟什维克则在这些组织中遭到了全面的失败。无论在杜马讲台上进行的鼓动方面,亦无论在工人刊物及其他合法组织中,孟什维克都被排挤到了后面去。卷入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确定不移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而把孟什维克抛开了。

此外,孟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也遭到了破产。俄国各边区发生的革命运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民族问题纲领。但孟什维克除了崩得所提出的那个谁也不能认为满意的“文化自治”要求外,就根本没有什么纲领可言。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这个纲领详见于斯大林同志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以及列宁所著《论民族自决权》和《略论民族问题》两文。

因此,在孟什维主义遭到这样的失败之后,八月联盟便摇摇欲坠了。这个联盟原是由一些乌七八糟的份子所组成,所以它经不起布尔什维克一击,便弄得七零八落。为了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而组织起来的这个八月联盟，很快就被布尔什维克打成粉碎。首先退出这个联盟的有前进派（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等），接着退出的有拉脱维亚人，末后其余的人也流离四散了。

取消派在与布尔什维克斗争中遭受失败后，乃乞援于第二国际。于是第二国际就来帮助他们。第二国际借口“调解”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借口奠定“党内和平”，要求布尔什维克停止对取消派妥协政策进行批评。但布尔什维克是不肯调和的：他们拒绝服从机会主义第二国际底决议，根本不肯作任何让步。

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组织中获得胜利，决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偶然的。其所以不是偶然的，不仅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明确的政纲，以及在战斗中受过锻炼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其所以不是偶然的，还因为布尔什维克底胜利反映着革命高潮底增长。

革命工人运动一天天展开，普及到一批批新的城市和区域。自一九一四年到来时起，工人罢工斗争不仅没有平静下去，反而更加强烈地开展起来。罢工斗争愈益坚强持久，其所包括的工人数量也日益增多。一月九号有二十五万工人举行罢工，其中有十四万是彼得堡工人。五月一号有五十余万人举行罢工，其中彼得堡工人有二十五万以上。工人在这些罢工中表现出异常坚忍的精神。彼得堡城奥布哈夫工厂中的罢工继续了两个多月，列斯涅尔工厂中的罢工继续了三个月左右。彼得堡许多企业里大批工人中毒的事实，激起十一万五千工人实行罢工，接着又转为游行示威。运动继续升长了。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包括七月上旬在内）参加罢工的有一百四十二万五千工人。

五月间，巴库煤油工人宣布总罢工，俄国全体无产阶级都对这次罢工极为注意。罢工进行得很有组织。六月二十号在巴库有二万工人举行示威。警察用凶残手段对付巴库工人。为了抗议这种暴行并对巴库工人表示同情，于是莫斯科工人开始举行罢工，接着

其他许多区域中的工人也响应参加了。

七月三日,在彼得堡城普梯洛夫工厂中举行了响应巴库罢工的群众大会。警察向工人开枪射击。彼得堡的无产阶级义愤填胸。七月四日,彼得堡有九万工人响应彼得堡党委员会号召,举行罢工表示抗议;七月七日参加罢工的有十三万工人,七月八日有十五万工人,七月十一日有二十万工人。

所有各个工厂中的工人都是义愤填胸,到处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情形异常严重,有些地方甚至构筑过街垒。在巴库和洛兹两城也有构筑街垒的事实。在许多地方有警察向工人开枪射击。政府采取“非常”手段来镇压运动,把首都变成了军营,《真理》报被封闭了。

但此时已有帝国主义大战这样一个国际性的新因素出现,结果便把事变进程改变了。正当彼得堡七月革命事件发生的时候,法国总统彭加勒来到彼得堡,以便同沙皇谈判当前大战开始的问题。过几天后,德国就向俄国宣战了。沙皇政府利用战争机会来摧残布尔什维克组织,并镇压工人运动。革命高涨进程因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沙皇政府想在这次战争中找到逃脱革命的出路。

简短的结论

在新的革命高涨年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工人运动并在布尔什维克口号下把它引向新的革命。党巧妙地实现了秘密工作与合法工作配合的原则。党击破了取消派及其朋友托洛茨基份子和召回派底反抗,而夺得了一切合法运动形式,并把合法组织变成了自己革命工作底据点。

党与工人阶级敌人及其在工人运动里的走狗进行斗争时巩固了本身的队伍,并扩大了自己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党会广泛地利用杜马讲坛来进行革命鼓动,并创立了出色的群众的工人刊物真理报,因而造就了一整代新起的革命工人,即真理报派。这一代工

人在帝国主义大战年代仍然忠实于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底旗帜。他们后来也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的中坚。

在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党领导了工人阶级底革命发动。这种前锋战斗虽曾被帝国主义大战所打断，但它过三年后又复兴起来，而把沙皇制度推翻了。布尔什维克党是高举着飘扬招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踏进帝国主义大战这一困难阶段的。

第六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俄国第二次革命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时期)

(一)帝国主义大战的发生及其原因。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公历二十七日),沙皇政府宣布总动员。七月十九日(公历八月一日),德国向俄国宣战。

俄国加入战争了。

在战争开始很久以前,列宁,布尔什维克早已预察到战争必不可免。在几次社会党人国际代表大会上,列宁再三提议确定社会党人在战争爆发时所应采取的革命行动路线。

列宁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侣。抢劫他国领土,侵占和劫掠殖民地,夺取新市场的斗争,已经屡次引起过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战争也如剥削工人阶级一样,对资本主义国家说是一种自然和当然的事情。

尤其当资本主义已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完全发展到它的最高最后阶段,即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时候,战争更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强大的资本家联合(垄断组织)和银行已在资本主义各国生活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财政资本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主人翁。财政资本需要有新的市场,需要侵占新的殖民地,需要有输出资本的新场所,需要有新的原料出产地。

但到十九世纪末期,整个地球领土都为资本主义各国瓜分完结了。加以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是极不平衡和跃进式的:从前占第一位的国家在工业方面发展得比较慢,而从前落后的

国家却迅速跃进，赶上并超过它们。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军事上的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改变。重新分割世界的趋向相继出现。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已使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就是重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在好久以前就由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准备好了的。发动这次战争的罪人是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

特别努力准备了这次战争的一方面是德国和奥国，别方面是英法两国以及依赖于它们的俄国。一九〇七年成立了三国协约，即英法俄三国联盟。组成另一帝国主义联盟的是德奥意三国。但意国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时退出了这个联盟，随后便加入了协约。支援德奥两国的有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德国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要从英法两国手中夺去殖民地，从俄国手中夺去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区。德国建筑了巴格达铁道，威胁到英国在近东的统治权。英国害怕德国海上军备的增长。

沙皇俄国力谋瓜分土耳其，想要占据黑海通地中海的海峡（他大尼里峡），想要夺得君士坦丁堡。此外，沙皇政府还想夺得奥匈帝国的加里细亚区。

英国力图用战争把它的危险竞争者德国击破，因为战前德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日甚一日地排挤着英国商品。此外，英国还蓄意从土耳其手中夺去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力斯坦，并巩固自己在埃及方面的地位。

法国资本家力图从德国手中夺取富产煤铁的萨尔区，以及原先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战争时曾被德国占去的亚尔萨斯——罗来因区。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大战是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间最大的矛盾所引起的。

这次重分世界的掠夺战争牵连到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底利益，

所以后来日本,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也被卷入进去。

这次战争成为世界大战了。

资产阶级准备帝国主义大战是背着本国民众而极端秘密地进行的。当大战爆发时,每个帝国主义政府都力图证明说,不是它侵犯了邻国,而是邻国侵犯了它。资产阶级欺骗人民,隐瞒着这次战争低真正目的,隐瞒着这次战争底帝国主义掠夺性质。每个帝国主义政府都说战争是为保护自己祖国而进行的。

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帮助资产阶级来欺骗人民。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卑鄙地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事业。他们不仅没有起来反对战争,反而在保护祖国的幌子下帮助资产阶级去挑拨各交战国工农互相残杀。

俄国不是偶然站到协约国英法方面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必须注意到,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俄国各最重要工业部门是握在外国资本,主要是英法比三国,即协约国资本手里。俄国最重要的冶金工厂是由法国资本家把持着。整个说来,冶金业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二)依赖于外国资本。煤炭工业方面,即顿涅茨矿区中的情形也是如此。煤油开采约有一半是操在英法资本手里。很大一部分俄国工业利润流到外国银行,主要是流到英法两国银行里去。所有这些情况,再加上沙皇在英法两国订借的几十万万债款,便使沙皇政府依附于英法帝国主义,把俄国变成了这些国家底纳贡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

俄国资产阶级指望开始战争,便可以改进自己的情况:获得新的市场,从军事定货和军需供给中赚得暴利,利用战争局面来一并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

沙皇俄国参加战争是没有充分准备的。俄国工业要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俄国工厂大半是些设备窳败的旧工厂。农业由于存在有半农奴制地产和大批农民贫困破产的关系,不能成为进行长期战争的坚固经济基础。

沙皇是以农奴制的地主为主要靠山的。黑帮大地主同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在国内和杜马中操纵一切。他们完全拥护沙皇政府底对内对外政策。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满心希望沙皇专制政府成为一个铁拳头，一方面能保证它夺得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土，别方面能镇压工农革命运动。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虽以反政府派自命，但它毫无条件地拥护沙皇政府底对外政策。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自战争开始时起就在社会主义幌子下帮助资产阶级欺骗人民，隐瞒这次战争底帝国主义掠夺性质。他们鼓吹说必须保护，必须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抗拒“普鲁士野蛮人”，他们拥护“国内和平”政策，于是他们也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帮助德皇政府进行战争反对“俄国野蛮人”一样，帮助俄皇政府进行战争。

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仍然忠实于伟大革命国际主义旗帜，确立不移地站在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地主资本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布尔什维克党从战争开始时起，就抱定这样一种立场，即认为发动这次战争并不是为了保护祖国，而是为了侵占别国领土，为了劫掠别国人民，以利于地主和资本家，因此工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来反对这次战争。

工人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底主张表示拥护。

固然，战争开始时笼罩着知识份子和富农阶层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狂热，也曾薰染到一小部分工人。但这主要是流氓式“俄国人民同盟”中的份子，以及一部分同情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工人。他们当然没有反映而且也不能反映工人阶级底情绪。正是这些份子参加了沙皇政府在战争开始时组织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游行。

（二）第二国际各国党转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去。

第二国际分崩为各国社会沙文主义党。

列宁屡次预告过第二国际持着机会主义立场和第二国际领袖

们态度不坚定的事实。他再三重复说过,第二国际领袖们只是口头上反对战争,而当战争一旦爆发时,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投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就会成为战争拥护者的。战争最初几天的情形就把列宁底预言证实了。

一九一〇年在哥平加根召集的第二国际大会上通过决议,认为社会党人应当在国会中投票反对军用预算。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时,在巴塞尔召集的第二国际大会发表声明,说世界各国工人认为为资本家增加利润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在口头上,在决议中的言论就是如此。

而当帝国主义战争已霹雳一声爆发,必须使这些决议见诸实现的时候,第二国际领袖们却竟成了无产阶级底叛徒和变节者,成了资产阶级底仆役,——成了战争底拥护者。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用预算,拥护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法英比及其他各国绝大多数社会党人也是这样作了的。

第二国际已不存在了。它事实上已分崩成为各个互相厮杀的社会沙文主义党了。

各国社会党领袖既已背叛无产阶级,于是就转上了社会沙文主义和保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帮助帝国主义政府来愚弄工人阶级,用民族主义毒药毒害工人阶级。这些社会党人叛徒在保护祖国的幌子下煽惑德国工人去反对法国工人,煽惑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去反对德国工人。第二国际内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实行逆流而进,固然是不充分自信,不充分确定,但总算是实行逆流而进了的。

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立刻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列宁在他于一九一四年秋拟定的论战争提纲中指出,第二国际底崩溃并不是偶然的。第二国际是被机会主义者断送了,而革命无产阶级底优秀代表还在很早以前就已预告过大家,

说必须反对这种机会主义者。

第二国际各国党在战前已沾染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公开鼓吹放弃革命斗争，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久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国际不愿与机会主义作斗争，而主张同机会主义和睦相处，让它巩固起来。第二国际既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政策，于是自己也变成机会主义的了。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靠着它从劫掠殖民地，剥削落后国家所获得的利润，用较高工资和其他种种小惠来一贯收买熟练工人上层份子，即收买所谓工人贵族。从这个工人阶层中产生了不少的职工会和合作社领导者，市议会和国会议员，刊物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在大战时，这些人既害怕失掉自己的地位，于是就变成了反对革命的人，变成了最狂热拥护本国资产阶级，拥护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人。

机会主义者变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了。

社会沙文主义者包括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向工人宣传在国内要同资产阶级维持阶级和平，在国外要同他国人民进行战争。他们在群众面前把战争底真正罪人隐讳起来，说他们本国资产阶级不是造成战争的罪人。有许多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中的总长。

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所谓中派，对于无产阶级事业也是同样危险的。中派份子考茨基，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等人，极力包庇辩护公开社会沙文主义者，亦即与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起叛变无产阶级，不过他们用一些专门欺骗工人阶级的“左的”反战辞句来掩盖着自己的叛变行为罢了。中派事实上是拥护战争的，因为中派提议不投票反对军用预算，亦表决军用预算时只限于放弃表决权；其实就是拥护战争。他们也如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要求在战争时放弃阶级斗争，以免妨碍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中派份子托洛茨基在战争与社会主义所有一切最重要问题上，都是反

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

列宁从战争爆发时起,便实行聚集力量来建立新的国际,即建立第三国际。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所发表的反战宣言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就已提出了为代替业遭可耻破产的第二国际而成立第三国际的任务。

一九一五年二月,协约国社会党人在伦敦举行会议,李维诺夫同志受列宁委托出席发言。李维诺夫要求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得,桑巴,黑得)退出比法两国资产阶级政府并完全与帝国主义者决裂,完全放弃同他们合作的政策。他要求一切社会党人都必须进行坚决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斗争,指斥投票赞成军用预算的行为。但李维诺夫底呼声在这个会议上却没有得到响应。

一九一五年九月初,在齐美尔瓦尔得召集了国际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列宁称这次会议为国际反战运动发展中的“最初一个步骤”。列宁在这次会议上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但在这个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中,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才采取了唯一正确,一贯到底的反战立场。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用德文出版了预言者杂志,上面刊载过列宁底论文。

一九一六年,在瑞士一个村庄昆塔尔里召集了国际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此时差不多所有一切国家中都已分出了国际主义者集团,国际主义份子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分裂的情形已显现得更加鲜明。尤其主要的,就是此时群众本身已因受战争和战争灾难影响而左倾了。昆塔尔宣言是由于代表会议上互相斗争的各个集团妥协的结果而拟定的。它和齐美尔瓦尔得宣言相比已是前进一步了。

但是昆塔尔代表会议也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政策底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成立第三国际。可是昆塔尔代表会议终究促进了国际主义份子分出的过程,后来这些份子便组成了共产主义第三国际。

列宁批评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中如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这些不彻底国际主义者底错误,但同时又帮助他们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三)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及革命问题上的理论与策略。

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如大多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呻吟和平,局限于鼓吹和平的一种简单和平主义者(和平派)。布尔什维克主张用积极革命手段争取和平,一直到推翻黷武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为止。布尔什维克把和平事业跟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事业联系在一起,认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是消灭战争,取得正义和平,即取得不割地不赔款和平的最可靠的手段。

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背弃革命的行为,反对在战时保持“国内和平”的叛卖口号,而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说,劳苦群众包括穿着军服的武装工人和农民在内,若是想要摆脱战争而达到正义和平,就应倒转枪头去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并推翻其政权。

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保护资产阶级祖国的政策,而提出了“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政策。这就是说,必须投票反对军用预算,在军队中成立革命秘密组织,援助前线兵士联欢运动,组织工农反战革命发动,并使这种发动转为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起义。

布尔什维克认为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对人民益处最少的是沙皇政府战争失败,因为这种失败可能促进人民对沙皇制度的胜利,可能促进工人阶级为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和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的顺利的斗争。同时,列宁认为不仅俄国革命家,而且一切交战国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都应执行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失败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并不反对一切战争。他们只是反对掠夺性的战争,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布尔什维克认为战争有两种:

(一)正义的,非掠夺性的,解放的战争,其目的或是在保卫人

民抵御外来侵犯及奴役人民的企图,或是在把人民从资本主义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或是在把殖民地和依赖国从帝国主义者压迫下解放出来。

(二)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其目的是在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奴役别国人民。

布尔什维克是拥护前一种战争的。至于后一种战争,那末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来反对这种战争,直到实现革命和推翻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为止。

列宁在大战时期所写的理论著作,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都有极重大的意义。一九一六年春,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证明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此时它已由“进步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寄生的资本主义,变成了腐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乃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不必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会自行死亡,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会自行枯死。列宁经常教导说,不经过工人阶级革命是无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因此,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认为它是垂死资本主义的定义之后,接着就在这书中证明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底前夜”。

列宁证明说: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愈益加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义愤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爆发的原素日益增长。

列宁证明说: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依赖国内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反对帝国主义的义愤原素日益增长,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原素日益增加。

列宁证明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及其矛盾已特别尖锐化;争夺商品销售和资本输出场所的斗争,争夺殖民地,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已使重新分割世界的周期性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免的了。

列宁证明说：正是由于有这种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以就有帝国主义战争发生，这种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底力量，并造成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地方冲破帝国主义战线的可能。

列宁根据这一切而作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在某一个地方或某几个地方冲破帝国主义战线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首先在几个或且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同时在一切国家内胜利是因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不可能的；社会主义首先会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若干时间内还会仍旧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列宁在大战时期所写的两篇标题不同的论文中，把这个英明结论表述如下：

(一)“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底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且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内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各国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摘自写于一九一五年八月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页)(注五四)。

(二)“资本主义底发展在各个国家内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就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某些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前期的国家。这就不仅会引起磨擦，而且会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开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在我们方面会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就会是为社会主义，为求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战争”(摘自写于一九一六年秋的《无产阶级革命底军事纲领》一文)(《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二五页)(注五

五)。

这是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单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关于社会主义胜利条件,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前途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底基础,列宁早在一九〇五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中就已把它规定了。

这个理论根本与帝国主义前期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流行于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方针不同,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认为社会主义将在一切文明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这一名著中所发挥的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论据出发,推翻了这种陈腐的方针,并且定出了新的理论方针,即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底无限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用新的理论来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底意义还在于它向各个国家内的无产者指出了革命的前途,展开了他们对本国资产阶级实行进攻的主动性,教导了他们利用战争环境去组织这样的进攻,巩固了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

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及革命问题上所持理论和策略的方针。

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一方针而在俄国进行了他们的实际工作。

在大战开始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巴达也夫,彼特罗夫斯基,穆拉诺夫,萨莫依洛夫和沙果夫,不顾警察残酷追究而巡视了许多地方组织,在那里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对战争和革命态度问题的报告。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召集会议,讨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在会议第三天,全体代表都被捕了。法庭判决褫夺所有这些代表底公权,并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去。沙皇政府给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加上了

“叛国”罪名。

在法庭上暴露出来的杜马代表活动情形，是为我党增光不浅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沙皇法庭上表现出他们勇敢奋斗的精神，竟把沙皇法庭变成了揭露沙皇政府侵略政策的讲坛。

当时因此案被检举的加米涅夫却表现了另外一种行为。他由于胆怯成性，一遭到危险就背弃了布尔什维克党底政策。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申明他在战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意见不合，并为证明这点而请求法庭把孟什维克易奥尔当斯基传来作证。

布尔什维克努力揭露了专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揭露了孟什维克想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企图。资产阶级切身需要在大众面前把帝国主义战争形容成为全民的战争。资产阶级在大战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全俄组织——地方自治局联合会和市政公所联合会，因而获得了很能影响国家事务的地位。同时，它还想使工人也来服从它的领导和影响。资产阶级为着这一目的而想出了一种手段——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工人团”。孟什维克极力拥护资产阶级这种思想。资产阶级利于吸收工人代表来参加这些军事工业委员会，以便利用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鼓动，说必须在炮弹厂、大炮厂、枪械厂、子弹厂及其他专为国防而工作的工厂中增加劳动生产率。“一切都为战争，一切都用在战争上”，——这就是资产阶级底口号。其实，这个口号底用意是要“靠供给军需品和侵占他国领土来大发横财”。孟什维克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所策划的这种冒牌爱国主义的勾当。他们为了帮助资本家而拼命鼓动工人去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设立的“工人团”选举。布尔什维克是反对这种计策的。他们主张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并卓有成效地实行了这种抵制。但有一部分工人终究在著名孟什维克格沃兹结夫和奸细阿布罗西莫夫领导下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底工作。当工人代表在一九一五年九月集合起来进行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决选时，才发现大多数代表都是反对参加这

种“工人团”的。大多数工人代表通过了激烈反对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决议,说工人决心要为和平,为推翻沙皇制度而奋斗。

布尔什维克在海陆军中也开展了巨大的工作。他们向海陆军兵士群众说明谁是造成这次空前战争惨剧和人民痛苦的罪人,解释说革命是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唯一出路。布尔什维克在陆军和海军,前线 and 后方部队中建立了支部,散发了反战传单。

布尔什维克在喀琅施塔得成立了“喀琅施塔得军事组织总干事团”,这个干事团同彼得格拉党委员会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在彼得格拉党委员会下设立了专在防军部队中进行工作的军事组织。一九一六年八月,彼得格拉暗探局局长在呈报中说道:“喀琅施塔得干事团里事情布置得很紧严,很秘密,参加者都是些沉默寡言和作事慎重的人。该干事团在岸上也派有自己的代表”。

党在前线上进行鼓动,号召交战军队兵士实行联欢,并着重指出,说敌人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说只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倒转枪头去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才能结束战争。个别部队拒绝进攻的事件日益加多。在一九一五年间,特别是在一九一六年间,已经有过这样的事实。

布尔什维克在波罗的海沿岸区域的北方战线各集团军中进行了特别巨大的工作。一九一七年初,北方战线集团军总指挥鲁茨斯基将军向上级长官报告,说布尔什维克在这条战线上开展了规模极大的革命工作。

战争是各人民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生活中极大的转变。它使各国家底命运,各国人民底命运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底命运,都处于决定的关头。因此,它同时又是一切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党派所受到的一种考验。这些党派究竟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忠实于国际主义事业,还是宁愿叛变工人阶级。把自己的旗帜卷起抛到本国资产阶级脚下践踏呢,——当时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战争表明第二国际各国党没有经得起这种考验,却竟叛变工

人阶级而向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投降了。

这些在本身中间培植了机会主义，并且是根据一味对机会主义者让步，一味对民族主义者让步的精神教育出来的政党，本来是不能不如此作的。

战争表明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是光荣地经住了考验，始终澈底效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效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唯一政党。

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有新型的政党，只有根据同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精神教育出来的政党，只有不受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沾染的政党，才能经得起伟大的考验，而始终效忠于工人阶级的事业，效忠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事业。

布尔什维克党便是这样的政党。

（四）沙皇军队在前线上的失败。经济破坏。沙皇制度的危机。

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了。战争夺去了数百万人底生命：有的被打死，有的受了伤，有的死亡于战争所引起的疫症。资产阶级和地主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工人和农民却受着日甚一日的艰难困苦。战争破坏了俄国全部国民经济。约一千四百万壮丁被拉去当兵，脱离生产了。工厂相继停闭。谷物种植面积因缺乏工作者而缩减了。居民和前线兵士受饥挨饿，赤脚露体。战争把国内一切富源都已消耗净尽。

沙皇军队屡战皆败。德国炮队用冰雹般的炮弹轰击沙皇军队，而沙皇军队则缺乏大炮，缺乏炮弹，甚至缺乏步枪，有时三个兵士共用一枝枪。在大战时期已发觉了沙皇军务大臣苏鹤林诺夫同德国间谍勾结的卖国行为。苏鹤林诺夫执行了德国侦探机关底指令——破坏前线炮弹供给事宜，不供给前线大炮，不供给前线枪械。有些沙皇大臣和将领自己暗中协助德军获胜：他们同跟德方有勾结的皇后一起把军事秘密泄露给德军。所以，沙皇军队屡遭

失败,不得不实行退却。到一九一六年的时候,德军已把波兰全境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区域一部分占去了。

凡此一切都使工人、农民、兵士和智识份子对沙皇政府表示深恶痛绝,都使后方和前线、中心和边区民众反对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加强加剧起来。

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不满了。拉斯普庭一类宵小奸人在沙皇朝廷内操纵一切,并且分明想同德方单独媾和的事实,使这个资产阶级大为愤恨。它日益确信沙皇政府不能进行胜利的战争。它害怕沙皇政府为求挽救本身地位而会去同德人单独媾和。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就决定举行宫廷政变,以便把沙皇尼古拉第二撤废,而代之以与资产阶级有勾结的米哈依尔、罗曼诺夫。资产阶级是想借此一箭双雕:第一,偕取政权并保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第二,用一个小小的宫廷政变来防止当时已在高涨的人民革命。

英法政府在这方面是完全赞助俄国资产阶级的。它们知道沙皇不能继续战争。它们害怕沙皇将会以与德人单独媾和了事。要是沙皇政府实行缔结单独和约,那英法政府就要失掉俄国这样一个不仅在自己战场上牵制敌军力量,而且还供给法国以数万优良俄国兵士的战争同盟者。因此,它们就对俄国资产阶级举行宫廷政变的尝试表示赞助。

于是沙皇便陷于孤立了。

前线上的失利既没有停止,而经济的破坏又日益加剧。一九一七年一二两月间,粮食、原料以及燃料供给方面的破坏,已达到最厉害最尖锐的地步。彼得格拉和莫斯科两城所仰给的食粮,差不多已完全停止输运。企业相继倒闭。而企业的倒闭又使失业人数增加。工人状况已是特别困苦不堪了。广大民众日益确信:打破这种不堪忍受状况的出路只有一条——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沙皇制度显然处在致命的危机中。

资产阶级是想用宫廷政变来解决危机的。

人民却按自己的方式把危机解决了。

（五）二月革命。沙皇制度的倾覆。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临时政府的成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一九一七年一开始就有一月九日的罢工发生。当罢工时，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巴库及尼什涅、诺夫哥罗德等城都发生过游行示威，而且莫斯科参加一月九日罢工的约达全体工人三分之一，当时在特维尔荫道上有两千示威群众被骑警驱散。在彼得格拉城维波尔格公路上有兵士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

“总罢工的思想，——彼得格拉的警察报告说，——一天天获得新的拥护者，已成为像一九〇五年那样普遍的思想了”。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纳入自由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轨范。到二月十四日国家杜马开幕这天，孟什维克提议组织工人游行去向国家杜马请愿。但工人群众却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去了，不是去向杜马请愿，而是去实行示威。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彼得格拉城内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了。二月二十二日，大多数大企业中的工人也宣布了罢工。在国际妇女节那天，即二月二十三日（公历三月八日），女工们响应彼得格拉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底号召，纷纷跑到街道上去游行示威，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反对沙皇制度。工人们用宣布彼得格拉全城总罢工来支援女工示威。政治罢工已开始转变为反对沙皇制度的总政治示威了。

二月二十四日（公历三月九日），示威运动更加壮烈地复发起来。此时实行罢工的工人已达二十万左右。

二月二十五日（公历三月十日），革命运动普及到彼得格拉全体工人。各区的政治罢工转变成彼得格拉全城的总政治罢工了。

到处都举行示威,并同警察发生冲突。在工人群众举着的红旗上写着:“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

二月二十六日(公历三月十一日)清晨,政治罢工和示威运动开始转变为起义的尝试。工人群众解除宪警武装而自行武装起来。但当时同警察发生的武装冲突,却以示威群众在兹那勉斯克广场上遭受枪击而告终了。

当时的彼得格拉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发出布告,说工人应于二月二十八日(公历三月十三日)复工,不然就要把他们派往前线。二月二十五日(公历三月十日),沙皇下令给哈巴洛夫将军:“着令于明日将京都中的骚乱悉行制止”。

但要“制止”革命已是无法办到的了。

二月二十六日(公历三月十一日)日间,帕夫洛夫团后备营第四连开火了,不过不是向工人开火,而是向那些实行与工人互射的骑警队开火。为争取军队而进行的最努力最坚强的斗争展开了,尤其是女工群众参加得特别积极,他们径直走到兵士面前,同他们欢谈,号召他们帮助人民推翻他们所憎恨的沙皇专制制度。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实际工作方面的领导,是由设在彼得格拉而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中央局负责实行的。二月二十六日(公历三月十一日),中央局发表宣言,号召继续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斗争,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二月二十七日(公历三月十二日),彼得格拉驻军拒绝向工人开枪,而开始转到起义人民方面来。二月二十七日早晨实行起义的兵士还只有一万,但到晚上却已达六万以上了。

起义的工人兵士群众开始拘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实行释放狱中的革命者。被释放的政治犯加入革命斗争事业了。

在街上,群众还在与那些架着机关枪盘踞楼顶的宪警实行互射。但军队迅速转到工人方面的事实,却已决定了沙皇专制制度底命运。

当革命在彼得格拉胜利的消息传到其他城市和前线时，各地的工人和兵士都一致奋起推翻沙皇官吏。

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

革命之所以获得了胜利，是因为工人阶级做了革命底先锋，并领导了数百万身穿军服的农民群众“争和平，争面包，争自由”的运动。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决定了革命底成功。

“无产阶级实现了革命，它显出了英勇精神，它流了鲜血，它率领了极广大的贫苦劳动民众……”，——列宁在革命最初几天内这样写道(《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三至二四页)。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准备了一九一七年第二次革命底迅速胜利。

“如果没有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的这三年内所进行的伟大的阶级搏斗，以及它当时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那末第二次革命就不会进行得这样迅速，就是说，不会在几天以内便完成了这一革命底始初阶段”，——列宁当时这样指出(同上，第一三页)(注五六)。

在革命最初几天就出现了苏维埃。获得胜利的革命是倚靠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起义的工人和兵士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已经表明苏维埃既是武装起义底机关，又是革命新政权底萌芽。苏维埃思想在工人群众意识中活着，所以他们在推翻沙皇制度后第一天便把这个思想实现了，不过这里有一点区别，就是一九〇五年所成立的还只是工人代表苏维埃，而一九一七年二月则由布尔什维克发起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

当布尔什维克在街上领导群众直接斗争的时候，妥协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在苏维埃中夺取代表位置，并在苏维埃里组成自己的多数。其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部分地是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大多数领袖还在监狱和流放所(列宁侨居国外，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还在西伯利亚流放所)，而孟什维

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可能在彼得格拉街道上自由游逛。因此,妥协党底代表,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便抓得了彼得格拉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底领导。莫斯科及其他许多城市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只有在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及其他几个城市,苏维埃中的多数从最初起就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

武装的人民——工人和兵士选派自己的代表到苏维埃去,本是把苏维埃当作人民政权机关看待的。他们认定并且相信,工兵代表苏维埃定会实现革命人民底一切要求,尤其首先会缔结和约。

但工人和兵士竟因轻信人言而上了大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没有想到结束战争,没有想到争取和平。他们只是想利用革命来继续战争。至于革命和人民底革命要求,那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革命已经完结,目前的任务只是要把它巩固,并转上“正常的”宪制的轨道,即转上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轨道。因此,把持着彼得格拉苏维埃领导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便竭力想方设法把结束战争的问题压下去,把和平问题压下去,并把政权转交资产阶级。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公历三月十二日),国家杜马中的自由派代表与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首领们暗中商定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并决定由第四届杜马主席地主兼保皇党人罗将科负责主持。几天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又同那些把持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背着布尔什维克而商定了组织俄国新政府,即组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以早在二月革命前就由沙皇尼古拉第二预定充任自己政府内阁总理的李沃夫侯爵来领导这个政府。参加临时政府的有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十月党领袖古契可夫及其他有名的资本家阶级代表,而以“民主派”代表资格参加的则有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

结果便是操纵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政权拱手交给了资产阶级,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知道此事之后,

又不顾布尔什维克抗议而以多数表决认可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首领们底行动。

于是在俄国就形成了正如列宁所说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地主”代表组成的新的国家政权。

但当时与资产阶级政府并存的还有另一个政权，即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中的兵士代表，主要是被动员作战的农民。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反对沙皇政权的工农联盟机关，同时又是他们的政权机关，是工农专政机关。

于是就形成了两个政权，两个专政特殊错综结合的局面：一个是实现着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实现着工农专政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结果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为什么起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得了多数呢？

为什么获得胜利的工人和农民自愿地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底代表呢？

列宁认为这是因为当时醒觉起来参加政治的是千百万缺乏政治经验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小私有者、农民和不久前还是农民的工人，即介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人们。当时俄国是欧洲一切大国家中最带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汹涌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潮浸没了一切，它非但在数量上，并且在思想上也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薰染了和笼罩了很广大的工人阶层”（《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一五页）（注五七）。

这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浪潮，便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浮到表面上来了。

列宁指出，另一个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成份在大战时期起了变化，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开始时缺乏充分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在

大战时期,无产阶级成份上发生了很大的变更。约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基干工人被动员到军队里去了。在大战年代,有很多与无产阶级心理格格不入的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小店主,都为逃避动员而跑到企业里来了。

工人中间的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就成了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滋生的地盘。

正因为如此,所以缺乏政治经验,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浪潮所浸没,为革命第一批胜利所陶醉的广大民众,遂于革命最初几个月内成了妥协党底俘虏,并同意把国家政权让给资产阶级,痴心指望资产阶级政权不会妨碍苏维埃进行自己的工作。

于是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群众中用耐心的解释工作来揭穿临时政府帝国主义性质,揭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底叛卖行为,并向群众说明,不用苏维埃政府代替临时政府是达不到和平的。

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就用全力来进行这个工作。

它恢复了自己的合法刊物。二月革命后第五天,真理报即在彼得格拉实行复刊;再过几天,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在莫斯科复刊了。党出而领导已在抛弃对自由资产阶级信任态度,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信任态度的群众。党耐心地向兵士,向农民解释必须与工人阶级共同行动。党向他们解释,不继续发展革命,不以苏维埃政府来代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那农民就得不到和平,也得不到土地。

简短的结论

帝国主义大战是因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因各个主要列强均势破坏、因帝国主义者需要用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并造成新的均势而发生的。

假使第二国际各国党没有叛变工人阶级事业,假使它们没有

违背第二国际数次代表大会底反战决议，假使它们有决心积极活动并发动工人阶级去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反对战争挑拨者，那末战争就不会带有这样大的破坏性质，或者甚至完全不会这样厉害地扩展起来。

布尔什维克党表现为唯一的无产阶级党，只有它才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事业，并组织了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国内战争。所有其余第二国际政党因经过它们的上层领导份子而跟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都作了帝国主义底俘虏，投奔到帝国主义者方面去了。

战争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底反映，而战争本身又加剧了这个危机，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俄国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世界上最先顺利利用了资本主义底弱点，冲破了帝国主义战线，推翻了沙皇并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

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兵士以至工人群众因被革命第一批胜利所陶醉，因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谓今后一切都会吉利的担保所安慰，都痴心信任临时政府而予以赞助。

于是，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向这些被第一批胜利所陶醉的工人和兵士群众解释，说明现在离革命完全胜利尚远，说当政权操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而苏维埃由妥协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操纵的时候，则人民便得不到和平，得不到土地，得不到面包；说为了要获得完全胜利，就必须更向前进进一步，把政权交归苏维埃掌握。

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实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

(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初的时期)

(一)二月革命后的国内状况。党从秘密状态转向公开政治活动。列宁回到彼得格拉。列宁的四月提纲。党所采取的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事变的进程以及临时政府底行为,都日益证实布尔什维克路线正确,愈益清晰地证明临时政府不是拥护人民而是反对人民,不是主张和平而是主张战争的政府,是根本不愿而且不能使人民获得和平,土地与面包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底解释工作日益博得民众底欢迎。

工人兵士实行推翻沙皇政府和消灭帝制根基,而临时政府却分明要想把帝制保存下去。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临时政府密派古契可夫和叔尔根两人去觐见沙皇。资产阶级想把政权转交给尼古拉、罗曼诺夫底兄弟米海依尔。但当古契可夫在铁路工人大会上演说完毕高呼“米海依尔皇帝万岁”的时候,工人却要求立刻把古契可夫拘捕起来和加以搜查,并忿然说道:“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当时看得十分明显,工人是决不会容许恢复帝制的。

工人农民实现革命和流血奋斗时,本是期望结束战争,想要获得面包与土地,要求采取坚决办法消除经济破坏状况,而临时政府却把人民这些切身要求置若罔闻。由一些最有名的资本家地主份子组成的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想到满足农民关于土地转归农民

的要求。同时，临时政府也不能使劳动者获得面包，因为要做到这点，就得触犯大粮食商人底利益，就得极力设法把地主和富农那里的粮食夺来，但政府却不愿这样去作，因为它本身就与这些阶级底利益密切关联。同样，临时政府也不能使人民获得和平，因为它是跟英法帝国主义者有勾结的政府，不仅根本没有想来停止战争，反而力图利用革命来使俄国更加积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来实现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占领加里细亚的帝国主义计划。

当时看得十分明显，民众对临时政府政策所持的轻信态度是很快就要终结了。

当时已经显而易见，二月革命后所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决不能长久支持下去，因为事变进程要求政权集中到某一方面：或是集中到临时政府宫墙内，或是集中到苏维埃掌握中。

诚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持的妥协路线，暂时还在民众中受到拥护。当时还有不少的工人，尤其是兵士与农民，以为“很快就会有立宪会议来把一切安排妥贴”，以为战争的进行不是为了侵略，而是由于迫不得已，即为了保护国家。列宁把这种人叫做诚心误入迷途的护国派份子。当时这班人还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底约许和劝说政策看作是正确的政策。但当时已经显而易见，靠这种约许和劝说决不能长久支持下去，因为事变进程以及临时政府底行为都日益揭露，日益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底妥协政策是种拖延问题和欺骗轻信者的政策。

临时政府并没有经常局限于暗中反对群众革命运动的政策，即用秘密勾结手段反对革命的政策。它有时也还企图公开消灭民主自由，企图——特别是在兵士中间——“恢复纪律”，企图“整顿秩序”，即是把革命纳入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轨范。但不管它在这方面怎样努力，终究还是没有什么成就，而民众却热情奋发地实现着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民主自由。工人和兵士极力想尽量利用他们初次争得的民主权利来积极参加国内政治生活，以

便认识和理解目前既成的局势,并决定今后动作的方针。

二月革命后,先前在极艰难的沙皇专制条件下秘密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已走出秘密状态,而开始进行公开的政治和组织的工作了。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里的人数还不过四万至四万五千人。但这是在斗争中受过锻炼的干部。各级党委员会已按民主集中原则实行改组。所有各级党机关都规定必须按选举原则产生。

自从党转到公开地位时起,党内立刻就暴露出意见分歧。加米涅夫以及莫斯科组织中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伯诺夫和诺根等人,持着有条件赞助临时政府和拥护护国派政策的半孟什维主义立场。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所回来——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协同党内大多数同志,坚持着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立场,并号召群众进行积极争取和平的斗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党内有一部分工作人员表现过动摇,反映出他们因受过长期监禁流放而在政治上落后的这种弱点。

处处都令人感觉到全当领袖列宁当时不在这里。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公历四月十六日),列宁经过长期流亡生活以后,终于回到俄国来了。

列宁的归来,对于党和革命有着莫大的意义。

列宁还在瑞士接到革命第一批消息的时候,就在从那里寄发的《远方来信》中向党和俄国工人阶级写过:

“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已经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民众的英勇精神底奇迹。你们现在应当表现出无产阶级和全民组织底奇迹,以准备自己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九页)(注五八)。

列宁于四月三日夜间到达彼得格拉。当时在芬兰车站和车站前面广场上,有成千成万工人和海陆军兵士群众集合起来欢迎列宁。当列宁下车时,群众充满着不可以言词形容的欢欣。他们

立刻把自己的领袖列宁举在手上，一直把他举到车站大厅，那里孟什维克齐赫芝和斯科别列夫两人已在开始用彼得格拉苏维埃名义致“欢迎”辞，说他们“希望”列宁会同他们采取“一致的步骤”。但列宁并没有去理会他们，却绕过他们而走向工人兵士群众，并从铁甲汽车上发表他有名的演说，号召群众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这就是列宁度过多年流亡生活后回来时初次演说底结语。

回到俄国以后，列宁马上就全副精力来从事革命工作。列宁回国后第一天就在布尔什维克大会上作了论战争与革命的报告，然后又在—一个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孟什维克参加的大会上重述了这个报告大纲。

这就是有名的列宁《四月提纲》，这个提纲给党和无产阶级定出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革命路线。

列宁底提纲对于革命，对于党后来的工作有着莫大的意义。革命是全国生活中最大的转变，所以党在推翻沙皇制度后新的斗争条件下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才能大胆而确有把握地循着新的道路前进。列宁底提纲也就向党指明了这样的方针。

列宁底《四月提纲》给党规定了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第二阶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天才计划。党本身所经过的全部历史，已把党准备好来执行这一伟大任务。早在一九〇五年时，列宁已在他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中说过，推翻沙皇制度以后，无产阶级就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提纲中新的东西，就是它定出了一个有理论根据的着手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计划。

在经济方面，过渡的办法是：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条件下实行全国一切土地国有，把所有一切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并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加以监督，对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监督。

在政治方面,列宁主张由国会制的共和国进到苏维埃的共和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进步。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国会制的共和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适当的政治形式。现在列宁主张用苏维埃的共和国来代替国会制的共和国,认为苏维埃的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

“俄国现今时局底特点,——在提纲中说,——就在于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底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而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八页)(注五九)。

接着又说:

“不是要有国会制的共和国,因为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国会制的共和国,就是倒退一步,而是要有自下至上由全国各地工人、雇农、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同上,第八八页)(注六〇)。

列宁说,战争在临时新政府统治下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党底任务是要向群众解释这点,并向他们指明,要想用真正民主和平而不是用强制和平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产阶级不可。

在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上,列宁所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赞助!”。

其次,列宁在提纲中指出,我们党在苏维埃中暂时还占少数,现时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在无产阶级中传达资产阶级影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底联盟,因此党底任务是:

“要向群众解释: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染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有系统地、坚毅地,特别是适应着群众底实际需求来解释他们策略底错误。当我们还占少数时,我们要实行批评与揭示他

们的错误，同时宣传必须使全部国家政权转归工人代表苏维埃……”(同上，第八八页)(注六一)。

这就是说，列宁并没有号召实行起义反对当时博得苏维埃信任的临时政府，没有主张推翻这个政府，而是力求用解释性的和征集力量的工作来争得苏维埃中的多数，改变苏维埃底政策，经过苏维埃而去改变政府底成份和政策。

这是预计到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

其次，列宁要求抛弃“肮脏衬衣”，即放弃“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第二国际政党和俄国孟什维克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已被机会主义者，被社会主义叛徒们所糟踏所玷辱了。列宁提议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呼自己的党那样称呼布尔什维克党为共产党。这个名称从科学方面说是正确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底终极目的是要达到共产主义。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进到社会主义，即进到公共占有生产资料和按各人劳动分配生产品。列宁说，我们党看得比这更远。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旗帜上所写的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最后，列宁在其提纲中主张建立新的国际，建立不受机会主义沾染，不受社会沙文主义沾染的共产主义第三国际。

列宁底提纲受到了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方面疯狂般的攻击。

孟什维克向工人发表了一篇宣言，开头就警告说：“革命在危险中”。所谓危险，据孟什维克底意见，就是布尔什维克提出了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要求。

普列汉诺夫在他所办的统一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称列宁底言论为“梦话”。普列汉诺夫引用了孟什维克齐赫芝所说的话：“落到革命以外的只有列宁一人，而我们却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四月十四日，召集了彼得格拉布尔什维克全市代表会议。它

接受了列宁底提纲,并将其当作自己工作底基础。

此后不久,各地方党组织也接受了列宁底提纲。

全党,除加米涅夫、李可夫、皮达可夫一类几个独夫外,都异常满意地接受了列宁底提纲。

(二)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四月代表会议。

布尔什维克准备去继续扩展革命,而临时政府则照旧进行着反人民的勾当。四月十八日,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米留可夫向协约国声明:“全体人民愿将世界大战进行到澈底胜利,临时政府决意完全遵守对我协约各国担承的义务”。

这就是说,临时政府赌咒发誓要忠实履行沙皇条约,并向帝国主义者担保,说他们为达到“胜利结局”而需要人民流多少血,那它就会继续叫人民流多少血。

四月十九日,这个声明(“米留可夫通牒”)已为工人和兵士们知道了。四月二十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号召群众抗议临时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和二十一两日(公历五月三四两日),至少有十万对“米留可夫通牒”极表愤慨的工人兵士游行示威。在旗帜上所写的口号是:“公布密约!”,“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工人和兵士群众自城郊走向中心,走向临时政府所在地。在涅瓦大街及其他地方,示威群众和几群资产阶级份子发生过冲突。

当时科尔尼洛夫将军一类最露骨的反革命份子号召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甚至还下过相当的命令。但军队接到这种命令后,却拒绝执行。

彼得格拉党委员会里有一小部分委员(巴格达铁也夫等等)在示威时提出了立刻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严厉申斥了这种“左的”冒险主义者底行为,因中央认为这是个不适时和不正确的口号,只能妨碍党争取苏维埃多数,且根本与党

预计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相抵触。

四月二十和二十一两日的事变，是意味着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

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持妥协政策中发生的第一个严重裂口。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由于群众方面的逼迫，从临时政府中撤销了米留可夫和古契可夫。

接着就成立了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其中除资产阶级代表外，还有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和策烈铁里)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和克伦斯基等人)参加。

这样，一九〇五年间否认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可以参加革命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现在却认为自己的代表参加反革命临时政府是可以容许的了。

这就是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营垒中去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宣布开幕。这是自党存在以来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党史上按其重要性来说，实等于一次党代表大会。

全俄四月代表会议表明了我党蓬勃增长的事实。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一百三十三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一共代表着八万个有组织的党员。

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并且定出了党对于这些问题的路线，其中包括有时局问题，战争问题，临时政府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等。

列宁在他所作的报告中发挥了他先前已在《四月提纲》中说明过的原理。党底任务就是要实行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

使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列宁语)(注六二)。党应采取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底最近任务。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底意义,就是说必须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结束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分掌政权的局面,必须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并将地主资本家代表逐出政权机关。

代表会议认定,党底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始终不倦地向群众解释“临时政府按其性质说是地主资产阶级底统治机关”这一真理,同时必须揭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持的妥协政策含有致命危险,因为他们用虚伪的诺言欺骗民众,叫民众去受帝国主义战争与反革命势力的打击。

加米涅夫与李可夫两人在代表会议上发言反对列宁。他们重复着孟什维克底意见,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认为俄国只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他们提议,党和工人阶级只应局限于“监督”临时政府。其实他们也如孟什维克一样主张保全资本主义,保全资产阶级政权。

季诺维也夫也在代表会议上发言反对列宁,这是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究竟是应留在齐美尔瓦尔得联合中,还是要同这联合决裂而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战争年代已表明这个联合虽进行着主张和平的宣传,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同资产阶级的护国派决裂。因此,列宁坚决主张立刻退出这个联合,而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主张仍旧同齐美尔瓦尔得派留在一起。列宁坚决驳斥了季诺维也夫所提出的这种意见,称季诺维也夫底策略为“极端机会主义的和有害的策略”。

同时,四月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土地问题与民族问题。

根据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通过了没收地主土地而将其交归农民委员会支配,并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号召农民去争取土地,并向农民群众证明说,布尔什维

克党是真正帮助农民推翻地主的唯一革命政党。

斯大林同志论民族问题的报告有极重大的意义。列宁与斯大林还在革命以前，即在帝国主义战争前夜，就已规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对民族问题政策底基础。列宁与斯大林常说，无产阶级党应当援助被压迫各族人民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始终都坚持直到实行分立而组成独立国家为止的民族自决权。代表中央做报告的斯大林同志在代表会议上所捍卫的正是这个观点。

当时发言反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主张的有皮达可夫。还在战争年代，皮达可夫就和布哈林一起对民族问题持着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皮达可夫和布哈林两人反对民族自决权。

正因为党对民族问题持着坚决一贯的立场，正因为党为实现民族权利完全平等，为消灭一切民族压迫表现和民族权利不平等现象而努力奋斗，所以党获得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底同情与援助。

以下便是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论民族问题决议底原文：

“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与君主制度底遗产，而地主、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则支持着这种政策，目的是要保护其阶级特权并分散各民族的工人。现代帝国主义加强着征服弱小民族的趋向，因而成为加深民族压迫的新因素。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可能达到铲除民族压迫，那就只有在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权的澈底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和管理制度之下，才能实现。

必须承认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皆有自由分立和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否认这种权利和不设法保障这种权利能具体实现，就等于赞助侵略或兼并政策。只有由无产阶级承认民族分立权，才能保证各民族工人底完全团结，并促进各民族间真正民主的接近…

决不可把民族自由分立权的问题和某个民族在某个时机中实行分立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后一问题，无产阶级党在每一场合，都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底利益以及无产阶级为社会

主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底利益,完全独立地加以解决。

党要求广泛的区域自治,取消自上的监督,取消强迫施行的国语,并要求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于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条件及居民民族成份等等的估计,来划定自管区以及自治区底疆界。

无产阶级党坚决排斥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即将学校等等事宜划出国家管辖范围而交给某种民族议会处理的办法;民族文化自治制是用人工方法把那些在同一地方居住和甚至在同一企业作工的人,按其所属的“民族文化”彼此分开,就是说,使工人和本民族底资产阶级文化间的联系加强起来;而社会民主党底任务,却在于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底国际文化。

党要求在宪法中加入一条基本法律,将某一民族所享有的任何特权以及对于少数民族各种权利的任何侵犯,都宣布为无效。

工人阶级底利益,要求把俄国境内所有各民族工人溶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政治的,职工会的,合作社的,教育的组织等等。只有这样把各民族工人溶合为统一的组织,才使无产阶级有可能来进行反国际资本和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胜利斗争”(《联共(布)决议案汇集》,卷上,第二三九至二四〇页)(注六三)。

这样,在四月代表会议上便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很小一群同道者所提出的机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揭破了。

代表会议一致拥护了列宁底主张,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采取了明确的立场,进行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路线。

(三)布尔什维克党在首都的成功。临时政府军队在前线进攻的失利。工人兵士七月示威运动的被镇压。

党根据四月代表会议底决定开展了争取群众,用战斗精神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党在这个时期的路线,就是要耐心解释布尔什维克政策并揭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所持妥协立场,借

以孤立这两个政党而使其与群众隔绝，由布尔什维克党争得苏维埃中的多数。

除在苏维埃中工作外，布尔什维克在职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也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特别是在军队中有布尔什维克开展着大规模的工作。到处都有军事组织成立起来。布尔什维克在前线和后方不倦地努力组织着海陆军兵士群众。在使兵士群众革命化的事业上，布尔什维克出版的前线刊物战壕真理报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

由于布尔什维克这种宣传鼓动工作的结果，所以在革命最初几个月内就有很多城市的工人改选了苏维埃，特别是区苏维埃，从那里逐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选进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份子。

布尔什维克底工作发生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彼得格拉。

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日，在彼得格拉召集了全市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在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中，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份子已占四分之三。彼得格拉的无产阶级，差不多全体都是拥护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

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公历六月十六日)，召集了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当时在苏维埃中还占少数，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仅有百余名代表，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党派却有七八百名。

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坚决揭露了同资产阶级妥协路线底致命危险性，揭穿了当时战争底帝国主义性质。列宁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发言中证明说布尔什维克路线完全正确，并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给予劳动者面包，给予农民土地，奠定和平，把国家引出经济破坏状态。

此时在彼得格拉各工人区中进行着大规模鼓动工作，号召群众举行示威，并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种种要求。彼得格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因企图防止工人自动示威，并蓄意利用群众革命情

绪来谋实现本身目的，于是自行决定六月十八日(公历七月一日)在彼得格拉举行示威。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指望这次示威将会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举行。而布尔什维克党却努力准备去领导这次示威。斯大林同志当时在真理报上写道：“…我们的任务是要做到使彼得格拉六月十八日的示威在我们的革命口号下进行”。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在革命烈士墓旁举行的示威，竟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力量底真正大检阅。这次示威表明群众底革命精神愈益高涨，表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日益提高。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出的口号，即对临时政府表示信任，认为必须继续战争的这种口号，在汪洋大海般的布尔什维克口号中淹没不见了。四十万群众举着示威的旗帜上所写的口号是：“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总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这次示威表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表明临时政府在首都遭到了失败。

但是，临时政府既获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底赞助，便决定继续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恰巧在六月十八这天，临时政府遵照英法帝国主义者意旨驱使前线兵士去实行进攻。资产阶级认定这次进攻是结束革命的唯一机会。资产阶级打算在进攻获得胜利时能把全部政权攫为己有，排除苏维埃，扑灭布尔什维克。而在进攻失利时，也可以完全归咎于布尔什维克，加他们一个瓦解军队的罪名。

进攻显然是要遭失败的。而进攻果然失败了。兵士的疲劳，他们对于进攻目的的茫然莫解，他们对于异己军官的不信任，炮弹和大炮的缺乏，——所有这些都预决了前线进攻底失败。

前线进攻以及进攻失败的消息，激动了首都。工人和兵士群众愤激万分。原来，临时政府标榜和平政策，只是为了欺骗人民。原来，临时政府是个主张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原来，全俄苏

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彼得格拉苏维埃并没有想要，或是没有能够对抗临时政府采取的罪恶行动，并且自己做了临时政府底尾巴。

彼得格拉工人和兵士群众底革命义愤达到极点了。七月三日（公历七月十六日），群众在彼得格拉城维波尔格区中自发开始举行示威。这次示威继续了一整天。单个的示威扩展成了总的宏伟的武装示威，口号是政权转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本是反对在当时实行武装发动的，因为它认为革命危机还没有成熟，军队和外省民众还没有决心来援助首都起义，在首都举行孤独无援和为时过早的起义，只会使反革命势力易于击破革命先锋队。但当情形表明阻止群众示威是无法办到的时候，党就决定去参加示威，以便把它变成一个和平而有组织的运动。布尔什维克党做到了这点，于是几十万示威群众就向彼得格拉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方面走去，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要求苏维埃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决裂而实行积极的和平政策。

虽然示威带有和平的性质，但政府还是为反对示威群众而调用了反动部队，即士官生队伍和军官队伍。在彼得格拉的街道上遍流了工人与兵士底鲜血。为了击溃工人，当时还从前线调回了最黑暗的，反革命的军队。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资产阶级及白卫将军把工人兵士示威运动压倒之后，就来对布尔什维克党横施压迫。真理报编辑处被捣毁。真理，兵士真理及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报纸被封闭。工人沃义诺夫只是为了在街上发卖真理小报，便惨遭士官生打死。开始来解除赤卫队武装了。彼得格拉防军中的革命部队被撤出首都而调往前线。后方和前线有许多人被捕。七月七日，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中有许多重要人物被捕了。刊印布尔什维克书报的“劳动”印刷局被捣毁了。彼得格拉法院检察官发出布告，说列宁及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因犯“叛国”和组织武装起义罪应交付法庭审判。诬加在列宁头上的这种罪名，是在邓尼金将军

司令部里根据侦探和奸细底口供伪造出来的。

这样,有策烈铁里和斯科别列夫,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一类著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临时政府,就滚到公开帝国主义和公开反革命的泥潭中去了。它不去执行和平政策,而竟执行继续战争的政策。它不去保护人民民主权利,而竟执行把这种权利一律取消并用武力摧残工人兵士的政策。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古契可夫和米留可夫所没敢作出的事情,“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切尔诺夫和斯科别列夫,却敢于作出了。

两个政权并存局面已告终结。

终结的结果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因为全部政权已转到临时政府手中,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领导的苏维埃却变成了临时政府底附属品。

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告终结,摆在日程上的已是短兵相接的问题。

由于环境已经改变,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就决定来改变自己的策略。党转入了秘密状态,把自己的领袖列宁深深隐匿了起来,并开始来实行准备武装起义,以期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建立苏维埃政权。

(四)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报章横施攻击的局面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拉召集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伦敦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十年,以及普拉加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后五年召集的。代表大会是秘密举行,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继续到八月三日。报纸上只公布了召集代表大会的消息,没有指明代表大会开会地点。最初几次会议是在维波尔格区举行,末后几次会议是在纳尔瓦门附近一个学校内开的,现在此地已建筑起文化

官了。资产阶级的报纸要求逮捕代表大会参加者。暗探疲于奔命，急想找到代表大会开会地点，可是始终没有找到。

这样，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五个月以后，布尔什维克竟不得不秘密集会，而无产阶级政党底领袖列宁，却不得不躲藏在拉兹里夫车站近旁一个草棚中。

列宁虽因受临时政府探狗追寻而没能出席代表大会，但他从秘密状态中，终于经过他在彼得格拉的战友与门生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四人而领导了代表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一百五十七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一百二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当时党员人数将近二十四万。截至七月三日止，就是说在工人示威运动被摧残事件尚未发生，而布尔什维克尚在公开进行工作的时候，党一共拥有四十一个机关刊物，其中有二十九个用俄文出版，有十二个用其他各种文字出版。

布尔什维克和工人阶级在七月事变时所受到的压迫，不仅没有使我们党底影响削弱，反而使其加强了。各地方组织代表举出了很多实例，说明工人和兵士已在大批脱离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轻蔑地称他们为“社会狱卒”。孟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中的工人和兵士份子纷纷撕破自己的党证，咒骂不休地离开他们的党，而请求布尔什维克把他们接受到自己的党中来。

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是中央政治工作报告和政治形势问题。斯大林同志在做这些问题的报告时十分明确地指出，不管资产阶级怎样设法镇压革命，但革命还是在增长和发展着。他指出，革命提出了对生产及产品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土地转归农民，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归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问题。他说，革命按其性质来说，已成为社会主义的了。

七月事变以后，国内政治情势已经根本改变。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业已消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领导的苏维埃，根本没有想把全部政权握到自己手里。因此，苏维埃已成为没有政

权的東西。政权已集中在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手中,这个政府还在继续解除革命底武装,摧残革命组织,摧残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和平发展的前途已经断绝。剩下的道路,——斯大林同志说,——只有一条:用强力推翻临时政府而夺取政权。但能用强力夺得政权的却只有与贫苦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

当时还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已滚入资产阶级的营垒,而且它在当时情况下只能做临时政府底帮手。斯大林同志说:在七月事变以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应当收回。但暂时收回这个口号,并不是表示要把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放弃。当时所说的不是作为革命斗争机关的一般苏维埃,而只是当时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

“革命底和平时期业已终结,——斯大林同志当时说,——不和平的时期,搏战和爆发的时期已经到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一一页)。

党朝着武装起义前进。

代表大会上居然有人反映着资产阶级底影响,出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方针。

托洛茨基份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说要在关于夺取政权的决议上指出:只有当西欧有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才可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时起来反对这种托洛茨基主义意见的是斯大林同志。

“很有可能,——斯大林同志说,——正是俄国会成为开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必须抛弃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同上,第二三三至二三四页)。

布哈林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宣称,农民怀有护国主义情绪,他们已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决不会跟着工人阶级走。

斯大林同志反驳布哈林这种意见而证明说，有各种不同的农民：富裕农民赞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贫苦农民则力求同工人阶级联合，并赞助工人阶级去争取革命胜利。

代表大会否决了普列奥布拉在斯基和布哈林两人所提出的修改，而批准了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代表大会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底经济纲领，并加以批准了。这个纲领底基本要点是：没收地主土地，把全国所有一切土地、银行及大工业收归国有，由工人实行监督生产和产品分配。

代表大会强调了为实现工人监督生产而斗争的意义，工人监督生产在实行大工业国有时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其所有一切决议中，特别着重强调了列宁认定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条件的原理。

代表大会指斥了孟什维克的所谓工会中立论。代表大会指出，只有在工会始终是一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政治领导的战斗组织的条件下，俄国工人阶级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才能实现。

代表大会通过了《论青年团体的决议》。当时这种团体往往是自动成立起来的。由于后来工作的结果，党已把这种青年团体巩固成为党自己的后备军了。

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列宁应否到法庭受审的问题。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等人就已认为列宁应当到反革命法庭受审，斯大林同志坚决反对列宁到法庭受审。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反对列宁到法庭受审，认为这不会是什么审判，而会是一种摧残手段。代表大会毫不犹豫地认定，资产阶级所想达到的只是一桩：把列宁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肉体上的摧残。代表大会对资产阶级警察迫害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手段提出抗议，并致书慰问列宁。

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在党章上指出，全党所有一切组织都应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

这就是说：

- (一)全党上下所有一切领导机关都应按选举制产生；
- (二)各级党机关应定期向各该党组织报告工作；
- (三)严守党内纪律，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 (四)下级机关以及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执行上级机关底决议。

党章上规定，凡请求入党者应有两个党员介绍，经过党组织全体党员大会通过后，由地方党组织接受入党。

第六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区联派”及其首领托洛茨基入党。这是个人数不多的集团，从一九一三年起便存在于彼得格拉，其中所包括的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份子以及一部分从党内分裂出去的从前的布尔什维克。“区联派”在大战时是个中派主义的组织。他们进行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在许多问题方面他们对孟什维克也不表赞同，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是中间的，中派主义的，动摇的立场。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时，“区联派”提出声明，说他们在各方面都同意布尔什维克底主张，并请求接受他们入党。代表大会满足了他们的请求，指望他们经过一些时候将会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有些“区联派”份子，例如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等人，后来真正成了布尔什维克。至于托洛茨基及其某些亲近朋友，那末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入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进行有益于党的工作，而是为了要动摇党，为了要从内部来炸毁党。

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都是为着准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去实行武装起义。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党指向于实行武装起义的目标，指向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代表大会在其发表的全党宣言上，号召工人、兵士和农民准备力量去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宣言底结语是：

“我们的战斗同志们，要准备去进行新的搏战！你们不应受人挑拨，而应坚定，大胆，镇静地积蓄力量，列成战斗的队伍！无产者和兵士们，站到我党旗帜下面来！农村中的被压迫者们，站到我们的

旗帜下面来!”。

(五)科尔尼洛夫将军底反革命阴谋。阴谋的溃败。

彼得格拉和莫斯科苏维埃之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

资产阶级夺得全部政权之后,就准备去把削弱了的苏维埃消灭,而建立毫无掩饰的反革命专政。亿万富翁梁布申斯基傲然宣布,说他认定摆脱现状的出路是“饥荒的瘦手和人民的贫困,将把冒充人民之友的民主苏维埃和各种委员会扼死”。战地法庭和兵士死刑律在前线上猖獗一时。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在后方也施行死刑律。

八月十二日,临时政府为动员资产阶级地主力量而召集的国事会议在莫斯科大戏院宣布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地主,资产阶级,将领,军官和哥萨克底代表。用苏维埃名义出席的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

在国事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布尔什维克为表示抗议而在莫斯科组织了有大多数工人参加的总罢工。同时在其他许多城市里也举行了罢工。

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在会议上讲话的时候妄自矜夸,威胁说他将用“铁血”手段镇压一切革命运动底尝试,包括农民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尝试在内。

反革命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公然要求“废除各委员会和苏维埃”。

银行家,商人和工厂主,接踵到大本营——当时这样称呼总司令部——来拜谒科尔尼洛夫将军,答应给他金钱和援助。

“盟邦”代表,即英法两国代表,也来访问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他立刻起事反对革命。

科尔尼洛夫将军所组织的反革命阴谋快要发动了。

科尔尼洛夫底阴谋是公开准备起来的。为了避免人们对于阴

谋的注意,于是阴谋者便拼命造谣,说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拉准备于革命半周年那天——八月二十七日——举行起义。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实行猛击,对无产阶级政党加紧施行恐怖手段。同时,科尔尼洛夫将军收集军队,打算把它开到彼得格拉来消灭苏维埃,并成立武人独裁政府。

科尔尼洛夫准备这次反革命发动,是事先同克伦斯基协商好了的。但当科尔尼洛夫实行发动的时候,克伦斯基却突然改变了阵线,表示和自己的同盟者完全无干。克伦斯基害怕,如果他自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不立刻表示和科尔尼洛夫叛乱毫不相干,那末民众起来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时击破了叛乱,就会也把克伦斯基所领导的这个资产阶级政府一并扫除的。

八月二十五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将军所指挥的骑兵第三军团向彼得格拉开动,并宣布说他立意“拯救祖国”。为了回答科尔尼洛夫暴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兵士群众对反革命势力实行积极的武装抵抗。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准备抵抗了。赤卫队在这几天内增加了数倍。职工会动员了自己的会员。彼得格拉的革命军队也在整装以待。在彼得格拉周围挖掘战壕,布置铁丝网,拆毁城周各铁道。有几千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开来保卫彼得格拉。当时派出大批代表到向彼得格拉进攻的“野蛮师”中去进行解释,经这些代表向该师山民士兵解释过科尔尼洛夫发动底意义之后,“野蛮师”就拒绝向彼得格拉进攻了。同样又还派人到其他各科尔尼洛夫部队中去进行鼓动。凡是有危险的地方,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指挥部。

当时,骇得魂不附体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首领们,包括克伦斯基在内,都来请求布尔什维克保护,因为他们知道,布尔什维克是首都方面唯一能够击溃科尔尼洛夫的实际力量。

但布尔什维克就在动员群众去消灭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同克伦斯基政府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在群众面前揭露

了克伦斯基政府，揭露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他们的全部政策在客观上帮助了科尔尼洛夫反革命阴谋。

由于采取了这一切办法，结果便把科尔尼洛夫叛乱消灭了。克雷莫夫将军实行自杀。科尔尼洛夫及其同僚邓尼金与鲁科姆斯基被捕（不过克伦斯基不久就把他们释放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溃灭的事实，一下子就把革命和反革命间的势力对比明白揭示了。从这事实中可以看出，整个反革命营垒，从各个将军和立宪民主党人起，直到陷入资产阶级俘虏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止，都是必遭灭亡的。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硬要把无力进行的战争拖延下去的这种政策，以及因拖延战争而引起的经济破坏，已使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根本破毁了。

其次，从科尔尼洛夫叛乱溃灭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已成长为革命底决定力量，能于击溃反革命底任何一种阴谋诡计。当时我们党还不是执政的党，但它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时日却俨如一个真正执政的力量动作了，因为工人和兵士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它的指示。

最后，从科尔尼洛夫叛乱溃灭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原已仿佛死亡的苏维埃在事实上竟含蓄有极大的革命抵抗力量。毫无疑问的，正是苏维埃及其革命委员会堵塞了科尔尼洛夫军队的道路，并摧破了这些军队底力量。

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振奋了原已萎靡不振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把它们从妥协政策束缚下解放出来，把它们引上革命斗争大道而使其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了。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空前增长了。

布尔什维克在农村中的影响也迅速地增长起来了。

科尔尼洛夫暴动已使广大农民群众明白，地主和将军把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击破后，就会来进攻农民。因此，广大的贫苦农民

群众日益紧密地团结到布尔什维克底周围。至于中农群众，他们的动摇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八月时期是阻碍过革命发展的，但在科尔尼洛夫溃灭以后，他们却已响应贫苦农民群众而肯定地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已经渐渐了解，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能使他们免除战争，才能击破地主，并决意把土地转交农民。一九一七年九十两月，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事件大大增加。擅自耕种地主土地已成为各地普遍的现象。无论劝说或讨伐，都已制止不住奋起革命的农民群众了。

革命高潮日益增涨起来。

苏维埃活跃与刷新的阶段，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阶段展开了。工人和兵士实行改选自己的代表，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选到苏维埃中去代替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战胜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的翌日，即八月三十一日，彼得格拉苏维埃就已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底政策，齐赫芝所主持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旧届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团，不得不实行辞职而让位给布尔什维克。九月五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也只好实行辞职而让路给布尔什维克。

这就是说，起义胜利所必需的基本前提业已成熟。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但这已不是政权转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的那个旧口号。不，这是苏维埃起义反对临时政府，以便把国内全部政权转交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苏维埃掌握的口号。

妥协党中间开始发生齟齬了。

社会革命党内因受同情革命的农民群众逼迫而出现了左翼，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开始对那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表示不满。

孟什维克中也出现了一个“左派”，即所谓“国际主义者”，他们

开始来同布尔什维克接近。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就是影响极小的集团，现在已完全分裂成一些细小的团体，有的去同社会败类中刑事匪盗和奸细份子混成一团，有的去作“有思想的”强盗，专门劫掠农民与城市贫民，抢劫工人俱乐部所有的房屋和储金，有的公开转入反革命营垒，在资产阶级庇荫下谋自己个人的幸福。他们全体都反对一切政权，特别是反对工农革命政权，因为他们分明知道，革命政权决不会让他们劫掠人民和窃取民众财产的。

科尔尼洛夫叛乱溃败以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作过一次想削弱当时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的尝试。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召集了全俄民主会议，其中有社会党人，妥协派苏维埃，职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以及军队代表参加。由此次会议产生了预备国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妥协派想利用预备国会来阻止革命，并使国家离开苏维埃革命道路而走上资产阶级宪政发展的道路，即走上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道路。但这是业遭破产的政治家想把革命车轮倒转开去的一种绝望的企图。这种企图必然要遭到失败，而且果然遭到了失败。工人们嘲笑了妥协派所干的这种国会主义儿戏。他们为开玩笑而把预备国会叫作“预备澡堂”。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抵制预备国会。固然，预备国会中有加米涅夫和特奥多维奇一类人盘踞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是不愿意退出预备国会的。但党中央委员会强迫他们退出了预备国会。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顽强地主张参加预备国会，目的是要叫党离开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斯大林同志在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中发言坚决反对参加预备国会。他把预备国会叫作“科尔尼洛夫叛乱底流产儿”。

列宁和斯大林认为甚至在很短一个时期内参加预备国会也是

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种参加能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幻想,以为豫备国会真能替劳动者做出什么事情。

同时,布尔什维克又坚忍不拔地准备召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打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多数。不管盘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支吾搪塞,但在布尔什维克化的苏维埃逼迫之下,终于不得不指定一九一七年十月下半月召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六)彼得格拉的十月起义与临时政府人员的被捕。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底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

社会主义革命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底原因。

布尔什维克已在加紧准备起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既已在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工兵代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就可以而且应当掌握国家政权。列宁总结已往途程时着重指出:“人民多数是拥护我们的”。列宁在他的论文以及致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书信中,定出具体的起义计划,其中指明应如何利用海陆军部队和赤卫队,指明必须夺取彼得格拉哪些有决定意义的地点来保证起义胜利等等。

十月七日,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拉。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党中央举行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议上决定要于最近几日内开始武装起义。在由列宁起草而经党中央通过的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中说: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底国际环境(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全欧洲增长底极端表现;其次,帝国主义世界以扑灭俄国革命为目的的威胁),军事状况(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及其同流已经毫无疑问地决定把彼得城让给德军),无产阶级党已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的事实,——此外,更加上农民起

义以及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最后，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着（原有军队之调出彼得城，哥萨克军队之调入彼得城，哥萨克军队之包围明斯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起义时机业已完全成熟，兹特号召全党一切组织以此为准绳，并根据这个观点去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之调出彼得城，莫斯科人与明斯克人之发动等等）”（《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三页）（注六四）。

当时发言并在表决时举手反对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决议的有两个中央委员，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们也和孟什维克一样梦想成立资产阶级国会制的共和国，并诬蔑工人阶级，说它没有能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说它还没有成长到夺取政权的程度。

托洛茨基在这次会议上虽没有公开举手反对这一决议，但他提议在决议上加进一个修改，这一修改如被采纳，结果就会使武装起义化为乌有而遭到失败。他提议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不要开始起义。这实际上就是延缓起义事业，事先泄露起义日期，把此事预告给临时政府。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分派特派员到顿巴斯、乌拉尔、赫尔森福斯、喀琅施塔得、西南战线及其他地方去组织当地的起义。沃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卡甘诺维奇，库恢贝舍夫，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及其他同志，奉党专令去领导当地的起义。当时在乌拉尔的沙德林斯克镇军队中进行工作的是史丹诺夫同志。中央特派员向各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底领导者说明了起义计划，并使他们整装以待，预备随时支援彼得格拉起义。

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彼得格拉苏维埃下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它后来便成了起义底公开司令部。

同时，反革命也赶急来聚集自己的力量。军官们组成了反革

命的“军官联合会”。到处都有反革命份子建立突击营编制部。到十月底,反革命已经拥有四十三个突击营。专门组织了几个“佐治亚奖章军人”突击营。

克伦斯基政府提出了政府从彼得格拉迁往莫斯科的问题。由此便可看出它准备把彼得格拉让给德国,以期防止彼得格拉发生起义。但因彼得格拉工人和兵士群众提出抗议,终使临时政府不得不仍然留在彼得格拉。

十月十六日,党中央召集扩大会议。在会议上选出了领导起义的党总部,由斯大林同志负责主持。党总部是彼得格拉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底领导核心,它在实际方面领导了全部起义。

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投降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发言反对起义。他们受到回击之后,就到报章上去公开反对起义,公开反对党。十月十八日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底声明,其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在准备武装起义,并说他们两人认为起义是种冒险举动。这样,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在敌人面前泄露了中央关于起义,关于在最近期间举行起义的决定。这是一种叛变行为。列宁关于此事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本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列宁向中央提出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党的问题。

革命敌人接到叛徒预告之后,马上就设法防止起义和击破革命底领导参谋部布尔什维克党。临时政府召集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同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办法问题。十月十九日,临时政府急忙从前线调军队来镇守彼得格拉。各街道上都已加岗巡逻。反革命在莫斯科聚集了特别大的力量。临时政府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举行进攻,占领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在地的斯莫尔尼,并击破布尔什维克底领导中心。为了这个目的,政府把它所认为忠实可靠的军队集中到彼得格拉。

可是临时政府底死期已至。任何力量都已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行进了。

十月二十一日，在所有各个革命军队中都由布尔什维克党派来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在起义前几日之内，各个军队和各个工厂每天都在进行热烈的战斗准备。两艘战斗舰——“阿芙乐尔”巡洋舰和“自由曙光”舰，也奉到了相当的指令。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拉苏维埃会议上夸大吹牛，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即泄露了布尔什维克预定开始起义的日子。为了不让克伦斯基政府有可能破坏武装起义，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原定日期以前，即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开始和实现起义。

十月二十四日（公历十一月六日）清晨，克伦斯基开始动作，下令查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并把装甲车调到工人之路编辑部和布尔什维克印刷所跟前。但到上午十点钟时，赤卫队和革命兵士已遵照斯大林同志命令把装甲车赶走，并在《工人之路》编辑部和印刷所门前加岗防卫了。上午十一点钟，《工人之路》报出版了，报上号召推翻临时政府。同时，根据领导起义的党总部所发出的指令，立刻便实行把革命兵士队伍和赤卫队调集到斯莫尔尼来。

起义开始了。

十月二十四日夜间，列宁到了斯莫尔尼，亲自担负起领导起义的重任。整夜都有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向斯莫尔尼开来。布尔什维克随即将这些部队派往首都中心去包围临时政府所盘踞着的冬宫。

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各火车站，邮政局，电报局，政府阁部，国家银行。

预备国会被解散了。

彼得格拉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所在的斯莫尔尼，成了革命底战斗司令部，从这里发出战斗的命令。

在这些时日,彼得格拉工人表明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受到了很好的锻炼。由布尔什维克工作所准备起来参加起义的革命军队,确切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同赤卫队肩靠肩地进行了战斗。海军也不比陆军落后。喀琅施塔得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底堡垒,这里早已就不承认临时政府底政权了。“阿芙乐尔”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报导了十月二十五日是新纪元,即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纪元底开始。

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告俄国公民书》,书上宣告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归苏维埃掌握。

临时政府躲藏在冬宫里面,由士官生和各突击营护卫着。十月二十五日深夜,革命的工人、兵士和水兵攻下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

彼得格拉武装起义胜利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晚上十点四十五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宣布开幕,当时彼得格拉的胜利起义已达沸点,首都的政权事实上已握在彼得格拉苏维埃手中了。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崩得份子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眼看自己已遭破产,于是声明拒绝参加代表大会工作而离开了大会会场。他们在其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的声明书中,公然把十月革命称为“军事阴谋”。代表大会痛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指出代表大会对于他们的退出不仅不表示惋惜,反而极为欢迎,因为从叛徒退出时起。代表大会就成了真正革命的工兵代表大会。

用代表大会名义宣布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掌握。

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上说:

“代表大会凭靠着绝大多数工人,兵士和农民底意志,凭靠着

工人和防军在彼得格拉所实现的胜利起义，业已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历十一月八日）夜间，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代表大会向各交战国提议、立刻缔结至少三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和平谈判。代表大会向一切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呼吁时，同时又向“人类三个最先进民族和此次战争中三个最大参战国，即英法德觉悟工人们”呼吁。代表大会号召这些工人帮助“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民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顺利进行到底”。

同夜，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土地法令，上面规定“立刻毫无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这个土地法令是以根据二百四十二个地方农民委托书制定的全国农民委托书作为基础通过的。依照这个委托书上所载，土地私有制宣告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民的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皇室土地以及寺观土地，一律无报酬地交归全体劳动者使用。

按照这个法令，农民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一共领得了一万五千万余俄亩的新有土地，这些土地从前是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皇室、寺观和教堂手中的。

农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及五万万金卢布的租金。

所有地下蕴藏（煤油，煤炭，矿源等等），森林和水流，一律转归人民所有。

最后，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其成份全是布尔什维克。列宁被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

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这样结束的。

大会代表分途回到各处去报道苏维埃在彼得格拉获得胜利的消息，并保证把苏维埃政权扩展到全国各地。

并非所有一切地方的政权都是一下子转到了苏维埃手中的。

当苏维埃政权在彼得格拉已经确立时，莫斯科各街道上还进行过几天顽强残酷的战斗。为了妨碍政权转入莫斯科苏维埃掌握，反革命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跟白卫队及士官生一起开始了反对工兵群众的武装斗争。只是经过数日以后，叛乱者才被击破，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才奠定起来。

在彼得格拉本城及其几个区里，反革命份子在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天就进行过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尝试。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克伦斯基(他是在起义发生时从彼得格拉逃往北方战线区的)收集了一些哥萨克部队，并将其交由克拉斯诺夫将军向彼得格拉开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社会革命党人主持的一个反革命团体“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拉发动士官生叛乱。但这次叛乱很快就被粉碎。在一天之内，到十一月十一日傍晚时分，水兵和赤卫队就把士官生叛乱消灭下去，而在十一月十三日，又在普尔科夫高地把克拉斯诺夫将军击溃。列宁也如在十月起义时一样，亲身领导了粉碎反苏维埃叛乱的事情。他的坚定不移的精神与确信胜利的镇静态度，鼓舞并团结了群众。敌人被击破了。克拉斯诺夫被俘虏后，讲了句“良心话”，说他以后决不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在这句“良心话”担保下被释放，但后来事实证明克拉斯诺夫违背了他自己的这种将军诺言。而克伦斯基呢，却已男扮女装藏到“不知去向”了。

在当时驻扎于莫吉利沃城内的全军总司令大本营里又有杜鹤宁将军企图举行叛乱。当苏维埃政府责成杜鹤宁立刻开始同德军指挥部进行停战谈判时，他却竟拒绝执行政府底指令。于是就由苏维埃政权下令把杜鹤宁撤职。反革命的大本营被击溃了，杜鹤宁本人被那些起义反对他的兵士们打死了。

党内人所共知的机会主义者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施里亚普尼可夫及其他等人，也会试图来袭击苏维埃政权。他们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让刚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孟什

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也来参加。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否决了主张同这些反革命政党妥协的提议，而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叫作破坏革命事业的工贼。十一月十七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米留亭四人因不同意党底政策，乃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同日，即十一月十七日，诺根用本人以及人民委员会委员李可夫，米留亭，特奥多罗维奇，施里亚普尼可夫，梁赞诺夫，尤烈涅夫和拉林等人名义提出声明，说他们不同意党中央底政策，并声明他们全体退出人民委员会。一小群懦夫逃跑的事实，顿使十月革命底敌人喜形于色。整个资产阶级及其帮手们都在幸灾乐祸，高声叫喊布尔什维克主义陷于瓦解，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必遭灭亡。但这一小群逃兵丝毫也没能动摇党。党中央委员会轻蔑地指斥他们为革命战场上的逃兵和资产阶级底帮手之后，就转而进行正常的事务。

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因想保存其在分明同情于布尔什维克的农民群众中的影响，故决定不来同布尔什维克争执，并暂时同他们保持着统一战线。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召集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承认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获得的一切成果和苏维埃政权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当时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协定，并把几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科烈加也夫，斯皮里多诺娃，普洛施洋与施坦白尔格)加进到人民委员会中。但这种协定只存在到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和贫农委员会成立时止，因为当时农民中已发生深刻的分化，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因其愈益反映富农利益而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叛乱，结果是被苏维埃政权击破了。

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一八年一二两月间的时期内，苏维埃革命已推广到全国各地了。苏维埃政权在幅员广阔的国家领土上推行得如此迅速，列宁把这称呼为苏维埃政权底“凯歌行进”。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

从决定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样较为容易获得胜利的种种原因中,应该指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十月革命所遇到的是俄国资产阶级这样一个力量较为薄弱,组织不良而又欠缺政治经验的敌人。俄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尚未强固而且完全依赖于政府定货,所以它既没有必需的政治独立性,也没有充分的自动性来找到逃出现状的出路。它既没有例如法国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那种玩弄大规模政治拉拢和政治撞骗手腕的经验,也没有例如英国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那种玩弄大规模狡黠妥协手腕的经验。它昨天还想去同二月革命所推翻的那个沙皇谋妥协,而它在二月革命以后获得政权时,却又除了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继续可恶沙皇底政策以外,根本就想不出什么较好的办法。它也和沙皇一样主张“战到胜利结局为止”,却不顾国家已无力再战,人民和军队已被战争弄得疲困不堪。它也和沙皇一样主张基本上保存地主土地私有制,却不顾农民已因缺乏土地和遭受地主压迫而弄得奄奄待毙。在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上,俄国资产阶级比沙皇更加仇视工人,不仅力图保存和加强工厂主底压迫,并且用大批停业办法把这种压迫弄成更加不堪忍受了。

无怪乎人民认为沙皇政策与资产阶级政策之间没有重大区别,于是就把自己对沙皇的仇恨转向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身上。

当妥协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党在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影响的时候,资产阶级还能靠它们掩护而把政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而当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已暴露自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底走狗,因而在人民中丧失了自己影响的时候,于是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就根本站不住脚了。

(二)领导十月革命的是俄国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革命阶级,它在战斗中受到过锻炼,在一个短时期内经历过两次革命,而在第三次革命前夜又已博得领导人民争取和平,争取土地,争取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领袖底威信。如果没有俄国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受到

人民信任的革命领袖，就不会有工农联盟，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联盟，则十月革命就会不能获得胜利。

(三)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当中有占农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这样一个严重的同盟者。完全可以比得上几十年“常态”发展经验的这八个月革命发展经验，对于农民劳动群众并没有白白过去。在这个期间，他们有可能按事实来检验俄国所有一切政党，并确信无论立宪民主党，亦无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不会为农民利益认真去与地主争执，都不会为农民利益去流血牺牲，俄国只有一个党才和地主没有联系，并决心推翻地主，以满足农民底需要，——这个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这种情况也就成了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联盟底实际基础。工人阶级与贫苦农民联盟的事实，也就决定了中农底行为，他们曾动摇过很久，直到十月起义前夜时才响应贫苦农民而真正转到革命方面来。

根本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联盟，则十月革命就会不能获得胜利。

(四)领导工人阶级的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在政治斗争中受过锻炼的党。只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充分勇敢能引导人民作坚决冲击，充分慎重能绕过横在前进途中的一切暗礁而走向既定目标的党，才能非常巧妙地将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即争取和平的一般民主运动，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民主运动，被压迫民族力求民族平权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运动，汇合成一个总的革命洪流。

毫无疑问，这种种革命运动汇合为一总的雄强的革命洪流，也就决定了俄国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

(五)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大战正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营垒，彼此忙于战争和互相消耗而不能认真干涉“俄国内政”和积极反对十月革命时开始的。

毫无疑问，这种情形是大大促进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

(七)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布列斯特和约。第七次党代表大会。

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破坏和打破旧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而代之以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其次,必须破坏等级制度残余及民族压迫制度,废除教会特权,铲除反革命的出版物以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组织,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末了,必须在实行土地国有以后实行把一切大工业也收归国有,然后就退出战争状态,把当时最能妨碍苏维埃政权巩固的这个战争结束。

所有这一切办法,都在一九一七年末至一九一八年中这几个月内实现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组织的旧时阁部官吏的怠工被打破和肃清了。各旧有部院均被废除而代之以新成立的苏维埃管理机关和相当人民委员部。成立了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来管理全国工业。组织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来专负肃清反革命和怠工行为的事宜。颁布了成立红军和红海军的法令。基本上是在十月革命以前选出,而且拒绝批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政权转归苏维埃法令的立宪会议被解散了。

为了澈底铲除封建残余,等级制残余,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于是颁布了废除等级,消灭民族限制和信教限制,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男女平权,以及俄国境内各族人民权利一律平等的法令。

在苏维埃政府通过的标题为《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的特别决议》中,把俄国各民族自由发展和各民族权利完全平等定为法律。

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底经济势力,为了组织新的苏维埃的国民经济,首先是为了组织新的苏维埃的工业、于是实行把银行、铁路、对外贸易、商船以及所有各部门的大工业,如煤炭工业、冶金工业、

煤油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纺织工业和制糖业等等收归国有。

为了使我国免除财政上的依赖以及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于是宣布把俄国所欠一切由沙皇以及临时政府订借的外债取消。我国各族人民不愿偿付那些借来继续掠夺战争并使我国陷于受外资盘剥的依赖地位的债款。

由于实行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办法的结果，就使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官吏以及反革命政党底势力根本被摧毁，而使苏维埃政权在国内的地位大加巩固。

但是，既然俄国还处于同德奥交战的状态中，因此苏维埃政权底地位还不能认为完全巩固。要澈底巩固苏维埃政权，就必须结束战争。所以，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上便展开了争取和平的斗争。

苏维埃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议，立刻开始进行关于正义民主和平的谈判”。可是，“盟邦”英法当局不肯接受苏维埃政府底提议。既然英法两国拒绝进行和平谈判，于是苏维埃政府为了执行苏维埃意志，便决定开始同德奥两国进行谈判。

谈判是于十二月三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开始的。十二月五日，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暂时停止作战行动的协定。

这次谈判是在国民经济遭受破坏，大家都疲于战争，我国军队从前线撤退，前线陷于瓦解的局势下进行的。在谈判时查明出来，德帝国主义者力图夺去前沙俄帝国一大块领土，并把波兰、乌克兰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变成成为德国底附属国。

在当时条件下继续战争，就无异把刚才产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底生命拿来作孤注一掷。于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必须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必须在当时最危险的强盗德帝国主义面前实行退却，以便取得暂息时机，巩固苏维埃政权，并建立新的军队，即建立能卫国抗敌的红军。

一切反革命份子,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到最顽固的白卫份子,都进行了反对签订和约的疯狂煽动。他们的路线是很明显的:破坏和平谈判,挑起德军进攻,使尚未强固的苏维埃政权遭受打击,使工农获得的成功受到威胁。

同他们勾结进行这种黑暗勾当的有托洛茨基及其帮手布哈林,当时布哈林同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一起领导着一个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为了掩饰自己起见,便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党内发动了反对列宁的残酷斗争,要求继续战争。这些人显然是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反革命份子,因为他们力图使我们刚才成立而还没有自己军队的苏维埃共和国去受德帝国主义底打击。

这是用左的词句巧加掩饰的一种奸细挑拨政策。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进行的和平谈判中断了。虽然列宁和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坚决主张签订和约,但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却叛变式地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底直接训令。他声明说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在德国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但同时他却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共和国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实行遣散军队。

这是骇人听闻的行为。德帝国主义者当时所能要求于苏维埃国家利益叛徒的,无过于此了。

德国政府破坏休战协定并转为进攻了。我国旧军残部抵不住德军猛击而开始溃散。德军迅速进展,占领了广大地区,并威胁着彼得格拉。德帝国主义侵入苏维埃国境的目的,是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并把我国祖国变成为它的殖民地。旧的陷于瓦解的沙皇军队,不能抵抗德帝国主义底武装大队。它在德军打击下溃退了。

但德帝国主义者底武装干涉引起了我国雄伟的革命高涨。工人阶级响应着党和苏维埃政府宣告“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警号,加紧实行编制红军部队。年轻的新军——革命人民军——队

伍，英勇地拒绝了全副武装的德国强盗底攻击。德国侵略者在纳尔瓦和普斯可夫受到了坚决的回击。他们进攻彼得格拉的动作被阻止了。回击德帝国主义军队的那天，即二月二十三日，便成了年轻红军底生日。

还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党中央已通过了列宁主张致电德国政府立刻订立和约的提议。德军为了保证自己获得更有利的和约条件，仍然继续进攻，直到二月二十二日德国政府才表示同意签订和约，但此时的和约条件已比最初的条件苛刻得多了。

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为达到采取签订和约的决定，曾须在中央内部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其他托洛茨基份子进行极坚持的斗争。列宁指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实际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并且妨碍了德国革命底增长和发展”（《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〇七页）（注六五）。

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决议接受德军司令部所提出的条件并签订和约。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底叛卖举动使苏维埃共和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更不用说波兰——割给了德国；乌克兰脱离苏维埃共和国而变成德国底藩属国（依赖国）。苏维埃共和国按所订条约应向德国缴付赔款。

但“左派共产主义者”还是继续进行反对列宁的斗争，每况愈下地坠入叛变的深渊。

莫斯科省常务局因暂时被“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奥新斯基，雅科福列瓦，司徒可夫，曼采夫）所占据，竟通过了分裂主义的决议，表示不信任中央，并说它认为“党在最近将来恐难避免分裂”。在这个决议上，“左派共产主义者”居然走到了采取反苏维埃的决定，说什么“为着国际革命底利益，我们认为那怕就是丧失这现时变成为纯粹形式东西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

列宁称这个决议为“奇谈与怪论”。

当时党还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这种反党行为

底真实原因。然而不久前审判反苏维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份子联盟”时(一九三八年初)已经查明:布哈林及其所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曾经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组织过反苏维埃政府的秘密阴谋。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阴谋同伙曾打算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并加以杀害,然后由布哈林份子、托洛茨基份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新政府。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一面组织秘密反革命阴谋,一面又在托洛茨基协助下公开向布尔什维克党实行进攻,力图分裂党和瓦解党底队伍。但是,党在这个严重关头始终紧密地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底周围,党在和平问题上,也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拥护了中央委员会。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陷于孤立,并被粉碎了。

为了最终解决和约问题,于是就召集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

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六日开幕的。这是我党获得政权以后所召集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四十六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五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这次大会代表着十四万五千个党员。实则当时党员总数至少有二十七万人。其所以有这样一种差别,是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带有一种非常的性质,许多组织都没有来得及选派代表,况且当时被德军暂时占领各区的组织,又没有可能选派代表。

列宁在这次大会上做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报告时说道:“我们的党由于党内有左倾反对派形成而遇到的这个严重危机,乃是俄国革命所遭遇的最大危机之一”(《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二一页)(注六六)。

在把列宁论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案交付表决时,有三十人表示赞成,十二人表示反对,四人表示怀疑。

在决议通过后第一天,列宁就在不幸的和约一文中写道:

“和约底条件是苛刻不堪的。但历史毕竟是会占得上风的…我们要从事组织,组织和组织。不管有怎样的艰难困苦,最后的胜利总是会属于我们的”(同上,第二八八页)。

代表大会底决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发动在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代表大会认为党底基本任务是要用最坚强最坚决的办法来提高工农底自我纪律和纪律精神,准备群众去奋勇保护社会主义祖国,组织红军,实行全民军训。

代表大会认准了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正确路线,指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人底立场,痛斥了已遭失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力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制造分裂的行为。

由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于是党就有可能赢得时间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来调整全国经济。

由于和约的签订,于是我国就有可能来利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冲突(德奥继续同协约国作战),瓦解敌人力量,组织苏维埃经济,建立红军。

由于和约的签订,于是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保持其对农民的领导,并积聚力量,以求在临来的国内战争时期击溃白卫将军。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教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应怎样在有进攻所必需的条件时大胆坚决地实行进攻。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列宁教导了党应怎样在敌人力量显然超过我方力量时有秩序地实行退却,以使用最大的努力准备对敌人实行新的进攻。

历史完全证明了列宁路线的正确。

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改换党名称和改变党纲的决议。从此时起,党就称呼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俄共(布)。列宁提议把我党称为共产党,是因为这个名称恰巧符合党所抱定的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目的。

为了要制定新的党纲,于是选出了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把列宁所拟定的草案采纳为党纲底基础。

这样,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完成了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业:击破了党内暗藏的敌人“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份子,使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争得了和平,即暂息时机,使党赢得了组织红军的时间,向党提出了在国民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任务。

(八)列宁所规定的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

贫农委员会和压制富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及其被消灭。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之通过。

苏维埃政权既已签订和约并取得暂息时机,就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时期,列宁称之为“用赤卫队来攻击资本”的时期。苏维埃政权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打破了资产阶级底经济势力,掌握了国民经济底命脉(工厂,银行,铁路,对外贸易,商船等等),打破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关,胜利地消灭了反革命势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次尝试。

但这还千万不够。为要继续向前进展,还必须从破坏旧制度而进到建设新制度。因此,在一九一八年春,就开始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从剥夺剥夺者”进到了在组织上巩固既得胜利,进到了建设苏维埃国民经济。列宁认为必须最高限度地利用暂息时机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底基础。布尔什维克应学会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列宁当时写道: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把俄国从富人手中夺来交归了人民,现在,——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党应当学会管理俄国。

列宁认为这个阶段上的主要任务就是统计国民经济中所出产的东西,并实行监督一切产品的消费。当时俄国经济中是以小资产阶级成份占多数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千百万小业主是资本主义所由滋长的基地。这些小业主既不承认劳动纪律,也不承认全国

纪律，他们既不服从什么统计，也不服从什么监督。在这个困难关头特别危险的是小资产阶级投机谋利的自发势力，是小业主小商人利用人民困乏而自肥的企图。

于是党就进行坚强斗争来消除生产方面松懈废弛的现象，来消除工业方面缺乏劳动纪律的现象。群众获得新的劳动习惯是很缓慢的。因此，为劳动纪律而斗争，就成了这时期的中心任务。

列宁指示说，必须在工业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施行按件工资制，反对均等主义，除用教育说服方法外，还必须用强制手段对付那些想从国家手里多拿一些，游手好闲，从事投机事业的份子。列宁认为新的纪律，即劳动的纪律，同志关系的纪律，苏维埃的纪律，是要由千百万劳动者在日常实际工作中来养成的。他指出，“这件事情将占去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四四页）。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的问题，都由列宁在其名著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一书中阐明了。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也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发动了反对列宁的斗争。布哈林和奥新斯基等人反对培植纪律，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反对在工业中利用专门家，反对施行经济核算制。他们诬蔑列宁，说实行这样的政策就是回复到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又宣传了托洛茨基认为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不能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点。

“左派共产主义者”口里讲着“左的”词句，事实上拥护富农，懒汉和投机商人，拥护这些反对纪律，反对国家调节经济生活，反对统计和监督的份子。

党把组织苏维埃新工业的问题解决后，就来实行解决农村问题。当时农村中正沸腾着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积聚着力量，极力侵占从地主手中夺出的土地。贫农急需帮助。富农同无产阶级国家作斗争，不肯按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他们想用

制造饥荒的手段来强迫苏维埃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的设施。党提出了击破反革命富农的任务。为了要组织贫农和顺利反对占有剩余粮食的富农，于是就组织了工人下乡运动。

“工人同志们！——列宁当时写道，——你们要记着革命情况危急。你们要记着只有你们才能挽救革命。现在正需要有几万个精锐，先进，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工人，他们决不会受贿行窃，而能组成为铁一般坚强的力量去反对富农，反对投机者，反对劫掠者，反对贪脏受贿者，反对捣乱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五页）。

“为粮食而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列宁当时这样说道。在这个口号下组织了工人下乡运动。当时颁布了几道法令规定粮务独裁并赋予粮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按固定价格采买粮食的非常权柄。

依照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法令成立了贫农委员会（贫委）。贫委在和富农斗争中，在重分所没收的土地与分配农具的事业上，在采办富农所有剩余粮食的事业上，在为工人中心区域和红军供给粮食的事业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富农所占据的五千万海克脱土地已转入贫农中农掌握。富农所有的大部分生产工具，都被没收而交归贫农了。

成立贫农委员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开展过程中更进一步的阶段。贫委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据点。当时用农民编制红军基干部队，多半是经过贫委来进行的。

无产者下乡工作和贫农委员会的成立，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势力，并在把中农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这点上发生了极大的政治作用。

一九一八年末，贫委既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于是就宣告取消而与农村苏维埃实行合并。

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开幕。在

这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拥护富农而开展了反对列宁的残酷斗争。他们要求停止反富农的斗争，并要求放弃派遣工人收粮队到农村中去的办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眼看他们的路线受到大会多数底坚决反对，于是便在莫斯科举行叛乱，占据了三仙巷，并从那里实行向克列姆里宫开炮射击。但布尔什维克几点钟内就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次冒险动作镇压下去了。在国内其他几个地点，也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地方组织企图举行叛乱，但这种冒险动作也到处很快就被消灭了下去。

现在已由法庭对反苏维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份子联盟”的公审查明，当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是经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两人知悉及同意后所发动，并且是布哈林份子、托洛茨基份子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的那个反革命阴谋计划中的一部分。

同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留姆金，他后来成了托洛茨基底走狗，——钻进德国大使馆去刺死了德国驻莫大使米尔巴赫，以期挑起德国来同我国战争。然而，苏维埃政府终于防止了战争，打破了反革命份子底挑拨。

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即第一个苏维埃宪法。

简短的结论

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的八个月中实现了极困难的任务：争取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把千百万农民吸收到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来。它使这些群众脱离了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底影响，一步一步地揭破了这些政党反对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布尔什维克党在前线和后方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工作，准备群众去实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这时期的党史中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就是列宁的归国,列宁四月提纲的公布,党的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人阶级从我党决议中取得了力量和胜利的信心,找到了对革命一切重要问题的答复。四月代表会议把党引向于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党指向于实行武装起义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

妥协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已结束了他们的发展过程:这些政党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变成了主张保全与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政党。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领导了群众为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同时,布尔什维克打破了党内投降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等人想使党离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企图。

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同贫农联盟并在海陆军兵士群众协助下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奠定了新式的国家,即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转交农民使用,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剥夺了资本家,争得了摆脱战争的出路——和平,获得了必要的暂息时机,因而造成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生产资料,把工厂、土地、铁路和银行变成了全体人民所有产,即变成了社会公有财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把一个巨大国家的领导权转交了工人阶级,因而使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

这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开辟了人类史上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纪元。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时期)

(一)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国内战争第一时期。

苏维埃政权在西欧战事正酣时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并因实行种种革命经济设施而巩固起来的事实，深使西方各国帝国主义者，尤其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感到不安。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害怕，俄德两国缔结和约的事实将使德国作战地位占到便利，而使协约国作战军队感到困难。其次，他们害怕，俄德两国奠定和平的事实将使各国和各战场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因而就会使战争事业，使帝国主义事业受到破坏。最后，他们害怕，苏维埃政权存在于一个广大国家及其在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权后已获得大批成功的事实，可能使西欧各国工人和兵士群众受到熏陶，这些群众既对战争迁延深感不满，就可能效法俄国工人和兵士群众榜样倒转枪头反对本国统治者和压迫者。因此，各协约国政府就决定来对俄国实行武装干涉，以期推翻苏维埃政权，成立资产阶级政权，希望后者能在俄国恢复资产阶级制度，取消俄德和约，恢复对德奥两国作战阵线。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所以乐意来干这种黑暗勾当，更因为他们深信苏维埃政权不稳固，以为只要苏维埃政权敌人相当努力一下，苏维埃政权就必然会很快灭亡的。

因苏维埃政权获得成功和日趋巩固而尤感惊惶的，是国内已被推倒的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已被击破的政党(立宪民

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及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及白卫将军和哥萨克军官等等。

所有这些敌人份子,从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天起,便异口同声地叫喊,说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没有根基,说它一定要遭受失败,说它经过一两星期,经过一月,至多是经过两三个月,就会必遭灭亡。但因苏维埃政权不顾敌人怎样诅咒而仍是继续存在并且巩固起来,于是俄国内部苏维埃政权底敌人也就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要比他们先前所想像的强大得多,所以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就需要有一切反革命势力底严重努力和残酷斗争。因此,他们便决定来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工作,借以收集反革命力量,纠合军事干部,组织叛乱,首先是在哥萨克和富农区域组织叛乱。

这样,还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已确定形成了两种准备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势力:协约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内部的反革命。

这两种势力中的任何一种势力,都没有充分力量来单独进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虽拥有掀起反苏维埃政权暴动所必需的若干军事干部和人员,主要是哥萨克上层份子和富农,但却没有金钱和军火。反之,外国帝国主义者拥有金钱和军火,但却不能“抽出”充分兵力来进行武装干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必须用兵去同德奥作战,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兵力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会是不大可靠的。

由于这种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条件,遂使国内外这两种反苏维埃势力必须实行联合。而他们也确实就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联合起来了。

外国武装干涉者以俄国内部苏维埃政权敌人反革命叛乱为内应而进行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就是这样造成的。

暂息时机业已终结,俄国各民族工农同苏维埃政权内外敌人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了。

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未经宣战而径直开始了武装干涉，虽然这次武装干涉分明是反对俄国的战争，并且是最坏的一种战争。这些“文明”强盗就像盗窃一般，潜入俄国边境，把自己的军队开进到俄国领土里来。

在俄国北部有英法两国军队实行登陆，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牟尔曼斯克，扶持当地的白卫叛乱，推翻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成立白卫的“北俄政府”。

在海参崴有日本军队实行登陆，占领沿海州，驱散苏维埃，扶持不久后恢复过资产阶级制度的白卫叛乱份子。

在北高加索，科尔尼洛夫，阿列克塞也夫和邓尼金等将军在英法援助下组织白卫“志愿军”，发动哥萨克上层份子的叛乱，开始向苏维埃政权大举进攻。

在顿河一带，克拉斯诺夫将军和马蒙托夫将军在德帝国主义者秘密援助下(因为已与俄国订有和约，不便公开援助)发动顿河哥萨克的叛乱，占领顿河区，并开始向苏维埃政权大举进攻。

在窝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一带，由英法两国阴谋造成了捷克斯拉伐克军团的叛乱。这个军团原是由军事俘虏组成，由苏维埃政府允许经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回本国的，但它在中途却被社会革命党人和英法两国利用来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当这个军团举行叛乱时，窝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富农，以及沃特根工厂和益热夫工厂里同情社会革命党的工人立即发动叛乱实行响应。在窝尔加河岸成立了萨马拉白卫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在阿姆斯特克城成立了西伯利亚白卫政府。

德国没有参加而且也不能参加英法日美联盟所进行的这次武装干涉，因为它当时还与这个联盟处于交战地位。虽然如此，虽然订有俄德和约，但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深知德皇威廉政府也如英法日美武装干涉者一样，是苏维埃国家底凶恶敌人。而德帝国主义者也确实用过各种办法，以图孤立、削弱并消灭苏维埃国家。他们

从苏俄方面——固然是按他们和乌克兰拉达(注六七)订立的“条约”——夺去了乌克兰,应乌克兰白卫拉达之请调兵进驻乌克兰,用残暴手段劫掠和压迫乌克兰人民,禁止乌克兰人民同苏维埃俄国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从苏俄方面夺去了南高加索,应格鲁吉亚和阿捷尔拜疆两处民族主义者之请调派德土军队进驻该地,在梯弗里斯和巴库肆意横行。他们多方——虽然是暗地里——用军火和粮食援助当时在顿河区举行叛乱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反对苏维埃政权。

这样,苏维埃俄国就与各个富产粮食,原料和燃料的基本区域隔绝了。

当时苏维埃俄国情形是很困难的。面包供给不够。肉类供给不够。工人忍饥挨饿。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城中的工人每两天只能领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甚至还有完全不能发给面包的日子。工厂因为缺乏原料和燃料,不得不停止生产,或者是几乎停止生产。但工人阶级并没有灰心丧气。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灰心丧气。当时所遭到的莫大困难以及为克服这种困难而进行的坚忍斗争,证明工人阶级中蕴藏有怎样源源不绝的力量,证明布尔什维克党享有怎样无限伟大的威信。

党宣布全国为军营,并把全国经济和文化政治生活转入战时轨道。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并号召人民实行抗战。列宁提出“一切为前线”的口号,于是就有几十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加入红军,开往前线作战。有约占党员和青年团员总数一半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开赴前线了。党发动人民来进行卫国战争,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者军队底侵犯,反对被革命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底叛乱。列宁所组织的工农国防委员会领导了用人力、粮食、服装和军火供给前线的事业。由于把志愿原则改为义务兵役制的结果,红军既已得到几十万新的人员补充,于是红军在很短期间便成为百万大军了。

不管国内状况如何困难，虽然红军尚属年轻，未及强固，但由于实施种种国防办法的结果，第一批成功终于已经获得了。克拉斯诺夫将军已从他所认为定能占领的沙丽城方面被击退，且被逐到顿河以外。邓尼金将军被拊在北高加索一隅，而科尔尼洛夫将军则在与红军交战中阵亡。捷克斯拉伐克军团和社会革命党白卫匪帮，已被红军从嘉桑，西姆比尔斯克和萨马拉驱走并压退到乌拉尔去了。英国驻莫使节团首席代表罗卡尔特在雅罗斯拉夫里城所组织的白卫沙温可夫叛乱已被扑灭，罗卡尔特本人被捕。刺死了乌里茨基和沃洛达斯基两同志并还向列宁实行过谋刺举动和社会革命党人，因从事反布尔什维克的白色恐怖而受到红色恐怖的惩治，并在俄国中部一切较为重大的地点被打成粉碎。

年轻的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受到锻炼，并且壮大了。

当时担任红军政治委员的共产党员，在巩固红军，进行红军政治训练，加强红军战斗能力和纪律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布尔什维克党知道，红军所获得的这些胜利还不能解决问题，还不过是红军底初步胜利。它知道前面还有更加严重的新的战斗，国家还必须同敌人进行长期严重的斗争，才能把富产粮食、原料和燃料的沦陷区域收复。因此，布尔什维克就来加紧准备进行长期的战争，决定使整个后方都来与前线服务。苏维埃政府施行了战时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对大工业施行监督之后，对中小工业也施行监督，以便积蓄大量日用消费品去供军队和农村底需要。苏维埃政权施行了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了私人粮食贸易，并规定了余粮收集制，以便统计农民所有的剩余粮食并储蓄后备谷物来供给军队和工人。最后，苏维埃政权施行了普及于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党既迫使资产阶级来参加体力劳动，借以抽出一部分工人去作对前线更为重要的工作，于是党也就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原则。

所有这些为非常困难的国防条件所引起，并带有临时性质的

种种设施,便称为战时共产主义。

国家准备去同苏维埃政权内外敌人作长期严重的国内战争。它到一九一八年底的时候就要把军队人数增加到三倍。它应当积蓄供给这个军队的资料。

列宁当时指明:

“我们曾经决定到春季造成一百万人的军队,而现在我们却需要有三百万人的军队。我们能造成这样一支军队,并且我们一定会造成这样一支军队”。

(二)德国的军事失败。德国的革命。第三国际的成立。第八次党代表大会。

当苏维埃国家准备去同外国武装干涉势力进行新战斗的时候,西欧各交战国后方和前线发生了一些极重大的事变。德奥两国因受战争和粮食恐慌重压而气息奄奄。当时英法美三国运用着一批批新的资源,而德奥两国方面却连最后一点资源也消耗殆尽。眼看这疲竭到极点的德国和奥国,很快就要遭到失败。

同时在德奥两国内部又是民情鼎沸,反对这不知何时终结和祸国殃民的战争,反对把人民弄到精疲力竭和饥寒交迫境地的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十月革命底伟大革命影响,苏军兵士与德奥兵士早在布列斯特和约前就在战线上实行联欢的事实,以及德方与苏维埃俄国停战媾和这一事实底影响,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俄国人民借推翻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而把他们所痛恨的战争结束了的实例,不能不给予奥德工人一个教训。德军方面那些在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从东方战场调到西方战场的士兵向当地德军叙述他们怎样和苏军兵士联欢,以及苏军兵士怎样摆脱了战争的情形,不能不使当地德军发生瓦解。至于奥国军队,那末它还在更早以前,就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开始瓦解了。

因为有这一切情况,所以德军中渴望和平的趋向已经加强,他们已失去先前的战斗能力,结果就在协约国联军压击下开始退却,

而在德国本国，又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爆发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

德国不得已而承认自己为战败国，并向协约国求和。

于是，头等强国的德意志一下就降为次等强国了。

这种情形对于苏维埃政权颇为不利，因为它使那些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的协约国变成了欧亚两洲的统治力量，使它们可以加强武装干涉并对苏维埃国家实行封锁，更加紧紧地围困苏维埃政权。结果正是如此，这点我们往下就可看见。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却又有更加重要，根本上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良好作用。第一，它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取消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停止支付赔款，并进行公开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来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别洛露西亚、立陶宛、乌克兰及南高加索免除德帝国主义的压迫。第二，——这是主要的——在欧洲中部的德国成立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事实，曾不能不使欧洲各国革命化，而且真正已使欧洲各国革命化，结果也就不能不巩固俄国苏维埃政权底地位。固然，德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那里的苏维埃做了听凭资产阶级国会利用的工具，因为这些苏维埃是由像俄国孟什维克那样的妥协派社会民主党人所把持，这也就是德国革命软弱无力的原因。那里的革命竟是如此软弱，致使德国白卫份子可以任意杀害卢森堡和李布克内西这样有名的革命家，而不受到任何惩罚。但它终究是一次革命。威廉已被推倒，工人已从枷锁下解脱出来，单是这事实也就不能不展开西欧各国的革命，不能不引起欧洲各国革命的高潮。

欧洲的革命高潮开始了。奥国革命运动扩展起来。在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欧洲各国共产党在革命浪潮基础上出现了。

各国共产党统一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实际基础已经奠定。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召集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虽然有许多代表因为帝国主义者实行封锁和追究而没能到达莫斯科,但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终究有欧美各重要国家底代表参加。世界代表大会是在列宁领导下举行的。

列宁在他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中,说明了苏维埃政权是供劳动者享受的真正民主。世界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号召世界各国工人为无产阶级专政,为苏维埃革命胜利而坚决奋斗。

世界代表大会选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底执行机关。

这样就成立了新式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即共产国际这一马列主义国际。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一方面既有协约国反动联盟加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有欧洲各国,主要是战败国中革命高涨大大减轻了苏维埃国家困难情况的这种矛盾局面下,我党召集了第八次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三百零一个有表决权的代表,总共代表着三十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六个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计有一百零二人。

列宁致代表大会开幕词时,第一句话就是悼念大会开幕前夜逝世的布尔什维克党优秀组织者之一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纲上说明了资本主义及其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底特征。党纲上对比了两种国家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党纲上详细地指出了党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具体任务:澈底剥夺资产阶级,按照社会主义统一计划经营全国经济,吸收职工会参加组织国民经济的事业,实行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在国民经济中由苏维埃机关监督利用专门家,有条不紊地逐

渐吸收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代表大会采纳了列宁提出的意见,认为党纲上除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一定义外,还要把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旧党纲上说明工业资本主义和简单商品经济的一节写进去。列宁认为在党纲上必须估计到我国经济底复杂情形,并指出我国有各种经济结构,其中包括有中农所代表的小商品经济。因此,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反对了布哈林提议把论资本主义,论小商品生产,论中农经济的条文从党纲上删去的这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布哈林底这种观点,也就是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否认中农在苏维埃建设中作用的观点。同时,布哈林抹煞了富农成份从小商品农民经济中生长出来的事实。

同时,列宁还驳斥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两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他们两人反对把民族自决权条文写进党纲,反对民族平权,理由是说这个口号能妨碍无产阶级革命底胜利,能妨碍各族无产者底联合。列宁驳倒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这种极有害的大国沙文主义观点。

对中农态度问题,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工作中占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实现著名土地法令的结果,农村已是一天天变成为中农的了。当时中农已在农民人口中占多数。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中农,其情绪和行为对于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底命运有极大的意义。国内战争底结局,在许多方面都要依中农究竟动摇到何处去为转移,要依中农究竟是受那一阶级所吸引,是受无产阶级还是受资产阶级所吸引为转移。捷克斯拉伐克军团,白卫份子,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九一八年夏在窝尔加河一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也就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很大一部分中农底援助。富农在俄国中部组织叛乱时的情形也是如此。但从一九一八年秋天起,中农群众已转向于同情苏维埃政权。农民已经看见:白军获得胜利,就会恢复地主政权,夺去农民手中的土地,使农民

受到抢劫,拷打和残杀。贫农委员会粉碎富农的活动,也促进了农民情绪上的改变。因此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就提出了如下的口号。

“要善于与中农达到协定,一分钟也不放弃反富农的斗争,而只是稳稳地倚靠着贫农”(《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页)。

诚然,中农还没有完全停止动摇,但他们已是更接近于苏维埃政权,更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了。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对中农的政策,大大促进了这点。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党对中农政策上的转变关头。列宁底报告和代表大会底决议,决定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新路线。代表大会认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把中农与富农辨识和分划清楚,并用细心关注中农需要的态度把中农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绝对不要用强制方法,不要用强迫手段,而是要用说服方法去克服中农底落后性。因此,代表大会指示说:在农村中实行社会主义设施(成立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时,决不可采取强制手段。在凡与中农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场合,都要同中农成立实际的协定,要在决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上对中农让步。代表大会责成实行无产阶级与中农坚固联盟,同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在这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政策。

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对中农的新政策,要求无产阶级倚靠贫农,与中农保持坚固联盟,并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在大体上是实行了中立中农的政策。这就是说,党在当时设法使中农不站到富农方面,不站到一般资产阶级方面去。但现在这已是不够的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已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进到了与中农实行坚固联盟反对白卫势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以及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

代表大会所采取的对农民基本群众,即对中农的路线,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者及其白卫走狗的国内战争获得胜利的结局中,起

了决定的作用。一九一九年秋，当农民必须在苏维埃政权和邓尼金之间二者择一的时候，农民拥护了苏维埃，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战胜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代表大会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是红军建设问题。代表大会上有所谓“军事反对派”出来说话。“军事反对派”中有许多人是先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然而“军事反对派”中除了参加过当时已被粉碎的“左派共产主义”集团的份子外，还有从未参加任何反对派，但对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领导表示不满的工作者。大多数军人代表都激烈反对托洛茨基，反对他那种崇拜旧时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国内战争时期公开叛变了我们），而藐视和仇恨军队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干部的态度。在代表大会上举出了许多“实践”例子，证明托洛茨基企图枪毙他所不喜欢的许多在前线上担任负责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借以帮助敌人，只是由于中央出而干涉和军事工作人员提出抗议，才使这些同志幸免于死。

“军事反对派”虽然反对了托洛茨基歪曲我党军事政策的行为，但他们在许多军事建设问题上却拥护了不正确的观点。列宁和斯大林坚决驳斥了“军事反对派”；因为“军事反对派”拥护军队中游击主义底残余，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反对任何一个真正军队所绝对必需的铁的纪律。在反驳“军事反对派”时，斯大林同志要求建立充满严格纪律精神的正规军队。

“要就是——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创造起真正是工农的，主要是农民的，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而把共和国保持住；要就是我们陷于灭亡”。

代表大会否决了“军事反对派”所提出的许多意见，同时又给了托洛茨基一个打击，要求改善中央军事机关底工作，并加强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作用。

由于代表大会所成立的军事问题委员会工作的结果，代表大会在军事问题上达到了一致的决定。

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使得红军巩固起来,使得红军更加跟党接近了。

其次,在代表大会上还讨论了党和苏维埃的建设问题,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代表大会给了萨普朗诺夫和奥新斯基两人领导的机会主义集团一个回击,因为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最后,因为当时有大量的新党员加入了党,所以代表大会通过了改善党员社会成份和举行重新登记的决议。

这就是第一次清党的开始。

(三)武装干涉的加强。苏维埃国家的被封锁。高尔察克的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的进攻及其被粉碎。三个月的暂息时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协约国既将德奥打败,就决定调大批兵力来反对苏维埃国家。自德国遭受失败,而德军已从乌克兰和南高加索撤退以后,英法两国就替代了德国,把自己的军舰开进了黑海,派自己的军队在敖德萨和南高加索一带登陆。协约国武装干涉者在其所强占的区域内肆行残暴,居然用武力摧残整批整批工农群众。最后,武装干涉者占领土尔克斯坦后更是凶横至极,竟将当时在巴库负领导责任的邵武勉、飞奥列托夫、查帕里则、马里根、阿齐斯伯可夫、科尔干诺夫等二十六个布尔什维克同志解到里海东岸,并在社会革命党人协助下把他们实行枪毙了。

此后不久,武装干涉者又宣布对俄国实行封锁。俄国同外界来往的一切海路及其他交通道路,都被截断。

于是,苏维埃国家就陷于几乎四面受围的地位。

当时协约国底主要希望是寄托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身上,后者是协约国驻西伯利亚,驻鄂木斯克城的走狗。高尔察克被宣布为“俄国最高执政者”了。俄国所有一切反革命势力都受他的节制。

于是，东方战线成为主要战线了。

一九一九年春，高尔察克既已聚集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差不多已进到窝尔加河畔。当时为抗拒高尔察克而派去了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动员了许多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工人。一九一九年四月，红军使高尔察克军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不久高尔察克军队便开始了全线总退却。

当红军在东方战线进攻正烈的时候，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可疑的计划：停留在乌拉尔山前，对高尔察克军队停止追击，把东方战线的军队调往南方战线。党中央十分懂得绝对不可让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留在高尔察克手中，让他在那里凭靠日英两国援助而恢复元气和重振旗鼓，于是党中央就否决这个计划而发出继续进攻的指示。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一指示，乃提出辞职声明。中央否决了托洛茨基辞职的声明，同时又责成他立刻离开东线战事的领导工作。于是红军就来加紧向高尔察克进攻，结果又给了高尔察克许多新的打击，并在敌后强大游击运动援助下把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从白军手里解放出来了。

一九一九年夏，领导西北一带（波罗的海沿岸，彼得格拉附近）反革命势力的尤登尼奇将军，又奉帝国主义者命令向彼得格拉实行进攻，借以牵制东方战线上的红军力量。彼得格拉附近两个炮台上的防军因受旧时军官反革命煽动所惑，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而在前线参谋部中又有反革命的阴谋发现。彼得格拉受到敌人威胁了。但由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种种办法，加上有工人和水兵群众方面的援助，终使两个举行叛乱的炮台从白军手中解放出来，使尤登尼奇军队遭到失败，并把尤登尼奇本人驱逐到爱沙尼亚去了。

在彼得格拉附近击败尤登尼奇之后，我军已易于集中力量去同高尔察克斗争。一九一九年末，高尔察克军队已全被击溃。高尔察克本人被擒，并由革命委员会判决在依尔库茨克枪毙了。

于是便把高尔察克军队澈底消灭了。

当时,在西伯利亚民间唱出了一支讥讽高尔察克的歌曲: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草，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掉落了，
烟草吸完了，
执政王滚蛋了”。

武装干涉者看见高尔察克没有实现他们所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便来改变其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驻扎在敖德萨的陆战队不得已而调了回去,因为武装干涉者底军队同苏维埃共和国军队接触时受到革命精神的薰染,已开始起义来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例如,敖德萨有法国水兵在马尔梯领导下举行起义。因此,当时在高尔察克被消灭以后,协约国便把主要视线移到科尔尼洛夫同僚和“志愿军”组织者的邓尼金将军身上。当时邓尼金正在南方,即在库班一带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勾当。协约国用大批武器军装供给邓尼金军队,将其开往北方去反对苏维埃政权。

于是,南方战线便成为主要战线了。

一九一九年夏,邓尼金开始其对苏维埃政权举行的主要进攻动作。托洛茨基瓦解了南方战线上的工作,使我军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至十月中旬,白军占据了乌克兰全境,夺得了奥勒尔城,并已逼近到供给我军子弹、步枪和机关枪的土拉城。白军部队向莫斯科进逼。苏维埃共和国处在极严重的情况中。党敲起警钟,号召人民起来抗战。列宁发出“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的口号。受着布尔什维克鼓励的工农振起全副力量,以求把敌人消灭。

为了要组织击溃邓尼金势力的战事,于是中央把斯大林,沃罗

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及布将尼四同志派往南方战线。托洛茨基被撤销指导南方战线红军动作的职权。在斯大林同志来到以前，南方战线指挥部同托洛茨基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其内容是要从沙丽城经顿河草原达诺沃斯斯克城对邓尼金施行主要的打击，但红军沿顿河草原行进，就会遇到完全没有道路的地带，并且还要经过颇大部分居民受着白卫影响的哥萨克区域。斯大林同志给了这计划一个严厉的批评，并向中央提出自己制定的粉碎邓尼金的计划，其内容是经过哈尔科夫——顿巴斯——罗斯托夫路线对邓尼金施行主要打击。我军实行这个计划，就能迅速前进去反对邓尼金，因为依照这个计划所要经过的工农区域中的居民显然是同情我军的。此外，这个区域又有稠密的铁路网，使我军可以经常获得一切必需品的供给。最后，实行这个计划，就能解放顿涅茨矿区，借以保证我国燃料的供给。

党中央采纳了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计划。于是，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下半月，邓尼金作了几次残酷抵抗以后，就在奥勒尔和沃龙涅什两城附近会战中被红军击破。邓尼金开始迅速退却，随后就在我军追击下向南方仓皇逃窜。一九二〇年初，乌克兰全境和北高加索都从白军手中解放出来了。

当在南方战线上进行决战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又派尤登尼奇军团来进攻彼得格拉，借以牵制我军南线的力量而减轻邓尼金军队底窘局。白军已逼近到彼得格拉城下了。彼得格拉英勇的无产阶级挺着胸膛来捍卫第一个革命城市。共产党员现在也如通常一样在最前列作战。经过几次激战以后，白军便被击破，而且又被驱逐到我国境外，驱逐到爱沙尼亚去了。

于是便把邓尼金军队也澈底消灭了。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溃灭以后，接着就开始了—一个短促的暂息时期。

帝国主义者眼看白卫军队已被击溃，武装干涉没有什么成就，

苏维埃政权已在全国巩固起来,而在西欧又增长着工人愤恨武装干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战争的怒潮,于是就来改变自己对于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一九二〇年一月,英法意三国决定取消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

这是武装干涉墙壁上打穿的一个极严重的裂口。

这当然还不是说苏维埃国家已消灭了武装干涉,已结束了国内战争。当时还有帝国主义波兰进犯的危险。在远东,南高加索和克里木一带,武装干涉者还没有尽被驱逐出去。但苏维埃国家此时已获得一个暂息机会,可能用更多的力量去进行经济建设。党已获得了从事经济问题的可能。

在国内战争时期,有许多熟练工人因为工厂停闭而离开了生产。现在党又把熟练工人调回生产,使其能各按自己的专长从事工作。有几千个共产党员被派去恢复当时情形极为困难的运输业。当时若不把运输业恢复,便不能切实着手恢复基本工业部门。粮食方面的工作已经加强和改进了。拟制俄国电气化计划的工作已在开始进行。当时红军现役战士还约近五百万人,因为还有战争危险存在,所以暂时还不能把他们遣散。因此就把一部分红军部队改编为劳动军,好利用他们来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工农国防委员会改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同时又为辅助它的工作而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一九二〇年三月底召集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幕的。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五百五十四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一共代表着六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计有一百六十二人。

代表大会规定了国家在运输业和工业方面最近的经济任务,并特别指出职工会必须参加经济建设事业。

代表大会对规定首先振兴运输业、燃料业和冶金业的统一经

济计划问题，曾予以特别注意。在这个计划上占主要地位的是全部国民经济电气化的问题，列宁提出了电气化的任务作为“预定在一二十年内实现的伟大纲领”。后来根据这个指示而制定了有名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它现在已大大超过完成了。

代表大会申斥了反党的“民主集中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反对在工业方面实行一长制和经理专责制，而坚持工业领导方面的无限制的“合议制”和无人负责现象。这个反党集团中的主要角色是萨普郎诺夫，奥新斯基和佛·斯米尔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拥护他们的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四）波兰地主对苏维埃国家举行进攻。弗兰格尔将军实行袭击。波兰计划的失败。弗兰格尔的溃灭。武装干涉的终结。

虽然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已被击溃，虽然苏维埃国家已把北方边疆、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顿河区、乌克兰及其他区域从白军和武装干涉者手中收复过来而更加扩大了自己的领土，虽然协约国已被迫取消了对俄封锁，但协约国终究不肯容忍苏维埃政权不可摇撼的事实，不肯容忍苏维埃政权已获胜利的事实。因此，他们决定再来一次武装干涉苏维埃国家的尝试。这次武装干涉者打算一面利用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且事实上是波兰国家元首的皮尔苏茨基，另一方面利用当时在克里木收集邓尼金残部并从那里来威胁顿巴斯和乌克兰一带的弗兰格尔将军。

正如列宁当时所形容的那样，地主波兰和弗兰格尔是国际帝国主义企图用来扼死苏维埃国家的两只手。

波兰人当时的计划是要占领苏维埃乌克兰境内的德涅伯尔右岸地区，占领苏维埃别洛露西亚，在这里恢复波兰地主政权，把波兰国家境界扩大到“由一海到另一海”，即由但泽到敖德萨，并为报酬弗兰格尔的帮助而帮助弗兰格尔击破红军，在苏维埃俄国恢复地主资本家底政权。

这个计划是经各协约国批准了的。

苏维埃政府为了保持和平,防止战争,曾经设法同波兰进行谈判,可是没有获得任何结果。皮尔苏茨基根本不愿谈及和平。皮尔苏茨基想要作战。他以为红军已在与高尔察克及邓尼金作战中陷于疲惫,一定会挡不住波兰军队的进攻。

短促的暂息时期从此终结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波兰军队闯入苏维埃乌克兰境内,占领了基也辅城。同时,弗兰格尔也转为进攻,威胁着顿涅茨矿区。

红军部队为回答波军进攻而展开了全线总反攻。南方战线上的红军部队把基也辅收复并把波兰地主驱出乌克兰和别洛露西亚之后,就乘胜猛攻,一直攻到加里细亚省里沃夫城下,而西方战线的红军部队则已逼近华沙。波兰地主军队的完全失败,已是指日可待了。

但托洛茨基及其在红军总参谋部中的拥护者形迹可疑的行动,却打破了红军底成功。西线红军部队向华沙方面进攻的动作,竟因托洛茨基和屠哈切夫斯基两人措置失当而进行得毫无组织:没有让军队巩固已占领的阵地,把前锋部队推进到了太远的前面,把后备部队和弹药留到了太远的后方,因而使前锋部队落得既没有弹药,又没有后备队伍的地位,把战线拖得长到极点,因而使我方阵线易被敌人冲破。由于有这一切情况,所以当波兰军队一个不大集团突破我军西线一个地段的时候,我军就因缺乏弹药而不得不实行退却。至于我军已经进到里沃夫城下并在那里攻退波军的南线部队,那末所谓“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却竟禁止他们占领里沃夫,并命令他们把骑兵军团,即南方战线的主力,调到很远的东北方去,似乎是为着援助西方战线,虽然当时不难了解,只有占领里沃夫,才是给予西方战线唯一可能而且最好的援助。但骑兵军团退出南方战线行列和离开里沃夫,实际是等于我军在南方战线上也实行退却。这样,托洛茨基所发出的暗害性的

命令，就强迫我军南线部队实行莫明其妙和毫无理由的退却，而使波兰地主大大欢喜。

这是一种直接的帮助，不过不是给予我军西方战线的帮助，而是给予波兰地主和协约国的帮助。

过几天后，波兰军队底攻势已被阻住，而我军部队就开始准备再向波军反攻。但是波兰既无力继续战争，又害怕红军实行反攻，遂不得不放弃其企图占领德涅泊尔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和别洛露西亚的计划，甘愿同俄国订立和约。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我国与波兰在里加城订立了和约，上面规定加里细亚和一部份别洛露西亚领土留归波兰。

苏维埃共和国同波兰订立和约后，便决定去消灭弗兰格尔。弗兰格尔从英法方面领到了最新式的武器、装甲车、坦克、飞机和军需品。他拥有白卫突击部队，主要是军官部队。但弗兰格尔在其所调到库班和顿河区登陆的军队周围，却没能集合起若干重大的农民和哥萨克势力。虽然如此，而弗兰格尔终究已紧逼到顿涅茨矿区，使我们的产煤区域受到威胁。并且，还有一种情况也使苏维埃政权地位趋于困难，就是红军此时已很疲倦了。红军战士必得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移动，一方面要向弗兰格尔军队进攻，同时又要消灭帮助弗兰格尔的马赫诺无政府主义者匪股。可是，虽然弗兰格尔拥有技术上的优越，虽然红军没有坦克，但红军终于把弗兰格尔驱逐到克里木半岛上去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红军克复了皮列可普工事阵地，冲进了克里木半岛，粉碎了弗兰格尔军队，并把克里木从白军和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出来。克里木成为苏维埃的了。

于是，武装干涉时期就以地主波兰大国主义计划破产和弗兰格尔溃败而终结了。

一九二〇年末，南高加索开始从阿捷尔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木沙瓦特派，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孟什维克以及阿尔明尼亚

达史那克派压迫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权在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及格鲁吉亚一带胜利了。

但这还不是说武装干涉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在远东方面的武装干涉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二年。此外,还有人作过组织武装干涉的新尝试(一九二一年间,在东方有谢米诺夫统领和温琴男爵实行发动,在卡列里亚有芬兰白军进行干涉)。但苏维埃国家底主要敌人,武装干涉方面的主要势力,到一九二〇年末已被粉碎了。

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白卫反对苏维埃的战争,结果是苏维埃获得了胜利。

苏维埃共和国保住了本身的国家独立,保住了本身的自由生存。

这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终结。

这是苏维埃政权所获得的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五)苏维埃国家怎样和为什么战胜了英法日波武装干涉者与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白卫反革命派联合势力呢?

只要把武装干涉时期的欧美重要报纸拿来看看,就可马上断定:当时没有那一个著名作家(军事的或普通的),没有那一个军事专家相信苏维埃政权会获得胜利。恰巧相反,当时所有一切著名作家,军事专家,研究世界各国革命史的史学家,所谓科学界人物,都异口同声地叫喊,说苏维埃政权底末日已经屈指可数,说苏维埃政权必遭失败。

他们认定武装干涉必获胜利时所持的理由,是说苏维埃国家还没有坚强的红军,这样的红军还得临时建立,而在武装干涉者和白卫方面,都有多多少少是现成的军队。

其次,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红军没有谙练的军事干部,因为这样的干部大多数都已跑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却拥有这样的干部。

复次，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红军因俄国军事工业落后而苦于军火数寡质劣，并且红军又因当时俄国四面均被紧紧封锁而不能从其他国家取得军用品，而当时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队却源源不绝地获得头等武器、弹药和军装的供给，并且将来还会获得这种供给。

最后，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队据有俄国粮产极丰的区域，而红军却因没有这种区域而苦于粮食不足。

所有这一切缺点在红军方面确实是都有过的。

在这一点上，——但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武装干涉者老爷们是说得完全对的。

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有这么多严重缺点的红军毕竟战胜了没有这种缺点的武装干涉者和白卫的军队呢？

（一）红军之所以战胜了敌人，是因为红军所捍卫的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适合于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因为人民明白了解这一政策是正确的政策，是他们自己的政策，所以他们也就澈底拥护了这一政策。

布尔什维克知道，一个为了不正确的政策，为了人民所不拥护的政策而斗争的军队，是不能获得胜利的。武装干涉者和白卫的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武装干涉者和白卫的军队有着一切：有老旧的谙练的指挥官，有头等的武器，有弹药，有服装，有粮食。但是他们缺少了一件东西，即缺少了俄国各族人民底援助和同情，因为俄国各族人民不愿而且也不能援助武装干涉者和白卫“执政者”那种反对人民的政策。因此，武装干涉者和白卫的军队也就遭受了失败。

（二）红军之所以战胜了敌人，是因为红军澈底忠实和献身于本国人民，所以人民也就爱戴和拥护它，把它看作是与自己骨肉相连的军队。红军是人民底产儿，所以只要它像儿子对待母亲那样忠实于自己的人民，那它就一定能得到人民底援助，就一定会获得胜利。而反对本国人民的军队，则一定会遭到失败。

(三)红军之所以战胜了敌人,是因为苏维埃政权能把整个后方,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为前线利益服务。一个没有竭力援助前线的坚固后方的军队,是必然要遭受失败的。布尔什维克知道这点,所以他们也就把全国变成了用武器、弹药、服装、粮食以及补充人员供给前线的军营。

(四)红军之所以战胜了敌人,是因为(甲)红军战士了解了战争底目的和任务,认识了这些目的和任务的正确;(乙)对于战争目的和任务正确的认识,巩固他们的纪律精神和战斗能力;(丙)因此,红军战士群众同敌人撕杀的时候,往往表现出史无前例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空前未闻的群众英勇气概。

(五)红军之所以战胜了敌人,是因为红军后方和前线的领导核心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个因为团结紧密和纪律坚强而统一的政党,是个因为具有坚强革命精神和为共同事业成功牺牲一切的决心而强有力的政党,是个非常善于组织千百万群众并在复杂环境中正确领导他们前进的政党。

“只是因为党会时刻戒备,——列宁说,——因为党有极严格的纪律,因为党底威信把一切机关及部门都统一了起来,而数十,数百,数千以至数百万人都一致遵循中央发出的口号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只是因为有这一切,才造成了现有的这种奇迹。只是因为有这一切,才不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举行二次,三次以至于四次的进攻,而我们终能获得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九六页)(注六八)。

(六)红军之所以战胜了敌人,是因为:(甲)它在自己队伍中炼成了如伏龙芝,沃罗希洛夫,布将尼等等这样一种新型的军事领导者;(乙)在它队伍中作战的有科托夫斯基,夏伯阳,拉佐,邵尔斯,帕尔合勉科及其他许多天生的英雄;(丙)当时担任红军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斯维尔德洛夫,卡甘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库依贝舍夫,米科杨,史丹诺夫,安得

列也夫,彼特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捷尔任斯基,夏殿科,墨赫里斯,赫鲁晓夫,史维尔尼克,史吉里亚托夫等等这样一些政治活动家;(丁)红军在自己的成员中有军事政治委员这样一种出色的组织者和鼓动家,他们自己的工作巩固了红军战士底队伍,他们在红军战士中培植了确守纪律和英勇作战的精神,他们坚决、迅速和无情地斩断了个别指挥员底叛变行为,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大胆和坚决地维持了效忠于苏维埃政权并能坚强果决领导红军部队的那些指挥官(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底威信和荣誉。

“没有军事政治委员,我们便不会有红军”,——列宁这样说过。

(七)红军之所以战胜了敌人,是因为当时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和弗兰格尔等白卫军队后方,有许多出色的党员和非党员布尔什维克秘密进行工作。他们会发动工农起义反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队,破坏了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后方,因而协助了红军进展的动作。大家知道,当时在乌克兰,西伯利亚,远东,乌拉尔,别洛露西亚,窝尔加河一带活动的游击队以其破坏白卫和武装干涉者军队后方的动作,给了红军无限宝贵的帮助。

(八)红军之所以战胜了敌人,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在反对白卫反革命派及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斗争中并不是孤立无助,因为苏维埃政权所进行的斗争及其成功引起了全世界无产者底同情和拥护。当帝国主义者企图用武装干涉和封锁手段来扑灭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而他们国家里的工人却站到苏维埃方面来援助了苏维埃。他们同那些与苏维埃共和国为敌各国资本家们进行的斗争,促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武装干涉动作。英法及其他参加武装干涉诸国工人曾举行罢工,拒绝装载军需品去供给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将军,并且在“不许侵犯俄国”的口号下建立了“行动委员会”。

“当国际资产阶级一动手来打我们的时候,——列宁说道,——它的那只手就被它自己那里的工人抓住了”(《列宁全集》,

第二十五卷,第四〇五页)。

简短的结论

地主资本家被十月革命击破后,便同白卫将军们一起用牺牲祖国利益的代价去与协约国政府勾结,以求共同用武力进攻苏维埃国家和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了协约国武装干涉和俄国边区白卫叛乱,结果便使俄国中部和富产粮食及原料的区域隔绝。

由于德国的军事失败,以及两个帝国主义联盟在欧洲战争的结束,遂使协约国势力得以加强,使武装干涉势力得以加强,而为苏维埃国家造成许多新的困难。

反之,德国所发生的革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中所开始了的革命运动,却为苏维埃政权造成了顺利的国际环境,减轻了苏维埃国家底困难情况。

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工业来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和资产阶级地主白卫势力的卫国战争。苏维埃共和国及其红军把协约国底走狗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和弗兰格尔相继击破,并把协约国底另一个走狗皮尔苏茨基驱出乌克兰和别洛露西亚以外,于是就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武装干涉者军队逐出了苏维埃国土。

这样,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第一次武装进攻,就以国际资本完全失败而告结束。

被革命击破了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等政党,在武装干涉时期帮助白卫将军和武装干涉者,举行倾覆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组织谋害苏维埃活动家的恐怖。在十月革命以前,这些政党在工人阶级中还有过某些影响,而在国内战争时期,却已在民众面前完全揭破了自己是些反革命政党。

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是这些政党在政治上遭到灭亡,而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的时期。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时期)

(一)苏维埃国家在肃清武装干涉和结束国内战争以后。恢复时期的困难。

苏维埃国家把战争结束后,就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必须医治战争所引起的创伤。必须恢复备遭破坏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运输业和农业。

但是,过渡到和平建设这件事,必须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进行。国内战争中的胜利不是轻易获得的。国家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反武装干涉战争弄得穷竭不堪了。

一九二〇年农业出产总量,只等于战前出产总量一半左右。何况这种战前水准,根本就是沙俄农村贫困的水准。加之,一九二〇年在许多州区发生过歉收。农民经济遭遇着严重的困难。

当时处于破坏状态的工业,情形更加恶劣。一九二〇年大工业出产量,几乎少于战前六倍。大多数工厂停闭了,矿山和矿井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淹没了。尤其感到困难的是冶金业。一九二一年全年生铁熔铸量,只等于十一万六千三百吨,即只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百分之三左右。燃料出产不够。运输业被破坏了。国内所有储存的金属和布匹差不多都已用完。甚至连最必需的物品,如面包,脂油,肉类,靴鞋,衣服,火柴,食盐,煤油和肥皂等,也都极感缺乏。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大家都忍耐着这种物品欠缺情形,有

时甚至还不复觉察到这种情形。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战争,于是人们就忽然感到这种物品欠缺情形不堪忍受,而要求立刻把它消灭。

农民中间呈现出一种不满情绪。在国内战争火焰中成立和巩固了工农军事政治联盟。这个联盟所借以支持的基础,是农民从苏维埃政权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农压迫的保障,工人按照余粮收集制从农民方面取得粮食。

现在这种基础已经不够了。

从前,苏维埃国家不得不把农民所有一切剩余粮食都按余粮收集制拿来供给国防需要。不实行余粮收集制,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乃是为战争和武装干涉所逼迫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策。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曾甘愿接受余粮收集制,没有觉察到商品不够的情形,而当战争已告结束,地主回归的威胁已成过去的时候,农民却已开始对征缴一切剩余粮食的办法,即对余粮收集制表示不满,而要求供给他们充分数量的商品了。

全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正如列宁当时所指出那样,已处于同农民利益相抵触的地位。

不满情绪也曾侵入到工人阶级中去。无产阶级担负了国内战争底主要重担,英勇舍己地进行了反对白卫和武装干涉者寇群的斗争,进行了反对经济破坏和饥荒的斗争。最优秀最觉悟最奋勇最守纪律的工人,表现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热忱。但是,极深刻的经济破坏对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影响。当时还在进行生产的很少一部分工厂,往往有生产工作间断的情事发生。工人们不得不从事于手工业,制造点火器和从事小贩投机生意。无产阶级专政底阶级基础削弱下去,工人阶级涣散起来,有一部分工人跑到乡村中去,渐渐不成其为工人,渐渐失去阶级地位了。由于饥饿和疲惫的关系,有一部分工人表现出不满情绪。

于是就有一个问题摆在党面前:必须针对着新的环境来定出

党对于国内经济生活一切问题的新方针。

而党也就来着手规定对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新方针。

但是阶级敌人并没有昏睡。他们企图利用困难经济状况，企图利用农民不满情绪。在西伯利亚，乌克兰以及唐波夫省（当时这里有安通诺夫匪帮叛乱），有白卫份子和 社会革命党人所组织的富农叛乱发生。各种各样的反革命份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卫份子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积极活动起来。敌人采取新的策略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改涂了一层苏维埃颜色，此时他们所喊的已经不是遭了破产的“打倒苏维埃”的旧口号，而是“赞成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苏维埃”的新口号。

当时在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革命叛乱，便是阶级敌人这种新策略底明显表现。这次叛乱是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即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开始的。领导叛乱的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外国代表有勾结的白卫份子。起初，叛乱者极力用“苏维埃”招牌把他们妄想恢复资本家地主政权和私有制的意图掩饰起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反革命势力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群众底不满情绪，以期在仿佛是苏维埃的口号下推翻苏维埃政权。

促成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有两种情况：军舰上水兵成份的变坏和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薄弱。原先参加过十月革命的那些水兵，几乎全体开往前线参加红军队伍英勇作战去了。新补充到海军中来的人员，都是些没有受过革命锻炼的新兵。他们是还完全没有受到过训练的农民份子，反映着农民不满意于余粮收集制的情绪。至于当时的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却又因多次动员上前线而大为削弱。因有这两种情况，所以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白卫份子，就能乘机混进喀琅施塔得，并将它把持起来。

叛乱者占据了 这个头等要塞，连同几艘军舰和大批枪炮弹药。

国际反革命势力已在庆祝胜利。但敌人未免欢乐得太早了。叛乱很快便被苏维埃军队镇压了下去。当时党为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而派出了自己那些参加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优秀子弟,由沃罗希洛夫同志率领前往。红军战士踏着薄冰向喀琅施塔得行进。因为中途冰解,竟有许多人沉到水中。必须朝着几乎是坚不可犯的喀琅施塔得炮台冲击。但对革命的忠诚和勇敢,决心为苏维埃政权捐躯的自我牺牲精神,毕竟占得了上风。喀琅施塔得要塞由红军猛力攻克。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被肃清了。

(二)党内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第十次党代表大会。

反对派的失败。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党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列宁多数很清楚地知道,在战争已经结束并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以后,已经没有根据来把战争和封锁环境所造成的硬性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保存下去。

中央懂得,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继续实行的必要,而应该代之以粮食税,使农民有可能随意去利用他们所出产的大部分剩余粮食。中央懂得,实行这种办法,便能振兴农业,扩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谷物和技术作物出产,振兴全国商品流转,改善城市供给,并为工农联盟造成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

同时,中央也曾注意到振兴工业是首要任务,但它认为要振兴工业,就必须吸收工人阶级及其职工会来参加这件事情;认为如果能用说服方法使工人确认经济破坏是如武装干涉和封锁一样可怕的人民公敌,那末吸收工人来参加这件事情是可能办到的;认为如果党和职工会对于工人阶级不是采取着先前在前线上确实必须加以采用的军事命令手段,而是经过说服,采用说服方法,那末党和职工会毫无疑问是能做到这点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党员都像中央这样想法。各种反对派小团体——托洛茨基份子,“工人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等等,都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都在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轨

道时的困难面前表示动摇。当时党内有不少的人是从前的孟什维克，从前的社会革命党人，从前的崩得份子，从前的博罗提巴份子（注六九）以及俄国边区各种各样的准民族主义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参加过某种反对派小团体的份子。这些人既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受过列宁主义的党性锻炼，当然也就只是加强了反对派小团体思想混乱状态和动摇。其中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必减弱硬性的战时共产主义统制，反而要“把螺丝钉扭紧一下”。另一部分人认为党和国家应把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丢开不管，应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工会去作。

当时看得很明显，党内某些成份中间既有这样一种思想混乱状态，当然也就会有一些爱好争论的人，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首领”钻出来强迫党进行争论的。

结果果然如此。

争论开始时所涉及的是工会作用问题，虽然当时工会问题并不是党政策中的主要问题。

首先发难挑起争论，挑起斗争来反对列宁，反对中央列宁多数的就是托洛茨基。为了要把情形弄尖锐化，于是他在出席第五次全俄职工会代表会议（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的共产党员会议上发言时，竟提出所谓“把螺丝钉扭紧一下”和“把职工会振刷一下”这一形迹可疑的口号。托洛茨基提出了立刻把“职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反对向工人群众采用说服方法。他主张把军事方法搬到职工会里来。托洛茨基反对在职工会里扩大民主，反对职工会机关选举制。

托洛茨基份子反对在工会组织活动中唯一可能运用的说服方法，而主张采取赤裸裸的强制方法，采取赤裸裸的命令手段。凡是由托洛茨基份子占得职工会领导位置的地方，他们总是用自己的政策来在职工会里引起冲突，分裂和瓦解。托洛茨基份子用自己的政策来实行挑拨非党工人群众反对党，来实行分裂工人阶级。

其实,职工会问题争论底意义,是要比职工会问题本身广泛得多。后来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全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在决议中指出,其实当时所争论的是“关于应如何对待那些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农民,关于应如何对待非党工人群众,以及一般关于党在国内战争已归于结束的那个时期中对待群众的方法问题”(《联共(布)决议案汇集》,卷上,第六五一页)。

跟着托洛茨基起来斗争的还有其他的反党集团:“工人反对派”(施里亚普尼可夫,墨得维结夫,柯伦泰等等),“民主集中派”(萨普朗诺夫,多罗布尼斯,波古斯拉夫斯基,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等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工人反对派”提出了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管理事业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去作的口号。他们想把党底作用化为乌有,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工人反对派”拿职工会来与苏维埃国家及共产党对立。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底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职工会。“工人反对派”实际上是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集团要求让各派别组织和团体能完全自由活动。民集派也如托洛茨基份子一样,力图破坏党在苏维埃和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列宁把民集派称为“叫喊得最响亮者”的派别组织,把民集派底纲领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纲领。

布哈林帮助了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反对党的斗争。布哈林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色列普略可夫及索科里尼可夫一起成立了所谓“缓冲”集团。这个集团拥护和掩护了最凶恶的派别组织者托洛茨基份子。列宁称布哈林底行动为“思想堕落至极”。此后不久,布哈林份子就同托洛茨基份子公关联合起来反对列宁了。

列宁和列宁主义者用了主要的火力去打击托洛茨基份子,因为托洛茨基份子是各反党集团中的主力。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揭露了托洛茨基份子把职工会与军事组织混为一谈的罪状,并向他们

指出不可把军事组织底方法搬到职工会里来。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拟定了根本与各反对派团体底政纲相反的政纲。在这个政纲中指出：职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职工会应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建筑在说服方法上。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它才能动员一切工人去消减经济破坏现象，才能吸引他们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与一切反对派集团斗争中，党组织团结到了列宁底周围。莫斯科组织中的斗争来得特别紧张。反对派在这里集中有他们的主要力量，打算把首都组织夺归己有。可是，派别组织者这种阴谋诡计受到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底坚决回击。当时在乌克兰党组织中也发生过尖锐的斗争。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当时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的莫洛托夫同志领导下，击溃了托洛茨基份子和施里亚普尼可夫份子。乌克兰共产党仍然是列宁党底忠实可靠的支柱。在巴库，由奥尔忠尼启则同志领导击溃了反对派。在中亚细亚，由卡甘诺维奇同志领导进行了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

所有一切基本的地方党组织，都拥护了列宁底政纲。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开幕了。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六百九十四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万二千五百二十一个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计有二百九十六人。

代表大会作了职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并以绝大多数表决通过了列宁所提出的政纲。

列宁在宣布代表大会开幕时说，争论是一种不可容许的奢侈品。他当时指出，敌人是满心指望共产党内部分裂的。

第十次代表大会鉴于派别组织底存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莫大的危险，所以特别注意到党内统一问题。列宁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代表大会指斥了一切反对派集团，并指出它们“事实上是帮助无产阶级革命底阶级敌人的”。

代表大会责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委托各级党组织严格

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并说,凡不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人,都应立刻毫无条件地开除出党。代表大会给了中央一种全权,凡遇有中央委员违背纪律,以及凡遇有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事发生时,均得采取党内一切处罚办法,直到开除其中央委员资格和党籍为止。

所有这些决定,都写进了由列宁提出而经代表大会通过的论党内统一的特别决议中。

在这个决议案上,代表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注意,由于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处时期有许多情况加强了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中的动摇,所以党队伍底统一和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统一,是特别必要的。

“但是,——在决议案上指出,——还在全党讨论职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已显露出某些小组织活动的征候,即发生了几个具有其特别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另立门户并规定出自己派别纪律的小团体。必须叫一切觉悟工人明白了解,任何小组织活动都是非常有害而决不可容许的,因为小组织活动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协力进行的工作,必然会使混进到政府党内来的敌人更力图重新加深党内的分立,并利用这种分立来实现其反革命目的”。

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案上接着又说:

“无产阶级底敌人极力利用一切离开共产党坚定路线的倾向,这种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实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份子立刻就表示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底口号,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社会革命党人和一般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运用了仿佛是为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而举行暴动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白卫份子极力并且巧于装扮为共产党人,甚至装扮为似乎比共产党人“更左”的人,只求削弱并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底支柱。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拉发现的孟什维克

传单，也是表明孟什维克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以便实际上来鼓舞并支援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份子，而在口头上则表示自己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是要给苏维埃政权加上一些仿佛不大的修正”。

决议案上指出，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应当透澈说明派别组织活动底害处和危险，因为它能破坏党内的统一，能破坏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基本条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意志的统一。

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决议上指出，——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又应当说明苏维埃政权敌人所采取的最新策略手段底特点。

“现在，——决议上指出，——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他们拼命攫住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像是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借以推进反革命势力（见《联共(布)决议案汇集》，卷上，第三七三至三七四页）。

决议上接着又指出，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同样应当阐明过去各次革命底经验，当时反革命势力也曾援助过最接近于极端革命政党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以便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因而促使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势力将来获得完全胜利”。

与《论党内统一》的决议密切相联的，还有《论我们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这个决议也是由列宁提出而经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上指斥了所谓“工人反对派”。代表大会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党员所能容有的事，并号召全党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

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过渡到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极重要的决议。

从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新经济政策的这一转变，表现出了列宁政策底全部英明和远见。

代表大会决议上说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物粮食税额要比余粮收集额低些,粮食税额必须在春种以前公布,缴税期限是明确规定了的。所有超过税额的剩余粮食,完全留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可以自由出卖这种剩余粮食。列宁在其报告中指出,贸易自由,在开始的时候,会使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有某种活跃。还得容许私人贸易和准许私人工业家开设小企业。但这并用不着害怕。列宁认为少许的商品流转自由能造成农民努力经营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迅速高涨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工业将会恢复起来,而私人资本则将被排挤出去;积蓄了力量和资财以后,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工业——社会主义底经济基础,然后就转为坚决进攻,以便消灭国内资本主义残余。

战时共产主义是用冲击手段,用正面进攻手段攻破城乡资本主义成份的尝试。在实行这个进攻时,党向前面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列宁现在主张稍许后退一点,暂时退到更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方去。由冲击手段转到较为长期的包围敌人堡垒的方法,以便积蓄起力量后,再去开始进攻。

托洛茨基份子及其他反对派份子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退却。这样的解释是于他们有利的,因为他们的路线是要恢复资本主义。这是对新经济政策所作的一种极有害的反列宁主义的解释。其实,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一年以后,列宁就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声言退却已经终结,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实行进攻”(《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一三页)。

反对派份子是个毫不中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政策问题根本是一窍不通,所以他们没有了解新经济政策底实质,也没有了解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实行的那种退却底性质。关于新经济政策底实质,上面已经说过了。至于退却底性质,那末退却是有各种不同的。有时候,党或军队因为遭到了失败,必须实行退却。党或军队在这种场合实行退却,是为着保存自身和保存自

己的干部，准备去进行新的战斗。列宁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并不是主张实行这种退却，因为党并没有遭受失败，并没有被人击破，恰巧相反，它自己在国内战争时期击破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的势力。但也有这样的场合，那时获得了胜利的党或军队因为在进攻过程中向前跑得太远，没有替自己保证后方的根据地，结果便造成了严重的危险。在这种场合，一个有经验的党或军队为了不致脱离自己的根据地，通常认为必须稍许向后退却一下，退到更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点，以便与自己的后方根据地更坚固地联结起来，替自己保证一切必需品，然后就更有把握地，具有胜利保障地重新实行进攻。列宁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所采取的，也就是这种性质的暂时退却。列宁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报告施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时，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在自己的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大远了，没有替自己保证充分的根据地”，因此我们必须朝着有保证的后方实行一个暂时的退却。

反对派倒霉的地方，就是他们因为昏庸无知而不了解，并且至死也没有了解在新经济政策下实行退却底这种特点。

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施行新经济政策的决定，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的经济联盟。

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另一个决议，即论民族问题的决议，也是从这个基本任务出发的。在大会上作民族问题报告的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铲除了民族压迫，但这还不够。现在的任务是要消灭旧时代的沉痛遗产，即从前被压迫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落后的情形。必须帮助他们在这方面赶上俄罗斯中部。

其次，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民族问题方面的两种反党倾向，即大国（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代表大会指斥了这两种倾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对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害而且危险的倾向。同时，代表大会集中其主要火力反

对了当时最为危险的大国主义,即反对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在沙皇制度时代对各个非俄罗斯民族所表现过的那种态度底残余和遗毒。

(三)新经济政策底初步总结。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形成。列宁之患病。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

新经济政策的施行遇到了党内一切不坚定份子底反抗。这种反抗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实行反抗的是“左的”叫喊者,如罗明那则和沙茨金等等一类的政治畸形儿,他们力图“证明”说,施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放弃十月革命所获得的成果,就是回转到资本主义,就是使苏维埃政权趋于灭亡。这些人既是政治上的门外汉,根本不知道经济发展规律,于是也就不懂得党底政策,而陷入了惊惶失措状态,并在自己周围散布着灰心失望的情绪。从另一方面实行反抗的是公开的投降主义者,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索科里尼可夫,加米涅夫,施里亚普尼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等一类的人,他们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匍匐拜倒于资本主义“威力”之前,并且为了要巩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阵地,居然要求对国内和国外的私人资本作巨大的让步。要求按租让原则或按吸收私人资本参加混合股份公司原则,来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经济命脉让给私人资本。

这两种人都是敌视马克思主义,敌视列宁主义的。

党把这两种人都加以揭破并使其陷于孤立。党给了惊惶失措者和投降主义者一个坚决的回击。

这样一种反抗党政策的事实,就是再次提醒说必须把党内不坚定的份子清洗出去。于是中央就进行了一番巩固党的巨大工作,而于一九二一年间举行了清党。这次清党是在公开大会上吸收非党员参加进行的。列宁指示说要澈底从党内清除“……欺骗份子,官僚化份子,不诚实的份子,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

装过‘门面’，但内心里还仍旧是孟什维克的那些人”（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三页）（注七〇）。

由于清党结果而被开除出党的有十七万人，即约占全体党员百分之二十五。这次清洗大大巩固了党，改善了党员底社会成份，加强了群众对党的信任，提高了党底威信。党底团结性和纪律性增长了。

新经济政策施行第一年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个政策的正确。由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已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大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已是更加坚强有力。富农的土匪运动差不多已全被肃清。余粮收集制取消后，中农帮助了苏维埃政权反对富农匪帮的斗争。苏维埃政权把国民经济中的一切经济命脉都保持在手：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土地、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党达到了经济战线上的转变。农业也很快就向前进展了。工业和运输业达到了初步的成功。暂时还很缓慢，但却真实可靠的经济高涨开始了。工农群众感觉到并亲眼看到党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召集了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五百二十二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三万二千个党员，即比上次代表大会时期减少了一些。有发言权的代表计有一百六十五人。党员数量减少，是由于当时已开始了清洗党队伍的工作。

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经济政策施行第一年的总结。根据这些总结，列宁就能在代表大会上声称：

“我们退却已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正在终结，甚至可以说已经终结了。现在所提出的是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重新配置力量”（《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三八页）（注七一）。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乃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殊死斗争。“谁战胜谁”——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为要胜利，就要保证

工人阶级与农民间,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经济间的结合,其方法就是极力发展城乡间的商品流转。为此就必须学会管理经济,就必须学会文明经商。

在这个时期,商业是党前面所有各个任务链条中的基本环节。不解决这个任务,便不能扩展城乡间的商品流转,便不能巩固工农经济联盟,便不能提高农业,便不能使工业走出破坏状态。

当时苏维埃商业还很薄弱。商业机关还很薄弱,共产党员还没有获得经商的技能,还没有熟知敌人耐普曼(注七二),还没有学会怎样同他们斗争。私资商人,耐普曼,利用苏维埃商业薄弱的机会,抓得布匹及其他畅销货物的贸易。组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问题有了重大的意义。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经济工作更加沸腾起来了。国家所遭遇的歉收底后果,已被顺利地消灭下去。农民经济已在迅速地恢复起来。铁路运输工作已有进步。重新开工的工厂数目日益增多。

一九二二年十月,苏维埃共和国庆祝了巨大的胜利:红军和远东游击队把武装干涉者所占有的最后一块苏维埃国土海参崴从日本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出来了。

此时,在苏维埃国家全境都已把武装干涉者肃清,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的任务又需要使苏维埃国家内各民族底联盟更加巩固,于是各苏维埃共和国彼此更加亲密地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联盟,便成了十分迫切的问题。必须把所有一切人民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组织坚固的国防。必须保证我们祖国所有各个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为了这个目的,必须使苏维埃国家所有各个民族彼此更加接近起来。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召集了第一次全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和斯大林两人提议成立了各苏维埃民族自愿成立的国家联合,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最初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别洛露西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久后又在中亚细亚成立了三个独立盟员苏维埃共和国，即乌兹别克，土尔克明与塔什克三盟员苏维埃共和国。现在，所有这些共和国都按自愿和平权原则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联盟——苏联，同时每个共和国都保留有自由退出苏联之权。

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表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党列斯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了言。列宁讲到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五年的总结时，表示坚信“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这是他在全国面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说。一九二二年秋，党遭到了大不幸的事件：列宁患重病了。全党和全体劳动者都感觉着列宁患病是如同他们自己身受的一种重大痛苦。大家都时刻为亲爱的列宁底生命担忧。可是，列宁在病中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工作。列宁在病势已很沉重的时候，还写过好几篇很重要的论文。在这些最后的论文中，他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并拟定了我国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法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列宁提出了他主张吸收农民参加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合作社计划。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制，特别是农业合作制，是千百万农民易于接受和了解的从狭小个体农庄过渡到大规模共耕制生产联合，即过渡到集体农庄的道路。列宁指出，我国农业的发展，应经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应经过逐渐把集体制原则灌输于农业，起初灌输于销售方面，然后灌输于农产品生产方面的道路前进。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在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的条件下，在有社会主义工业存在的条件下，组织得正确而包括有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生产合作制，就是可能用以在我国建成完备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

一九二三年四月,党召集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不能亲自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四百零八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三十八万六千个党员,即比上次代表大会时期减少了一些。这是由于继续进行清党的结果,因为这次清党把颇大一个百分数的党员开除出党了。有发言权的代表计有四百一十七人。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接受了列宁在他最后一些论文和书信中所作出的一切指示。

代表大会坚决指斥了所有一切把新经济政策解释为放弃社会主义阵地,解释为向资本主义投降的份子,指斥了所有一切提议要我们去受资本主义盘剥的份子。在代表大会上作过这种提议的有托洛茨基底伙伴拉狄克和克拉辛。他们提议要我们去向外国资本家投降,把苏维埃国家生命攸关的工业部门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他们提议缴付十月革命废除了的沙皇政府外债。党把这些投降主义的提议指斥为卖国的提议。党并没有拒绝运用租让政策,但只能以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部门和范围为限。

布哈林和索科里尼可夫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已提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这个提议也是由于把新经济政策解释为向资本主义投降的结果。列宁当时痛斥了布哈林,说他是投机商人、耐普曼和富农底拥护者。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坚决驳斥了这种谋害不可动摇的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企图。

同时,代表大会又打破了托洛茨基硬要党对农民采取危害政策的企图。代表大会指示说,不要忘记小农经济在国内占绝大比重的事实。代表大会强调说,工业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发展事业不应同农民群众底利益相抵触,而应与他们结合起来进行,应当为着全体劳动居民底利益来进行。这些决议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因为托洛茨基提议用剥削农民经济的办法来建设工业,托洛茨基事实上是不承认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政策的。

同时，托洛茨基又提议把普梯洛夫工厂和布良斯克工厂等等有国防意义的巨大企业关闭，因为据他所说，这些工厂是些不生利的企业。代表大会忿然否决了托洛茨基底提议。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用书面提交代表大会的建议，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联合的机关。这个机关负有保护我党统一，巩固党和国家纪律，尽量改进苏维埃国家机关等重大任务。

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问题，曾予以严重注意。斯大林同志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西方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都认定苏联是解决民族问题和铲除民族压迫的榜样。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必须极力把苏联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不平等的现象铲除。他号召全党坚决反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在代表大会上揭破了民族主义倾向者及其对于少数民族的大国主义政策。当时发言反对党的有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倾向者麦吉凡尼等人。民族主义倾向者反对成立南高加索联邦，反对巩固南高加索各民族间的友谊关系。这些民族主义倾向者对格鲁吉亚其他各民族采取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他们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特别是阿尔明尼亚人，都驱逐于梯弗里斯城以外；在他们所颁布的一个法律上规定，格鲁吉亚女子与非格鲁吉亚人结婚时，便要丧失格鲁吉亚国籍。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斯克力普尼克和拉可夫斯基都拥护了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倾向者。

代表大会闭会后，接着就召集了各民族共和国工作人员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揭破了苏尔坦—加里也夫等人所代表的鞑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集团以及何扎也夫等人所代表的乌兹别克民族主义倾向者集团。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新经济政策施行两年以来的结

果。这些总结使党更加精神焕发和确信最终胜利。

“我们的党仍然是同心一致，团结坚固，经历了极大转变，高举着飘扬招展旗帜向前迈进的党”——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这样说道。

(四)消除国民经济恢复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份子利用列宁患病而乘机加紧积极活动。党内新的争论。托洛茨基份子的失败。列宁逝世。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

在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的头几年中，就已达到了显著的成功。到一九二四年的时候，各方面都已呈现出高涨的景象。播种面积从一九二一年起已经大大增加，——农民经济愈趋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已逐渐增长和发展起来。工人阶级的人数已经大大增加。工资已经提高。工农生活已比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时期轻松和优裕些了。

但是，尚未消除的经济破坏的恶果，终究还令人感觉得到。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准，工业的增长还远没有赶上国家需要方面的增长。一九二三年末，还有一百万左右的失业者，——因为国民经济增长得迟缓的原故，所以无法把失业现象消灭。商业因城市制品价格过高而发展得不平整，而这种过高的价格是由国内耐普曼以及我们商业机关中的耐普曼份子造成的。因此，苏维埃币制急速地动摇起来，货币价格低落下去。所有这些情形，都阻碍了工农生活状况的改善。

一九二三年秋，经济上的困难略有紧张，这是因为我们的工商业机关违犯了苏维埃的价格政策。工业品价格与农业品价格很不相符。粮食价格很低，而工业品价格则太高。工业生产方面的杂费很大，因而就使商品价格高涨。农民出卖粮食所得的货币迅速跌价。加之，当时在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坐着的托洛茨基份子皮达可夫，又向经济工作人员发出一种罪恶的指令：从出卖工业品

方面尽量多取利润，无限制地提高价格，美其名是为了发展工业。其实，这种耐普曼的口号只能缩小工业生产基础，破坏工业。在这种条件下，农民既不利于购买城市商品，于是就停止购买这种商品了。结果便酿成了销售困难的危机，接着便使工业受到影响。在工资发给上感到困难，因而引起工人底不满。在某些工厂中，最落后的工人曾经抛弃过工作。

党中央委员会定出铲除这一切困难和缺点的办法。采取了种种铲除销售危机的手段。日用必需品底价格实行减低。同时又决定实行币制改革——过渡到稳定巩固的币制，过渡到金本位制。整顿了发给工人工资的事情。拟定了经过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扩展商业，并把各种私资份子和投机份子从商业中间排挤出去的办法。

当时必须和衷共济地努力进行工作。忠实于党的人就是这样想并且这样作了的。但托洛茨基份子却不这样来作。他们乘列宁病重不能视事的机会，又来向党及其领导机关举行新的袭击。他们认定实行击破党并推翻其领导机关的顺利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在进行反党斗争中利用了一切：一九二三年秋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国内的经济困难，列宁的卧病。正当全党领袖卧病不起而国家遭遇困难的关头，托洛茨基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党实行进攻。他把党内一切反列宁主义份子集合在自己周围，造作了一个反对派的政纲，其目标是反对党，反对党底领导机关，反对党底政策。这个政纲就是所谓四十六名反对派份子底声明书。在反对列宁党的斗争中，所有一切反对派集团——托洛茨基份子，民集派份子，“左派共产主义者”残余以及“工人反对派”残余，都一致联合起来了。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书中预言沉重经济危机必不可免，预言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并要求让各派别组织和集团能自由活动，硬说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进行这一斗争的目的无非是要想把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根据列

宁提议而加以禁止了的派别组织恢复起来。

托洛茨基份子并没有提出过任何改善工业或农业,改善国内商品流转,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的具体问题。而且他们根本就不对这种问题不感什么兴趣。他们所感觉兴趣的只有一点:利用列宁病重不能视事的机会来在党内恢复派别组织,并动摇党底基础,动摇党底中央。

四十六人底政纲提出以后,接着又有托洛茨基所写的一封信发表出来,在这封信上他诬蔑党的干部,对党提出许多新的诋毁的责备。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上重复着党从他那里已屡次听到过的孟什维主义的老调。

托洛茨基份子首先就来攻击党的机关。他们知道,党没有坚强的党的机关是不能生存,不能工作的。于是反对派就来企图动摇这个机关,破坏这个机关,并把党员群众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青年份子和党内老干部对立起来。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特别指望着学生青年,指望着不知道党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史的年轻党员。托洛茨基为了夺取学生青年,不惜多方阿谀他们,称他们为“党内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时又说老的列宁主义的前卫已在蜕化。他用卑鄙齷齪的口吻指东说西,援引第二国际首领蜕化的事实来从事暗示,说老的布尔什维克的前卫也是走着这条路。托洛茨基叫喊党在蜕化,无非是企图掩蔽他自己蜕化的事实以及他自己的反党阴谋。

反对派份子所提出的两个文件,即四十六人底政纲和托洛茨基底一封信,都由托洛茨基份子分送于各区组织和各支部,并交付党员们去讨论。

党接到了发动争论的挑战书了。

这样,现在也如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前夜进行职工会问题争论时一样,托洛茨基份子又强迫党来进行全党争论了。

党虽然忙于更加重要的经济问题,但它终究接受了这种挑战而宣布举行争论。

全党都来参加争论了。斗争是很激烈的，尤其是莫斯科党组织中的斗争来得特别尖锐。托洛茨基份子力图首先把首都组织夺去。可是争论并没有使托洛茨基份子得到什么补益。争论只是使他们丢了脸。托洛茨基份子无论在莫斯科方面或在全苏联各地，都被迎头击破了。拥护托洛茨基份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

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集了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听了斯大林同志底报告，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作了关于争论的总结。代表会议申斥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认为它是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代表会议底决议后来由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赞助了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然而，托洛茨基份子并没有停止其破坏工作。一九二四年秋，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底教训》一文，他在这里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诬蔑我们党，诬蔑我党领袖列宁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底一切敌人，都把这本诽谤册子当作至宝来抓住。党用愤怒态度申斥了托洛茨基这种诬蔑布尔什维克英勇斗争史的论调。斯大林同志揭破了托洛茨基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的企图。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言论中指出：“党底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斯大林同志底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底基础》（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对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保护列宁主义有极重大的意义。这部著作是对于列宁主义的一个精彩的解说和深刻的理论上的论证。它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用锋利的马列主义理论武器来武装着世界各国的布尔什维克。

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战斗中，斯大林同志把党团结到了党中央周围，并动员党去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斯大林同志确凿地证明说，在思想上把托洛茨基主义粉碎，是保证我国继

续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同志总结我党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一时期时说道：

“不击破托洛茨基主义，便不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达到胜利，便不能把现今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

但是，党的列宁政策所获得的成功，忽然被党和工人阶级所遭遇的最大不幸事件所盖住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布尔什维克党底创始人列宁，在莫斯科附近哥尔克村逝世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把列宁逝世看作是最沉痛的损失。在列宁安葬之日，国际无产阶级宣布到处停止工作五分钟。铁路上的运输停止了，工厂里的工作停止了。全世界的劳动者抱着极沉痛的哀忱护送着自己的父亲和导师，最好的友人和保护者列宁入墓。

苏联工人阶级以更紧密团结在列宁党周围来回答了列宁逝世事件。在这些哀悼日子，每个觉悟工人都周密考虑了自己对于实现着列宁遗嘱的共产党的态度。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成千累万非党工人工人请求接收他们入党的声明书。中央委员会为迎接先进工人底这种愿望而宣布大批接受先进工人入党，宣布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成千累万新的工人加入了党。加入党来的是决意为党的事业，为列宁的事业而舍身奋斗的人。在很短一个期间就有二十四万余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加入党来的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份子，即最觉悟最革命最勇敢最守纪律的份子。这就是为纪念列宁而举行的征收党员运动。

在追悼列宁时的情形，表明我党对于工人群众该是多么亲切，表明工人们该是多么珍重列宁党。

在哀悼列宁的日子，斯大林同志代表全党在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伟大的誓词。他当时说道：

“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底军队，列宁同志底军队，就是由我们

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员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底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

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伟大称号底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一个遗嘱，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实现！

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保护我们党底一致，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个遗嘱，我们也一定会光荣地实现！

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个遗嘱，我们也将不遗余力来光荣地实现！

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个遗嘱，我们也一定会光荣地实现！

列宁同志始终不倦地对我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自愿联盟之必要，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和国联盟内亲密合作之必要。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个遗嘱，我们也一定会光荣地实现！

列宁屡次对我们说过：巩固红军和改进红军状况，是我们党底最重要任务之一……同志们！我们来宣誓：我们将不遗余力来巩固我们的红军，来巩固我们的红海军……

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忠实于共产国际底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将奋不顾身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联盟的共产国际！”。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它的万古长存的领袖列宁面前宣读的誓词。

一九二四年五月，举行了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

会的有七百四十八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一个党员。党员数量比上次代表大会时大大增加,是因为在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时约有二十五万人新加入了党。有发言权的代表计有四百一十六人。

代表大会一致申斥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底政纲,认定它是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一种修改列宁主义的企图,同时大会又批准了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党内建设》和《关于争论总结》的决议。

从巩固城乡结合这一任务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必须继续扩大工业,首先是扩大轻工业的指令,同时并着重指出说必须迅速发展冶金业。

代表大会批准了设立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提案,并在一切商业机关面前提出了掌握市场并把私人资本从商业范围里排挤出去的任务。

代表大会提出了扩大国家发给农民低利借款并把高利贷者从农村中间排挤出去的任务。

代表大会提出了尽量吸收农民群众加入合作社的口号,作为农村中工作底主要任务。

最后,代表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这一运动底巨大意义,并要求党注意于加强使年轻党员——尤其是在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时接受入党的年轻党员——领会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工作。

(五)苏联在恢复时期终结时的情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底“新反对派”。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方针。

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坚忍工作,已经四年有余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英勇工作行将终结。苏联底经济

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

当时国际形势已有变更。资本主义抵挡住了群众在帝国主义大战后所实行的第一次革命攻击。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波兰及其他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革命运动，都被镇压下去。妥协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底领袖在这方面帮了资产阶级不少的忙。革命底暂时退潮到来了。西欧资本主义底暂时局部稳定时期，即资本主义地位底局部巩固时期到来了。但资本主义稳定并没有把腐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消除。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底局部稳定使工人与资本家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民族间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资本主义稳定局面所准备的是矛盾底新爆发，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新危机。

与资本主义稳定同时发生的还有苏联底稳定。但这两种稳定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底稳定是预示着资本主义新危机行将到来。而苏联底稳定则表明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更加增长。

虽然西欧的革命遭受了失败，但是苏联底国际地位还是继续巩固，虽然这种巩固的速度还较为缓慢。

一九二二年，苏联被邀请参加在意大利热那亚城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各个帝国主义政府因资本主义各国革命遭受失败而气焰增长，于是在热那亚会议上企图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新的逼迫，不过这次所采取的是一种外交形式。帝国主义者向苏维埃国家提出了横蛮无理的要求。他们要求把十月革命收归国有的各个工厂归还给外国资本家，要求缴付沙皇政府所订借的一切外债。在这样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诺许给予苏维埃国家一些不大的借款。

苏联否决了这些要求。

热那亚会议没有什么结果。

英国外相克尔逊一九二三年提出的最后通牒，是实行新干涉的一种威胁，但这种威胁也受到了应有的回击。

各资本主义国家既已觉察到苏维埃政权坚固不拔,确信苏维埃政权已经稳定,便相继来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一九二四年间,苏联同英法日意等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当时已看得很明白,苏维埃国家终于争得了整整一个和平的暂息时期。

国内的情形也变更了。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底奋勇工作,已获得相当的成果。国民经济已有迅速的增长。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经济年度,农业已接近到战前的规模,达到战前水准百分之八十七。苏联大工业在一九二五年的出产,已约占战前工业产量四分之三。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苏维埃国家投到基本建设事业上的资金已达三万八千五百万卢布。全国电气化计划,也实现得卓有成效。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中的主要命脉巩固了。国家同工商业私人资本进行的斗争,已获得重大的成功。

由于经济的高涨,工农生活状况也跟着更加改善。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长起来。工资水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物质生活状况已大加改善。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工农国家已能拿出约近二万九千万卢布来帮助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在工农生活状况改善的基础上,群众底政治积极性已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党底威信和影响增大了。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快告终结。可是,对于苏维埃国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单只恢复经济,单只达到战前水准还是不够的。战前水准是个落后国家的水准。必须继续向前进展。苏维埃国家所获得的长久的暂息时期,保证有继续向前建设的可能。

可是这里却很紧张地提出了前途问题,我国发展,即我国建设底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问题。究竟应循着什么方向进行苏联经济建设,是循着社会主义方向呢,还是循着其他某种方向呢?我们究竟是应当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我们

注定要为另一种经济，即为资本主义经济去肥沃土壤呢？一般说来，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呢；如有可能，那末能否在资本主义各国革命延迟爆发和资本主义稳定的条件下做到这一步呢？在一方面极力巩固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力量，别方面又暂时让资本主义得到某种发展的新经济政策轨道上，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要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呢，要从何处来开始进行这种建设呢？

所有这些都是恢复时期终结时摆在党面前，并且已经不是作为一些理论问题，而是作为一些实践问题，作为日常经济建设问题摆在党面前的问题。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给以明白确切的回答，好使我们那些从事工业和农业建设的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以及全体人民，都知道要朝着什么方向走，——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呢？

若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明白的回答，那我们在建设方面的全部实际工作就会成为没有前途的工作，盲目的工作，徒劳无益的工作。

党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了明白确切的回答。

党回答说：是的，在我国可能而且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专政，在政治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那时起，苏维埃政权就极力设法打破资本主义底经济实力，并创造着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条件。这些办法就是剥夺资本家地主底财产，变土地、工厂、交通工具和银行为全民财产，施行新经济政策，建立国营社会主义工业，实行列宁所规定的合作化计划。现在，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以期在经济上也把资本主义澈底打破。我们的全部实际工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服从于实现这个主要

任务的要求。工人阶级能做到这点,并且一定会做到这点。这个伟大任务的执行,应当从国家工业化开始做起。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工作所借以扩展的基本环节。无论西欧各国革命的延迟爆发,亦无论非苏维埃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局部稳定,都不能阻止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行程。新经济政策只会促进这一事业,因为党施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也就是要促进我们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基础底建设。

这就是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问题的回答。

但党知道这还不能概括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转变,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所获得的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但这终究是苏联内部的事情,而且只是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底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这个问题底国际方面。斯大林同志论证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原理}时屡次指出,说应把这个问题底两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分别清楚。就这个问题的国内方面,即就国内阶级相互关系方面来说,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能在经济上克服本国资产阶级并建成完备社会主义社会。但这个问题还有其国际方面,即外部关系方面,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苏维埃人民与国际资产阶级间的关系方面。国际资产阶级仇恨苏维埃制度,总想乘机对苏维埃国家举行新的武装干涉,以求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苏联暂时还是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所以苏联四周还有资本主义包围形势存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很明显的,当资本主义包围形势还存在的时候,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也是还会存在的。苏维埃人民单靠本身力量,能否消灭这种外来危险,这种反对苏联的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危险呢?当然不能。其所以不能,是因为要消灭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危险,便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形势,而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形势,却至少要靠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才可做到。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即表现于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胜利，还不能算是最终的胜利，因为外国实行武装干涉和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危险依然没有消灭，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免除这种危险的保障。要消灭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便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形势。

当然，苏联人民及其红军在苏维埃政权政策正确的条件下，定能打退外国资本主义所举行的新的武装干涉，也如他们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间打退了资本主义所举行的第一次武装干涉一样。但这还不是说，新的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危险就会因此消灭。第一次武装干涉的失败，并没有消灭新的武装干涉危险，因为武装干涉危险的来源，即资本主义的包围形势，还继续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包围形势还存在着的时候，新的武装干涉遭受失败也还是不会使武装干涉危险消灭的。

由此就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胜利，是苏联劳动者切身利益攸关的事情。

这就是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方针。

中央当时要求把这个方针提交当前的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去讨论，好使代表会议把它批准和通过作为全党方针，作为全体党员必须服从的全党法规。

党的这个方针把反对派份子弄得目瞪口呆。其所以把他们弄得目瞪口呆，首先是因为党使这个方针带有具体实践的性质，将其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实际计划连成一气，并要求把这个方针变为全党法规，变为全体党员必须服从的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托洛茨基份子出而反对党底方针，并为对抗这个方针而提出了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而这个“理论”是只有在讥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才可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因为它根本否认苏联

可能达到社会主义建设底胜利。

当时,布哈林份子还不敢公开反对党底方针,但他们暗中已开始用自己的关于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和党底方针对立,并用“发财吧”的“新”口号来补充了这个“理论”。照布哈林份子那样说法,社会主义底胜利不是意味着资产阶级底消灭,而是要培养资产阶级并使之发财致富。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个时候也曾出头声言,说苏联因技术上经济上落后而不能达到社会主义胜利,但后来他们却只好默不作声。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一九二五年四月)申斥了所有这些公开和暗藏反对派份子底投降主义“理论”,批准了党认定社会主义在苏联可能胜利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当的决议。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逼迫得无路可走,也就只好表示赞成这个决议。但是党知道,他们只是暂时把他们的反党斗争延缓一着,以便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来“对党开火”的。他们在列宁格拉收集着自己的同伙并组织了所谓“新反对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内情形紧张的空气下举行的。自党存在时起,从来还没有过如像列宁格拉代表团这样整整一个最大党中心组织的代表团,居然预备来反对本党中央的事实。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六百六十五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六百四十一个有发言权的代表,总共代表着六十四万三千个党员和四十四万五千个候补党员,即比前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人数稍微少了一点。这是由于在有許多反党份子混入的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里实行了局部清洗的结果。

作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是斯大林同志。他把苏联政治和经济实力增长情形作了一番鲜明的叙述。无论是工业或农业,都因苏维埃经济体系优越而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期内恢复过来,并接近

到战前水准了。虽然有这些成功，但斯大林同志还是提议不要以此自满，因为那怕有这些成功，但我国仍然还是个落后的国家，农业的国家。当时农业产品在全部出产总量中占三分之二，而工业却只占三分之一。斯大林同志说，在党面前十分迫切地摆着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把我国变为经济上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这是可以做到，并且是必须做到的。于是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便成了党底中心任务。

“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为能够自力出产必需装备品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底实质和基础”——斯大林同志当时这样指示说。

实现国家工业化，就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巩固其国防能力，并造成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季诺维也夫份子起来反对党底总路线。为了要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立，季诺维也夫份子索科里尼可夫提出了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是出产原料和粮食，将其输出国外，而从国外输入它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不应生产的机器。在一九二五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要让工业发达的外国来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要满足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豺狼底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地位。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底一个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形势面前成为手无寸铁的脆弱的国家，归根到底就是要葬送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代表大会申斥了季诺维也夫份子所提出的这个经济“计划”，认为它是奴役苏联的计划。

“新反对派”所讲出的这样一种狂言暴语，如硬说（公然违反着列宁意见！）我们的国家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或声言（也是公然违反着列宁意见！）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同盟

者等语,也没有使“新反对派”得到过什么补益。

代表大会申斥了“新反对派”底这种狂言暴语,认为这是种反列宁主义的论调。

斯大林同志揭破了“新反对派”底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实质。他指明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是重唱着列宁在世时无情攻击过的我党敌人底调子。

当时已看得很明白,季诺维也夫份子是个些掩饰得不巧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巩固工人阶级与中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联盟,是本党最重要的任务。他指出当时党内对农民问题存在有两种危害工农联盟事业的倾向。一种倾向是看轻和小视了富农危险;另一种倾向是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而看轻了中农作用。当有人问究竟那一种倾向更坏时,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两种倾向都很坏。如果让这两种倾向发展下去,那它们就能瓦解和残害党。幸而我们党内有能于把这两种倾向一同打破的力量”。

而党也就把“左”右两种倾向都击溃和打破了。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总结经济建设问题讨论的时候,一致否决了反对派份子所提出的投降主义计划,并在自己的著名决议中写道:

“在经济建设方面,代表大会所持的出发点,是认为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建成完备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列宁语)。代表大会认为争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我们党底基本任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新的党章。

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我们的党就开始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季诺维也夫份子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以后,并没有对党表示服从。他们开始了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第十四次

代表大会闭会后，季诺维也夫立刻就召集了列宁格拉青年团省委会议，其中各上层份子，是由季诺维也夫、查鲁茨基、巴卡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库克林、萨发罗夫及其他两面派份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养成的。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格拉青年团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决议，即拒绝服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

但列宁格拉青年团组织中的季诺维也夫上层份子，丝毫也没有反映列宁格拉青年团员群众底情绪。因此，这些上层份子也就很容易地被击溃了，而列宁格拉青年团组织很快就重新占上了它在青年团中应有的位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时，有一部分大会代表，即莫洛托夫、基洛夫、沃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得列也夫等同志，被派到列宁格拉去。必须向列宁格拉党组织中的党员们解释，用欺骗手段取得代表资格的列宁格拉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一种罪恶的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为听取代表大会工作报告而召集的党员大会，情形甚为激烈。当时重新召集了一次列宁格拉党组织非常代表会议。列宁格拉党组织中的绝大多数党员群众（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都完全赞同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底决议，并申斥了反党的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这个“新反对派”当时就已是些无军之将了。

列宁格拉的布尔什维克，仍然是站在列斯党底前列的。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工作时写道：

“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底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根本揭破了新反对派底错误，排斥了新反对派底不相信和号泣态度，明白确切地指出了继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确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一五〇页）（注七三）。

简短的结论

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年份,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中最艰巨的时期之一。党在紧张的环境中,终能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到新经济政策的困难转变。党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新经济政策轨道上达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有决定意义的成功。苏维埃国家卓著成效地经历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恢复时期,接着便开始过渡到新的时期,即过渡到国家工业化的时期。

从国内战争转到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这种过渡,感受到——特别是在最初一个时候——巨大的困难。布尔什维主义底敌人,联共(布)队伍中的反党份子,在这时期内始终都进行了反对列宁党的激烈斗争。领导这些反党份子的是托洛茨基。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帮手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反对派份子打算在列宁逝世后瓦解布尔什维克党底队伍,分裂党,用不相信苏联社会主义胜利事业的心理来传染党。其实,托洛茨基份子是想在苏联建立一个新资产阶级底政治组织,建立另一个党,即资本主义复辟党。

党在列宁旗帜下团结到自己的列宁中央周围,团结到斯大林同志周围,而把托洛茨基份子以及他们在列宁格拉的新朋友们,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一齐打败。

布尔什维克党积聚了充分的力量和资源,便把国家引上新的历史阶段,即引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阶段。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时期)

(一)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时期中的困难和克服这种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底反苏维埃行动。联盟的失败。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展开了为实现苏维埃政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总方针而进行的斗争。

恢复时期的任务是要首先振兴农业，从农业方面取得原料和粮食，使工业动作起来，——恢复工业，恢复现有的工厂。

苏维埃政权是较为容易就把这些任务解决了。

但恢复时期有过三个重大缺点：

第一，当时所有的工厂是些技术陈旧落后，很快就能变成无用之物的工厂。当时的任务就是要用新技术来改造这些工厂。

第二，恢复时期所有的工业是基础太狭的工业，在当时所有的工厂中缺乏国家所绝对必需的数十百个机器制造厂，我们当时既没有这种工厂，就应将其创立起来，因为工业没有这种工厂是不能成为真正工业的。当时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种工厂，并用现代技术把它们装备起来。

第三，恢复时期所有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这种工业在恢复时期是已有发展且已走上大道了。但后来轻工业发展过程本身也因重工业薄弱而受到阻碍，更不用说我国其他种种只有高度发展的重工业才能满足的需要了。当时的任务就是要着重于发展重

工业。

所有这些新任务，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政策所应解决的。

必须从新创立沙俄时代所未曾有过的许多工业部门，——必须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必须创立本国制造发动机和电站装备品的生产，必须增加金属和煤炭开采量，因为这是为保证苏联社会主义胜利而绝对必需的。

必须创立新的国防工业，——建立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加强我们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的苏联国防能力而绝对必需的。

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农业机器制造厂，并用这种工厂底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细小的个体农庄能过渡到大的集体农庄的生产，因为这是为保证社会主义在农村中胜利而绝对必需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底实质就在于此。

当然，这样巨大的基本建设事业非有数十万万资金不行。指靠外债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借给我们借款。只好不要外国帮助而专靠本国资金来从事建设。但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是个不富足的国家。

这就是当时的主要困难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创立自己的重工业，通常是靠外方资金流入，即靠劫掠殖民地，靠从战败国人民方面取得赔款，靠借外债来进行的。苏维埃国家是在原则上不能靠采取如劫掠殖民地或战败国人民一类的龌龊办法来吸收工业化资金的。至于借用外债的这种办法，苏联却又没有加以利用的机会，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借款给苏联。所以必须在本国内部找得资金。

而这样的资金确实也就在苏联本国内部找到了。在苏联内部

找到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设想的积累来源。苏维埃国家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家地主手中夺取过来的一切工厂，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银行，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都一律收归自己掌握。现在，从国家工厂中，从运输业、商业和银行方面所获得的利润，已不是用于供给资本家寄生阶级耗费，而是用于继续扩大工业了。

苏维埃政权取消了沙皇政府所订借的外债，过去人民单只为偿付这种外债的利息，每年就要付出数万万金卢布。苏维埃政权既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消灭，就使农民免除了每年必须向地主缴纳的约及五万万金卢布的地租。农民因为摆脱了这一切重担，所以能够帮助国家来创立新的强大的工业。农民是切身需要获得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

所有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泉源能够提供几万万和几十万卢布供建设重工业之用。只是必须用经济主人的态度来处置事情，在金钱消耗方面实行极严格的节省，实行生产合理化，减低生产成本费，铲除无谓的消耗等等。

而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这样作的了。

由于厉行节省的结果，积蓄起来供给基本建设工程的资金是逐年增加了。于是就有可能来着手建筑许多巨型企业，如德涅泊尔水电站，连接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铁路，斯大林格拉拖拉机制造厂，好几个机床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现今的斯大林汽车工厂）等等。

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约近十万万卢布，而经过三年就已有可能投入五十万万左右了。

工业化的事业向前进展了。

各资本主义国家认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一种威胁，于是那里的帝国主义政府就极力设法来对苏联实行新的逼迫，设法引起混乱，设法破坏或至少是阻挠苏联工

业化事业。

一九二七年五月，盘踞英国政府中的保守党人（“硬头派”）向“阿尔克斯”（苏英贸易协会）举行了挑衅的袭击。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有个加入波兰国籍的俄国白卫份子在华沙刺死了苏联大使沃义可夫同志。

同时，在苏联境内又有英国间谍和军事破坏者向列宁格拉克党俱乐部投掷炸弹，当时受伤的约有三十人，其中有几人受伤甚重。

一九二七年夏，在柏林、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处，差不多同时发生了袭击苏联大使馆和商务使馆的事件。

这样就为苏维埃政权造成了补充的困难。

但苏联并没有屈服于他人的逼迫，而是很容易就把帝国主义者及其代办们底挑衅伎俩击退了。

托洛茨基份子及其他反对派份子所进行的破坏工作，也使党和苏维埃国家受到了不少的困难。所以斯大林同志当时不为无因地说过：为反对苏维埃政权而“结果便形成了一种从张伯伦起，到托洛茨基止的统一战线”。虽然有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底决议以及反对派自己对党表示忠顺的声明，但反对派份子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武器。并且，他们还更其加强了他们所进行的破坏的，分裂主义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诺维也夫份子结成了一个反党联盟，把所有一切已被击破的反对派集团余孽团结在这一联盟周围，并建立着他们那个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底基础，这样来横蛮地违背党章以及几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成立派别组织的决议。党中央委员会警告说：这个与有名的孟什维克八月联盟同类的反党联盟如不解散，那结果是会对联盟参加者不利的。但联盟参加者并没有干休。

同年秋，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前夜，他们又在莫斯科，列宁格拉及其他几个城市中工厂党员大会上实行袭击，企图强迫党来进行新的争论。并且，他们还提出自己的政纲来要求党员讨论，而这个政纲不过是通常的托洛茨基孟什维主义的政纲，反列宁主义的政纲底一种抄本罢了。党员群众给了反对派份子一个无情的回击，有些地方甚至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逐出了会场。中央再次警告联盟参加者说，党已不能再容忍他们所干的破坏工作了。

反对派份子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索科里尼可夫等人签名向中央提出声明书，谴责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活动，并承诺说他们今后定会对党忠顺。然而联盟事实上还是继续存在着，联盟参加者并没有停止其秘密的反党工作。他们继续纠缠他们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党，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同伙中间征收党费，散布自己的政纲。

因为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诺维也夫份子采取这样一种行动，于是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和共产国际执委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就把托季联盟问题提出讨论，并在自己的决议中痛斥了参加这个联盟的份子，认为他们所提出的政纲表明他们是滚入孟什维克立场的分裂主义者。

然而，这也没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一九二七年，当英国保守党人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时候，他们又来加紧对党横施攻击。他们造作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的政纲，即所谓“八十三人底政纲”，把这个政纲散布到党员中去，并要求中央宣布举行新的全党争论。

在一切反对派的政纲中，这个政纲要算是最虚假最伪善的了。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诺维也夫份子并不反对遵守党底决议并且主张对党表示忠顺，但在事实上，他们却极横蛮地违背党底决议，讥笑对党及其中央表示任何忠顺。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并不反对党内统一并表示反对分

裂,但在事实上,他们却极横蛮地破坏党内统一,进行分裂路线,且已成立有自己特殊的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而这个党分明是会成为一个反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政党的。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赞成工业化政策,甚至责备中央没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但在事实上,他们却笑骂党关于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决定,讥笑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要求把一批一批的工厂租让给外国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外国资本在苏联境内经营的租借企业。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赞成集体农庄运动,甚至责备中央没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集体化,但在事实上,他们却讥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宣传说工人阶级与农民必然会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农村中的“文明租佃人”,即寄托于富农的农庄。

这是反对派所有一切虚伪政纲中最虚伪的政纲。

这个政纲是专为打算欺骗党而提出的。

中央拒绝了立刻宣布举行争论的要求,并向反对派份子说,争论只能根据党章,即只能在党代表大会召集前两个月宣布举行。

一九二七年十月,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全党的争论。到处都开起争论会来了。争论底结果对于托季联盟原是极其悲惨的。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万四千个党员。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人,即还不满百分之一。反党联盟被迎头击破了。党内绝大多数都一致否决了联盟所提出的政纲。

这就是党所明显表现出来的意志,而当时联盟参加者自己正是诉诸党底意见的。

然而这次教训也没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他们不仅不服从党底意志,反而决定要破坏党底意志。还在争论未结束以前,他们眼看自己必然会遭到可耻的破产,于是决定采取更尖锐的手段

来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他们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拉举行公开的抗议示威。他们选定的示威日子是十一月七日，即苏联劳动者照例举行革命全民示威的十月革命纪念日。这样，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诺维也夫份子就是立意要举行一个平行的示威了。果然不出所料，联盟参加者所能带上街去的只是他们那一群少得可怜的应声虫。应声虫和他们的魁首被全民示威队伍踏坏和撵走了。

此时，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诺维也夫份子滚进了反苏维埃泥潭的事实已是不容置疑的了。在举行全党争论时，他们是向党控诉中央的，而在这里，在他们举行这个可怜的示威时，他们却已走上向敌人阶级控诉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了。他们既已抱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目的，也就必然要滚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道路，因为在苏维埃国度里，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是分不开的。于是托季联盟底魁首们便以此而置身于党外了，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党队伍中间，是不能容许有滚进了反苏维埃泥潭的人们立足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了。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农业的落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托季联盟的溃败。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

到一九二七年末，已可明白看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获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实行的工业化，很快就有了重大的进展。工业和全部农业(包括森林业和渔业在内)，就其出产总量说来，不仅达到战前水准，且已超过这个水准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到百分之四十二，达到了战前时期的相当的水准。

工业中的社会主义部份，排挤着私人部份而迅速增长起来，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私人部份底比重在同一时期内，却从

百分之十九降到了百分之十四。

这就是说,苏联所实行的工业化是带有很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工业是循着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获得胜利的道路发展,工业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已预决要由社会主义获得胜利了。

私人资本在商业方面也很迅速地被排挤,私人资本在零售方面所占的比重已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更不必说批发商业,这里私人资本所占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九降到了百分之五。

尤其增长得迅速的是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它的出产量在一九二七年间,即在恢复时期以后第一年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这是一种打破纪录的增长数字,是资本主义最先进国家中的大工业也不能达到的速度。

农业,特别是谷物业方面的情形,却就不同了。虽然农业整个说来已超过战前水准,但它的主要部门——谷物业——出产总量,却只等于战前水准百分之九十一,而谷物出产总量中的商品部分,即卖出供给城市需要的部分,至多也不过等于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七,并且当时所有一切事实都说明,谷物出产总量中的商品部分有继续低落下去的危险。

这就是说,一九一八年开始在农村中发生的那种由巨大商品经济单位碎裂为细小经济单位,再由细小经济单位碎裂为极小经济单位的过程,仍然继续着,细小和极小农民经济变成为半自给的经济,只能出产最低限度的商品谷物,一九二七年时期谷物业所出产的谷物,虽然只稍微少于战前谷物业所出产的数量,但当时谷物业所能出卖给城市的谷物,却只稍微多于战前谷物业所能出卖的数量三分之一。

毫无疑问的,让谷物业所处的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苏联的军队和城市居民就会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这曾是谷物业的危机，在这种危机后面一定会有畜牧业的危机跟着发生。

为要逃出这种状况，必须在农业方面过渡到能运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并把谷物业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规模生产。当时在国家面前摆着有两种可能道路：或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生产，结果就会使农民大众遭到破产，使工农联盟陷于灭亡，使富农势力加强并使社会主义在农村中遭到失败；或是把各小农户联合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运用拖拉机及其他现代机器来迅速提高谷物业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

当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只能走后一条道路，即集体农庄农业发展道路。

党在这方面所倚据的，是列宁认定在农业中必须从细小的农庄过渡到大规模的劳动组合的集体的农庄的如下一些指示：

（一）“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境遇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页）。

（二）“如果我们仍旧依靠小农庄来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资格来生活，也是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第二卷，第四一七页）。

（三）“如果农民经济能够更进一步发展下去，那就必须稳稳地保证更进一步的过渡，而这种更进一步的过渡就一定会要把最少利益，最落后，规模狭小，彼此分散的农庄逐渐联合成为规模巨大的公共农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九九页）。

（四）“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制的，劳动组合制的耕种方法优越时，只有当它用共耕制的，劳动组合制的经济来帮助了农民时，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有理，才能把数千万农民群众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坚实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页）（注七四）。

这就是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夜的局势。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是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开幕的。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八百九十八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一共代表八十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三名党员和三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名候补党员。

斯大林同志在他所作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了工业化获得的种种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工业迅速高涨情形，同时向党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不论是在城市或农村中，都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抱定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

斯大林同志拿农业来和工业比较，并指出农业——特别是谷物业——因本身散漫不能采用近代技术而陷于落后的情形时，着重指出说，农业方面这种很不雅观的状况，可能使全部国民经济受到威胁。

“出路何在呢？”斯大林同志问道。

“出路，——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就在于用公共耕种制做基础来把零散的小农庄联合为大农庄，用新的更高的技术做基础来实行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循序渐进，然而一贯到底地，不是用强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说服方法，把小的和极小的农庄统一为大的农庄，以公共的共耕制的集体的耕种制做基础来采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增加农业强度的科学方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尽量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代表大会拟定了扩大和巩固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网的计划，并给了怎样为农业集体化而进行斗争的明确指示。

同时，代表大会又给了如下的指令：

“继续对富农开展进攻，并采取种种新办法来限制农村资本主

义成分的发展，引导农民经济循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联共（布）决议案汇集》，卷下，第二六〇页）。

最后，代表大会鉴于国民经济中计划原则已经巩固，并为在国民经济各方面组织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有条不紊的总进攻起见，于是责成相当机关制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结束以后，就来讨论消灭托季联盟的问题。

代表大会认定“反对派在思想上已与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势力底工具”（《联共（布）决议案汇集》，卷下，第二三二页）。

代表大会认为党与反对派间的意见分歧已经转变成了纲领上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说，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是与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资格根本不能相容的。

代表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入党籍的决议，并决议把托季联盟中所有一切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科夫斯基，皮达可夫，色列普略可夫，依·斯米尔诺夫，加米涅夫，萨尔基斯，萨发罗夫，里弗施茨，麦吉凡尼，斯米尔加一类积极份子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萨普朗诺夫，佛·斯米尔诺夫，波古斯拉夫斯基，多罗布尼斯等人）开除出党。

托季联盟中的参加者在思想上被击破和在组织上被粉碎之后，便把自己在人民中间最后一点影响也丧失净尽了。

被开除党籍的反列宁主义份子，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来呈递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申明书，并请求恢复他们的党籍。当然，那时党还不能知道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廷斯基、索科里尼可夫及其他等人早已是人民公敌和受外国侦

探机关招收担任间谍的事实,还不能知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及其他等人已经在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苏联敌人建立联系,以便跟他们一起“合作”来反对苏联人民的事实。但党已受到充分的经验教训,知道这些屡次在最艰难关头反对过列宁和列宁党的人能干出一切齜齜的勾当。因此,党对于这些被开除了党籍的人所写的申请书表示不信任。为了着手检查这些递申请书者有无诚意,于是党就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作为恢复党籍的条件:

(一)公开指斥托洛茨基主义为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反苏维埃的思想体系;

(二)公开承认党底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三)无条件地服从党及其各个机关底决议;

(四)要经过一个考察期限,使党能对这些递申请书者实行考察,然后根据考察结果按个别原则来提出恢复每个被开除者底党籍问题。

当时党打算到,被开除者公开承认这些条件是在一切场合都对党有利的,因为这种承认会打破托季联盟队伍底统一,引起他们内部的瓦解,再次表明党底正当有理和威力,并使党能在递申请书者有诚意时把过去的党工作人员收回党来,而在其没有诚意时,则在大众面前把他们揭破,但已不是将其看作是犯了错误的人,而是将其看作是一些毫无宗旨的野心家,看作是欺骗工人阶级的份子和不可救药的两面派份子。

大多数被开除的人都接受了党所提出的入党条件,并在报章上公布了相当的声明书。

党因为怜悯他们,不愿拒绝给予他们重新成为党和工人阶级中人的机会,于是就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资格。

可是过后却查明出来,托季联盟中的“积极活动家”——除了少数例外——所写的申请书,原来是完全虚伪的两面派的申请书。

原来,这班老爷还在呈递申请书以前,就已不复是一个决意在

人民面前坚持自己观点的政治派别而变成了一伙毫无宗旨的野心家，甘愿在大家眼前把自己的观点践踏无余，甘愿在大家眼前颂扬自己所敌视的党底观点，决意涂上任何一种颜色，——如变色的蜥蜴一样，——只求把自己保存在党里面，保存在工人阶级中间，以便有可能来危害工人阶级和它的党。

托季联盟中的“积极活动家”，原来是些政治上的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

政治上的两面派通常总是从欺骗开始做起，用欺骗人民，欺骗工人阶级，欺骗工人阶级党的手段来干自己的黑暗勾当。然而，决不可把政治上的两面派看作单只是一些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乃是一伙毫无宗旨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民方面的信任，于是就采用欺骗的方法，采用蜥蜴变色的方法，采用拐骗的方法——随便采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来企图重新博得信任，只求为自己保持着政治活动家的资格。政治上的两面派乃是一颗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甘愿倚靠随便什么人，甚至倚靠盗匪份子，甚至倚靠社会败类，甚至倚靠人民死敌，以便在“适当时机”来重新爬上政治舞台，来骑在人民颈上充当人民底“统治者”。

托季联盟中的“积极活动家”，原来就是这样一种政治上的两面派。

(三)对富农的进攻。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取。社会主义竞赛。群众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托季联盟为反对我党政策，为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为反对集体化而进行的煽动，以及布哈林份子所进行的煽动，说什么集体农庄事业行不通，说不要触动富农，因为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对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危险，——所有这些煽动，都在国内资本主义份子中，首先是在富农中得到了强烈的回应。现在富农从报章上所登载的消息中知道他们并不是孤独无助

的人,知道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他等人保护和辩护他们。当然,这种情形不能不鼓起富农反对苏维埃政府政策的精神。果然,富农也就一天天加紧进行反抗了。大批大批的富农实行拒绝把他们积蓄得不少的剩余粮食卖给苏维埃国家。他们采取恐怖手段来对付集体农民,来对付农村中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放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谷仓。

党很懂得,当富农反抗尚未被击破,富农尚未在农民眼前被公开击溃时,工人阶级和红军是会苦于粮食不足,而农民的集体农庄运动是不能普遍发展的。

党遵照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底指令,转而对富农实行坚决的进攻。党在进攻中所实现的口号是:稳稳倚靠着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为了回答富农拒绝按固定价格把剩余粮食卖给国家的行动,党和政府实行了许多反对富农的非常手段,采用了刑律第一百零七条所定关于在富农和投机者拒绝按固定价格出卖剩余粮食给国家时,得根据法庭判决没收其所有剩余粮食的办法,同时又给予了贫农许多优待,使其能从所没收的富农粮食中领得百分之二十五来供自己享用。

非常手段发生了应有的效力: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富农和投机者底反抗被打破了。到一九二八年年底,苏维埃国家已拥有充分的后备粮食,而集体农庄运动已是取着更有把握的步调向前迈进了。

同年间,在顿涅茨矿区沙赫特区内破获了一个大规模的资产阶级专门家暗害组织。沙赫特暗害份子是同从前俄国和外国资本企业主,以及外国军事侦探机关有密切联系的。他们所抱定的目的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底增长,而促进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暗害份子用不正确的方法进行采矿工作,以便减少煤炭产量。他们实行损坏机器和通风机,设法使矿井崩陷,爆炸和放火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暗害份子故意阻挠工人物质状况底改善,违抗苏

维埃劳动保护法。

暗害份子被交付法庭究办了。他们从法庭方面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党中央委员会责成各级党组织从沙赫特事件中取得教训。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应精通生产技术，使旧的资产阶级专门家中的暗害份子今后不能欺骗他们；必须加速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造就新的技术干部。

根据中央底决议，改善了高等技术学校里造就青年专门家的工作。被动员去学习的有数千个党员，青年团员以及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非党份子。

当党尚未转而对富农实行进攻，而还在设法消灭托季联盟的时候，布李集团底举动还较为沉静，还留作为反党势力底后备，还不敢公开援助托洛茨基份子，有时甚至还和党一起反对过托洛茨基份子。自从党转而对富农实行进攻，而采取反对富农的非常手段时起，布李集团便抛弃了假面具，公开来反对党底政策。布李集团底富农本性已经隐讳不住，于是其中各参加者就来公开袒护富农。他们要求取消非常手段，恐吓傻子，说否则农业就会开始“退化”（下降，衰落，崩坏），且说退化已经开始。他们没有觉察到更高农业形式的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的增长，而只看见富农经济的衰落，竟将富农经济底退化说成为农业底退化。为了在理论上把自己的立场巩固起来，他们便造作了一种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并根据这个理论来断定，说社会主义在其与资本主义成份斗争中获得的成功愈多，阶级斗争也就会愈缓和；说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说因此根本就用不着实行进攻富农。这样，他们便把他们的认为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陈腐资产阶级理论恢复起来，而践踏着列宁主义底著名原理，这个原理认为阶级敌人愈益失去立足基地，社会主义愈益获得成功，则阶级敌人底反抗也就会愈益加紧；

认为阶级斗争只是在阶级敌人已被消灭后才会“熄灭”。

很明显的,布李集团是个右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它与托季联盟只有形式上的区别,就是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诺维也夫份子曾有过某些可能来用所谓“不断革命”的,叫喊革命的,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实质,而布李集团却因是在党转而对富农实行进攻时出来反对党的关系,已没有可能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面目,便不得不公开地,毫无粉饰地,不戴假面具地保护我国反动势力,首先是保护富农。

党很懂得,布李集团迟早是会与托季联盟余孽携手来共同进行反党斗争的。

布李集团不但进行了政治的发动,而且还进行了收集其同伙的组织“工作”。它经由布哈林去实行纠合斯列普可夫,马列茨基,爱恒瓦里特和哥里登伯尔格等一类的资产阶级青年,经由托姆斯基去实行纠合官僚化的职工会上层份子(麦里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人),经由李可夫去实行纠合腐化的苏维埃机关上层份子(阿·斯米尔诺夫,爱斯蒙特,佛·史米特等人)。凡是政治上腐化而并不掩蔽其投降主义情绪的人,都乐意加入了这个集团。

当时布李集团得到了莫斯科党组织里上层份子(乌格兰诺夫,科托夫,乌汉诺夫,柳亭,雅果达,坡朗斯基等人)方面的援助。一部分右派份子仍旧掩藏起来,没有公开发表反对党路线的言论。有些右派份子在莫斯科党刊和党员大会上从事鼓吹,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向富农征税是不适当的,说工业化是对人民繁重不堪的负担,说建设重工业是一件为时过早的事情。乌格兰诺夫反对建筑德涅泊尔水电站,要求把资金由重工业移到轻工业中去。乌格兰诺夫及其他右派投降主义者信口开河,说莫斯科曾是而且将来还会是出产花布的莫斯科,说不应在莫斯科建筑机器制造厂。

莫斯科党组织把乌格兰诺夫及其同伙揭破了,给了他们一个最后的警告,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周围。斯大林同

志一九二八年在联共（布）莫斯科省委全会上说到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认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斯大林同志说，右派是富农在党内的代办。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结果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底革命阵地，提高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起来的机会”，——斯大林同志当时说道（《列宁主义问题》，第二三四页）（注七五）。

一九二九年初查明出来，布哈林代表右派投降主义者集团而由加米涅夫串通去同托洛茨基份子实行勾结，并规划出同他们一起进行反党斗争的协定。中央揭破了右派投降主义者所干的这种犯罪勾当！并警告他们说，这样干下去，结果会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等人大吃其亏的。但右派投降主义者不肯干休。他们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了新的反党纲，但中央又申斥了他们的这个声明。中央重新警告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托季联盟所遭到的结局。虽然如此，但布李集国还是继续进行其反党的活动。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辞职声明书，想借此来恐吓党。中央斥责了这种怠工主义的辞职政策。最后，一九二九年中央十一月全会通过决议，认为宣传右派机会主义者观点的行为与党员资格不能相容，主张把右派投降主义者底急先锋和领导者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并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右倾反对派参加者下了一个严重的警告。

右倾投降派魁首们见势不佳，便呈递声明书，表示承认自己错误而承认党底政治路线正确。

右倾投降派决定暂时实行退却，以便保存自己的干部免遭粉碎。

党与右倾投降派斗争的第一阶段，就是这样结束的。

党内发生的意见分歧，不能不引起苏联外部敌人注意。他们以为我党内部的“新纷争”是我党力量削弱的表现，于是就来重新

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以便破坏我们尚未巩固的国家工业化事业。一九二九年夏,帝国主义者挑起中苏冲突事件,唆使中国军阀强占中东路(中东路是属于苏联的),指使中国白军侵犯我国远东边界。但中国军阀所举行的袭击在很短期间就被消灭下去,被红军击败的军阀们只好退却,于是这次冲突就由我国同满洲当局订立和平协定而结束。

苏联底和平政策不顾一切,不顾外敌底阴谋和党内的“纷争”,而再次地凯旋了。

不久后,原被英国保守党人打断的苏英两国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恢复了。

党一面顺利击退内外敌人举行的攻击,同时又努力进行了开展重工业建设,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建设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准备好采取和实现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必需种种条件的巨大工作。

一九二九年四月,召集了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代表会议排斥了右倾投降派所拥护的“最低式的”五年计划,而采取了“最高式的”五年计划,作为绝对必须执行的计划。

这样,党就采取了有名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

按五年计划规定,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间投入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费等于六百四十六万万卢布。其中投入工业和电气化方面的计有一百九十五万万卢布,投入运输业的计有一百万万卢布,投入农业的计有二百三十二万万卢布。

这是用现代技术装备苏联工农业的伟大计划。

“五年计划底基本任务,——斯大林同志指出,——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改组过来的重工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四八五页)(注七六)。

这个计划虽然非常宏伟，但它对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和足以冲晕头脑的事情。它是由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的全部发展进程所准备好了的。它是由先前已普及于工农群众而表现于社会主义竞赛的那种劳动高潮所准备好了的。

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通过了为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告全体劳动群众的宣言。

社会主义竞赛表现了努力劳动和新劳动态度的灿烂模范。工人和集体农民在许多企业，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中提出他们的迎展计划。他们表现出英勇工作的模范。他们不仅执行而且超过执行了党和政府所拟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人们对于劳动的观点改变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一种强迫性的和苦役式的义务，而现在劳动却变成了“光荣的事业，荣耀的事业，豪迈和英勇的事业”（斯大林语）。

在全国各地进行着新的巨大的工业建设。德涅泊尔水电站建筑工程开展起来了。在顿巴斯一带开始了克拉马托尔工厂和哥尔洛夫卡工厂的建筑工程，进行着鲁干斯克火车头制造厂的改造工程。新的矿井和新的熔铁炉日益增多。在乌拉尔一带建筑着乌拉尔机器制造厂，柏列兹尼克和索力康姆斯克两处化学联合制造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炼厂建筑工程开始了。在莫斯科和高尔基城开展着巨型汽车制造厂建筑工程。在许多地方建筑着巨型拖拉机制造厂和康拜因机制造厂，在顿河岸罗斯托夫城建筑着巨型农业机器制造厂。苏联第二个产煤基地库兹涅茨矿区扩大了。一个极大的拖拉机制造厂，在十一个月以内就在草原地带的斯大林格罗成长起来。在建筑德涅泊尔水电站和斯大林格罗拖拉机制造厂的时候，工人们打破了全世界的劳动生产率纪录。

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新工业建设，这样高度的新建设热忱，这样英勇的数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劳动精神。

这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竞赛基础上展开的真正的劳动

高潮。

农民这次也不落后于工人。农村中也开始了农民群众努力建设集体农庄的劳动高潮。农民群众已确定地转向集体农庄方面来了。具备有大量拖拉机及其他各种机器的苏维埃农庄和农业机器站,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一群群的农民来到苏维埃农庄和农业机器站考察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的工作情形,表示出自己的欢欣,马上便通过决议“加入集体农庄”。农民向来都是分散成许多细小和极小个体农户,没有稍许完备的工具和曳引力,没有耕种广大荒地的可能,没有改善经济的前途,备受贫困拘束,零丁孤苦而无所依靠,现在他们却终于找到了出路,找到了走向优美生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在于把细小农庄联合成为集体农庄,就在于能够耕耘一切“硬土”和一切荒地的拖拉机,就在于从国家方面获得机器、金钱、人材和意见的帮助,就在于有可能免除富农盘剥,因为苏维埃政府不久前已把富农击破和打得永远不能翻身,而使数千万农民群众感到无限欢欣。

在这个基础上就有群众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发生而接着又广泛扩展起来,到一九二九年未已特别加强,使得集体农庄的增长具有了甚至连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也未会有过的速度。

集体农庄播种面积在一九二八年是一百三十九万海克脱,在一九二九年是四百二十六万二千海克脱,而在一九三〇年间,集体农庄却已能预计耕种一千五百万海克脱的土地了。

“老实说,——斯大林同志在他所著《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一九二九年)讲到集体农庄增长速度时说道,——这样飞快发展的速度,甚至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也未曾有过,而一般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是发展得很迅速的”。

这是集体农庄运动发展中的转变。

这是群众集体农庄运动底开始。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究竟是什么呢?”——斯大林

同志在其所著《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问道。他接着便回答说：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现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已不像从前那样只是几人一队，而是整村、整乡、整区以至于整州一同加入的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就是农业发展中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一根本转变，就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成绩”。

这就是说，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已在成熟，或者说已经成熟了。

简短的结论

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间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中，党克服了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巨大困难。由于党和工人阶级底努力，遂使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政策获得了胜利。

工业化方面的一个极困难的任務，即积蓄重工业建设基金的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于是就奠定了能把全部国民经济改造过来的重工业底基础。

当时采取了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了新工厂、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的伟大建设。

这样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进程，引起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党内斗争的尖锐化。这一斗争最重要的总结，就是把富农底反抗镇压下去，把托季投降派的联盟揭破而暴露它是个反苏维埃的联盟，把右倾投降派揭破而暴露他们是富农的代办，把托洛茨基份子从党内驱逐出去，认定托洛茨基份子和右派机会主义者底观点根本与联共(布)党籍不能相容。

托洛茨基份子既已在思想上被布尔什维克党击破，既已丧失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任何根基，就已不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变成了一伙毫无原则专求利禄的政治骗子，变成了一伙政治上的两面派份子。

党既已奠定重工业底基础,就动员工人阶级和农民去执行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各地开展着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生长着雄强的劳动高潮,造就出新的劳动纪律。

大转变的一年就是这一时期的结束,这个转变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工业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农业方面达到了第一批重大的成功,中农已转向于集体农庄,群众的集体农庄运动已经开始了。

第十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 农业集体化而斗争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时期)

(一)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间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经济危机。日本强占东三省。德国法西斯蒂上台执政。两个战争策源地。

苏联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功,并很迅速地发展着工业,而资本主义国家却于一九二九年末爆发了破坏力量空前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以后三年中间加深起来。工业危机既与农业危机错综结合,于是就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底状况更加恶化。

在经济危机的三年间(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三三年与一九二九年水准相较等于百分之二百零一,而美国工业在一九三三年年底却降到一九二九年水准百分之六十五,英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国工业降到百分之七十七。

这种情形再次显示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情形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不沾受经济危机的国家。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有二千四百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受苦的境地。数千万农民感受到农业危机的痛苦。

世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列强间,战胜国与战败国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以及依赖国间,工人与资本家间,农民与地主间的

矛盾,更加尖锐化。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两方面寻找逃出经济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借建立法西斯专政,即建立资本主义最反动,最激烈沙文主义,最激烈帝国主义份子底专政来镇压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来劫掠防卫能力薄弱的国家。

结果正是如此。

一九三二年,从日本方面加强了战争威胁。日本帝国主义者眼看欧洲列强和美国因经济危机发生而完全忙于内部事务,于是决定乘机来逼迫防卫能力薄弱的中国,企图把它征服,而成为那里的主宰。日本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向中国宣战,却狡诈地利用他们亲自造成的“地方事件”,像行窃似地把自己的军队开进满洲,日本军队把满洲全部占领,以便准备方便阵地去侵占中国北部和进犯苏联。日本为了便于自由行动而退出了国际联盟,并更其加紧扩充军备。

这种情形就推动美英法三国去加强它们在远东方面的海上军备。日本分明力图把中国征服,并从这里把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撵出去。于是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就以加强军备来实行对付。

但日本同时又还力图侵占苏联远东地区。苏联当然不能把这种危险置之不顾,于是就来加紧巩固远东边疆一带的国防能力。

这样,由于有日本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者作祟,就在远东方面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经济危机不仅使资本主义矛盾在远东方面尖锐化。它并且使这种矛盾在欧洲也尖锐化了。延续的工农业危机,大批工人失业以及贫苦阶级生活更加痛苦不堪的事实,使工农不满情绪日益加强。不满情绪已转变成工人阶级底革命义愤。不满情绪特别在德国这一因受战争破坏,因付赔款给英法战胜国以及遭遇经济危机而弄得经济上疲竭不堪的国家里加强起来,因为这里工人阶级遭

受着本国和英法资产阶级双重的压迫。德国共产党在法西斯蒂上台前最后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六百万选票，便是最能说明这点的例证。德国资产阶级看到，德国当时所保存着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可能使它吃到大亏，工人阶级可能利用这种自由权利来开展革命运动。因此它便认定，为了要在德国保持资产阶级政权，唯一的手段就是取消资产阶级民主权利，把国会化为乌有，而建立一个能把工人阶级镇压下去，并能在怀有复仇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找到基础的恐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专政。于是它就叫专为欺骗人民而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法西斯党来上台执政，因为它很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党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仇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法西斯党是个复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党，巧于引诱千百万怀有民族主义观念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在这方面帮了法西斯党不少的忙，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妥协政策替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

这就是使德国法西斯蒂能在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分析到德国事变时说道：

“不仅要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作是工人阶级力量软弱的表现，看作是替法西斯主义当清道夫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同时还须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力量软弱的表现，因为资产阶级已不能用国会制的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式来实行统治，所以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五四五页)(注七七)。

德国法西斯蒂用火烧国会，残酷镇压工人阶级，消灭工人阶级组织，消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的行动来开始实现其对内的政策。他们用退出国际联盟和公开准备为强迫修改欧洲各国疆界以利于德国的战争的行动来开始实现其对外的政策。

这样,因有德国法西斯蒂作祟,就在欧洲中部形成了第二个战争策源地。

苏联当然不能把这样严重的事实置之不顾,于是它就来炯然注视着西欧事变底进程,并巩固其在西方边境的国防能力。

(二)从限制富农份子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为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政策的行为而斗争。对资本主义成分举行的全面进攻。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间开展的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是党和政府过去全部工作底结果。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发展到能够大宗出产供给农业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由于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粮食采办运动时进行过反对富农的坚决斗争,由于有逐渐教导农民加入集体经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增长,以及由于有第一批集体农庄与苏维埃农庄的优良经验,结果就准备好了过渡到全盘集体化,整乡、整区、整府农民一同加入集体农庄的基础。

过渡到全盘集体化的经过并不是表现于基本农民群众简单而和平加入集体农庄,而是表现于农民群众同富农进行斗争。实行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全村所有一切土地转交集体农庄,但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土地还操在富农手中,因此农民便把富农从土地上赶走,把富农所有的财产实行没收,把富农所有的耕畜和机器夺取过来,并要求苏维埃政权逮捕和驱逐富农。

所以,全盘集体化就是消灭富农。

这就是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当时苏联已经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铲除富农,击破富农反抗,消灭富农这一阶级,并用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的生产来代替他们的生产。

一九二七年间,富农还出产过六万万余普特的粮食,其中当作

商品粮食交出的约有一万万三千万普特。当时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所能交出的商品粮食还不过三千五百万普特。一九二九年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发展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的坚决方针，由于供给农业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器的社会主义工业获得了成功，遂使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长成为极重大的力量。在这一年间，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出产了不下四万万普特的粮食，其中当作商品粮食交出的已超过一万万三千万普特，即超过富农在一九二七年间所交出的数量。而在一九三〇年间，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所应该交出而且确实交出了的商品粮食已达四万万普特，即已比富农在一九二七年间所交出的数量多得不可比较了。

这样，由于全国经济方面阶级力量对比的变更，由于已具有必需的物质基础来用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粮食生产，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就能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

苏维埃政权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所实行的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苏维埃政权曾向富农抽收高度赋税，曾要求他们按照固定价格出卖粮食给国家，曾以颁布租地法来相当限制过富农土地使用权，曾以颁布个体农户雇佣劳动采用法来限制过富农经济底范围。但当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实行过消灭富农的政策，因为租地法和劳动雇佣法既容许富农存在，而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命令又对此给予过相当的保障。这样的政策结果是使富农份子的增长受到阻碍，使那些经不住这种限制的个别富农阶层受到排挤和陷于破产。但这一政策并没有把富农阶级底经济基础推翻，并没有把富农阶级消灭。这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这政策在一定时期，却在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力量尚嫌薄弱而不能用自己的粮食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时期，原是必要的。

在一九二九年年底的时候，因为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已有充分的增长，于是苏维埃政权就放弃这个政策而实行了一个急剧

的转变。此时它已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过渡到铲除富农阶级的政策。它废除了租地法和劳动雇佣法，于是就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它取消了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命令。它允许农民把富农所有的耕畜、机器及其他农具没收转交给集体农庄。富农财产被剥夺了。富农财产被剥夺，实与一九一八年资本家在工业方面被剥夺的情形相同，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此时从富农那里没收过来的生产资料不是转归国家，而是转归联合在一起的农民，即转归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极深刻的革命，是从社会底旧质态转变到新质态的突变，照其结果来说，它是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

这个革命底特殊处，就在于它是由上面，由国家政权来提倡，并由反对富农盘剥，争取自由集体农庄生活的千百万农民群众从下面直接赞助实现的。

这个革命一举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根本问题：

(一)它把我国人数最多的剥削者阶级，即资本主义复辟支柱的富农阶级消灭了。

(二)它使我国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即农民阶级，离开了产生着资本主义成份的个体经济的道路而转上了公共集体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

(三)它在农业这一最广大和切身必需，而又最落后的国民经济部门中，给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

这样就把国内所有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底最后根源消灭下去，而创造了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新的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论证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并指明农民全盘集体化群众运动底结果时，写道：

“各国资本家妄想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即

“神圣的私有原则”，已在崩溃而化为灰烬了。他们所认为是资本主义滋养料的农民，已纷纷抛弃那所赞美的“私有制度”旗帜，而走上了集体制度的轨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一点希望，已在崩溃下去”(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二九六页)(注七八)。

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是在联共(布)中央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通过的《论集体化速度与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中明文规定的了。这一决议充分估计到苏联各个区域条件不同的情形，充分估计到苏联各个省区对集体化准备程度不一的情形。

当时规定了各种不同的集体化速度。联共(布)中央根据集体化速度的标准把苏联各省区分成了三类。

归入第一类的是对集体化最有准备，拖拉机数量较多，苏维埃农庄数量较多，并且在过去几次采办粮食运动时同富农作斗争的经验较多的那些主要谷物产区，即北高加索(库班区，顿河区，特勒克区)，窝尔加河中游区，窝尔加河下游区。对于这一类的谷物区，中央提议要在一九三一年春季把集体化工作大体完成。

第二类所包括的谷物区，即乌克兰，中央黑土省，西伯利亚，乌拉尔，卡查赫斯坦等谷物区，可能在一九三二年春季把集体化工作大体完成。

其余各省，边区及共和国(莫斯科省，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等等)，可能把集体化工作完成时间延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终结时期，即延长到一九三三年。

党中央认为由于集体化速度日益增长的关系，必须加速建筑出产拖拉机、康拜因机以及由拖拉机曳引农具等等的工厂。同时，中央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在集体农庄运动现阶段上轻视马匹曳引力作用的偏向，因为这种偏向会引起浪费马匹和出卖马匹的现象”。

同时中央又决定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发给集体农庄的

贷款增加一倍(增至五万万卢布)。

同时还决定由国家出资给集体农庄进行土地整理。

在这个决议中给了一个极重要的指示,即认为集体农庄运动在目前阶段上的主要形式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集体化的农业劳动组合。

中央极严厉地预告各级党组织,必须“反对任何自上‘号令’集体农庄运动,因为这种办法可能造成用集体化的儿戏来代替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真正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危险”(《联共(布)决议案汇集》,卷下,第六六二页)。

中央通过这一决议,便把究应如何实现党在农村中新政策的问题阐明清楚了。

在实行消灭富农和进行全盘集体化这一政策的基础上,集体农庄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整村整区农民一同加入集体农庄,从道路上扫除富农,摆脱富农盘剥。

可是,在集体化运动方面获得这样巨大成功的时候,而在党工作人员实际工作中却很快就暴露出一些缺点,其表现就是歪曲了党对于集体农庄建设事业的政策。有许多党工作人员不顾中央已经预告大家不要过分竞求集体化底成功,却竟不问地方和时间条件怎样,不问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如何,而用人工方法勉强加速集体化。

当时暴露出违背集体农庄运动自愿原则的事实。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对农民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等要挟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的办法来代替了自愿原则。

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官僚主义的号令手段浮报集体农庄数目的办法,用勉强夸大集体化百分数的办法来代替了集体化方面的准备工作,来代替了耐心解释党在集体化方面政策基础的工作。

在好几个地方,人们不顾中央认定集体农庄运动基本环节是

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这种指示，公然鲁莽从事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等实行公共化。

有几个省区里的领导工作人员因迷恋于集体化方面的初步成功，公然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莫斯科省为了竞求浮报的数目字，竟责成该省工作人员必须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完成集体化，虽然他们至少还拥有三年的时间（到一九三二年年年底止）。在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一带，人们更把这一指示违背得粗暴已极。

富农及其应声虫就利用这种过火行动来实行挑拨，主张组织公社来代替农业劳动组合，立刻把住房、小牲畜和家禽实行公共化。同时，富农又煽动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将牲畜宰杀，诱感农民，硬说牲畜到集体农庄内“横竖是会被人拿去的”。阶级敌人是指望地方组织在集体化运动中所犯的过火行动和错误将会激怒农民，将会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

由于党组织所犯的错误的以及阶级敌人直接挑拨捣乱的结果，所以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下半月，虽然集体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已获得显然的成功，但在某些区域内却暴露出农民严重不满底危险征兆。在个别地方，富农及其走狗甚至还煽起过一部分农民来进行直接反苏维埃的发动。

党中央接到关于有人歪曲党路线而势必使集体化事业受到破坏的警号以后，立刻就来实行设法纠正，使党的干部转上立刻改正错误的道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根据中央决议而公布了斯大林同志所写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在这篇论文里警告了所有迷恋于集体化成功而陷入严重错误并离开党路线的人，警告了一切企图用行政强迫手段把农民转入集体农庄道路的人。在这篇论文中强调了集体农庄建设底自愿原则，并指出，在规定集体化速度和方法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区的特殊条件。

斯大林同志提醒说,集体农庄运动底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只把基本的生产资料,主要是谷物业底基本生产资料化为公有,而并不把屋旁园地、住宅、某一部分乳畜、小牲畜和家禽等等化为公有。

斯大林同志底论文发生了极大的政治作用。这篇论文帮助党组织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给了苏维埃政权敌人一个极有力的打击,这些敌人是指望他们能利用这种过火行为来煽动农民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已确信布尔什维克党路线与某些地方工作人员鲁莽从事的“左的”过火行动毫不相干。这篇论文使农民群众安心下去了。

为了把斯大林同志底论文所开始的改正过火行动和纠正错误的事情贯澈到底,于是联共(布)中央就决定再把这些错误打击一下,而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公布了《反对歪曲我党集体农庄运动路线》的决议。

在这个决议中,详细分析了因离开我党列斯路线,因直接违反我党指令而作出的种种错误。

中央指出:“左的”过火行为乃是直接帮助阶级敌人的一种举动。

中央提议:“把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坚决反对歪曲党路线的工作者撤职,而用其他的工作者代替之”(《联共(布)决议案汇集》,卷下,第六六三页)。

中央把几个犯了政治错误而又不善于改正错误的省党组织和边区党级组织(莫斯科省,南高加索)底领导成份革新了。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公布了斯大林同志所写的《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复》一文。这篇论文上指出,在农民问题上所犯的种种错误底根源以及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了中农;在建设集体农庄时违背了列宁所规定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认定必须估计到苏联各区特殊条件的原则;公然跳

过劳动组合而径直成立公社。

由于实行这一切办法的结果，于是党就把许多区域内的地方工作人员所犯的过火行为克服了。

只是因为中央具有极坚决的精神和逆流而进的本领，才把党内颇大一部分因迷恋胜利而离开党路线往下飞奔的干部及时引上了正轨。

党把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行为克服了。

结果就把集体农庄运动底成功巩固了。

结果就为集体农庄运动更进一步的雄强发展造成了基础。

在党进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以前，以反对资本主义成份和消灭资本主义成份为目的的严重进攻，主要是在城市方面，在工业方面进行的。当时农业，农村，在这方面还落后于工业，还落后于城市。因此，当时的进攻还是一种片面性的进攻，不是全面进攻，不是总进攻。现在农村底落后性已开始成为过去，农民为消灭富农而进行的斗争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党已进到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所以反资本主义成份的进攻就成了总的进攻，片面的进攻就转变成了全面的进攻。到召集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时，对资本主义成份实行的总进攻，已经全面开展起来了。

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开幕的。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千二百六十八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八百九十一个有发言权的代表，总共代表着一百二十六万零八百七十四名党员和七十一万一千六百零九个候补党员。

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开展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斯大林语）载入我党史册的。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开展社会主义进攻时所达到的重大成功。

在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方面,已使工业在全部国民经济出产总量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业比重。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经济年度,工业部分至少已等于全部国民经济出产总量百分之五十三,而农业部分则约占百分之四十七。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时,即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全部工业出产总量还只等于战前水准百分之一百〇二点五,而到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即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却已约占战前水准百分之一百八十。

重工业,即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机器制造业,更加巩固了。

斯大林同志在全体代表热烈赞同声下说道:

“……我们现时已处在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前夜了”。

然而,——斯大林同志解释说,——不可把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和工业发展的水准混为一谈。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得空前迅速,但我国工业发展的水准却还远远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电力出产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虽然苏联在电气方面已达到了重大的成功。五金生产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苏联生铁出产额,按计划规定,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末应等于五百五十万吨,而德国一九二九年生铁熔铸量却等于一千三百四十万吨,法国等于一千零四十五万吨。为着在最短期间消灭我国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情形,必须继续提高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必须和企图降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速度的机会主义者作最坚决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指出:

“……那些瞎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们,乃是社会主义底敌人,乃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底走狗”(《列宁主义问题》,第三六九页)。

当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度计划已经顺利完成和超过完成时,群众中产生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在许多先进工业

部门(即石油业,泥炭业,普通机器制造业,农业机器制造业,电工器材制造业),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甚至可在两年半或三年内把这些部门中的五年计划完成。这样就证实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完全可能实现,并揭破了怀疑其有实现可能的那些缺乏信心者底机会主义立场。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委托党中央“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今后也有战斗性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达到五年计划真正四年完成”的目的。

到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时,在苏联农业发展方面已达到了极重大的转变。广大农民群众已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到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在各出产省中基本谷物区里,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在一九二八年春季,还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集体农庄底播种面积已等于三千六百万海克脱。

这样,中央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决议中所规定的增高的纲领(三千万海克脱),竟是超过完成了。五年的集体农庄建设大纲,在两年以内就超过完成到一倍半了。

集体农庄底商品产量在三年以内增加了四十多倍。在一九三〇年的时候,国家从集体农庄方面——除开苏维埃农庄不算——取得的商品谷物,已超过全国谷物商品出产总量二分之一。

这就是说,今后决定农业命运的已不是个体农庄,而是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了。

如果说在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以前,苏维埃政权主要是倚靠于社会主义的工业,那末今后它却同时还倚靠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部份的农业,即倚靠于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了。

正如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一个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集体农民已经成了“苏维埃政权底真正和坚固的支柱”。

(三)改造国民经济所有各个部门的方针。技术底作用。集体农庄运动的继续发展。农业机器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总结。社会主义底全面胜利。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

当重工业和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不仅已经创立和巩固,而且分明已在很迅速地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于是党面前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在新的现代的技术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所有各个部门。必须拿出现代的新技术,新机床和新机器来供给燃料工业,冶金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木材工业,军事工业,运输业和农业。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需求额大量的增加,必须把国民经济所有各个部门中的出产量增加两三倍。可是为要达到这一步,就必须拿出充分的现代新装备品来供给工厂,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因为旧装备品不能把出产量提到这样的高度。

不改造国民经济各个基本部门,就不能使国家及其国民经济愈益增长的新的需要得到满足。

不实行改造,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底全面攻势贯彻到底,因为要打破和澈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就不仅要运用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运用新的技术,运用自己优越的技术。

不实行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虽已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工业发展水准方面,在出产品数量方面却还比它们落后得多。

为了消灭这种落后情形,就必须用新的技术来供给我国全部国民经济,就必须在现代的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于是,技术就具有了决定一切的意义。

障碍这件事情的,与其说是新机器和新机床的不够,——当时机器制造业已能供给新的装备品,——不如说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正确对待技术的态度,轻视技术在改造时期作用的态度,鄙薄技术的态度。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认为技术是“专门家”底事

情，是委托给“资产阶级专门家”去作的一种次要的事情，担任经理工作的共产党员不应干预生产技术，他们不应过问技术，而是应当注重于更重要的事情，即对生产实行“一般的”领导。

于是，资产阶级“专门家”就可以随便操纵生产上的事务，而担任经理工作的共产党员自己却只从事于“一般的”领导，即签署公文。

当然，在这样一种处置问题的态度下，“一般的”领导也就不免要变成妄谈“一般”领导的废话，变成签署公文的无谓玩意，变成纸上的劳碌。

当然，在担任经理工作的共产党员这样鄙薄技术的态度下，我们就会不仅永远不能超过，并且还不能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对待技术，——何况是在改造时期，——就会使我国陷于落后地位，使我们的发展速度降低下去。其实，这样一种对待技术的态度，是掩盖和掩饰了一部分担任经理工作的共产党员潜藏在心的愿望——延缓工业发展速度，降低工业发展速度而为自己造成一种“安静的环境”，而把生产方面的责任推到“专门家”身上。

必须使担任经理工作的共产党员转而注重技术，使他们对技术感觉兴趣，向他们证明，精通新技术是布尔什维克经理工作人员切身的事情，我们如果不精通新的技术，就会使我们祖国陷于落后地位，陷于苟延残喘的地位。

当时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前进。

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一年二月在第一次工业工作人员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起了极重大的作用。

“人们有时发问，——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说，——难道不可稍许减低速度，延缓进展速率么？不行的，不可以的，同志们！决不可减低速！……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我们不愿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

旧俄罗斯底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常因落后而挨打。蒙古的

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法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爵士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翻……

我们至多是在十年当中就要跑过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我们有一切‘客观的’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技能。而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并且只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已经是学会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不干预生产工作的腐败方针的时候了。已经是领会另一个方针，即适合现今时期的要干预一切的新方针的时候了。你既然是个工厂经理，就得干预一切事务，就要熟悉一切而什么也不要忽略过去，就得学习，再三学习。布尔什维克应当精通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门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四四四至四四六页）（注七九）。

斯大林同志这一演说底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担任经理工作的共产党员鄙薄技术的态度，使他们转而注重技术，开辟了为使布尔什维克自己精通技术而斗争的新时期，因而促进了扩展国民经济改造的事业。

从此时起，技术就由资产阶级“专门家”所垄断的事业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经理人员自己切身的事业，而“专门家”这一鄙薄的称呼就变成成为精通了技术的布尔什维克底光荣称号了。

从此时起，就必定要出现——而后来也就确实出现了——一批一批，成千成万精通了技术和能领导生产的红色专门家。

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所拥有的新的，苏维埃的生产技术知识份子，他们现在是我们经济领导中的基本力量。

所有这些，都必定要促进——并且确实促进了——国民经济改造事业底扩展。

改造事业不仅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扩展了，而且更为迅速地在农业方面扩展了。这也是当然的事：因为当时农业底机器装备程度要比其他部门薄弱，所以它特别需要有新式机器的供给。而现在却正特别需要加紧用新式机器供给农业，因为现在集体农庄建设每月每周都有新的增长，当然也就每月每周都要求供给它成千成万架新增的拖拉机和农用机器。

一九三一年间集体农庄运动有了新的增长，就基本的谷物区域来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区域里的全盘集体化事业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在次要的谷物区域和技术作物种植区中，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十万个集体农庄和四千个苏维埃农庄底播种面积已占全部播种面积三分之二，而个体农民底播种面积却只占三分之一。

这是社会主义在农村中获得的巨大胜利。

然而，当时集体农庄建设底发展还不是朝着纵深方面，而是朝着横广方面进行的，还不是朝着改善集体农庄工作及其干部底质量方面，而是朝着增加集体农庄数量以及使集体农庄普及到一批批新区域中去的方面进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集体农庄积极份子成长的速度，集体农庄干部成长的速度，还没有赶上集体农庄数量增加的速度。所以，新集体农庄中的工作，并不是时常都能令人满意，集体农庄本身也尚嫌幼弱而没有强固。此外，还有一些事实也阻碍了巩固集体农庄的事业，就是在农村中还缺少集体农庄所必需的有知识的人材（会计员，经济部主任，秘书），农民还缺乏经营大规模集体经济的经验。当时在集体农庄中工作的还是些昨天的个体农民。他们只有在小块土地上经营的经验，而还没有领导大规模集体经济的经验。要获得这样的经验，是需要费些时间的。

因为这些情形,所以集体农庄工作在最初一个时期也就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缺点。原来集体农庄中的劳动还组织得不好,劳动纪律尚嫌薄弱。有许多集体农庄不是按劳动日,而是按人口分配收入。偷懒者往往竟比勤恳忠实工作的庄员领得较多的粮食。由于集体农庄领导方面有这种缺点,就使庄员们在工作中的兴趣降低,甚至在农忙时期也有许多庄员不到场工作,一部分集体农庄的庄稼直到下雪时还没有收割,并且收割工作也做得很不仔细,常使谷物损失很大。机器和马匹缺乏专人照管以及工作中没有专人负责的情形,也削弱了集体农庄的事业,降低了集体农庄底收入。

尤其是那些由过去的富农和富农走狗钻得集体农庄某些职务的区域中的情形特别恶劣。富农被剥夺了财产之后,往往跑到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区域里去,钻进那里的集体农庄去进行暗害和破坏工作。有时候,由于某些党工作人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缺乏警觉性之故,富农竟钻进了本地的集体农庄。富农在反对集体农庄斗争中急剧改变了策略的事实,也是使过去富农易于混入集体农庄中去的一种原因。从前,富农总是公开反对集体农庄,进行残酷斗争来反对集体农庄积极份子,反对先进集体农庄庄员,暗杀他们,放火焚烧他们的房屋和仓库等等。当时富农想用这种手段吓倒农民群众,不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现在,公开反对集体农庄的斗争既已遭到失败,于是他们就来改变自己的策略。他们现在已经不是用半截枪来实行射击,而是装成温和,客气,驯顺,完全像个苏维埃人的样子了。他们钻进集体农庄之后,就用暗中拆台手段来危害集体农庄。他们到处设法从内部瓦解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中的劳动纪律,把计算收成和计算劳动的工作弄得混乱不清。富农极力想把集体农庄中的马匹消灭,并且居然害死了许多马匹。富农故意用鼻疽症、癩病及其他种种病症来传染马匹,不给马匹任何照料等等。富农把拖拉机及其他机器弄坏。

富农之所以往往能够欺骗集体农庄庄员和肆无忌惮地进行暗

害工作,是因为当时集体农庄还嫌薄弱和没有经验,而集体农庄的干部又还没有充分巩固。

为了铲除富农在集体农庄中所进行的暗害勾当,为了促进巩固集体农庄的事业,就必须给予集体农庄以人材,意见和领导上的迅速而严重的帮助。

而布尔什维克党也就给予了集体农庄这样一种帮助。

一九三三年一月,党中央通过了在供应集体农庄的农业机器站中成立政治部的决议。当时为了帮助集体农庄而派出了一万七千个党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担任政治部工作。

这是很重大的一种帮助。

农业机器站政治部在两年(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以内就作了很大一番铲除集体农庄工作缺点,培养集体农庄积极份子,巩固集体农庄,以及把集体农庄中的敌人、富农和暗害份子清除出去的工作。

政治部光荣地实现了它们所担负的任务:在组织上经济上巩固了集体农庄,培养成了许多新的集体农庄干部,整顿了集体农庄经济上的领导,提高了集体农庄庄员群众底政治水准。

第一次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一九三三年二月)和斯大林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演说,在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群众为巩固集体农庄而奋斗的积极性这一事业上发生了莫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演说中,拿乡村中集体农庄以前的旧制度来同集体农庄的新制度比较时说道:

“在旧制度下,农民们总是单独做工,用古老的方法,用旧式的农具做工,替地主和资本家,替富农和投机商人做工,替他们生财致富,而自己却是一辈子忍饥受饿。而在新制度下,在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们却是共同做工,按劳动组合方式做工,用新式农具,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做工,大家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做工,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者插足的生活,他们

做工,是为了一天比一天改善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状况”(《列宁主义问题》,第五二八页)(注八〇)。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这个演说中,指明了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以后所达到的实际成绩。布尔什维克党帮助了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集体农庄,摆脱富农盘剥。先前忍饥挨饿的数千百万贫农既已加入集体农庄,并在这里使用着优良土地和优良生产工具,于是就在那里升到了中农的水准,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了。

这是集体农庄建设道路上的第一步,第一个成绩。

第二步,——斯大林同志当时说,——就是要把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过去的贫农或中农——提得更高,使一切集体农庄庄员都成为生活丰裕的人,使一切集体农庄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

“现在,——斯大林同志说,——要变成为丰裕的集体农庄庄员,只要在集体农庄里诚恳工作,正确利用拖拉机和机器,正确利用耕畜,正确耕种土地,爱护集体农庄财产就行了”(《列宁主义问题》,第五三二至五三三页)(注八一)。

斯大林同志底演说深深印入了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底意识,成了集体农庄底实际战斗纲领。

到一九三四年年底的时候,集体农庄已成为坚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约占全苏联农户总数四分之三,集体农庄播种的土地已约占全部播种面积百分之九十。

一九三四年在苏联农业中工作的拖拉机已有二十八万一千架,康拜因机三万二千架。一九三四年的春种工作比一九三三年早十五至二十日完成,比一九三二年早三四十日完成,而采办粮食的计划则比一九三二年早三个月完成。

这样,由于党和工农国家给予了集体农庄重大的帮助,于是集体农庄在两年之内就巩固了。

由于集体农庄制度底坚实胜利以及与此相连的农业高涨,于

是苏维埃政权就有可能把面包及其他食品配给制废除，而规定一切食品都可自由购买。

因为作为临时政治机关而设立的农业机器站政治部已完成它们所负的任务，于是中央就决定把它们改为通常的党部机关，使其与现存的区党委员会合并。

所有这些成功，无论在农业或工业方面，都是因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而获得的。

到一九三三年初已看得很明显，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已经提前完成，即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就完成了。

这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所获得的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一九三三年，斯大林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联席会议上作了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的报告。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过去这一时期中，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中，达到了如下的基本成绩。

（一）苏联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品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把工业方面的资本主义成分消灭，而成了工业中的唯一经济体系。

（三）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把农业方面的富农阶级消灭，而成了农业中的统治力量。

（四）集体农庄制度已把农村中的贫穷困乏现象消灭，——千百万贫农已升到生活有保障的地位。

（五）社会主义体系在工业中消灭了失业现象，在几个生产部门里保存了八小时工作制，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在有害于健康的企业中规定了六小时工作制。

（六）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一切部门中的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成绩底意义,首先就是它们使工人和农民澈底摆脱了剥削的桎梏,并为苏联全体劳动者开始了享受丰裕文化生活的康庄大道。

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集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五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三十六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一共代表着一百八十七万四千四百八十八个党员和九十三万五千二百九十八个候补党员。

代表大会总结了党在过去这一时期中的工作,指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切经济和文化部门中都已变得有决定意义胜利的事实,确定了党的总路线已达到全面胜利的事实。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代表大会”载入史册的。

斯大林同志在他所作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了苏联在报告期内所发生的那些根本变化。

“苏联在这个时期内已经根本改变样子了,它已经抛弃了落后的中世纪的面貌。它已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已由一个具有小规模个体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它由一个黑暗无知,居民不识字,不文化的国家,变成了——更确切一点说,正在变成——人人识字的文化的国家,到处设立有用苏联各民族语言教授的高级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的国家”(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五五三页)(注八二)。

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已占我国全部工业百分之九十九。社会主义农业,即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已约占我国全部播种面积百分之九十。至于商品流转,那末资本主义的成分已是完全被排挤出商业范围了。

列宁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说过:我国有五种社会经济结构底成分。第一种结构是宗法式的经济,多半是自然经济,即差不多完全不从事贸易的经济。第二种结构是小商品经济,即出卖农产品的大多数农户以及手工业者。这种经济结构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

最初几年包括有大多数居民。第三种结构是私人资本主义，它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初期活跃起来了。第四种结构是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租让制，它没有获得什么重大的发展。第五种结构是社会主义，即当时还嫌薄弱的社会主义工业，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初期还只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微小地位的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以及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初期也是尚嫌薄弱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

列宁当时指出，在所有这些结构中间，社会主义的结构必定会占得优势。

新经济政策底目的是要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获得完全胜利。

而这个目的到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已经实现了。

我们现在可以说，——斯大林同志论到这点时说道，——第一种，第三种和第四种社会经济结构已不存在了，第二种社会经济结构是被排挤到次等地位了，而第五种社会经济结构，即社会主义结构，已成了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独占统治的唯一指挥力量（同上，第五五五页）（注八三）。

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特别注重到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问题。他预告党说：虽然党底敌人，各色机会主义者和各种民族主义倾向份子已被击破，但他们思想体系底残余还在个别党员底头脑中留着，并且往往显露出来。遗留在经济中，特别是遗留在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孽，便是已被击破的反列宁主义集团底思想体系所能借以复活起来的良好基地。人们意识底发展是落后于人们底经济地位的。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在经济中已被消灭，而资产阶级观点底余孽却仍然在人们底头脑中保存着，并且将来还会保存着。此外还要估计到，我们所应当时刻防范的资本主义包围势力，是力图复活和支持这种余孽的。

斯大林同志就中还讲到了在民族问题方面特别牢固的那些遗留在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孽。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反对地

方民族主义倾向。在好些共和国内(乌克兰、别洛露西亚等等)党组织减弱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却竟让它滋长起来,一直滋长到已同敌人势力,同武装干涉主义者打成一片而变成了一种祸国的危险。斯大林同志在答复什么倾向是民族问题上主要危险的问题时说道:

“主要危险就是人们中止与它作斗争而让它滋长成为祸国危险的那种倾向”(同上,第五八七页)(注八四)。

斯大林同志号召全党加强思想上政治上的工作,有系统地打破各个敌人阶级以及那些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底思想体系和思想体系残余。

往后斯大林同志又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单只通过正确决议,还不能保证事业成功。要保证事业成功,还必须正确布置能够实现领导机关决议的人材,并组织对于这种决议执行情形的审查。不实行这种组织办法,决议就有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决议的危险。这里,斯大林同志援引了列宁认定组织工作中的主要点是挑选人材和审查执行情形这一著名原理。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主要祸害,就在于我们所通过的决议与执行这种决议、审查这种决议执行情形的组织工作互相隔离。

为了改善对于党和政府决议执行情形的审查工作,于是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就设立了联共(布)中央直属的党监督委员会,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直属的苏维埃监督委员会,以代替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完成了本身任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

斯大林同志把党在新阶段上的组织任务规定如下:

- (一)要设法使我们的组织工作能适应于党政治路线底要求;
- (二)把组织上的领导提到政治上的领导底水准;
- (三)使组织上的领导能完全保证党政治口号及其决议的实现。

斯大林同志在结束报告时警告说:虽然社会主义有伟大的成

功，虽然这种成功理应引起我们的自尊心，但是我们不能沉迷于现有的成功，不能“夸功自满”，不能妄自安慰。

“……决不要使党高枕而卧，——斯大林同志说，——而要在党内发展警觉性；不要使党酣睡，而要把它保持在战斗准备状态中；不要解除党底武装，而要把它武装起来；不要废弛党底队伍，而要把它保持在动员状态中，以便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列宁主义问题》，第五九六页）（注八五）。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听了莫洛托夫和库依贝舍夫两同志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底任务要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底任务更加宏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即是在一九三七年间，工业产量就会增加到超过战前水准八倍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全部国民经济中的基本工程建设费规定为一千三百三十万万卢布，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则为六百四十余万万卢布。

实现这样巨大的基本建设工程，就能保证使国民经济所有一切部门都实行完全的技术改造。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机械化应该大体完成。全国所有拖拉机底能力，应从一九三二年的二百二十五万马力，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八百多万马力。当时又规定广泛采用各种农艺设施（正确的轮种制，用精良种子播种，秋耕等等）。

在计划上规定了运输业和邮电业技术改造方面的巨大工程。

在计划上定出了继续提高工农群众物质文化水准的广大纲领。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特别注意组织问题，并根据卡甘诺维奇同志报告通过了关于党和苏维埃建设问题的专门决议。党底总路线既已获得胜利，党底政策既已由实际生活，由千百万工农群众底经验检验过了，于是组织问题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上所规定的新的复杂任务，必须提高所有各个部门

中的工作质量。

“第二个五年计划底基本任务，即澈底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把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毒克服，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完成全部国民经济底改造，尽量运用新技术和新企业，实行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农业出产率等任务，非常紧张地提出了提高所有各个部门中工作质量，首先是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领导底质量问题”，——在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上这样写道。

(《联共(布)决议案汇集》，卷下，第五九一页)。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党章，其与旧党章的区别，首先就在于这里增加了一个导言。

在党章导言中给共产党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说明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说明了共产党在无阶级专政机关体系中的地位。新的党章详细指明了党员底种种义务。在这个党章中加进了关于接收党员的更严格的规则，并增加了论同情员小组的条文。在新的党章中更详细地阐明了党底组织结构问题，从新确定了关于先前称为党支部，而从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时起则已改称为初级党组织的条文。同时，在新的党章上又从新确定了关于党内民主和党纪律的条文。

(四)布哈林份子蜕化为政治两面派。托洛茨基两面派蜕化为一伙白卫杀人凶手和间谍。基洛夫惨遭凶杀。党所采取的加强布尔什维克警觉性的办法。

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使我们党，不仅使工人和集体农民群众欢欣鼓舞，而且还使我们的整个苏维埃智识界，使苏联全体忠实公民欢欣鼓舞。

这些成功不是使被击破了的剥削阶级底余孽感到欢欣，而是使他们更加表示仇恨。

这些成功使被击破了的阶级底应声虫，即一群小得可怜的布

哈林份子和托洛茨基份子余孽疯狂起来了。

这班老爷估计工人和集体农民底成绩时，并不是从欢迎每一次这样成绩的民众底利益出发，而是从他们自己脱离了实际生活，完全腐化了的那个小得可怜的派别集团底利益出发的。既然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是意味着我党底政策获得了胜利，是意味着这班老爷底政策遭到了最终的破产，于是这班老爷就不仅不去承认明显的事实而加入共同的事业，却因自己已遭失败，已遭破产而向党和人民实行报复，实行捣乱并危害工人和集体农民底事业，炸毁矿井，放火焚烧工厂，在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中进行暗害勾当，以便破坏工人和集体农民底成绩，并在人民中间引起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情绪。同时，他们为了使他们那个小得可怜的集团免被揭破和粉碎，于是就戴上一副忠诚于党的假面具，日益加紧谄媚党，赞美党，在党面前匍伏跪拜，事实上却仍继续暗中进行他们那种反对工农的破坏勾当。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了悔过的演说，颂扬党，把党底成绩吹得天花乱坠。但代表大会感觉到，他们的演说含有不诚恳和两面派的意味，因为党所要求于党员的不是歌颂和赞美党的成绩，而是在社会主义战线上诚恳工作的态度，可是这种态度在布哈林份子那里却早已没有看见过了。党分明看见，其实这班老爷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虚伪演说是和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外的那些同伙们遥相呼应，教导他们玩弄两面手腕，号召他们不要放下武器的。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份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也发了言，他们为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过分责骂了自己，同时又为了党所获得的成功而过分赞扬了党。但是代表大会不能不看见，无论是这班老爷令人作呕的自打自招的说法，亦无论是他们用甜言蜜语赞扬党的态度，都是证明他们心境齷齪和做贼心虚的一种变相表现。然而当时党还没有知道，还没有料想到，这班老爷在代

表大会上发表甜蜜演说的时候,就已经在准备行凶杀害基洛夫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的斯莫尔尼宫里,基洛夫被人用手枪行凶刺死了。

就地捕获的凶手,原来就是由季诺维也夫反苏集团参加者在列宁格拉所组成的那个反革命秘密团体中的一份子。

全党敬爱的,工人阶级敬爱的基洛夫被刺的消息,引起了我国劳动群众极大的愤慨和沉痛的哀悼。

从预审中判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从前的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中的参加者在列宁格拉组织了一个反革命的秘密恐怖团体,由所谓“列宁格拉总部”主持。这个团体所抱定的目的是要刺杀共产党底领导人物。基洛夫就是这个团体所预定要首先刺死的第一名牺牲者。从这个反革命团体参加者底口供中查明,他们同几个资本主义外国底代表们有勾结,并常从他们那里领取金钱。

这个组织中被揭破的份子,由苏联最高法院军法科判处枪毙的极刑了。

很快又查明出存在有反革命的秘密“莫斯科总部”的事实。从预审和庭审过程中判明出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以及这个组织中的其他领导人在养成他们那些同伙的恐怖主义情绪这一点上,在准备暗杀我党中央委员和苏联政府人员这一点上,起了可恶的作用。

这班人竟如此玩弄两面手腕,竟卑鄙齷齪到如此地步,以至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个组织和鼓舞凶杀基洛夫的人,这样一个催促凶手赶快执行这次罪行的人,居然写了一篇颂扬死者基洛夫的祭文,并要求把这篇祭文登载出来。

季诺维也夫份子在法庭上装出悔过自新的样子,其实他们就在此时也还是继续玩弄着两面手腕。他们隐瞒了他们和托洛茨基有勾结的事实,他们隐瞒了他们同托洛茨基份子一起卖身给法西斯蒂侦探机关的事实,隐瞒了他们所干的间谍和暗害的活动。季

诺维也夫份子在法庭上隐瞒了他们同布哈林份子有勾结的事实，隐瞒了有法西斯主义佣仆托洛茨基份子和布哈林份子联合匪帮存在的事实。

根据不久以后查明的消息，基洛夫同志被刺事件，就是由这一联合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干的。

还在当时，即在一九三五年间，就已令人看得明白，季诺维也夫集团是个暗藏的白卫组织，对于这个组织中的参加者，完全应该用处置白卫的手段来处置。

经过一年后就已查明，基洛夫被刺事件底真正直接和实际组织者，以及为杀害我党中央委员会里其他委员而进行的种种实际步骤底组织者，原来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同谋人。于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也夫，叶夫多基莫夫，皮克里，依·恩·斯米尔诺夫，穆拉契科夫斯基，特尔·瓦干尼洋，莱因果里得及其他等人就被提付法庭审判。这些连赃拿获的罪犯，不得不在法庭上当众承认说，他们不仅组织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而且准备了杀害党和政府其余一切领导人的举动。后来又从预审过程中判明，这些恶徒走上了组织军事破坏行动的道路，走上了充当间谍的道路。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公审，揭穿了这班人在道义上政治上堕落到最骇人听闻地步的事实，揭穿了这班人用假装对党表示忠实的两面派的声明所掩盖着的最卑鄙的龌龊勾当和叛卖行为。

奸猾的叛徒托洛茨基是所有这伙凶手间谍底主要指使人和组织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托洛茨基主义的跟班，就是托洛茨基底帮手及其反革命指令底执行者。他们准备使苏联受帝国主义者侵犯时遭到失败，他们成了主张工农国家失败的败北主义者，他们成了替德日法西斯蒂效忠的可恶奴仆和走狗。

各级党组织从因基洛夫被刺案而举行的几次公审中所应得出的基本教训，就是要把自己的政治盲目病消灭，要把自己的政治淡

漠疏忽态度消灭,要把自己以及全体党员底警觉性提高。

党中央在其为基洛夫被刺事件告全党各级组织的信上指示说:

(甲)“必须铲除从一种错误想法出发的机会主义淡漠疏忽态度,这种错误的想法就是以为我们的力量愈增长,敌人也就会变成愈驯服,愈良善。这种想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种想法是右倾思想底残余,因为右倾份子硬说敌人将会无声无响地渐渐爬进社会主义社会,硬说敌人终究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布尔什维克决不应高枕而卧,决不应马虎从事。我们不应持淡漠疏忽态度,而应提起警觉精神,提起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觉精神。必须记着,敌人处境愈是绝望,他们也就会愈加乐于采取‘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唯一最后挣扎手段。应该记着这一点,并保持着警觉精神”。

(乙)“必须把党员中教授党史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研究我们党史中所有一切反党集团,研究他们反对党路线的斗争手段,研究他们的策略,同时要特别努力研究我们党同一切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策略和手段,研究那些保证我们党克服并澈底打破了这些反党集团的策略和手段。必须使我们的党员不仅要熟悉我们党怎样反对和怎样克服了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形,而且要熟悉我们党怎样反对和怎样克服了托洛茨基份子、“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份子、右倾份子以及右“左”畸形儿等等的情形。应该时刻记着,通晓和了解我党历史是为完全保证党员具有革命警觉精神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手段”。

在这个时期发生过极大作用的,是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实行的把混进来的和异己的份子清除出党队伍的工作,特别是在基洛夫被刺后所采取的仔细检查党证表册,并用新的党证表册更换旧的党证表册的办法。

在检查党证表册以前,许多党组织中间曾流行着一种任意和

随便对待党证的态度。在好些地方党组织中，发现了共产党员登记工作方面完全不可容忍的混乱状态，敌人曾利用这种混乱状态来实现其卑鄙龌龊的目的，利用党证为护符来干间谍和暗害勾当等等。许多党组织中的领导者竟把接受新党员和发给党证的事情交给一些很不重要的人员去作，甚至往往交给一些完全没有受过考查的党员去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党中央发出了一封论登记，发给和保存党证问题的告全党各级组织的专信，责成全党各级党组织必须实行仔细检查党证表册，必须“在我们自己党的家屋内整饬布尔什维克的秩序”。

党证表册检查工作发生了很大的政治作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全会通过了论检查党证表册工作总结的决议，其中指出，这次检查工作成了巩固联共(布)队伍的一种极重要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办法。

实行检查和更换党证表册以后，就恢复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同时，联共(布)中央责成各级党组织实行征收新党员时，绝对不要用笼统接收的方法，而要根据严格实行的个别选择原则接受“我国真正先进，真正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份子，首先是工人中，以及农民和劳动知识份子中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各个斗争阵地上受过考查的份子”入党。

中央恢复接收新党员入党的工作时，叫各级党组织必须记着，敌对份子今后也会企图钻进联共(布)队伍中来的。因此：

“每个党组织底任务就是要极力提高布尔什维主义的警觉精神，珍重列宁党底旗帜，使党能免除异己份子，敌对份子和偶然份子钻进它的队伍中来的危险”(联共(布)中央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决议，载于一九三六年第二百七十期《真理》报)。

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清洗和巩固自己的队伍，把党的敌人消灭，无情铲除歪曲党路线的行为，于是也就在党底中央周围团结得更

加紧密了。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党中央领导下过渡到了新的阶段，即过渡到了完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段。

简短的结论

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布尔什维克党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千百万小私有农户转上集体农庄道路，转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把富农这一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消灭并使基本农民群众转上集体农庄道路的结果，遂使国内资本主义底最后根蒂全被消灭，使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获得完全的胜利，使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地位最终巩固。

集体农庄既已克服组织方面的许多困难，于是就最终臻于巩固，而走上了丰裕生活的道路。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结果，在我国已经建成了坚固不移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建成了头等的社会主义重工业和集体的机械化农业，消灭了失业现象，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造成了继续不断改善我们祖国劳动群众物质文化状况的条件。

我国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一切劳动者之所以达到了这种伟大的成功，是因为党和政府实行了大胆的，革命的和英明的政策。

资本主义的包围势力企图削弱和破坏苏联威力，于是就来加紧其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份子和间谍匪帮的“工作”。自法西斯蒂在德日两国上台执政时起，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反对苏联的活动特别加紧起来。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诺维也夫份子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他们不惜充当间谍，进行暗害勾当，从事恐怖暗杀和军事破坏工作，力图使苏联遭到失败，以期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苏维埃政权用坚强果决手段惩罚了这班人类蠢贼，铁面无情地惩治了这班人民公敌与祖国叛徒。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 社会建设而斗争和新宪法之 施行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时期）

（一）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间的国际环境。经济危机的暂时减弱。新经济危机的开始。意大利强占阿比西尼亚。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国中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开始。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在资本主义各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三年年底。然后工业低落过程就暂时停止，危机转成了萧条，接着又来了一个少许的工业活跃，少许的工业高涨，但这次高涨并不是有在新的较高基础上发生的工业繁荣跟着到来的高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甚至没能升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准，在一九三七年中期只达到过这一水准百分之九十五六左右。而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却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首先卷入进去的便是美国。到一九三七年年底，美国失业人数已增加到一千万人。英国失业人数也开始激增起来。

这样，各资本主义国家尚未把不久前的经济危机所引起的伤痕医好，就又碰到了新的经济危机了。

这种情形，结果就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更加紧张。因此，侵略国企图用劫掠防卫力量薄弱国家的手段来弥补本国内部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损失的这种

趋向,也就更加强起来。并且这次除德日两个有名的侵略国外,还加上一个意大利。

一九三五年,法西斯意大利实行向阿比西尼亚侵略,并把它征服了。它对阿比西尼亚实行侵犯,从“国际公法”上看是没有任何根据或理由的,是用不宣而战的手段,用现时法西斯蒂惯用的盗窃方式来干的。这一举动不仅打击到阿比西尼亚,而且打击到英国,打击到英国从欧洲通印度,通亚洲的海上要道。英国想阻挠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确立统治的企图,是没有获得什么结果的。后来,为了要取得行动的自由,意大利就实行退出国际联盟并加紧来扩充军备。

于是就在从欧洲通亚洲的一条最短的海路上结成了一个新的战争纽带。

法西斯德国用单方面的行动撕碎了凡尔赛和约,并决定来把它用暴力修改欧洲各国疆界的计划付诸实现。德国法西斯蒂公开表示,说他们力求把各个邻国征服,或至少是把这些国家住有德意志人的区域占领。这个计划是预定首先要占领奥地利,随后就要打击捷克斯拉伐克,然后也许要打击波兰,因为那里也有一整个居住有德意志人的并且是与德国交界的区域,然后……然后“再看分晓吧”。

一九三六年夏,德意两国开始来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了。意大利和德国假借援助西班牙法西斯蒂的名义来暗中把自己的军队开进西班牙境内,即开进位置在法国背后的地方,同时又把自己的舰队开进西班牙各领海——在南面开到巴列阿尔群岛和直布罗陀海峡一带,在西面开到大西洋一带,在北面开到比斯开海湾一带。一九三八年初,德国法西斯蒂强占了奥地利,侵入多瑙河中游区,并扩展到欧洲南部一带,进到亚得利亚海近旁了。

德意法西斯蒂开展其对西班牙武装干涉的时候,公然向大家担保,说他们在西班牙只是进行着反对“赤化”的斗争,而并不想达

到其他什么目的。但这是很粗笨很拙劣而专门想来欺骗傻子的一种掩饰手腕。其实，他们是向英法两国施行打击，因为他们把英法两国与其非亚两洲广大殖民地领土交通的海上要道截断了。

至于强占奥地利一事，那末，要说这是德国同凡尔赛条约作斗争的一种举动，要说这是德国为保护自己“民族”利益而力求把自己因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结果所丧失的领土收回的一种举动，却就更是绝对不行了。奥地利无论战前战后都不曾属于德国的领土。德国用暴力兼并奥地利，乃是用横蛮帝国主义手段侵占异国领土的一种举动。这种举动无疑是表明法西斯德国力图夺得西欧大陆的霸权。

这首先是对法英两国利益施行的打击。

于是就在欧洲南部，即在奥地利和亚得利亚海沿岸一带，以及在欧洲极西部，即在西班牙及其周围海面一带结成了一些新的战争纽结。

一九三七年，日本法西斯军阀夺去了北平，侵入了中国中部，占领了上海。日本军队侵入中国中部，也如数年前侵入满洲一样，是用日本惯用的方式，即是用盗窃的方式，用狡诈吹求日本人自己所造成的“地方事件”的手段，用事实上根本破坏一切“国际公法”，条约和协定等等的手段进行的。日本既将天津和上海占领，就抓得了外国与中国这一广阔市场通商的锁钥。这就是说，当日本还掌握着上海和天津的时候，它随时都能把英美从其投有巨量资本的中国中部驱逐出去。

当然，中国人民及其军队英勇抗拒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国雄强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中国众多人口和广阔的疆土，以及中国民族政府誓将中国解放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完全把侵略者逐出中国国境的决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地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什么前途的。

但另一方面，当日本还握着外国对华通商锁钥的时候，那它对

中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对英美利益施行的一种极严重的打击，同样也是没有疑问的。

于是，在太平洋上，在中国一带，就又结成了一个战争纽结。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表明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它是暗地里开始的，是用不宣而战的手段开始的。许多国家和民族，都像是不知不觉地陷进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漩涡。这次战争是由三个侵略国，即由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当权人物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开始的。战争已在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至上海的广阔地面上进行着。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已有五万万以上的居民。这次战争归根到底是个反对英法美资本主义利益的战争，因为它的目的是要重分世界领土和势力范围，使侵略国得到利益而使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受到损害。

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目前的特点，就在进行和开展这一战争的是几个侵略国，而其他各国，即战争锋芒所指向的所谓“民主”国，却竟装出认为这次战争与它们没有什么关系的样子，持袖手旁观态度，节节退让，以爱好和平自夸，责骂法西斯侵略者，并……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阵地奉送给侵略者，同时却还硬说它们是在准备回击哩。

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个颇为奇怪而带有片面性质的战争。但它终究是个残酷的和横蛮侵略的战争，是使防卫力量薄弱的阿比西尼亚人民、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受到蹂躏的战争。

如果以为此次战争底这种片面性是由于各“民主”国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薄弱的结果，那就不正确了。各“民主”国底力量，无疑是要比法西斯国家的力量强大得多的。目前扩展着的世界大战之所以具有片面性，是由于各“民主”国没有结成一个共同对付法西斯国家的战线。所谓“民主”国当然不赞同法西斯国家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且害怕法西斯国家势力加强。但他们却更害怕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抵御这一切

“危险”运动的一种“消毒良剂”。因此，各“民主”国中的当权人物，特别是现在英国当权的保守党人，也就只是局限于劝导那些猖狂的法西斯首脑们“不要走极端”的政策，同时又还予以暗示，表示他们“完全谅解”和基本上同情法西斯首脑们压迫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警察政策。英国当权人物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大体上是与俄国自由保皇资产者在沙皇制度下所采取的政策相同，当时俄国自由保皇资产者也是害怕沙皇政策“走极端”，但他们同时却更害怕人民，所以他们也就采取了劝导沙皇的政策，亦即勾结沙皇来反对人民的政策。大家知道，俄国自由保皇资产阶级因采取这种两面政策而吃了大亏。现在英国当权人物及其法美两国的朋友们，大概也是会受到相当的历史报应的。

苏联面临着这样一种国际局势，当然不能把这种凶险事置之不顾。侵略者所开始的任何一个战争，即令是范围不大的战争，都是威胁着爱好和平国家的一种危险，至于“不知不觉”临到各国人民头上并且已包括着五万万多居民的这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更加不能不是威胁着各国人民，首先是威胁着苏联的一种极严重的危险了。德意日三国“反共联盟”的成立，就是一个极明显的例证。因此，我们的国家一面执行着自己的和平政策，同时也就实行继续加强我国边境防卫能力，加强红军与红海军底战斗准备。一九三四年末，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因为苏联知道，国际联盟虽有许多弱点，但它终究可能成为一个揭穿侵略者的场所，成为一种固然是很薄弱，但多少总能阻碍战争爆发的和平工具。苏联认为在目前这样的时刻，甚至国际联盟这样一个薄弱的国际组织，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九三五年五月，苏法两国缔结了共同抗拒可能侵犯的互助公约。同时，苏联与捷克斯拉伐克也成立了同样的协定。一九三六年三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缔结了互助公约。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公约。

(二)苏联工农业的继续高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早完成。农业的改造与集体化的完成。干部底意义。斯达汉诺夫运动。人民生活水准的增进。人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苏维埃革命底力量。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过去以后三年的时候,又来了新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工业却在这整个时期中都是一往直前地继续高涨着。全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在一九三七年中期只达到过一九二九年水准百分之九十五六左右,并且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又进入了新的经济危机时期,而苏联工业却是有增无已地高涨起来,到一九三七年终时达到了一九二九年水准百分之四百二十八,较之战前水准增长了七倍以上。

这些成功是由党和政府十分坚决执行的改造政策直接造成的。

由于获得这些成功的结果,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竟是提早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即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就完成了。

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胜利。

农业方面也有着与此相近的高涨。农作物播种面积在一九一三年(战前)等于一万零五百万海克脱,而在一九三七年则已增加到一万三千五百万海克脱。谷物产量在一九一三年等于四十八万万普特,而在一九三七年则已增加到六十八万万普特;生棉花产量由四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一万五千四百万普特;亚麻(纤维质)产量由一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千一百万普特;糖萝卜产量由六万五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十三万一千一百万普特;油类产量由一万二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万万零六百万普特。

应当指出,单是集体农庄(苏维埃农庄除外)在一九三七年间供给国家的商品麦子,就等于十七万万普特,即至少要比地主、富农和农民在一九一三年所供给的麦子总量超过四万万普特。

只有一个农业部门，即养畜业部门，才仍然落后于战前水准，而进展得颇为缓慢。

至于农业集体化，那末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集体农庄在一九三七年间所包括的农户已有一千八百五十万户，即占农户总数百分之九十三，而集体农庄所包括的谷物播种面积则已占全部农民谷物播种面积总数百分之九十九。

农业的改造和农业获得拖拉机及其他农用机器加紧供给这一事实所产生的果实，已经是历历在目了。

由于工农业改造事业完成的结果，国民经济已具备有丰富的头等技术。工业和农业，运输业和军队，都已获得巨量的新技术，新机器和新机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火车头和轮船，大炮和坦克，飞机和军舰。于是就必须动用数万以至数十万受过训练，能完全使用这些技术和尽量利用这些技术的干部。没有这种干部，没有充分数量精通技术的人材，那末技术就会有变成一堆死铁的危险。当时这种危险是很严重的，因为当时能驾驭技术的干部增加的速度，还赶不上并且远远落后于技术增长的速度。此外又还有过一种补充的困难，就是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觉悟到这种危险，竟认为技术“自己会把问题解决的”。如果从前，人们曾把技术估计过低，曾对技术表示鄙弃，那末现在，人们却已把技术估计过高，且把技术变成偶像了。人们竟不了解，技术没有精通技术的人材，便是死的东西。人们竟不了解，技术只是在具有精通技术的人材的时候，才能产生出最高的生产率。

于是，精通技术的干部人材问题，便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

因此就必须使我们的工作人员抛弃其过分醉心技术和轻视干部作用的态度，而来注意学会尽量利用技术，精通技术，极力培养许许多多能驾驭技术和尽量利用技术效能的干部。

如果从前，在改造时期底初期，即在国内尚感觉到十分缺乏技术的时候，党提出了“在改造时期内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那末现

在,在技术已很丰富,改造时期基本上业已终结,而国内已感觉到十分缺乏干部的时候,党就应当提出一个新的口号,提出一个已不是要大家注重技术,而是要大家注重人材,注重能充分利用技术的干部的口号。

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五年五月在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从前,——斯大林同志说道,——我们是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并在一切工作部门里创立了极广大的技术基础,以使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材。这是很好的。但这还千万不够。为要使技术动作起来并把它利用到底,就需要有精通技术的人材,就需要有善于学会利用和巧于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技术没有精通技术的人材,便是死的东西。技术有精通技术的人材来使用,便能够而且应当显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业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充分数量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末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效果,就会比它现时所有的还要多三四倍。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应当特别注重人材,特别注重干部,特别注重精通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旧口号,即“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反映着已经过去时期的口号,反映着我们十分缺乏技术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由新口号,即“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现时的主要点就在这里……

毕竟应该了解:人材,干部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宝贵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现时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将有人数众多的优良干部,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不会有这种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于是,加紧速度培养技术干部和赶快学会利用新技术来更加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

最能表明这种干部增长的实例，最能表明我们的人材已学会利用新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已更加增长的实例，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个运动在顿涅茨矿区，即在煤矿工业中产生和开展起来，随即扩展到其他工业部门，推广到运输业，后来又普及到农业。这个运动之所以称呼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因为它是由“中央依尔明诺”（顿涅茨矿区）矿井汽钻掘煤手斯达汉诺夫首先发起的。还在斯达汉诺夫以前，易左托夫已作出前此未有的掘煤纪录。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得一百零二吨煤炭，即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四倍之多，于是这一榜样就肇始了工人和集体农民为提高生产定额，为劳动生产率新高涨而进行的广大群众运动。汽车工业中的布塞根，皮鞋工业中的斯美坦宁，运输业中的克里沃诺斯，木材工业中的毛新斯基，纺织工业中的叶夫多基亚·维诺格拉多娃和玛利亚·维诺格拉多娃，农业中的戴姆青科，格娜亭科，安格林娜，坡拉古亭，科列索夫，科瓦尔达克和波灵等，——这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第一批先驱份子底名字。

继他们而起的还有其他的先驱份子，还有整批整批超过了第一批先驱份子劳动生产率的先驱份子。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克列姆里宫举行的苏联第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会议，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对于斯达汉诺夫运动底开展有着极重大的意义。

“斯达汉诺夫运动，——斯大林同志在这次发言中说道，——是社会主义竞赛底新高涨，是社会主义竞赛底新的更高的阶段……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竞赛第一个阶段时期中，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与新技术相联系。而且，我们当时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反之，社会主义竞赛的现今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与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座的这些人，像斯达汉诺夫，布塞根，斯美坦宁，克里沃诺斯，普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

许多同志,都是些新的人材,都是些完全精通了本行工作技术,驾驭并鞭策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工和女工。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材,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材……斯达汉诺夫运动底意义就在于它这一运动,能打破不充分的旧时技术定额,并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底劳动生产率,这样就造成了在我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变成最丰裕国家的实际条件”。

然后,斯大林同志说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作方法底特征,并阐明斯达汉诺夫运动对于我国前途的巨大意义时,又说道:

“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多数都是些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工和女工,是些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物,他们作出准确工作和着实工作的模范;他们善于重视工作中的时间因素,他们学会了爱惜时间,不仅一分钟,就是一秒钟也不浪费的技能。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学过了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继续充实着自己技术知识的。他们并没有沾染某些工程师、技师以及经济管理员所有的那种保守主义和顽固思想;他们很勇敢地前进着,打破陈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于我国工业领导者所制定的生产标准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而且往往补充和纠正工程师和技师底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精通了本行工作技术,善于最高限度利用技术的人材。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就一定增至于十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里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我国工业未来之花,它包含有工人阶级将来文化技术高涨底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唯一的途径,去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即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指标,为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的对立性所必需的指标,——这难道不是很明白么?”。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扩展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的事实,

造成了更加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准和文化程度的条件。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工人和职员底实际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工资基金在一九三三年为三百四十万万卢布，而在一九三七年则已增加到八百一十万万卢布。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在一九三三年为四十六万万卢布，而在一九三七年则已增加到五十六万万卢布。单是一九三七年一年内，国家用在工人和职员保险方面，用在改善日常生活和文化需要方面，用在疗养所、天然疗养地和休养所以及医药救助方面的经费，就约达一百万万卢布。

在农村中间，集体经济体系已最终巩固了。大大促进了这点的，是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二月）所通过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以及规定集体农庄所耕种的一切土地交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法令。由于集体农庄制度巩固的结果，农村中的贫穷困乏现象已经消灭了。如果三年以前，按每个劳动日只能领到一两个基罗格兰姆的谷物，那末现在谷物区内的大多数集体农民，却能按每个劳动日领得五个以至十二个基罗格兰姆，其中有许多人甚至能领得二十个基罗格兰姆，此外还能领得其他各种产品和货币收入。当时已有几百万个集体农户，在谷物出产区中每年领到五百个至一千五百个普特的谷物，在棉花、糖萝卜、亚麻、牲畜、葡萄酒、柑果以及蔬菜出产区中每年领得数万卢布的进款。集体农庄已成为生活丰裕的了。建筑新谷仓和储藏室的工作已成为集体农户所注意的主要问题，因为原先那些每年只预定容纳少量存额的贮藏所，已经不能满足集体农民新增需求于什一了。

一九三六年，政府因民众生活水准增进而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同时又拟定了大规模建筑产儿院、婴儿院、制乳厨房和幼稚园的广大计划。一九三六年间，为进行这些设施支出了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万卢布，而在一九三五年所支出的则不过是八万七千五百万卢布。同时又用特别法律规定给子女众多的家庭以巨量的补助金。一九三七年按照这个法律发出的补助金，计达十万万卢布

以上。

由于普通义务教育的实施和新学校的建设,民众底文化程度汹涌高涨起来了。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了宏伟的学校建设工作。小学和中学学生数量在一九一四年为八百万人,而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度则已增到二千八百万人。高级学校学生数量在一九一四年为十一万二千人,而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度则已增到五十四万二千人。

这真是一个文化革命。

民众物质状况的增进和文化程度的高涨,是意味着我们苏维埃革命有雄强伟大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从前所有一切革命陷于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都只给予过人民自由,而没有给予过人民切实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状况的可能。它们的根本弱点就在这里。我国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摆脱资本主义制度而获得了自由,并且把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状况根本改善了。我国革命力量雄厚而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

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过:

“在全世界上,只有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把自己的政治果实,而且把自己的物质果实显示给人民看了。在过去一切工人革命中,只有一个工人革命是勉强取得过政权的。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并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曾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它没有来得及把这种枷锁打破,尤其是没有来得及把革命底物质生活幸福的果实显示给人民看。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不仅给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予了人民享受丰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力量雄厚而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

（三）第八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苏联新宪法的制定。

一九三五年二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七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修改一九二四年所制定的《苏联宪法》。其所以必须修改《苏联宪法》，是因为从一九二四年以来，即从第一个苏联宪法制定以来，苏联生活中已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更。在过去这些年代中间，苏联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完全改变：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已经创立成功，富农已被粉碎，集体农庄制度已经获得胜利，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在全部国民经济中奠定为苏维埃社会基础。由于社会主义底胜利，已有可能使选举制度更加民主化，即施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制。

由斯大林同志主席的宪法专门委员会，拟定了新的苏联《宪法》草案。草案经过了延长至五个半月之久的全民讨论。宪法草案被提到第八次非常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讨论。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召集了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其使命就是批准或者否决苏联新《宪法》草案。

斯大林同志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论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叙述了苏维埃国家内自一九二四年《宪法》制定时起所发生的基本变更。

一九二四年《宪法》是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制定的。当时，苏维埃政权还容许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排发展。当时，苏维埃政权是打算在两个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竞赛进程中组织并保证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战胜资本主义。当时，“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建筑在不丰富的旧技术基础上的工业，甚至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准。农业情况更不雅观。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与个体农户比较起来，还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个别小岛而已。当时还没有实行消灭富农，而只是实行限制富农。在商品流转方面，社会主义部门还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一九三六年的苏联情形已经不同了。到一九三六年时，苏联经

济已经完全改变。到这时候,资本主义成份已全被消灭,而社会主义体系则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获得胜利。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产量已超过战前工业产量七倍,并把私人工业完全排挤出去了。在农业方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器化的,用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即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体系,已获得胜利。到一九三六年时,富农阶级已全被消灭,而个体农民部分则已不能在国民经济中起什么严重作用。全部商品流转都已集中在国家与合作社手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永远铲除。公共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都已奠定为社会主义新制度不可动摇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中,危机,贫困,失业和破产现象已永远绝迹。苏维埃社会全体成员都已保证有丰裕文化生活的条件。

于是,——斯大林同志在其报告中说,——苏联居民底阶级成份也发生了变更。地主阶级和旧时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已被消灭。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所有一切剥削份子,即资本家,商人,富农和投机者,都被消灭了。所保存下来的只有已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底少数残余,这种残余在最近时间就会全被消灭。

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苏联劳动者,即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

工人阶级已不是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没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它已把资本主义消灭,已从资本家手中夺得生产资料而将其变成公有财产。它已不是原来的旧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了。拥有国家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已经是个完全新的阶级。这一工人阶级已摆脱了剥削,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奠定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变成了人类史上没有先例的工人阶级。

苏联农民底情形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前有两千余万零散的个体农户,即小农农户和中农农户,都是各自单独地在自己的份地上劳苦耕作。他们当时使用着落后的技术,受着地主、富农、商人、投机者和高利贷者等等的剥削。而现在苏联却已长成了

一种崭新的农民：那些能于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已不存在了。绝大多数的农户都已加入集体农庄，其基础并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长成的集体所有制。这是已摆脱一切剥削的新式农民。这样的农民也是人类史上没有先例的。

苏联智识份子也发生了改变。智识份子就其大多数说来，已经完全是新的知识份子。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是由工农出身。他们不像旧时的智识份子那样替资本主义服务，而是替社会主义服务。知识份子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这些智识份子和工农群众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新社会。这是替人民服务，已摆脱一切剥削的新式知识份子。这样的知识份子是人类史上没有先例的。

这样，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线已在愈益泯灭，旧时的阶级特殊性已在愈益消失。工人，农民以及知识份子间的经济上政治上的矛盾日益降低和泯灭。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统一底基础。

苏联生活中的这些深刻变更，社会主义在苏联获得的这些有决定意义的成功，都在苏联新《宪法》中得到了反映。

照这个《宪法》上所说，苏维埃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友爱阶级组成，工人与农民之间还存留有一些阶级上的区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之政治基础，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此苏维埃因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业经发扬巩固。

苏联全部政权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苏联之最高国家政权机关为苏联最高苏维埃。

苏联最高苏维埃由平权的两院——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所组成，而由苏联公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选举制选出，任期四年。

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一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之选举,均采用普选制。这就是说,凡年满十八岁之苏联公民,不分种族和民族,不分信仰,不分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不问社会出身,财产状况以及过去活动如何,皆有选举代表及被选为代表之权,惟患精神病者和由法庭判决褫夺选举权者除外。

代表之选举采平等制。这就是说,每一公民,皆有一票选举权,所有一切公民均平等参加选举。

代表之选举采直接制。这就是说,凡一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之选举,自乡村和城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起,至苏联最高苏维埃止,皆经由公民直接选举之。

苏联最高苏维埃在两院联席会议上选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

苏联之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苏联实行着“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

凡苏联公民皆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在年老以及患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享受物质保证之权。

妇女在一切活动方面皆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是为确定不变的法律。

一切公民皆有信教自由和进行反宗教宣传之自由。

为巩固社会主义社会起见,《宪法》保障言论、出版、集会和群众大会自由,保障结合于各种社会组织之权利,保障身体不可侵犯,住宅不可侵犯和通信秘密,保障凡因拥护劳动群众利益,或进行科学活动,或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而被通缉之外国公民有居留权。

同时,新《宪法》责成苏联一切公民执行下列严重义务:履行一切法律,遵守劳动纪律,诚恳履行社会义务,尊重社会主义公共生活规则,爱惜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保卫祖国,为每一苏联公民之神圣天职”。

关于公民结合于各种团体的权利，在《宪法》条文中，有一条里规定说：

“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之公民，则结合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劳动群众为巩固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中之先锋队，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之领导核心”。

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和批准了苏联新《宪法》草案。

这样，苏维埃国家就有了新的《宪法》，有了这个表明社会主义和工农民主胜利的《宪法》。

这样，在《宪法》上就明文规定了一件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即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已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到应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社会。

（四）布哈林托洛茨基间谍、暗害者和卖国贼余孽的被消灭。对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准备。党扩展党内民主的方针。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在一九三七年，发现了证明布哈林托洛茨基匪帮暴徒罪行的新材料。法庭对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人案所举行的公审，法庭对屠哈切夫斯基和雅基尔等人案所举行的公审，以及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庭斯基和罗森果里茨等人案所举行的公审，都证明布哈林份子和托洛茨基份子早已结成“右派和托洛茨基份子联盟”这一共同的人民公敌匪帮的事实。

法庭公审查明，这些人类蠢贼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初几天起，就已和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勾结起来阴谋反对列宁，反对党，反对苏维埃国家。在一九一八年初为破坏布列斯特和约而进行挑衅尝试；在一九一八年春阴谋反对列宁，勾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图谋逮捕并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一九一八年夏谋刺列宁并把列宁刺伤；在一九一八年夏“左

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叛乱；在一九二一年为了从内面实行动摇并推翻列宁领导而故意把党内意见分歧尖锐化；在列宁卧病时和逝世后试图推翻党底领导；出卖国家秘密并为外国侦探机关供给间谍消息；凶杀基洛夫；进行暗害勾当，军事破坏和爆炸工作；凶杀明仁斯基、库依贝舍夫和高尔基，——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在二十年当中所干出的罪行，原来都是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同伙们参加或领导下，遵照外国资产阶级侦探机关底指令进行的。

在法庭公审时查明，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暴徒遵照他们的主人外国资产阶级侦探机关底意旨而力求摧毁党和苏维埃国家，破坏国防，协助外国实现武装干涉，准备使红军遭受失败，分裂苏联，把苏维埃的沿海州割让给日本，把苏维埃的别洛露西亚割让给波兰，把苏维埃的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消灭工人和集体农民所获得的成果，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度。

这些犹如蜉蝣一样脆弱无力的白卫侏儒小丑，竟以——大概是为着令人发笑——国家主人翁自居，竟以为他们真能把乌克兰、别洛露西亚和沿海州割让和出卖给他人。

这些白卫蜉蝣竟已忘记苏维埃国家主人翁是苏联人民，而李可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一流老爷却不过是暂时在国家机关中服务的人，国家随时都能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把他们当作无用废物抛弃出去。

这些区区不足道的法西斯蒂奴仆们竟然忘记，苏联人民是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把他们打成粉碎的。

苏维埃法庭将布哈林托洛茨基匪帮暴徒判决枪毙。

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了这一判决。

苏联人民赞同了粉碎布哈林托洛茨基匪帮的办法，随即转而进行当前的事务。

而当前的事务就是准备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并有组织地实

行这次选举。

党用全力开展了这次选举的准备工作。党认为苏联新《宪法》的施行是意味着国内政治生活中的转变。党认为这个转变就是实行选举制度完全民主化，从有限制的选举过渡到普遍的选举，从不完全平等的选举过渡到平等的选举，从多级的选举过渡到直接的选举，从公开投票的选举过渡到秘密投票的选举。

在新《宪法》施行以前，会对僧侣、过去白卫份子、过去富农以及凡不参加社会有益劳动者实行过选举权上的限制，而新《宪法》却完全取消了对这几类公民所实行的一切选举权上的限制，而使代表选举成了普遍的选举。

从前代表选举是不平等的，因为当时曾对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规定过不同的选举定额，但现在选举权上这种不平等的限制已无必要，于是一切公民都有按平等原则参加选举的权利。

从前苏维埃政权中级高级机关底选举是多级的，而现在新《宪法》规定所有一切苏维埃，自乡村苏维埃和城市苏维埃起，直到最高苏维埃为止的选举，都应径由公民用直接选举法实行。

从前苏维埃代表选举是用公开投票和以候选名单为单位投票实行的，而现在选举代表则应以秘密投票法实行，不是以候选名单为单位投票表决，而是按选举区所提出的个别候选人为单位来投票表决。

这是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真正重大的转变。

新选举制度必定而且果然加强了群众底政治积极性，加强了群众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监督，提高了苏维埃政权机关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为要有充分准备地来迎接这个转变，党应当领导这个转变，并完全保证自己在当前选举中的领导作用。但为着这个目的，就必须使各级党组织本身在实际工作中成为澈底民主的组织，必须使它们在自己的党内生活中遵照党章来澈底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必须使党内所有一切机关都按选举制产生,必须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尽量发展起来,必须使党组织在党员群众面前完全负责,并使党员群众底积极性尽量提高。

一九三七年二月末,史丹诺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党组织应如何准备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问题的报告,其中所指出的许多事实,表明许多党组织在自己的实践中往往违背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常用补选指定办法来代替选举制,常用按名单表决议来代替按各个候选人表决议,常用公开投票法来代替秘密投票法等等。当然,采用这种办法的组织是不能执行其最高苏维埃选举时所负的任务的。因此,必须首先把党组织中这种反民主的实践铲除,并按扩展民主的原则改造党的工作。

因此,中央全会听了史丹诺夫同志底报告以后,决议如下:

“(甲)在绝对完全实现党章所定党内民主原则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

(乙)取消用补选办法指定党委员会委员的实践,而应依照党章恢复各级党组织领导机关选举制。

(丙)禁止在选举党机关时按名单表决议,必须按单个候选人分别进行表决议,同时保证一切党员有提议取消候选资格和批评候选人的无限权利。

(丁)选举党机关时采用不记名(秘密)投票的表决议。

(戊)在所有各级党组织——从初级党委员会起,至边区委员会,省委员会以及各民族共产党中央止——中一律举行党机关选举,并应于五月二十日以前结束之。

(己)在各级党组织中必须严格遵照党章上所定党机关选举期限:初级党组织中每年选举一次,区和城市组织中每年选举一次,省和边区以及共和国组织中每一年半选举一次。

(庚)在初级党组织中必须严格遵行在全厂党员大会上选举党委员会的办法,不许用代表会议来代替全厂党员大会。

（辛）必须把现在许多初级党组织中事实上已将全体党员大会取消，而用车间党员大会和代表会议来代替全体党员大会的这种实践消灭”。

这样就开始了党对于当前选举的准备。

中央通过的这一决议发生巨大的政治作用。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它开始了党为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而进行的选举运动。它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帮助各级党组织实行改造过来，实现发展党内民主的方针，并卓有准备地去迎接最高苏维埃选举。

党在开展选举运动时，决定把共产党人和非党份子实行选举同盟的思想作为自己全部选举政策底中心。党是与非党份子结成同盟，与非党份子结成联盟去进行选举的，党决定与非党份子一起提出各个选区的候选人。这在资产阶级国家选举运动的实践中是从所未有而且完全不可能的一种现象。而在我国这里，共产党人和非党份子的同盟却成了一种完全自然的事情，因为我国已没有什么彼此仇视的阶级，我国人民各阶层在道义上政治上的统一是种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全体选民书，其中说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苏联劳动者将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宪法》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布尔什维克党是和非党工人、农民、职员、智识份子结成同盟，结成联盟去进行选举的……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和非党份子隔离，而是和非党份子结成同盟，结成联盟去进行选举的，是同职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非党组织与非党社团结成联盟去进行选举的。因此，代表候选人将是共产党人和非党份子共同提出的代表候选人，每个非党的代表都是共产党人底代表，同样每个共产党的代表都是非党份子底代表”。

中央委员会告选民书最后向选民发出如下的号召：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一切共产党员和同

情份子号召,希望他们像选举共产党的候选人那样来一致投票选举非党的候选人。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一切非党的选民号召,希望他们像选举非党的候选人那样来一致投票选举共产党的候选人。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全体选民号召,希望他们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大家一致到选举箱前选举联盟苏维埃代表和民族苏维埃代表。

每个选民都应当去实现其选举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关代表的的光荣权利。

每个积极公民都应当把协助所有一切选民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一事当作是自己的公民职责。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应成为苏联所有各族劳动者在列斯胜利旗帜周围统一起来的伟大节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即是在选举前夕,斯大林同志在提出他为候选人的选区中发言,他在发言中讲到人民使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应是怎样的活动家时说道:

“选举人,人民,应当要自己的代表们始终称职;要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他们始终做一个像列宁那样明显确定的活动家;要他们像列宁那样在战斗中大胆无畏,对人民公敌毫不留情;要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当地平线上呈现某种危险的时候,一点也不慌张,丝毫也不慌张;要他们像列宁那样丝毫也不慌张;要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周密认清环境,周密计较各个正反方面时,能像列宁那样明哲镇定;要他们像列宁一样正直忠诚;要他们像列宁那样爱护自己的人民”。

十二月十二日,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选举是在巨大的热潮中进行的。这并不是什么平常的选举,而是一个伟大的节

日，是苏联人民庆祝节，是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底表示。

在九千四百万选民中，参加这次选举的有九千一百余万人，即占选民总数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其中有八千九百八十四万四千人，即百分之九十八点六的选举人，都投票赞成共产党人和非党份子同盟所提出的候选人。只有六十三万二千人，即还不满选民总数百分之一的人，才是投票反对共产党人和非党份子同盟所提出的候选人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份子同盟所提出的一切候选人，都没有一个例外地当选了。

这样，九千万人就用万众一心的投票表决来证实了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事实。

这是共产党人和非党份子同盟获得的辉煌的胜利。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胜利的凯旋。

莫洛托夫同志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所说到的苏联人民道义上政治上的统一，在这里得到了灿烂的证实。

结 束 语

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途程底基本总结怎样呢？

苏联共产党（布）底历史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

（一）党史首先教导说，无产阶级革命底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底胜利，没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这样一个不受机会主义沾染，对妥协者和投降主义者取毫不调和态度，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持革命态度的政党是不可能的。

党史教导说，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这样一个政党的地位，就是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革命领导的地位，而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革命领导的地位，就是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党史教导说，西欧式的那些普通社会民主党是不能成为这样的政党的，因为它们是在国内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尾随于机会主义者之后，一味希望“社会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

党史教导说,只有新式的党,马列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政党,因为只有它才能准备无产阶级去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底胜利。

这样的政党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在革命前的时期,——斯大林同志说,——在多少是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的力量,而国会的斗争形式,算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后来在公开革命战斗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严重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反对他人攻击第二国际而替第二国际辩护时说道: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战争底工具,所以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底革命发动时期,就表明自己无力采取什么严重办法。这是完全对的。而这是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并不是无产阶级底战斗党,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党,而是迁就于国会选举和国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是因此,所以在第二国际底机会主义者占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底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国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时期只是国会党团底附属品和服役者。显然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领导下,当然是谈不到什么准备无产阶级去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阶级公开冲突时期,无产阶级底革命发动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的轨范去改造全部党工作,要用争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教育工人,要准备和提上后备力量,要与邻国无产者联盟,要与殖民地和依赖国解放运动建立坚固的联系,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用那些在国会制度和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老旧社会民主党力量来解决,那就是自陷于绝望的境地,自陷于必不可免的失败。担负有这

样的任务而以老旧的党为领导,那就会陷于完全解除武装的境地。显然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就需要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很勇敢,足以引导无产者去争取政权;这个党要很有经验,足以认清革命环境底复杂条件;这个党要很机敏,足以绕过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途中的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便根本不要去推翻帝国主义,不要去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底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六二至六三页)(注八六)。

(二)其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底党不精通工人运动底先进理论,不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便不能实现其为本阶级领导者的作用,便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

马列主义理论强有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能了解周围事变底内在联系,能预察事变底进程,不仅能察知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能察知事变在将来会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只有精通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党,才能确有把握地向前进展,才能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反之,没有精通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在行动上没有把握,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前进。

有人也许以为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就是用心读熟马恩列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而以此自安,希望读熟的结论和原理能适用于任何环境,能适用于一切实际情形。但这样来看待马列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可把马列主义理论看成是一部教条集录,看成是一部教理问答,看成是一种信仰条规,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是一些咬文嚼字和呆读死记的人。马列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

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停留,并且也不能停留不进,而是不断发展着,不断完善着的。所以它在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因时而变,不能不由适合于新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

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完全不是说要读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拘守着这些公式和结论底每一字句。为了精通马列主义理论,首先就要学会怎样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清楚。

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底实质,要学会在无产阶级斗争各种条件下,在解决革命运动底实际问题时运用这个理论。

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善于拿革命运动底新经验来丰富它,要善于拿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它,要善于发展它和推进它,不怕根据这个理论底实质去用适合于新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代替其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

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底指南。

在第二次俄国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的时期,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宜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固然,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一度指示,说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不是国会制的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但可惜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没有把这一指示继续加以发挥,于是这一指示便被人付诸遗忘了。此外,恩格斯在其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评中(在一八九一年)所作的有权威的声明,说“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底特殊形式”等语,也无容置疑地证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底政治形式。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个原理后来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所奉行的准则。然而,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特别是一九一

七年二月革命，却提出了工农代表苏维埃这一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列宁根据他对于俄国两次革命经验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而得出结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底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一点，列宁就于一九一七年四月间，即在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提出了组织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好政治形式的口号。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拼命抓住国会制的共和国，而责备列宁，说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说他破坏了民主。但精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硬要把这个理论拉向后退，硬要把它的各个原理中的一个原理变成教条。

假如列宁曾经屈服于马克思主义底字句，没有敢于用关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历史环境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规定的一个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那末我们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又会处于什么境况呢？那我们党就会陷于黑夜徘徊的地位，苏维埃就会陷于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遭到严重的损伤。无产阶级就会遭到了失败，而无产阶级底敌人就会获得了胜利。

恩格斯和马克思研究帝国主义前期的资本主义时，得出了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说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同时举行进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说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所有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前期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根据他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而得出了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底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说社会主义革

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拼命抓住恩格斯和马克思底旧公式,而责备列宁,说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精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却硬要把这个理论拉向后退,硬要把它变成木乃伊。

假如列宁曾经屈服于马克思主义底字句,没有充分理论勇气去抛弃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已经过时的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这一适合新的历史环境的新结论,那末我们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又会处于什么境况呢?那我们党就会陷于黑夜徘徊的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落到没有领导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衰颓起来。无产阶级就会遭到了失败,而无产阶级底敌人就会获得了胜利。

机会主义并不常常都是直接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否认这个理论底个别原理和结论。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于企图拘守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个别原理,把它们变成教条,这样来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因而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恩格斯死后只有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而在列宁死后,只有斯大林及其他的列宁门生,才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唯一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用新经验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获得了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假如布尔什维克党底先进干部竟没有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竟没有学会把这个理论看作行动指南,竟没有学会向前推进马克

思主义理论并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那末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会不能获得胜利。

恩格斯批评那些担负起美国工人运动领导责任的德国侨美马克思主义者时写道：

“德国人没能把自己的理论变成发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连自己也往往不懂得这个理论，却把它看成是种教义和教条，以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能应付一切实际情形的了。在他们看来，这个理论是一种教条，而不是行动底指南”（《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六〇六页）。

列宁批评加米涅夫以及那些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即在革命运动已经向前进展而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拘守着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旧公式的老布尔什维克时写道：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底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这样说，他们很公正地讥笑了那种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态度，因为‘公式’最多也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但这种任务是必须依历史进程中每个特殊时期底具体经济和政治环境而有所改变的……必须领会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估计到活的生活，估计到现实中确切的事实，而不是继续拘守着昨天的理论……”（《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〇至一〇一页）。

（三）其次，党史教导说，假如不把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活动，想将工人阶级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因而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我们党底历史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等小资产阶级政党作斗争，并把它们粉碎的历史。不把这些政党克服，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便不能达到工人阶级底统一，而没有工人阶级底统一，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底胜利。

假如我们没有把这些起初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往后——在

十月革命以后——又主张恢复资本主义的政党粉碎,那我们就会无法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无法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并建成社会主义。

所有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为“革命”党和“社会主义”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侦探机关底走狗,变成了一伙间谍、暗害者、军事破坏者、杀人凶手和卖国贼,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社会革命时代,——列宁说,——只有极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政党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底统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五〇页)。

(四)再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底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底建设者的使命。

我们党内部生活发展的历史,是与党内“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及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把他们粉碎的历史。

党史教导说,所有这些投降主义者集团实质上都是孟什维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底余孽,是孟什维主义底继续。他们也如孟什维主义一样在工人阶级和党内执行了传达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因此,为消灭党内所有这些集团而斗争,就是继续为消灭孟什维主义而斗争。

假如我们没有击破“经济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那我们就会不能建成党并引导工人阶级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

假如我们没有击破托洛茨基份子和布哈林份子,那我们就会不能准备好为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

假如我们没有击破一切和各种民族主义倾向者，那我们就会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会不能保持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底旗帜，就会不能建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为了与党内机会主义份子作斗争而耗费的时间未免太多，以为他们把这些机会主义份子底意义未免看得太高。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党是工人阶级底领导部队，工人阶级底先头堡垒，工人阶级底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有缺乏信念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要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这样的斗争分明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所以，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及民族主义倾向者因为进行反对列宁的斗争，因为进行反对党的斗争，而终于遭到了与孟什维克党及社会革命党同样的结局。即变成了法西斯侦探机关底走狗，变成了间谍、暗害者、杀人凶手、军事破坏者和卖国贼，这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在自己队伍内，——列宁说，——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那就不能_不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获得胜利，就不能_不保持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显然的。这是已由俄国和匈牙利底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有过很_多次的困难情形，当时如果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旧留在我们党内，那末苏维埃制度就会_一定_是被_推翻_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三页）。

“如果说我们党，——斯大林同志说，——已创立了自己内部

的统一,创立了自己队伍空前未有的团结,那末这首先就是因为它及时清除了机会主义的污浊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与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与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除出去。党是靠清除自身中间的机会主义份子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七二页)(注八七)。

(五)复次,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迷恋于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竟隐瞒自己的错误,抹煞迫切困难的问题,用百事大吉的粉饰词令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卧,那它就会必遭灭亡。

“政党对于本身错误所持的态度,——列宁说,——就是表明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在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底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底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页)(注八八)。

其次:

“从前所有一切革命党陷于灭亡,就是因为它们自傲,而看不见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学会克服弱点”(《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至二六一页)。

(六)最后,党史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党不与群众发生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底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党,就不能成为能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党。

如果党善于像列宁所说那样“与最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联系,接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与他们溶成一片”(《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页)(注八九),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竟在自己狭隘的党范围内闭关自守,如果它竟与群众隔绝,如果它竟蒙上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必遭灭亡。

“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同志说道,——只要是与广大民众保持着联系,就会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定理。反之,布尔什维克一脱离群众,一失掉自己与群众间的联系,一染上官僚主义的尘垢,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所传说的神话中有一位叫做安泰的著名英雄,他的父亲据说是海神波赛东,母亲是地神盖娅。他对于生育、抚养并把他教养成人的这位母亲爱慕备至。安泰很有力量,没有那一个英雄能与他抗衡,因此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无敌英雄。为什么他这样有力呢?原来他同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即往生育和抚养了他的母亲身上一靠,因而就取得一股新的力量。但他终有一种弱点,就是生怕别人用某种方法把他跟地面隔开。敌人知道他有这种弱点,于是时时刻刻暗中窥伺他。后来忽然有个敌人利用了他这种弱点,结果便把他战胜了。这个敌人就是盖尔枯里斯。试问他是怎样把安泰战胜的呢?原来这个敌人设法把安泰跟地面隔开了,把他举到了空中,竟使他无法再同地面接触,结果便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颇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相像。他们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而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即是与生育、抚养并把他们教导出来的群众保持着联系。所以他们只要还是与自己的母亲,与群众保持着联系,那他们就能始终稳有把握地保持住他们那种不可战胜的地位。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坚强有力而不可战胜的关键”(斯大林,《论党工作缺点》)。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途程底基本教训。

(完)

简 注

(注一)十二月党人系贵族出身的革命家,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起义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度而得名。

(注二)地政官是沙皇政府任命贵族份子担任的一种地方官职,兼管有警察、司法和行政大权。

(注三)沙皇暗探局是沙俄秘密政治警察机关,专为反对革命运动而设。

(注四)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卷,第二〇五页。

(注五)同上,第三四〇页。

(注六)同上,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页。

(注七)同上,第二一一页。

(注八)同上,第二〇七至二〇八页。

(注九)同上,第二二〇至二二一页。

(注一〇)同上,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页。

(注一一)同上,第三五一页。

(注一二)布尔什维克意即多数派,孟什维克意即少数派。

(注一三)马尼洛夫精神因戈果里所著长篇小说死人口中的一个
人物马尼洛夫得名,以一味痴心妄为特色。

(注一四)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八〇至三八
八一页。

(注一五)同上,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页。

(注一六)同上,第三八七页。

(注一七)同上,第四二〇页。

(注一八)同上,第四四四页。

(注一九)同上,第四二三页。

(注二〇)同上,第四二六页。

(注二一)同上,第四四四至四四五页。

(注二二)缙绅会议是俄国第十七和十八世纪时代专为同政府
磋商国事而召集的等级代表大会。

(注二三)国家杜马是沙俄时代按反民主选举法产生的立法机关。

(注二四)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八二页。

(注二五)同上,第五四〇页。

(注二六)同上,第四五一页。

(注二七)同上,第五〇三页。

(注二八)同上,第五〇三页。

(注二九)同上,第四八〇页。

(注三〇)同上,第四八〇至四八一页。

(注三一)同上,第五二八页。

(注三二)同上,第四九〇页。

(注三三)同上,第五二八页。

(注三四)同上,第五二九至五三〇页。

(注三五)同上,第五〇三页。

(注三六)同上,第五〇四页。

(注三七)同上,第四六七页。

(注三八)同上,第五二〇页。

(注三九)同上,第四八六至四八七页。

(注四〇)同上,第四五五至四五六页。

(注四一)同上,第五三〇页。

(注四二)同上,第五四一页。

(注四三)同上,第五七六页。

(注四四)同上,第五八一页。

(注四五)同上,第五八八页。

(注四六)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卷,第七四四页。

(注四七)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五八七页。

(注四八)同上,第五九一页。

(注四九)劳动派(劳动团)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团体,一九〇六年由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一部分农民代表所组成,其领导人是社会革命党的知识份子。

(注五〇)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六九七页。

(注五一)菲德主义亦译信仰主义,是排斥科学而崇尚信仰的一种反动理论。

(注五二)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六一一页。

(注五三)同上,第六九九页。

(注五四)同上,第八〇五页。

(注五五)同上,第九四七页。

(注五六)同上,第九五八页。

(注五七)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一页。

(注五八)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九六六页。

(注五九)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一八页。

（注六〇）同上，第一九页。

（注六一）同上，第一九页。

（注六二）同上，第一八页。

（注六三）同上，第六三至六四页。

（注六四）同上，第一六六页。

（注六五）同上，第三五九页。

（注六六）同上，第三七五页。

（注六七）乌克兰拉达是乌克兰反革命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底政府，曾将德奥帝国主义军队引进乌克兰境内来扑灭革命。

（注六八）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七〇九页。

（注六九）博罗提巴份子 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在民族沙文主义党中组成的左翼，因其在一九一八年前出版过他们的中央机关报《博罗提巴》而得名。

（注七〇）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九五三页。

（注七一）同上，第一〇〇一至一〇〇二页。

（注七二）耐普曼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私资企业家，商人和投机者。

（注七三）见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第二二九页。

（注七四）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六八八页。

（注七五）见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二九四页。

（注七六）同上，第四九五页。

（注七七）同上，第五七二页。

（注七八）同上，第三七四页。

（注七九）同上，第四四三至四四六页。

（注八〇）同上，第五四九页。

（注八一）同上，第五五五页。

（注八二）同上，第五八二页。

（注八三）同上，第五八四页。

(注八四)同上,第六三〇页。

(注八五)同上,第六四二页。

(注八六)同上,第一〇二至一〇四页。

(注八七)同上,第一一五页。

(注八八)见《列正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七六五页。

(注八九)同上。第七三三页。

四、共产国际的解散与中共对 共产国际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 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1943年5月26日)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共产国际曾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机会主义者所糟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一九二四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再则,当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间,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时候,它又声援了中国革命的人民。最后,在一九三七年以来的六年抗日战争中,它又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但时至今日,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书上所说,因为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因为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

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与群众动员,借以达到澈底的完全的胜利;因为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这种种理由,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召集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故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作出此种提议。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指出:在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之后,各国工人运动是更加发展了。现在第三国际之宣布解散,无疑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的来到。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二,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自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

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末，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①

(1943年5月26日)

毛泽东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吗?

是的,它是这样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一个经

①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六月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

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 and 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四天来各国对于解散共产国际的舆论，综合起来看是：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一切正义人士，对此举动都交口称誉。但法西斯国家却不同，一切血腥的侵略者，过去曾经订立过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的，现在却似乎不愿意共产国际的解散，你们看奇怪不奇怪呢？他们都异常狼狈地在拼命指责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同盟国^①中，例如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两地社会民主党中的顽固派分子，从前以“受共产国际指令”为理由，拒绝本国共产党加入该党，现在却又不欢迎共产国际的解散，也算一件小小的怪事。

现在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任务，在于使工人运动归于统一，以便有力地迅速地打败法西斯。此种工人运动中的顽固派，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借口，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说各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中国也许会有这一类毫无常识的议论出现，我们且看一看吧。但是我相信：全中国大多数正义人士是不会附和这种议论的，其理由就是因为这种议论缺乏任何起码的常识。

①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①,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七一八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

①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根据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解放日报》刊印

(录自《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共产国际结束声明

(1943年6月9日)

6月10日苏联真理报登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如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43年6月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中，讨论了各国支部交来关于1943年5月15日，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的决议，并且确定：

1. 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已由阿根廷共产党、澳洲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加泰隆尼亚统一社会党、智利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古巴革命共产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芬兰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爱尔兰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波兰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苏联(布尔雪维克)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瑞典共产党、瑞士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南非联邦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及青年共产国际(他是参加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批准。

2. 共产国际各支部中，没有任何支部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提出反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基于上述各点，兹特宣布：

1. 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业经所有各有权宣布决定之支部(包括最重要的一个支部在内)一致批准。

2. 自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秘书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宣告解散。

3. 指令由季米特洛夫(主席), 爱尔柯利, 曼努意斯基及皮克所组织之委员会结束已解散各机关的事务, 并处理共产国际的职员和资产的事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G·季米特洛夫(签字)

1943年6月9日

(录自《群众》第8卷, 第10期, 1943年出版)

论共产国际底解散

(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

昨日本报发表了两个重要文献：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和中共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工人运动底国际领导中心——共产国际解散了！这是一件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曾经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国际组织，这个继续着第一国际底光荣传统和第二国际战前最好时期的传统，领导着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集中的战斗组织，今天需要解散呢？它的解散对于目前的世界局势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往前发展将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着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组织形式是采取什么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其他原始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在解决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时，第一，不把运动束缚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否认绝对正确的对于革命运动一切阶段都适用的组织形式；第二，他们对于组织形式要求作无条件的历史的考察，必须从运动发展的当前阶段的具体环境中去观察组织形式之是否适宜；第三，他们认为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政治利益的，组织形式是为每个特定时期的具体历史环境及由此直接产生的任务所决定的。从这个观点看来，就可以懂得，任何组织形式由于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能够从促进运动发展的形式变成为它的桎梏，这时候，旧的组织形式必须改变。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历史，鲜明的说明

了这点。这个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于组织形式的观点,永远是共产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领导原则。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在“共产党底组织建设,他们工作的内容和方法”这一提纲中开始就说:“(一)党底组织应该适合它的活动的条件和目的……(二)不能有绝对正确的不变的共产党底组织形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在前进中经受着不断的变化,它迫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经常找寻自己组织底最合适的形式。……”

明乎马克思主义对于组织形式的这个基本原理之后,对于共产国际底解散就不会诧异了。就会懂得“共产国际底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中共中央)了。

共产国际产生于一九一九年,这时候战前的旧的工人政党绝大多数叛变了社会主义,政治上完全破产了;在欧美各国(除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这时候,既很薄弱,又没有广大的联系与组织,不能有力地来抗击机会主义的叛卖和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战斗;而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胜利、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将阶级斗争提高到空前的高度,这些条件在工人运动面前提出了在各国组织和旧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截然不同的新型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迫切需要,和在全世界组织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国际组织,以领导和帮助新兴的薄弱的各国共产党之迫切需要。共产国际担负着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出世了。在其存在的二十五年内,共产国际不仅帮助了各国工人阶级底先进分子团结为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扶植培养了这些政党的独立战斗的能力和创造的天才,使他们能够最好地和最有成效地解决各个国家面前的极复杂的任务。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得到最鲜明的例证。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有其深刻的根源的,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的党之所以能够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变成为全国政治生活底重大因素,所以能够在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独立地创造地,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客观

条件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对于这一点,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是曾经有过重大作用的。可是,如果在新兴的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在各国党创造和形成的时期,以及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各国革命斗争的任务比较单纯的时期,集中的国际的中心是必要的、合适的,能够促进运动发展的话,那么,在世界局势激变,各国工人运动面前的问题愈益复杂多变,而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创造的独立作战能力的时候,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显得陈旧了、不适时宜了,它的继续存在将成为运动发展的障碍。试设想一下,今天的世界状况,那是怎样一幅花样复杂的图画啊!今天的世界,有着以铁与血搏斗着的希特勒匪帮及其同盟者的侵略集团与伟大的爱好自由的民族的反希特勒同盟;在这对抗的营垒之旁站着若干中立国家。不论在侵略集团之内、反侵略同盟之内、中立国之间,各个国家的地位亦是极不相似。以侵略集团说,德国是完全的主人,日寇是半独立的希特勒同盟者,意大利是附庸,罗、匈、芬则是喽罗;以同盟国来说,有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的英、美,半殖民地的中国,殖民地的印度,暂时沦陷失却国家独立的法、比、捷、荷等国;以中立国说,有亲轴心的西班牙,亦有土耳其和瑞典,有在德国四面包围中的瑞士,亦有远离战场烽火的南美国家。姑不必论各国内部情况的天壤悬殊,工人运动主观力量的各不相同,即就这个复杂万分的国际关系和状况来说,要由一个国际领导中心来集中地解决一切国家的各种问题,是如何不可设想。一九三五年的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有鉴于国际形势之日趋复杂,就已经决定了使各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和特殊状况来解决本国的各种问题,八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已经成长到能够不犯重大错误地正确地决定其本国的内外政策的水平了。运动发展的客观条件,使得国际范围内的集中领导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其主观条件,则已成熟到使这种远离本国的中心的领导成为多余的了。

这样,旧的形式底抛弃,只会使新的内容更顺畅的发展起来,使运动更向前提高一步。

从上所述亦就可以明了,这个英明的措施,将必然会使得各国的工人运动更进一步的发展,使得各国共产党能够更切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和历史情况来解决本国革命运动面前的任务,而使它更能成为与千百万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民族的工人政党;使得它的领导干部及全体党员在提高了的责任感的基础上能够更进一步地依据本国的条件来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而提高他们的创造才能。我们可以期待,在今后,各国共产党不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不论在革命实践上,将会有迅速的飞跃发展和伟大成就。至于各国工人阶级底休戚与共利害相关的意识,那么,恩格斯关于第一国际解散所说的:“甚至没有暂时已经变为桎梏的形式的国际联合,亦会继续前进的”,在今天更加切合的。

对于目前的世界局势,它的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目前的世界局势正处在摧毁希特勒暴政的决战的前夜;毁灭希特勒主义及其亚种,乃是今天头一等的任务,一切力量应该集中于完成这一任务。而希特勒的情况愈加危急,他的政治和军事的地位愈加无出路,那么,他愈加想挑拨分裂同盟国的营垒。在希特勒匪帮手中的挑拨工具之一就是“反共产国际”这个幌子。在战前希特勒就以“反共公约”作为准备战争的工具,而在目前四面楚歌的环境中,戈培尔辈又声嘶力竭地叫喊莫须有的“布尔塞维主义的危险”和“共产国际干涉各国内政的阴谋”来找寻脱逃死亡的出路。共产国际底解散给了希特勒匪帮以当头一棒,使他们的“反共产国际的公约”落了空。这几天轴心宣传的慌乱,柏林发言人对“反共公约”将来如何之只能回答“将来自知”,已经充分暴露了轴心集团之周章狼狈。相反的,同盟各国朝野的交口称誉,证明了此举对于盟国团结和促进澈底摧毁轴心集团的胜利之到来的重大贡献。

总之,共产国际底解散,是为客观主观条件的变化所准备了

的,历史条件成熟了,新的内容生长了,已经陈旧了的,变成桎梏的旧形式之抛弃,只会使新的内容更迅速更顺利地茁长怒放。共产国际底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大的责任感,更大的自信心,更大的创造性,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革命斗争的先锋岗位上来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工作,来加强与千百万人民的联系,来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借以服务于抗战建国大业,首先最迅速地摧毁我们民族的死敌——日本法西斯及其德意同盟者! 战斗罢! 中国共产党人! 胜利是我们的。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1943年6月27日《解放日报》社论)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已经得到各国共产党的一致赞成,而于六月十日经过国际主席团的决定实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整个看法,在五月二十八日已经有所论述,现在专就中国从这件事所应得出的教训,再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共产国际的解散,至少应该使所有中国人进一步认识(或者是从新认识)三个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解散,应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新的认识呢?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中间,它曾经历过各种不同的发展条件,但是条件尽管改变,马克思主义却总是向前发展着。二十四年前共产国际的成立,曾表明这个发展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又到了一个更新的和更高的阶段。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为什么都赞成解散共产国际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今后将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继续发展,是有着一致的坚强的信心;这就是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之将在全世界继续发展,乃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抵抗的现象,而决不以任何国际中心的存在和帮助为其必要前提;这就是告诉我们,中国有些人过去和现在说是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用于今天,或特别不适用于中国,其所以还存在于今天的世界和中国者,就因为共产国际的活动云云,这是一种何等的浅见。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并不依靠某种国际性的组织形式,而可以

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得到发展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学说，正如地球绕日的学说之不受国界限制一样。革命（这是科学应用于具体国家的具体结果）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但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科学（这个一切先进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必然输出，也必需输入。还在几百年前，明末清初的那些最反动最守旧的昏君和暴君，就已经开始懂得了接受欧洲近代科学的必要，因而改进了几千年来“固有文化”的阴历。辛亥以后，虽然象袁世凯这样愚而好自用的专制魔王，也还知道定“舶来”的阳历为“国历”，以迄于今，未见中国因此丧失半点利权。若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则今日中国自中华民国之“民国”、国民党之“党”以下，各种输入的大小制度办法名目，何止千万？若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又不同，则俄国人列宁接受了德国人马克思的主义，大家试看究竟俄国有没有因此而成为德国的“附庸”，如完全“发扬”了独裁者凯撒以来“固有文化”的法西斯意大利那样？老实说，如果腐败的沙皇大地主资产阶级专制的俄国，没有幸而变为富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则岂但俄国今天确乎要成为德国的附庸，四强弱了一强，即其他三强之命运如何，也正在不可知之数。若说马克思主义尽可适用于其他国家并使其真正富强，独独中国是例外，中国有孙中山主义，而孙中山主义是与外来科学思想不能相容的，这就更荒唐了，这就并不是诽谤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诽谤本国的孙中山主义了。谁都知道，正是孙中山先生本人，第一个觉悟到国民党改组以前的固有方法不好，因而决心学习俄国革命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方法”。民国十三年孙先生给蒋介石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

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澈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其长,则各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在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

在这里,孙先生不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否和应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做了明确的结论,而且对于当时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地墨守固有方法,顽固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降心相从”的人,也做了公允的评价,这些结论和评价,都已经被后来的历史所一一证实了。

共产国际的解散,使我们对于国际主义也可以有同样进一步的认识。国际主义,并不是共产国际存在的结果,而是共产国际存在的原因。如果这个真理,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时候,有些人还是看不清的话,那么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就应该完全看清了。觉悟的人类,有这种国际组织也好,有那种国际组织也好,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国际组织也好,其不分国家民族而团结一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他们无论有一种什么形式的国际团结,总一定自始至终,忠实于其本民族的真正利益,这也是极其显然的。世界上决不可能真正有一个什么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为条件,也决不可能有一种什么全人类的国际利益,要以牺牲某一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利益为条件。无奈有些人硬象看见了什么似的,硬说一个国际组织对于一个民族是如何如何的“不妙”。那么看事实吧,以前美国共产党曾不得已而首先退出共产国际,这对于美国共产党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共产国际

解散了，这对于（比方说）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国际团结又有什么影响呢？唯一可说的影响，就不过是证明了那些造谣者的破产罢了。

中国现在还有人要趁这个“最后”的机会，伪善地“称赞”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国际主义特别是苏联的国际主义的“结束”。共产国际的解散，确如斯大林所说是“恰当和适合时宜”，而这种宣传，却应该说是极不“恰当和适合时宜”的。这种宣传极不恰当，因为第一，这些宣传者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再一次忘记了孙先生的遗教。孙先生正是在他的民族主义讲演里说：

“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推到全世界，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

可见孙先生自己，就是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于一身的人。第二，这些宣传者自称是国民党人，却忘记了从大革命到抗战，受苏联的国际主义最慷慨大量的帮助者正是国民党。第三，这些宣传者甚至拙劣地引证斯大林的意见，承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揭破了希特勒匪徒关于所谓‘莫斯科’意欲干涉其他国家生活并使之‘布尔塞维克化’的谎言”，然后又紧接着说，莫斯科过去确是意欲使其他国家布尔塞维克化的，这在逻辑上就不免使自己与希特勒的区别糊涂起来。这种宣传又极不适合时宜，因为第一，现在正是孙中山先生所说公理与强权的国际战争时代，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都已经联合一致，向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并肩作战，并且正在为最大限度地加强这种战时的和战后的国际团结而努力，因此就

应该大大提倡国际主义,而不应该稍微减弱国际主义。第二,即使对于法西斯集团国家的人民和士兵,也只应该大大宣传国际主义,来打击法西斯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争取他们走到反法西斯战线方面来,而不应该相反地和法西斯的反国际主义宣传同流合污。第三,在中国来说,加强国际主义的宣传更是迫切需要,因为中国的抗战正在最困难的时期,不但急须开展瓦解敌军的斗争,尤其急须取得同盟国以更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来给予我们更大的军事援助,在这个时候来宣传中国民族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有何矛盾,与整个反法西斯国际战争的利益有何不相调和,当然是非常有害,应该立刻“结束”的。

共产国际的解散,又使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而切实消除过去一切关于它的误解和妄说。今天再没有人能够抹煞事实,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了。审查一个政党的民族化,应该有些什么标准呢?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与这个民族的广大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本心的拥护;应该看这个政党的主张是否适合民族和人民的需要,能使其达到自由幸福的目的;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确实一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相信和能否发动本民族的人民的创造力量,自力更生,而不依赖或等待外援;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而不是坏的,早已过时而应该抛弃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从这所有的标准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最民族化的政党,在中国所有各政党中,它应该考第一名。

共产国际解散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推动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国际与国内团结。中国国内团结的中心关键,就是国共两党问的关系。不可讳言的,这种关系今天还有很多缺憾。同样不可讳言的,过去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借以反对共产党的理由,就是中国共产党曾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现在这个“理由”已经消灭

了。因为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国际主义而加以反对之不能自圆其说，我们也在前面讲过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迅速地将两党间的关系予以调整和改善。国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利于日本法西斯，但是环顾国内，一方面虽有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和其他英勇军民的艰苦奋战，虽有陕甘宁边区的积极发展生产，援助前线，改善民生，一方面却是大后方的民生憔悴，士气消沉，这种险象，起于亟待全力准备反攻的今日，真不禁使我们忧心如焚。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国内团结能够增进，一切问题都还是不难解决的。国民党人既然十分欢迎斯大林五月二十八日答复英记者的信，那么，他们当然是准备实现斯大林关于加强反法西斯各国国内团结的希望。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诚心努力与国民党人协商，来共同实现斯大林的希望，并且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实现蒋委员长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谈话，实现民国二十七年三月的抗战救国纲领，实现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和对共产党“一视同仁，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的诺言。果能如此，则国内困难必可克服，抗战胜利必可促进，中国就算是没有错过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条件，没有辜负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件大事了。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摘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1943年7月5日)

王稼祥

抗战已满六年了!

当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提供了抗战应循的正确道路与抗战中应该实行的政策。在六年抗战的过程中,共产党又把这条道路与这些政策更加具体化和更加充实起来。

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就坚决的不动摇的遵循这个抗战正确道路与实行这些抗战的正确政策。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敌后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到现在,而在敌后坚持抗战比之大后方坚持抗战要困难到不知道好多倍。

共产党所指出的抗战正确道路与抗战中正确政策早已在我党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表现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敌后抗战的实践中证实它的正确性。抗战的正确道路,归纳一句话,便是全体人民的抗战,全体民众的抗战,而不是只照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私利反而违反人民公益的抗战。

人民抗战的正确道路要求实行能够真正发动民众结合民众的政策。我们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这些政策。首先,我们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各阶级各阶层都能合作参加抗战。我们实现了民主,实行了三三制政权,实行了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保障了

人权，以便同心同德，共同对敌。我们实行了正确的军事政策，使武力与民众结合起来，解决了征兵的困难问题，又建立了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相结合的局面，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实施了正确的军队政治工作，做到了在敌我武器不平等的条件下能够最有效的打击敌人，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争取敌伪军的伟大效果。我们又实行了抗战中应有的经济政策：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发展生产，奖励私营公营生产，结果，民力得以生息，抗战供给得以维持。而当敌后抗战进入更困难的阶段，我们又实行了精兵减〔简〕政，以便减轻人民负担；实行了根据地领导一元化，以便增进抗战效能；实行了拥军和拥政爱民运动，以求得军民更加一致。凡此诸端均为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所坚决实行，而结果收到伟大的成绩。虽然敌后抗战之困难已经十分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为“豆腐块”，与大后方完全隔绝，几年来毫无经费、弹药、医药的补充，敌人仅在华北的封锁线之长已有万里长城之六倍，敌人在华兵力总数之一半是压在八路军新四军肩上，虽然困难重重，然而我们坚持到现在，军民奋发，不断取得胜利。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找出抗战的正确道路与抗战正确政策，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最先进的革命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中国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一起，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有其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由于全体共产党员与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坚决奋斗，不顾牺牲，是由于共产党所领导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全体人民与其各阶层都是诚心的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当着共产党找到了抗战正确道路而在敌后顺利的坚持抗战，抗击了在华日军之一半的时候，凡关心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前途的人，一定觉得高兴。然而反共分子则不然，他们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私利所蒙蔽，固执着自己不正确的抗战道路，看见共产党能够

坚持抗战,便觉得如临大敌,坐卧不安,日夜在研究打击共产党的方案,找寻破坏共产党的方法:不讲团结,而专找磨擦;不实行民主,而鼓吹法西斯独裁;不讲究军民一致,反而抓兵欺民,军民距离更远;不减租减息,实行孙中山的土地政纲,反而加重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仅存之土地继续丧失;不讲究扩大生产,反而因为垄断政策物价政策之结果,而使生产缩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方之安定成为问题,民变之风蔓延,军队之战斗力减弱,投降之军官增多。这一切都是反共分子实行不正确的抗战道路的结果。

当着反共分子实行不正确的抗战道路收到了悲惨的结果时,于是又想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以图挽救自己的危机。他们想出了国家统一的口号,污蔑抗日根据地“封建割据”,要求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同时又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惜儿戏抗战前途,以军事进攻为威胁,以言论进攻造舆论,欲使已经很困难的抗战中国更加分崩离析,更加糜烂破碎而后快。

当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在决战与胜利的前夜,当着中国抗战胜利在望、同时又处于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应当指出,现在是中国解放斗争历史最关重要的时候,也是我们为中国解放而奋斗的人士应当最负责的日子。

在这样严重关键,我们中国会:

团结则存,分裂则亡。

实行抗战的正确道路则胜,固执错误的抗战道路,则抗战局面会更恶化,失败的危险是没有取消的。

在这样负责的时候,我们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中或者“立功”,或者“犯罪”,或者“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人民是好的裁判官,决不是几句“我是统一”“你是封建割据”的调调所能解决的。

※ ※ ※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并且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斗争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也正因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了正确的道路，所以它便较容易的找到抗战中的正确道路。

回顾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便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理解到，为求得中国的澈底解放，必须解决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所提出的三个课题：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民族解放；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以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解除中国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压迫，把生产力提到更高的阶段，以求得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人民的社会解放。前两个课题的解决是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后一个课题的解决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来制订自己的政纲，把中国民族澈底解放和三大课题的解决，放在唯物的现实的与科学的基础上，而不让其解决方案停留在主观的空想的与公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三个课题或者说三大任务是彼此联系着的，但是每个课题的解决中，

参加的阶级力量不一样,因此必须在民族解放道路上的每个阶段,具体的估计情况,分析阶级关系,来制订它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积极的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二十二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成熟起来的。

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并且是在和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时有过陈独秀投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又有过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苏维埃运动时期中,有过盲动主义,李立三路线及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战时期中又有过新的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没有找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或者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是小资产阶级冲动,以愿望当政策,跳过革命的必经阶段,以为中国解放的三大课题立即可以同时解决,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在克服与反对这些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壮大起来,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在这个斗争中生长起来。

毛泽东同志从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订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反对了张国焘的反对国共合作,同时又反对了陈独秀主义,在湖南下乡调查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大革命失败后即手创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确定了苏维埃的各个政策与红军的战略战术及红军军政工作办法,又抗击了李立三

路线及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战时期中毛泽东同志又提供了抗战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党内党外对抗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错误思想，反对了党内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战路线的投降主义，写作了出名的小册子《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等著作。在最近又发动了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以教育共产党人更好的掌握马列主义，更好的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它既不象那些简单抄袭书本搬运理论，把理论当教条而自命为马列主义，把主观主义当作马列主义，也不象那些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来投机，抄袭一些中国封建时代的古书，同时偷运一些外国最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论为中国“本国货”，把封建思想与法西斯主义当作中国民族解放的理论。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

请看俄国布尔塞维主义——列宁主义是怎样发展的，来当作我们的一个例子吧！列宁自己说：

“一方面，布尔塞维主义于一九〇三年是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产生的。而这个——只有这个——革命理论底正确，不但是由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明，而且特别是由俄国革命思想界的迷惑、游移、错误和失望底经验所证明。大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五十年内，俄国进步的思想界曾处在空前野蛮与反动的俄皇专制压迫之下，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如渴思饮，它用了惊人的奋勉精神与慎密态度来探索欧美关于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世纪里，受到了空前的痛苦与牺牲，表现了空前的革命勇气，它表现难以设想的努力，它专心致志

从事探究,它在半世纪里经过训练、实验、失望,审查、参照欧洲经验等等折磨,它真正受尽了千辛万苦之后,才获得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革命者不堪俄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所以革命的俄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其国际联络之频繁及其对于各国革命运动底形式与理论之熟悉,为世界任何各国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固的理论基础上所产生出来的布尔塞维主义,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实际历史。这种历史经验的丰富世界上没有伦比。因为在这十五年内,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多的革命经验,革命运动各种形式——合法的与非合法的,和平的与激烈的,秘密的与公开的,小组的与群众的,国会主义的与恐怖主义的种种形式——彼此交替,都没有这样迅速和复杂,任何一国都没有在这样短促的时期内,积聚这样多的现社会一切阶级斗争底形式、方法以及斗争所带的色彩;而且因为俄国底落后与沙皇政府的残暴压迫,这种斗争特别快地成熟起来了,特别迫切和顺利地领会和采用了相当的欧美政治经验底‘新发明’。”(列宁:《左派幼稚病》)

这是俄国布尔塞维主义产生的过程,西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俄国革命经验相结合,便产生布尔塞维主义,列宁主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成长,也与俄国布尔塞维主义有了同样的过程。

中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与二十世纪,由于中国的落后,外有帝国主义的相继侵入,民族独立丧失,内有满清及军阀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近百年来历史都充满着民族解放与革命的斗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战争。同时百年来中国进步的思想界也同俄国一样在寻找革命理论,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为号召旗帜,义和团以原始民众暴动为其色彩不用去说他,后来又有康梁立宪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欧美资

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他们也同俄国一样都费尽心血在欧美的“新发明”中寻找挽救中国解放中国的革命理论，也是经过失败、痛苦、经验与教训之后，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看见了俄国共产主义挽救和解放了俄国之后，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共产党人是这样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这用不着说明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也深刻认识了马列主义这个革命理论之作用，承认中国革命非学“俄国方法”“非以俄为师”不能成功。所谓“俄国方法”便是布尔塞维主义的革命方法，所谓“以俄为师”，便是以列宁主义为师。这是孙中山先生经过失败与痛苦的过程后而认识到的，虽然孙中山先生并未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可惜的事，然而他在晚年能够进到认识“俄国革命的好方法”，已经是难得的可宝贵的事。

由于中国的落后，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的七十年，在布尔塞维主义出现后差不多二十年，中国才找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主义之思想，便建筑在这个马列主义的坚固的基础上。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自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共产主义也已经有廿二年的实际历史，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压迫之残暴比之俄皇政府有过之无不及。中国革命斗争经验之丰富，斗争形式之复杂，民族的、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破裂与再形成；城市的、乡村的；合法的、非法的；对外的、对内的；武装的与和平的。武装斗争延长了二十余年，革命是在战争中；这些斗争形式不仅很快的交替，并且有时在中国不同地区同时进行，这些斗争形式之复杂也至少不亚于俄国，假若不是更复杂更错综的话。所有这些都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实他的理论与经验，创造出建筑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中国共产主义。可是，中国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是落后的，与欧美是比较远隔的，中国共产党一产生后便

全部投入革命的热潮,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产生后还经过曲折,经过经验,经过成功与失败,经过克服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主义更加生长起来成熟起来,这是不奇怪的事,也是必然的事。

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当着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经验日益完备的时候,反共分子又觉得不安,想出了一些借口来反对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其最流行的便是:“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与机会主义,这是共产党自己承认的,可见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不适合于中国民族的解放。”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德国人马克思和俄国人列宁的理论,因此不合国情的。”

这又是极端浅薄的说法,这是剥削^①中国落后,这是以人民民族解放意识之提高来进行投机事业。

任何一个革命的理论,任何一个革命的政党都是在外部内部的斗争中形成起来壮大起来,有时是处于占少数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在创造自己的理论与政党时,是在工人运动中,在第一国际中,反对巴枯宁、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勃朗基主义,反对拉沙尔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列宁与斯大林创造布尔塞维主义与联共党,是在反孟尔塞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就说国民党的历史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其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方面是正确的,然而也经过了内部斗争,民国元年反对了宋教仁和江精卫的投袁路线,可是孙中山当时在国民党内是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地位,民国十二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又实行了自我批评,确定了“以俄为

^① 原文如此,疑为“利用”之误。

师”，反对了当时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分子。同样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主义是在反对与克服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这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检查错误，克服错误，正表示一个政党的严肃性，也表示这个政党的进步与老练，怎样能够作为反对这个政党的理由呢！

至于说马列主义是“从外国输入”，这仅仅是利用中国的落后，利用中国与外国的隔离，和以民族意识来作投机生意，这是上面已经说过了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为基础，但仅仅是基础，它对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搬运的公式主义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列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它必须而且已经创造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民族解放的问题，解决中国发展道路上三大课题的理论。并且，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抗战的烽火中，对于“外国东西”一般的可能产生“排外主义”（一切外国东西都是不好的）与“洋奴主义”（一切外国东西都是好的），但共产主义者是澈底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民族解放的坚决战士，“排外主义”与“洋奴主义”决不能安到共产党人的头上去，“排外主义”是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封建遗毒的守旧主义的本色，至于“洋奴主义”又恰恰是买办资产阶级应有的身份。孙中山不是吸收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晚年吸收列宁主义的“好方法”而形成他的三民主义吗？现在反共分子不是在偷运德日意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压迫民众的方法吗？

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列主义与中国

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

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五日

(录自 1943 年 7 月 8 日《解放日报》)

季米特洛夫日记

(节录)

1943年

1943年1月15日

博尔沙科夫(侦查局)。来自延安的有关王明病重的消息。必须到成都或苏联治疗,而似乎毛泽东和康生不想放他离开延安,担心他会提供于他们不利的情报。我劝侦查局的这位代表不要干预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内部事务。

1943年1月16日

书记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反法西斯战俘学校和战俘中开展工作的会议。

校长杨增作报告。

我责成委员会制定具体建议并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 (1)学校没有辜负自己的使命,应继续办下去;
- (2)学校应扩大,应设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奥地利、意大利、波兰——克罗地亚——斯洛伐克等部;
- (3)学校应搬迁到莫斯科附近;
- (4)教学大纲中应设置进行战俘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的实际训练科目;
- (5)学校要设军官俘虏讲习班;
- (6)确保为下期选拔更好的学员。

1943年1月19日

拉科西:关于派遣匈牙利同志去收容新战俘的匈牙利战俘营,

关于在匈牙利前线进一步开展争取独立运动和其他问题。

……

1943年1月28日

公布了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北非)举行的会谈公报。谈判持续了10天!

罗斯福建议此次会议称为“德、意、日无条件投降会议”。

1943年1月2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有各广播电台编辑部领导人和政治工作者参加的关于我们宣传工作的会议,讨论由于红军的胜利进军和法西斯德军110个师被歼而出现战争转折的情况下我们的宣传工作。

交换意见之后,责成中央编辑部为书记处准备一份有关我们宣传工作也必须有转折的指示草案。

1943年2月1日

结束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对法西斯德军集团的歼灭战。保卢斯元帅和16名将军被俘。歼敌33万。

收到王明(发自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他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我们方面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

电报是发给斯大林和我的。

1943年2月2日

与对南斯拉夫广播电台编辑部人员开会。讨论了德国人、意大利人、乌斯塔什分子、奈迪奇分子和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部队向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发动总攻的有关问题。

1943年2月3日

瓦西利耶夫(被任命为驻美总领事)。明日启程,约一个半月后抵纽约。我介绍了美国情况和美共的路线和活动。给他作了他可能对我们工作给予帮助的一些具体指示。

收到铁托关于敌人向解放区发动总攻的紧急求援电报。

收到毛泽东指责王明的电报。

1943年2月4日

与各国党的代表开会讨论关于进一步培养各国共产党在国外的党的后备力量问题。

听取了古利亚耶夫关于党后备干部工作组迄今所做工作的情况通报。

我责成各国党的代表经常对自己的干部进行政治工作。考虑到培养这些人是为了使他们回国从事实际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建议要做到能使他们了解相应各党的政治路线、策略和组织情况。

各组都应就下列问题进行工作：

- (1)反希特勒联盟纲领(按斯大林的论述)和苏联的领导作用；
- (2)反希特勒斗争的民族统一阵线；
- (3)民族阵线的行动纲领；
- (4)游击运动问题；
- (5)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反希特勒民族阵线中的作用；

今后，每10天给全体人员做一次国际情况报告。

都必须仔细自学：列宁和斯大林传记，《联共(布)简明教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国内战争史》的最重要章节，共产国际七大材料。

.....

1943年2月9日

海军上将沃尔科夫汇报了香港和上海被日本人占领时和占领后的情况。我建议他把这个有意思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

.....

1943年2月11日

杰卡诺佐夫电话谈王明来苏联治病问题。我建议他去找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要其取得蒋介石对王明赴苏的许可。

.....

1943年4月8日

弗拉索夫、弗里德里希谈南斯拉夫电台广播有关南斯拉夫国王在伦敦的答记者问一事的路线。我指示：

(1)将国王答记者问的摘要给铁托(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2)为“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准备一篇专稿谈反对占领者斗争的团结问题(并揭露切特尼克)，文章中现在暂不涉及国王彼得此次的答记者问；

(3)以战斗着的南斯拉夫名义写一份对国王答记者问的答复。

1943年4月9日

斯卢茨克尔(青年共产国际)报告他到乌法和库什纳连科沃出差的结果。党校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在特工学校，政治工作无人过问，有一些生活腐败分子。我建议他提出对学校今后工作的具体建议。

1943年4月10日

召开会议讨论战俘状况及在战俘中开展工作的条件等有关问题会议。出席的有：彼得罗夫少将和雅科维茨上校(战俘管理总局)、乌布利希、比安科、拉科西、柯普勒尼希、波克、费奥斯特林、贝洛夫、反法西斯战俘学校校长杨增。

彼得罗夫少将通报了战俘死亡率异常高的原因、为医治战俘所采取的措施、建起的医院以及在战俘中(特别是在反法西斯学校)开展政治工作的可能性。

经过详细讨论，讲清了所有问题并对今后工作达成了协议。

1943年4月13日

波克谈有关罗马尼亚政府发动成立农业联合社共同(用拖拉机等)耕地的运动。我提议应把罗政府的这些措施看做是掠夺农民的土地，是地主对农民进行奴役。在新的形式下恢复农奴制，其目的是继续进行希特勒的战争。

.....

1943年4月16日

……

接见了内斯托罗夫(海上舰艇)——我就我们系统在蒙古共和国的工作(有关同中共的联系)作了指示。

1943年4月19日

接见女作家克拉拉·布鲁姆。我向她解释她近期没有可能去中国。中国的同志们不知道她的丈夫在何处。关于工作事,我建议她与红军政治部商定。

给戈杜诺夫(一处)作指示。他将去重庆从事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系。

1943年4月20日

普利舍夫斯基、远东方面军政治部七处和外贝加尔军区一些领导人来我处。就有关在中国、朝鲜以及其他部队中开展工作和准备在日本对苏联作战时在日军开展工作事向我咨询。他们还要求我们的人去做这项工作。

……

1943年4月24日

米罗夫和格里奥谈关于《共产国际》杂志第四期的内容;许多文章的修改;选定下期双月刊目录。从本期撤下拉科西的文章重新加工、修改。对爱尔科利的文章我作了一些重要修改,主要是不要过分夸大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孤立,而且不要把事情想像为似乎整个资产阶级都转而反对墨索里尼。

1943年4月29日

全斯拉夫群众大会(1943年5月9日)的准备工作。奥斯米宁(斯拉夫委员会)、弗里德里希、什维尔玛、捷尔任斯卡娅、纳坦松、弗拉索夫。审核了大会的文件草案:

(1)致各斯拉夫人民呼吁书;

(2)为反对法西斯图谋消灭斯拉夫人致文明世界呼吁书。我

对这两个文件的修改作了指示。

……

1943年5月8日

当晚,与曼努伊尔斯基一道去莫洛托夫处。就共产国际的未来进行了商讨。得出结论是:在已形成的条件下,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要制定一个解散这个中心的文件。

1943年5月10日

晚上,曼努伊尔斯基来。讨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文件内容。

1943年5月11日

与曼努伊尔斯基校订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草案。

我将这个草案发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当晚和曼努伊尔斯基去斯大林处(莫洛托夫在座)。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草案。讨论了如何通过决议。谈到了下列程序:

(1)草案在主席团会议上审核并作为向各支部的建议予以通过;

(2)通知各支部并取得它们同意;

(3)得到各支部同意后予以公布。

哪些职能和在什么形式下今后还应继续存在——这一问题交由马林科夫和我去讨论并准备出具体的建议。

就此,斯大林说:经验表明,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这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和现在都已显示出来。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域性的联合,例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但是这也不要急于行事……

1943年5月12日

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介绍了决议草案。

马尔蒂、多列士和多洛雷斯、皮克、乌布利希、柯普勒尼希、拉

科西和什维尔玛。

波克、莱赫蒂宁、弗拉索夫、科拉罗夫、沃尔夫。

大家认为，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的，关于解散作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建议，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

决定明天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决议草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准备把决议草案送：波立特（通过费丁）。

还通过我们这条线送：毛泽东、铁托、芬德尔、杜克洛、白劳德（给拉丁美洲）、林德罗特（瑞典）。

1943年5月13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多列士、马尔蒂、多洛雷斯、皮克、乌布利希、柯普勒尼希、拉科西、什维尔玛、沃尔夫（青年共产国际）、科拉罗夫、波克、莱赫蒂宁、弗拉索夫、曼努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作为翻译——斯捷潘诺夫和费恩贝格。

我在报告中对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作了说明和论述，之后，主席团会议的所有参加者均依次发言。一致通过将这个草案作为决议的基础。交主席团所有委员和参加会议的各国党的代表在5月17日以前的期限内全面考虑草案内容并对草案作出可能的修改、改动和补充。

主席团开会之前我收到斯大林的如下通知：

“（1）这件事你们不要急。你们把草案提出来讨论，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两三天时间进行考虑并作出修改。他也有几点修改意见。

（2）草案现在暂时不要送往国外。我们以后会作出决定。

（3）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简直是在赶这些外国领导同志走。这些人将在一些报社工作。应该办四种报（德文、罗马尼亚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也可建立单独的德国人的和其他国家人的反法西斯委员会。”

1943年5月14日

校订了主席团的会议记录。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各发送一份记录。

给马林科夫送去了关于一处(联络和其他工作)、经济业务管理局、对各国进行广播的广播电台和通讯社的材料(为当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问题进行讨论时用)。

.....

1943年5月1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第二次内部会议。

对决议草案逐条地进行了分析研究。作一些不太重要的修改。校订工作交编辑委员会进行,其成员是:多列士、皮克、多洛雷斯、曼努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还讨论了两种通过决议的方案:

(1)公布由在苏联的主席团成员签署的决议草案,以此作为向各国支部提出的建议,请他们予以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应预先通知他们,将要公布类似的决议。)

(2)将决议草案送各国支部讨论,征得他们同意后再作为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党的文件予以公布。

第一方案作为更合适的方案得到通过。

给马林科夫送去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问题所需的补充材料。

1943年5月18日

编辑委员会会议。参加者:皮克、多列士、多洛雷斯、曼努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

校订了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对决议作出的修改。

全部得到一致批准。

与曼努伊尔斯基一起校订了昨天主席团会议的记录,记录附有个别同志发言的简短录音。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发去：

- (1)1943年5月17日主席团的会议记录；
- (2)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
- (3)决议草案，并注明须要修改的地方。

1943年5月1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部会议。

讨论了与共产国际解散有关的一些组织问题：

- (1)对各国的无线电广播；
- (2)各国党的国外局；
- (3)保持与国外的联系；
- (4)通讯社“苏普列斯”；
- (5)档案、图书馆、党校及其他。

所有这些职能都应以某种形式予以保留。在新的条件下这些职能应按联共(布)中央的系统予以安排。

当晚夜间在斯大林那里，在座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

斯大林对决议草案提出了某些修改意见：

- (1)最后一段不需要，删去；
- (2)要指出，解散的问题是在战争期间由一系列支部提出的；
- (3)在有关第一国际解散的那段文字中要强调，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是“由于建立群众性的各国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业已成熟”。

谈定：

- (1)要预先告诉各个支部，将会公布这样的决议；
- (2)决议应在10天后公布；
- (3)公布的决议要由主席团成员联共(布)由日丹诺夫和马努伊尔斯基签名；

(4)收到各个支部的中央批准该决议的决定之后，要发布主席团关于彻底解散的公报。

1943年5月20日

斯大林电话：“要不要今天将主席团的决议交去付印？要快一点公布。”

我给他解释，给各党的密码无线电通知我今天在白天、晚上和夜间发出。他们译出密码和研究决议内容不会早于明天的白天和晚上。在此之前公布是不合适的。应该在不早于明天晚上的时间交去付印，以便在5月22日公布。就这样说定了。

召集编辑委员会。通报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其他同志提出的对决议新的修改意见。

这些修改以及整个草案的最后文本都一致通过。

把决议交付译成德、法、英文和其他语种。

我交代费恩贝格、弗里德里希、格劳鲍弗，要他们关心翻译工作并将译文于5月21日夜间接发往国外。

1943年5月21日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我和马努伊尔斯基。

莫洛托夫宣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里宁指出，敌人会利用这个行动。最好是试一试将共产国际的中心转移到别的地方，例如：伦敦！（笑声）

斯大林阐述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现在，在战争条件下，当德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任务是打倒本国政府和执行使它们失败的策略的时候，而在苏联、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则是相反，他们的任务是完全支持本国政府争取最迅速地消灭敌人。

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

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

解散共产国际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在决议中并没有提到。敌人诬蔑各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是外国的间谍,这也有碍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手中的这张王牌就被打掉了。所采取的这个步骤无疑将巩固作为全国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同时也将加强以苏联为基地的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

一致通过了决议。

接着,就有关共产国际解散的某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当晚,我召集各处领导人开会,说明解散工作将是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而现在,他们要向处里工作人员讲清,应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1943年5月22日

《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根据我昨晚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各处均召开会议,就此问题作了说明。

……

1943年5月25日

米罗夫和格里奥关于杂志问题。对《共产国际》杂志最后一期的内容我作了指示。除刊登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外,还应由编辑部发一条消息,说此刊今后停止出版,同时对刊物在25年期间的工作作一个简短的回顾。

收到波立特的电报,说英国共产党中央赞同主席团的建议。

……

1943年5月28日

弗里德里希和费恩贝格谈对各国的广播;接待和安置从乌法搬迁来的各广播电台;等等。

米丁(“马恩列研究所”所长)讨论了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职能(相应的资料图书馆和档案,还有一些业务熟练的干部)移交给该研究所一事。

同时开始出版新杂志《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以取代《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和《共产国际》杂志)。

.....

1943年5月29日

.....

收到伦敦发来的如下明电: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季米特洛夫

我们赞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议,它是与反法西斯斗争中民族和国际团结的任务相适应的,我们保证将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争取加速对希特勒德国、它的盟国及附属国的胜利。

签名:波立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加拉赫(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杜德

约翰、坎贝尔、布拉德勒(均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

悉尼(澳大利亚)发来电报:

“致共产国际 季米特洛夫

澳大利亚共产党政治局一致赞同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曾指示党的各组织讨论此项建议并就此作出决定。我们相信,这项决定将会有助于加强澳大利亚的反法西斯阵线。我们号召加紧作战努力,给敌人以更多的打击,建立所有工人组织的统一阵线。

澳共书记 麦尔斯”

南斯拉夫来电:

“南共中央经过讨论,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以及提议中所阐述的论据。南共中央深信,这一历史性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即将在争取战胜人类公敌——

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巨大的成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南共已经成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党，它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领导着人民的解放斗争并以此赢得了南斯拉夫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同情。它不顾在争取南斯拉夫各族被奴役人民解放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付出的一切牺牲，将继续在马恩列斯旗帜下履行自己在人民面前应负的天职。南共仍将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南共中央总书记 铁托
政治局 兰科维奇、吉拉斯、卡德尔、
米卢廷诺维奇、莱斯科夫舍克”

昨天斯大林就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金所提有关共产国际解散问题，作出如下书面回答：

“我收到了你请求答复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的信。现将答复寄给你。

问：英国方面对于结束共产国际的决定予以好评。苏联方面对此问题及其对将来国际关系的影响有何见解？

答：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

解散共产国际之所以正确，是因为：

(1)揭穿了希特勒分子的谎言，他们说什么‘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从此以后，这种谎言就彻底破产了；

(2)揭穿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敌人的诬蔑，说什么各国共产党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来的命令行事。从此以后，这种诬蔑也彻底破产了；

(3)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一切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4)便于各国爱国者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联合成统一的国

际阵营,去同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

我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将使盟国和其他联合起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争取战胜希特勒暴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我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完全适时的,因为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必须组织爱好自由国家的共同进攻,以便彻底打死这只野兽,使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压迫。

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3年5月31日

去马林科夫处,同行有苏哈列夫、莫罗佐夫、费恩贝格、弗里德里希。解决与解散共产国际有关的组织问题。谈定:

(1)保留对各国的广播,对有关国家的广播交由相应国共产党国外局管理;

(2)保留“苏普列斯”电讯社,由联共(布)中央监管;

(3)保留联系服务处(电台联系、护照技术等),归属和管理问题待定;

(4)图书馆改为马恩列研究所分部;

(5)档案移交联共(布)中央;

(6)出版社继续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一个单独的出版社;

(7)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工作报告由联共(布)中央负责;

(8)经济实体移交联共(布)中央“文秘”局。

将收到的各国共产党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的通知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1943年6月2日

.....

夜间斯大林电话:“须要收到所有共产党通知之后才发表公报

吗？”他问。我回答说，因有些党将于6月7~8日召开代表会议，理应再等数日。就这样谈定了。

1943年6月4日

……

向法国、比利时、荷兰、美国、南斯拉夫、波兰、瑞典、中国发去如下密电：

“请紧急告知：

第一，中央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建议时，有无特殊意见，如果有，具体讲是哪些。

第二，地方上党的积极分子如何看待此建议。

第三，解散建议对党员群众和在同情者范围内有何影响。

第四，党内曾否出现过试图利用解散进行派别活动和瓦解活动的分子，如果有，是哪些，是何等人物。

第五，采取了哪些措施以使解散建议能在党内得到正确理解，并使那种把解散说成策略、假解散的敌对宣传不起作用。

第六，党做了哪些，以便向群众解释共产国际在其存在过程中，特别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战争贩子的斗争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诬蔑诽谤宣传给予反击。”

1943年6月5日

……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寄去新收到的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建议的通知。我告，将于6月8日召开主席团会议并拟于6月10日在工联代表会议开幕（今年6月13日）之前，发表关于各国支部业已通过的解散共产国际建议的新闻公报。

1943年6月7日

我校订了保共中央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所做决议的文本。

召开中央国外局会议，有其他保加利亚同志出席，讨论了决议

文本。一致通过。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各国支部通过解散建议的决定草案以及给报刊的新闻公报稿。

夜间莫洛托夫通知,斯大林和他同意我提交的草案。

1943年6月8日

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

(1)确定,所有(现在存在并有可能通知自己决定的)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没有任何支部对此建议提出异议。

(2)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秘书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解散。

(3)任命由季米特洛夫(主席)、马努伊尔斯基、皮克、爱尔科利和经济一业务局长苏哈列夫(秘书)组成的委员会,以具体处理共产国际的事务、机关刊物、机构及人员和产业。

(4)报刊上按此精神刊登新闻公报。

1943年6月9日

校订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告”,其内容为主席团为解散共产国际而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决定。把通告送《真理报》,6月10日公布。

米罗夫和格里奥谈最后一期《共产国际》杂志。我批准了本期内容并就解散共产国际有关材料的刊登顺序作了必要指示。

1943年6月10日

《真理报》公布了我们关于主席团1943年6月8日决定的通告。

诺根和霍多夫及其他人联共(布)中央文秘局来谈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的经济实体和档案向联共(布)中央移交的准备工作。我作了必要指示。

.....

1943年6月12日

处理共产国际善后工作委员会会议(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艾尔科里、皮克、苏哈列夫)。就委员会的工作交换了意见。拟订了某些决定草案,14日予以讨论。

晚间去斯大林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什切尔巴科夫)。讨论了关于成立“自由德国”反法西斯德国委员会的方案。基本通过。斯大林强调,需要给德国人指出有分裂和消灭德国的危险,只有推翻希特勒才能防止这一危险的发生。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同希特勒德国媾和。挽救德国免遭毁灭的斗争,争取恢复德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建立议会制度等——这些应当是德国爱国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任务。

决定联共(布)中央特设国际情报部,委其领导各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对各国的地下广播、同国外的联络、“苏普列斯”通讯社和外文书籍出版社。

为使敌人不能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这一事实,决定任命什切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定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

1943年6月14日

去马林科夫处。同什切尔巴科夫和马努伊尔斯基一起说明了国际情报部将如何具体地进行工作,以防止敌人借此说共产国际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的危险,并说明将赋予它怎样的职能。

……

1943年6月16日

曼努伊尔斯基来。我们具体拟订了“国际情报”部的职能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措施。

1943年6月17日

给马林科夫和什切尔巴科夫送去我们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移交给各党国外局的那部分职能之改组建议和以另外形式保存国外

联系和对各国广播的建议。

1943年6月18日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来。讲清了有关我们一些单位向其委员部移交以及给各党国外局向相应国家输送干部方面提供服务等一系列问题。

.....

1943年7月1日

去马林科夫处,什切尔巴科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往。谈定了部里的工作。我们保留下对各国广播、各党国外局、电讯社、外文书籍出版社、进行电台联系的电台中心。职能也在我们之间作了分配。一些基本职能分配给我,战俘问题分给马努伊尔斯基。

.....

1943年7月19日

去什切尔巴科夫处。最后确定了在罗斯托基诺今后将继续进行哪些工作。第一处的职能(改型)移交给“100 科学研究所”。对各国广播将作为“205 科研所”进行工作。图书馆将成为联共(布)中央图书馆分馆。经济职能由联共(布)中央“文秘”局承担。

“苏普列斯”电讯社问题留待同什维尔尼克商谈将其移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时解决。

德国人就共产国际解散事通过维希政权的报刊公布一系列伪造文件(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他的声明等),以竭力表明解散只是策略手腕.....

.....

1943年8月19日

伊利乔夫中将和博利沙科夫少将来谈关于向南斯拉夫和中国输送人员问题。

毛泽东的儿子在军事学院学习。

.....

1943年9月1日

关闭了我在罗斯托基诺的办公室。

今后我将在联共(布)中央领导罗斯托基诺各研究所的全部工作。

.....

(摘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①

(1960年7月14日、15日)

中央常委要我讲一下国际关系,主要是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我先概括地讲六点看法: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尽管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决定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所见,非常活跃。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说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但是这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需要,它在反法西斯和建立统一

^①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节录。

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这是对共产国际的一个粗浅的总评。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中国党的经验很丰富。中国党虽然犯过几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但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经验。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据我所了解,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断,拒绝国际提出的好的意见。陈独秀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断的。李立三同志也是这样,他提出夺取武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胜利的开始;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中国革命起来了,要苏联出兵;中国革命胜利,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都要濒于末日,世界革命就会起来。现在立三同志看一看这些话,他自己也会发笑的。

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在现在的情况下,成立国际组织,相互间总是不容易做到平等。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

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已经认识了,纠正了,革命已经胜利了。

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中国党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从遵义会议开始到七大,经过十年之久才解决了问题。一个党如此,何况国际?我们要举团结的旗帜。这主要是对于苏联千百万党员、两亿人民,各兄弟党的党员,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

下面分几个时期讲一讲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党很快地走到了群众斗争中去。这时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

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了。一九二〇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都讨论了东方革命问题。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去学习。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讨论了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发来了指示。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开三大。当时党内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帮忙，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根本没有提；一种以张国焘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只能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工人不能参加。实际上，这两种思想都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的四大的决议对这两种思想都批评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批评也没有重点。当时群众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但是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在关键问题上掌不好舵。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已经比过去嚣张得多，如西山会议派。但在此以前广东打商团，东征陈炯明等等，左派力量大大发展。当时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左派，排斥右派，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陈独秀却要让右派回去，并且要保证他们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结果右派的气焰高涨。在军事上，我们也让步。蒋介石进攻，我们党没有警惕，他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把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搞掉了一部分。当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力量，应该反击，但是没有反击。结果使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仅仅留下了一个独立团，这个团到了武汉发展成两个师。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出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

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会议,认为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到了武汉政府叛变之后,共产国际又认为,小资产阶级也离开革命了。在领导权问题上,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党已经起了领导作用。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这时列宁去世了,斯大林跟他们党内的反对派斗争很激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当时我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党的中心也应该在广东才好领导。但是党的中心在上海。请陈独秀到广东去,他也不去。两个中心常常发生矛盾。直到打下武汉很久,党的中心才移到武汉。所以,第一个时期还是中国党的领导人应负更多的责任。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还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当时党的领导人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不高,还有各种派别性,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更助长了派别性,这就影响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

(二)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来信。这封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对革命的任务,提出了七条:第一,退出武汉政府;第二,发表宣言;第三,不要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搞左派;第四,工人斗争;第五,武装工农;第六,党可能转入地下;第七,反机会主义。这七条,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没有重视,而当时恰恰应该是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

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联系到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这是仓促通过的。七月十三日中央有个声明，只提了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派了几个人来，在罗米那兹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反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务。张太雷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连写了几篇文章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后都离开革命阵营了，但是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处分。十一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参与指导广州暴动的有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苏联人。广州暴动失败，太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盲动主义在广东搞得最厉害，广东干部牺牲得最多。当时的路线，根本没有接受上海、南

昌、广州暴动的教训,仍然要到处搞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现在讲一下中共六大。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个工人,后来叛变的十六个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工作的人,一个是布哈林,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份,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会后,瞿秋白、张国焘留莫斯科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米夫做副校长,吸收了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干部和青年去学习,其中有王明这么一些人,还吸收了国民党的一些左派。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波兰同志和一个德国同志来中国。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

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第三种力量。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

我一九三〇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六个决议。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六月十一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沙,于是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九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向忠发和我做了报告,秋白做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向各地派“钦差大臣”,从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当时,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

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我们起草了决议,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

题的决议案的。四中全会也是根据这个决议案的,再加上国际的信,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作了决议。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评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健全了。实际上,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是批准了的。临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当时要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

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三) 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

这个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资本主义各国党处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乱。毛泽东同志九月一日有个《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

记者的谈话》，我把它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录自《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共产国际会议简介

第一次代表大会

时间：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开5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参加者：30个国家，35个政党和组织的52名代表，其中34名有表决权，18名享发言权。^①

中国代表：刘绍周（刘泽荣）。张永奎，享发言权。大会速记记录记载他们所代表的团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据初步查证，尚未见到资料说明当时旅俄侨民中有这样一个政党。^②当时刘绍周是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张永奎是该会莫斯科支会会长。^③

大会主席团：

列宁（苏俄）、阿尔伯特（即埃贝莱因·胡果）（德国）、普拉廷（瑞士），常务秘书：克林格尔（苏俄）。

大会下设资格审查委员会，由四人组成：阿尔伯特（德国）、契

① 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党务出版社1933年版，第251页。1956年伦敦、纽约、多伦多英文版的《共产国际文件》（珍妮·德格拉斯编）中（第5—6页）记载，与会者有19个政党和组织的35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个组织的19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② 关于这个时期旅俄华侨中的组织可参见《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十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

③ 参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文史资料》第60辑，刘泽荣文《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第195—228页）。

切林(苏俄)、鲁德年斯基(匈牙利)、斯坦因(挪威)。^①

此次大会议程共 9 项,决议 13 种。没有直接涉及中国的决议。

第二次代表大会^②

时间:1920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6 日。共开 16 次会议。

地点:7 月 19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开幕式,开完第一次会议后,移往莫斯科。从 7 月 23 日开第二次会议至大会闭幕式,会址未再变动。

参加国和政党:37 个国家 67 个组织的 217 名代表。其中 169 名有表决权,48 名有发言权。

中国代表:刘绍周、安恩学(АнЕн-хак),^③所代表组织的名称:俄国共产华员局。^④

主席团:

列维(德国)、罗斯麦(法国)、塞拉蒂(意大利)、列宁、季诺维也夫(俄国)。

大会议程共 12 项。^⑤

大会下设 10 个工作委员会。中国代表刘绍周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大会讨论时发言。

大会共作出 18 项决议。

① 资格审查委员会是在 1919 年 3 月 1 日举行的预备会上确定设立的。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 256 页。

② 本次大会前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共开 56 次会议(见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英文版第 1 卷,第 103 页)。

③ 见苏联《近现代史》杂志 1959 年第 5 期,第 139—140 页;《苏联的中国学》,1958 年第 4 期,第 21 页;《吉林大学学报》,1981 年第 5 期,第 30 页。

④ 见苏联《近现代史》杂志 1959 年第 5 期,第 139—140 页;《苏联的中国学》,1958 年第 4 期,第 21 页;《吉林大学学报》,1981 年第 5 期,第 30 页。

⑤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34 年版,第 467 页。《苏联大百科全书》“共产国际”词条,第 752 页。

东方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①

时间：1920年9月1日至7日。共开7次会议。

地点：巴库。

参加者：26个国家和苏俄东部各民族的代表计1891人。

中国代表：39人。^②

主席团共32人，有两名王姓的中国人当选。

大会议程共6项，通过5项决议。其中与中国有关的是：代表大会致东方人民书；土地问题提纲；东方苏维埃政权提纲。大会还决定建立东方人民行动和宣传委员会，为东方人民培训干部建立一所社会科学大学。^③

大会决定用俄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三种文字出版一个杂志《东方人民》（《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

中国代表王某^④被选入由47人组成的（其中共产党人34名）东方人民行动和宣传委员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

时间：1921年6月22日^⑤至7月12日。共开24次会议。

① 原拟每年举行一次这样的大会，但后来因种种情况未再举行。

② 这39人的姓氏待查。张西曼在《历史回忆》（上海东方书社1949年版，第21页）中说，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的代表有凌铨（前国会议员）、江亢虎（自命为中国社会党党魁）、贺衷寒”。关于凌铨，张在该书第5页说：凌是民国10年前经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柏烈伟（Лопевоў）介绍秘密赴苏俄的。

③ 《东方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0年彼得格勒版，第212页。

④ 这个委员会中设有共产党团和非党人士组，共47人。中国的王某系非党人士组。见《东方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19—220页。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原决定于1921年6月1日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1922年版，第3页。后因种种情况，会期推迟至6月22日。

地点:莫斯科,大剧院。

参加者:103个政党(其中有52个国家的48个共产党)和组织的608名代表。^①291名有表决权,其余享发言权。

中国代表:张太雷,杨好德。^②关于中国代表所代表的组织,大会速记记录中前后不一,一处是“左派社会主义党(享发言权),共产主义小组(享发言权)”^③;另一处是共产党代表、青年团代表各一人。^④

当时正在苏联的《晨报》记者瞿秋白也列席了大会。

到会旁听的还有肖劲光等当时赴苏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⑤

到会旁听的还有中国社会党人士江亢虎。江自己回忆说,他“无决议权,而有发言权”。^⑥

大会主席团:

主席:季诺维也夫。副主席:科拉罗夫(保加利亚)、詹纳里(意大利)、洛里欧(法国)、克南(德国)。

此次大会速记记录第3页记载,大会议程共15项,决议15项。大会议程中第14项为“东方问题”,但并未指定专门报告人,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共产国际”词条第753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94—498页记载参加国和地区为58个。代表总数为604人。珍妮·德格拉斯则认为出席大会的是48个国家的509名代表(见前引德格拉斯书第224页)。

② 尤登·诺特合著:《苏俄与东方1920—192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革命东方》,1928年第4—5期合刊,舒米亚茨基文;《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历史片断。纪念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第215—216页。

③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9页。

④ 同上,第497页。

⑤ 1979年11月《肖劲光回忆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合刊,第21页。

⑥ 《江亢虎讲演录》(一),第128—129页。

主要由东方国家代表发言。中国代表张太雷在讨论东方问题时，用大会规定的5分钟时间介绍了远东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对世界形势的影响和作用。张提请共产国际比过去更密切关注中国和远东。^①

大会的15项决议中没有东方问题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就中国问题作出专门决议。

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

筹备和发起：

1920年9月27日，即东方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不到20天，贝拉·库恩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提出在伊尔库茨克(当时的远东共和国境内)召开一次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俄文名称：Съезд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的建议。^②

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纳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建议，决定设立专门机构集中进行远东的工作，^③及

-
- ① 张太雷发言全文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72—473页。
- ② 台湾郑学稼认为召开此会的最初动议还要早些，即在(1920年9月1日至7日)东方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早在巴库会议时，国际执委会接受日本、中国和朝鲜急进者的意见，同意在西伯利亚某城市召开‘远东民族会议’。”见郑著《第三国际史》(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40页。有一点应说明，郑所指的“中国急进者”均系旅俄华侨，这时在旅俄华侨中已有一些共产主义组织并开展了活动〔详见《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文“十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但1922年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书是张太雷起草的。迄今未见张太雷同哪些‘中国急进者’的联系。
- ③ 在此之前，远东的工作(包括同中国的联系)是由1920年7月在伊尔库茨克设立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部负责的。这个部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前身。见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1920—1922年)”，载《远东问题》，1973年第1期，第137页。

“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①

1921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已参加和愿参加共产国际的各无产阶级组织”的信中提到,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议程第九项是“东方问题。此时,共产国际在东方人民中进行的工作已初见成效。巴库的东方人民代表大会无疑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在筹备中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也将发挥应有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将不象第二次代表大会前那样,仅仅从理论上考虑东方问题,而且要实际研究这个问题。没有亚洲的革命,就不可能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个思想应该为每个无产者——共产党人所掌握。只有这样,工人——共产党人才能从思想上充分武装起来,去反对希法庭先生们和第二半国际英雄们的‘欧洲’机会主义,这些人满脑子装的是对东方被压迫人民的蔑视”。^②

至此,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宗旨应已十分清楚了。那种认为此次大会主要是针对华盛顿会议而开的说法,恐怕是不够全面的。

1921年春来到伊尔库茨克的张太雷,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致朝鲜、中国、爪哇、蒙古等国人民的邀请书。^③

1921年8月张太雷(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又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赴日本东京,邀请日本代表。“接受邀请的有吉田一和田轨一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德田球一(水曜会)、铃木本茂三郎(《读卖新闻》记者)、高漱清(晓民会)。”^④

① 在此之前,远东的工作(包括同中国的联系)是由1920年7月在伊尔库茨克设立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部负责的。这个部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前身。见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1920—1922年)”,载《远东问题》,1973年第1期,第137页。

②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页。

③ 详见苏联《革命东方》1928年4—5期合刊,第225—226页;1922年7月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25号)。

④ 郑学稼:《第三国际史》(上),第640页。

1921年8月2日,俄共(布)负责远东工作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消息报》撰文介绍他的西伯利亚之行。威廉斯基奉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之命访问了远东,了解到远东人民的情况及他们对苏俄的态度。他认为,提出召开一次有中、蒙和其他远东国家及苏俄参加的东亚会议的时机现在到了。这个会议应代表远东人民利益,对抗那些策谋华盛顿会议的贪得无厌的人。

1921年8月已知帝国主义决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但没有邀请苏俄参加。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国家也不可能派出代表参加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会议。

192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Малое Бюро)决定在1921年11月11日召开“远东人民代表会议”(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小局并在此次会议上决定让片山潜回莫斯科。^①

1921年10月底11月初,各国代表陆续抵达伊尔库茨克。在那里开过分组(中国组、日本组、朝鲜组、蒙古组)会议,商讨与会议有关的各种问题。

1921年12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不迟于1922年1月1日正式举行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式。^②这实际上推迟了开幕日期。

1921年1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最后决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开会并选出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③

1922年初代表们离伊尔库茨克,乘车西行赴莫斯科,9天后到达。

① 《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活动》,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152、154页,转引自《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5期索尔金文“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314、379页。

③ 同上书,第314、379页。

议程：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国际形势和华盛顿会议的总结”。报告人：季诺维也夫；

2. 各国代表发言：

〔在大会上发言的中国代表有张国焘、张秋白、黄壁魂、邓培、于树德、杨潘潘(音)、孙(音)、平敦(音)、黄焕庭等〕

3. 报告“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的问题”。报告人：萨法罗夫；

4. 大会致远东人民宣言。

大会选举以下5人为名誉主席。

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片山潜、斯大林。

大会主席团：

萨法罗夫(苏俄)、田口(日本)、张秋白(中国)、张国焘(中国)、尼志、贝拉·库恩(匈牙利)、罗易(印度)。

主席团秘书：舒米亚茨基。^①

大会决议：

1922年2月2日大会通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致远东劳动人民的宣言”^②。

本次大会共有5个国家的148名代表参加，其中131名有表决权，17名享发言权。列席大会的有莫斯科劳动人民代表和彼得格勒工农代表(参加1922年2月2日闭幕式)。

中国代表团情况：

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为筹组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团进行了大量工作。尤其应指出的是张太雷的活动。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舒米亚茨基介绍，在会议筹备期间，张太雷表现了一个组织

^① 《真理报》，1922年1月24日。

^② 《真理报》，1922年2月9日。

者非凡的能力和才干。“他自己考虑了〔代表们应走的〕路线,确定了接头地点……象一个优秀指挥官,给赴会代表指出了突破封锁线的路线……”^①

中国代表团共 44 人,其中 39 名有表决权,5 名有发言权。代表团几乎包括了各阶层的人物。团长为张国焘。现已查明的代表有:瞿秋白(《晨报》记者),邓培(唐山工人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蔡和森,黄壁魂(南方国会议员,作家),张秋白(孙中山代表),王乐平(国民党员),蒋伏生(国民党员)^②,王全(王复元,后叛变共产党),王光辉(湖南劳工会代表)^③,贺衷寒(新闻记者)^④,于树德,陈公博,王尽美,邓恩明,高君宇^⑤,柯庆施,林育南,黄焕庭,卜士奇,杨潘潘^⑥(音,北京铁路职员),孙(音)^⑦,平敦(音,又作林敦、平童)^⑧,王天池(音)^⑨,朱务善^⑩,朱枕薪,梁鹏万^⑪,蒋光慈^⑫,夏涛声和黄超海〔凌霜〕^⑬。

据肖劲光同志回忆,他本人和任弼时是大会工作人员,瞿秋

- ① 叶菲莫夫:《张太雷——中国革命的英雄》,载《远东问题》,1973 年第 3 期,第 219 页。
- ② 郑学稼:《第三国际史》(上),第 640 页。
-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 184 页。
- ④ 《传记文学》第 34 卷(合订本)第 5 期。
- ⑤ 《中国青年》,第 72 期(1925 年 8 月 28 日出刊),第 331 页。
- ⑥ 《真理报》,1922 年 2 月 2 日。
- ⑦ 《真理报》,1922 年 2 月 4 日;《远东劳动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第 204 页。
- ⑧ 《真理报》,1922 年 1 月 26 日;同上书,第 49 页。
- ⑨ 《真理报》,1922 年 1 月 26 日。
- ⑩ 《中国现代史》,莫斯科 1983 年版,第 106 页。
- ⑪ 梁原系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1934 年被捕后出卖地下党组织,1937 年充当日本特务,1945 年加入国民党,1951 年被人民政府处决(见刘建才文,载《党史研究资料》,1984 年 9 月 20 日出刊,第 9 期第 29 页)。
- ⑫ 斯拉德科夫斯基:《中俄苏·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2 页。
- ⑬ 前引郑学稼书(上)第 640 页说夏、黄二人不能出席大会,因黄是无政府主义者。

白、李宗武给大会作翻译。^①

中国社会党江亢虎也列席了大会开幕式。^②

关于此次大会的名称各书刊提法不一。《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4卷第702页称这次大会为“远东各国劳动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称之为“远东劳动人民大会”(见第47卷,第9页‘瞿秋白’词条)；1927年中国出版的《广州》杂志第1期载卡拉切夫(即纳乌莫夫)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史纲》中称之为“远东人民代表会议”(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威廉斯基在《消息报》(1921年8月2日)撰文时用了东亚人民代表会议(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这个名称；1959年莫斯科版《中国现代史纲》称之为“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国书刊叫法也不一,《向导》第九期开始载萨法罗夫讲话时用的是“远东民族大会”,其他书刊多半称“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组织(或团体)第一次(有的书无这三字)代表大会”。

产生上述名称混乱的原因,主要是1920年9月开始至1922年大会开幕前和开会期间所使用的名称不同。单是《真理报》一家就先后使用了不下5个名称。

如1922年1月13日该报称即将召开的这次会为“远东革命政党和共产党代表大会”,而1922年1月22日报道大会开幕时,报上出现了“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的标题,但行文内却称此会为“远东劳动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而2月9日登载宣言时又用的是“远东共产主义组织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闭幕之后,彼得格勒出版了此次大会的部分速记记录,书名是《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

苏联研究此问题的人,近十几年来趋向一致,都用这个名称。

① 肖生、高军、胡庆云1980年访问肖劲光的记录。已经肖本人审阅。

② 江亢虎:《新俄游记》,第102页。

依笔者拙见,据大会召开的背景,大会代表的身份和代表们发言的内容看,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Съезд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较合适。

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会^①

时间:1922年2月21^②日至3月4日。共开17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36个国家的105名代表。

此次全会无中国代表参加。

据贝拉·库恩与比尔曼合编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莫斯科1932年版,第260页),本次全会共28项议程。1922年2月22日《真理报》所载全会议程与前引书略有不同。

全会下设9个委员会,其中有东方委员会。但全会的7项决议中并没有东方问题的决议。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直到此次全会开会时,共产国际仍然把注意力集中于西方和欧洲各党,称德、法、捷、意、英、美、波兰、巴尔干支部为“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支部”。^③

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

时间:1922年6月7日至11日。共开7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27个支部的60名代表,其中50名享表决权,10名有发言权。

① 本次全会资料据1922年2月22日—26日、28日—3月7日的《真理报》整理。

②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国际社会历史评论》发表卡汉整理的57张表中将该次会议时间标为2月24日。据汉堡1922年版《共产国际反对资本进攻的策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2年2月24日—3月4日)扩大全会报告》。

③ 见《真理报》,1922年2月22日。

中国代表团情况待查。从当时的《真理报》上未见到中国代表发言。

全会主席团：

季诺维也夫、蔡特金、弗罗萨尔。^①

全会议程共 13 项。全会下设 5 个委员会。

全会决议 7 种，无直接关涉中国的内容。^②

第四次代表大会

时间：1922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5 日。共开 32 次会议。

地点：彼得格勒、莫斯科。^③

参加者：58 个国家的 408 名代表。其中 344 名有表决权，65 名有发言权。

中国代表团：陈独秀、刘仁静。陈独秀任团长，但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刘仁静。瞿秋白作为大会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主席团（据季诺维也夫提议组成）共 13 人。没有中国代表。

大会议程共 23 项，下设 8 个工作委员会，^④其中有东方问题委员会。陈独秀参加了东方委员会的工作。

① 见《真理报》，1922 年 6 月 8 日。

② 此次全会资料可参见贝拉·库恩等合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22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13 日的《真理报》以及《国际新闻通讯》第 2 卷第 716 页（1922 年 6 月 17 日）。

③ 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决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期赶在十月革命 5 周年的纪念活动期间，故大会开幕式于 11 月 5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与会代表在开幕式后于 11 月 7 日参加了纪念活动，后到莫斯科继续开会。中国代表团未赶上开幕式，所以未去彼得格勒（见刘仁静文：《回忆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81 年第 4 期，第 3 页）。

④ 见 1922 年 11 月 9 日《真理报》和 1923 年汉堡德文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26—28 页。但贝拉·库恩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292 页）认为大会下设 20 个委员会。从大会决议和发言内容看，贝拉·库恩之说也不无道理。

大会共作决议 18 项,其中有《东方问题总提纲》,这是共产国际首次直接就东方问题作出专门决议。

大会选举产生的新执行委员会,由 32 人组成,中国代表未当选。

执行委员会全会^①

时间:1922 年 12 月 6 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后的第二天)。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执行委员会全体(32 名)委员和彼得格勒工人等。

会议内容:

1. 确定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克拉拉·蔡特金、布哈林、拉狄克、科拉罗夫、詹纳里、库西宁、片山潜、什麦拉里、马克一马奴斯;法国共产党选出两人:苏瓦林,弗罗萨尔;

2. 选举总书记和书记。结果:总书记:科拉罗夫;书记(共 5 人):皮亚特尼茨基、什特克尔、扎因斯特、库西宁、拉科施;

3. 选举由 5 人组成的组织局;

4. 选举蔡特金为妇女书记处主任;

5. 确定由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继任《共产国际》杂志总编,选举什特拉塞尔为编辑部秘书;

6. 设立“行动委员会”,与红色工会国际共同组成该委员会,以领导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的活动,也可举行这两个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7. 选出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

8.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备锦旗一面,赠莱比锡工人兄弟,委托蔡特金转交。^②

^① 这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新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会议。

^② 此次全会资料据 1922 年 12 月 7 日《真理报》整理。

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

时间:1923年6月12日至23日。共开17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参加者:36个国家的105名代表。

此次全会无中国代表参加。

大会主席团(共13人)

主席:季诺维也夫。成员(共12人):托洛茨基(俄国),蔡特金、贝特赫尔(德国),季鲍(法国),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詹纳里(意大利),加拉赫尔(英国),特兰麦尔·希格隆德(斯坎的纳维亚),阿姆特尔(美国),科拉罗夫(巴尔干),罗易(印度),片山潜(日本)^①。

全会议程共10项,全会设4个委员会进行工作。最后作出18项决议。未就中国问题专设议程,也没有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专门决议。^②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时间:1923年11月下旬。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主席团委员。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③团长蒋介石列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言。

此次会议据蒋介石之要求讨论了改组国民党的计划,最后由

① 代表东方国家。

② 此次全会资料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1923年6月12日至23日)》(莫斯科1923年版)一书整理。

③ 该团于1923年9月2日抵莫斯科,团员有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代表团访苏期间会晤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参观了红军、工厂和学校。11月25日、27日蒋介石应邀列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28日代表团一行归国。详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科拉罗夫签署了主席团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交蒋介石带回。^①

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②

时间：1924年6月12日。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31个国家的73名代表。

此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审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开幕日期。

第五次代表大会

时间：1924年6月17日^③至7月8日。共开31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49个国家的475名代表。代表了46个共产党、4个其他的工人党及10个国际组织。代表中计有表决权者358人，有发言权者143人。

中国代表团^④：团长李大钊，出席大会时用名琴华^⑤。现已查

-
- ① 关于此次全会情况可参见卡尔图诺娃编《加伦在中国》一书，黎东方：《蒋介石先生序传》；《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集》，莫斯科1966年版。
- ② 习惯上不把这次全会单独编为“第×次扩大全会”，因它近似一次普通的工作会或碰头会。
- ③ 执行委员会1924年3月30日会议决定于1924年6月5日举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将此日期通知中国共产党（见：中国共产党《党报》，1924年5月20日第3号）。后因故改期。
- ④ 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规定，中国共产党应有“代表四人”赴会（见前引《党报》）。1924年8月6日《真理报》也载明中国代表共4人，享表决权者3人，享发言权者1人。但《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卷第235页记载中国代表为五人。有发言权者2人，有表决权者3人。
- ⑤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卷第668页的“Чин Ха”显系 Чин Хуа〔琴华〕（第2卷第239页）之误。

实曾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代表还有：罗章龙、赵世炎、王荷波。

此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担任翻译工作的还有中国的黄平。1979年9月8日黄平来信说“我当时是李大钊报告的翻译”，代表大会之后“并陪他游列宁格勒”^①。这里所指翻译的内容，应是7月11日《真理报》刊载的中共代表团的声明，而不是李大钊在会上的报告。这个声明后来增补到7月1日的会议记录中去。

大会主席团共18人，季诺维也夫任主席。

其他成员：蔡特金；俄共(布)3人：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德国二人：台尔曼、盖什克；法国2人：特莱恩、谢利埃；意大利：博尔迪加；捷克斯洛伐克2人：什麦拉里、穆纳；巴尔干联盟：科拉罗夫；波兰：瓦列茨基；日本：片山潜〔当大会执行主席读完片山潜姓名时，会场爆发出掌声和“东方人民万岁”的欢呼声〕；罗易(印度)；斯图亚特(英国)；戴恩(美国)。

大会下设19个工作委员会。中国代表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情况是：Ванов(音：万诺夫)即罗文虎(罗章龙)的谐音，参加农民委员会工作；中国代表Петров(彼得罗夫)和Ванов参加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彼得罗夫参加宣传委员会工作，Люцика(音：刘奇卡)参加妇女委员会工作；罗文虎参加青年委员会工作；彼得罗夫参加日本委员会工作。

大会议程共33项。经过近40天的工作，作出决议34项。未就中国问题作专门决议。

大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委员43人(中国代表陈独秀^②当

①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平著《往事回忆》第9页载：“1924年……李大钊来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由我译成英文。”这里回忆不确切。因为李大钊未在大会上作口头发言。见前引本次大会速记记录第1卷第668页。

② 陈独秀未参加此次代表大会，但当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未与会者当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做法，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也有。

选)和候补委员 28 人(中国代表彼得罗夫当选)。

执行委员会第四次扩大全会

时间:1924 年 7 月 12 日至 13 日,共开两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31 个国家的 73 名代表。无中国代表参加。

议程共 6 项。

全会决议:即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本次全会在五大闭幕之后的第四天即召开,其任务就是受大会委托核准大会各项决议。

另外,全会据各项议程内容通过了相应决议。

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

时间:1925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6 日。共开 14 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共产国际 34 个支部的 244 名代表,其中 104 名有表
决权,140 名有发言权。

此次全会无中国代表参加。

全会共 10 项议程。

全会下设 9 个委员会,刚从中国回苏不久的伍廷康参加了殖民地委员会,与彼得罗夫一道以东方部的代表身份参与大会工作。^①委员会经过半个月的工作,共作出决议 12 项。未就中国问

① B. И. 格卢宁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伍廷康(魏金斯基)曾在此次全会第二次会议(1925 年 3 月 25 日)上发言谈中国问题(见《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 年版,第 285 页)。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1925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6 日)》一书未载伍廷康的发言。

题作专门决议。^①

执行委员会 1925 年 4 月至 1926 年 1 月间的会议^②

此期间执行委员会共开 3 次会议,讨论了 37 个问题。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开会 24 次,讨论 130 个问题。

执行委员会组织局开会 12 次,讨论 49 个问题。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书记局开 59 次会议,讨论了 973 个问题。

讨论过 4 个中国问题。但具体内容尚待查实。

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时间:1926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15 日。共开 20 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32 个国家的 130 名代表,其中 77 名有表决权,53 名有发言权。

中国代表团:胡汉民(国民党代表),苏方(音,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代表),陈金佑(音,上海纺织女工),蔡和森。^③

全会主席团共 23 人,中国代表苏方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全会选举产生由 9 人组成的书记处。无中国代表当选。

全会议程共 6 项。

全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时,有苏联沃龙涅什省女工人和女农

①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1925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6 日)》,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5 年版,第 30 页。

②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 年 4 月至 1926 年 1 月)》,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6 年版,第 12 页。

③ 中国代表团的这几个人,只是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15 日》(速记记录)一书(1927 年版)所载曾在会上发过言的人。中国代表团的实际人数尚待查实。

民的代表在场,她们前来向中国上海女工代表陈金佑(音)赠送红旗,表示苏联工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斗争的支援。陈致答辞。

全会于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10个工作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工会委员会;东方委员会;英国委员会;法国委员会;美国委员会;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组工作委员会。

东方委员会内又设立“中国分委员会”(或称中国组)。

从共产国际创立至本次全会,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并未公开化。

全会历时28天,作出决议13项。第十二项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会首次就中国问题作出全面决议。^①

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时间: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开28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各国代表191名,其中100名有表决权,其余享发言权。

中国代表:谭平山(共产党),邵力子(国民党),向警予。^②

全会主席团共21人,布哈林任主席。中国代表谭平山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议程共7项,其中第四项是“中国问题”,报告人:谭平山。实

① 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整理。

② 中国代表的总人数和姓名不详。

际上全会还有第八项内容,就是“关于共产国际的主席制问题。”^①

全会下设 9 个委员会,其中第二个是“中国委员会”。

决议共 12 项。其中第五个决议是《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此次全会上,中国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并引起了激烈争论。全会专门设立了中国问题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曾在会上多次发言。他在 11 月 29 日第十一次会议上向全会提交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详细书面报告。斯大林 1926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委员会发言,他说,他的发言对于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将同时带有批判性质”(见《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321 页)。后谭平山又于 1926 年 12 月 15 日代表中国委员会发言。^② 全会工作期间虽然中国委员会收到两个报告和 4 个提纲草案,其内容和观点却存在很大分歧。全会于 12 月 16 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基本是以斯大林的观点为基调的。

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

时间:1927 年 5 月 18 日至 30 日。共开 17 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国:25 个国家的 71 名代表,其中 33 名有表决权,38 名有

① 这次全会开会前夕即 11 月 21 日,季诺维也夫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称“据共产国际几个最大支部领导机构的决议,我请求解除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及目前在共产国际中担任的一般工作”。次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台尔曼宣读了季诺维也夫的信,并作出决定,同意了季诺维也夫的要求。从此季诺维也夫不再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所以这次主席团内也不包括季诺维也夫(见《世界革命之路》第 1 卷,1927 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版,第 14—15 页)。此次扩大全会由布哈林致开幕词。这次全会决定废除组织部和书记处,只设政治书记处(还可参见《国际新闻通讯》第 6 卷第 2522 页)。

② 谭的书面报告及发言见《世界革命之路》第 1 卷,第 395—420 页;第 344—345 页。

发言权。

中国代表：楚古诺夫。^①

议程共 10 项，第二项是“中国革命问题”。

全会下设 3 个委员会：第二个是“中国问题委员会”。

全会共作 4 个决议，第二个决议是《中国革命问题》。至今尚未见到此次全会速记记录的全文，据 1927 年 5 月 31 日《真理报》可知《中国革命问题》决议系据布哈林报告所作。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

时间：1927 年 9 月 27 日。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主席团成员和监察委员会成员。

会议内容：议程待查。从现有材料知中国问题及由此问题而引起的联共党内的争论占主要位置，因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发言都较多地提到了托洛茨基和反对派。^②

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③

时间：1928 年 2 月 9 日至 25 日。共开 9 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27 个国家的 92 名代表，其中 44 人有表决权，48 人有发言权。

中国代表：向忠发，李震瀛。

主席团共 26 名委员，中国向忠发当选为委员。候补委员共

① 在这次全会上发言的一名中国代表用的是这个名字。据前引卡汉第 34 号表知这次全会后选出的主席团有谭平山。也许楚古诺夫就是谭的化名。

② 此次会议材料据《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 41 期整理。

③ 迄今未见这次全会速记记录全文。有关资料数据可见《共产国际的十年》，第 327—328 页。

9名。

议程共9项,其中第三项为中国问题。

全会下设4个委员会,第一个即中国委员会。

经过16天的时间,全会通过9项决议,第五项系中国问题决议。这个决议是由出席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布哈林、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联合拟定,然后向全会提出的。1928年2月25日全会通过此决议,1925年2月28日《真理报》刊载了决议全文。

第六次代表大会

时间: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开40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57个国家,65个团体(其中有50个国家的共产党)的515名代表,其中38名有表决权,151名有发言权。与会的政党中有两个非共产主义政党(蒙古人民工党和爱尔兰共产主义小组)和8个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党团、农民国际、国际工人救济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体育国际等)。

中国代表团:共31人,其中20人有表决权,11人有发言权。因中国代表均用中文或外文化名,现尚不能一一确定姓名。中国代表名单:

有表决权的代表是:

| | |
|-------------------|-------------------|
| Чен Куан 陈广〔周恩来〕 | Чан Чун 常纯(音) |
| Ян Чен 杨成(音) | Ли шен 李申(音) |
| Шу Шао-чен 苏兆征 | Тао Чи 陶其(音) |
| Чанг Биао 张彪〔张国焘〕 | Шао Ше 邵舍(音) |
| Ван Шен 王生(音) | Ту Та-куай 屠大奎(音) |
| Чан Чен 常成(音) | Нао Мей 那梅(音) |
| Шю Ен 舒英(音) | Ю Фей 于飞(音) |

| | |
|--------------------------|---------------------------------|
| Ван Чан 王长(音) | Страхов(Цюй Витор)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 |
| Ен Шен 叶申(音) | Пионер 少先队员〔关向应〕 |
| Ван Чи 王琪(音) | Ма Тао-чин 毛涛青(音) |
| 有发言权的代表： ^① | |
| Тан Чин 唐青(音) | Тин 秦 |
| Ю Шен 于生(音) | Лиан И-це 梁怡采 |
| Чай Та-че 柴达奇(音) | Ван 王(音) |
| Ван Фу 王夫(音) | Ден Е-чао 邓颖超 |
| Немцев ^② 涅姆采夫 | Воровский ^③ 沃罗夫斯基(音) |

Хо 郝(音)

曾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Чжоу Сяо-мэй(周小妹，音)^④，

Лю Ян(刘阳，音)^⑤，Петрашевский 彼得拉舍夫斯基^⑥。

经初步查证，中国代表团团长为瞿秋白，副团长王若飞。成员

- ①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名单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卷，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9年版，第153—154页。
- ② 即王若飞。据军事科学院前顾问吉合同志(曾用俄文名 Тихонов, 1983年1月病故)1979年4月来信。
- ③ 即黄平。据1979年9月8日黄平来信。
- ④ 曾在第三十四次会议发言，内容见本资料第1辑471—474页。庄东晓同志(1928年初)作为我党交通，带领参加国际六大的代表前往莫斯科。1981年笔者在广州访问她时得知，她当年带领去莫斯科的是周秀珠(上海纺织工人)，因周年轻，人称周小妹。Чжоу Сяо-мэй的音与庄东晓同志所提供的情况是一致的。但据大会速记记录第4卷(206页)行文判断，此人应是男性。所以，还不能轻断 Чжоу Сю-мэй 就是周秀珠。
- ⑤ 曾在第三十五次会议发言，内容见本资料集第1辑480页。
- ⑥ 曾在第四十次会议上发言，见本资料集第1辑554—555页。但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卷第153—154页为何未开列以上3个人的名字，尚待进一步研究。

有：周恩来、张国焘、苏兆征、李光(音)、关向应、李震瀛、刘伯承^①、黄平、余飞、邓中夏、周秀珠。

中国代表李光(音)和瞿秋白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张彪当选为候补委员。

大会议程共 17 项，其中与中国有关的是：

库西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报告；埃尔科利、萨敏的副报告；西坎德尔—苏尔和斯特拉霍夫(瞿秋白)的副报告；洪贝尔—德罗的副报告，库西宁的总结发言，表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提纲；中国代表团的声明。

大会决议共 22 项。其中与中国有关的是：

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决议；

致中国工人和劳动人民书；

就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双周日活动致全世界工农的呼吁书等。

大会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由 59 人组成，中国代表瞿秋白当选；

执委会候补委员 43 人，中国的李光^②(音)、张彪(张国焘)、陈广(周恩来)^③当选。

国际监察委员会由 22 人组成，中国的许云(音)、陈承(音)当选。

① 陆定一同志(1979年7月18日)信和吉合同志(1979年4月)信均写刘伯承同志的俄文化名为Афанасьев(阿法纳西耶夫)，但大会速记记录第5卷153—154页未见此名，此次会上刘伯承同志用名尚待查证。

② 本资料集第1辑第357、384、414、601页的李光之后应有“(音)”字样，当时在李光之后注明“滕代远”是错误的，因国际六大开会时，滕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国内协助彭德怀同志组织和发动平江起义。滕用“李光”的化名是30年代的事。

③ 本次大会速记记录第5卷第140页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29卷第184页记载略有出入，后者载周恩来同志在六大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而不是候补委员)。另经查实，周恩来同志在六大用名是陈广，而不是陈宽，故本资料集第1辑第398、418、605页的陈宽均应改为陈广。

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

时间:1929年7月3日至19日。共开21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30个国家的108名代表,其中36名有表决权,72名有发言权。

中国代表:瞿秋白(会上用化名 Цюй Вито 屈维它),^①Лот ин (洛特因)^②,余飞,蔡和森。^③

全会主席团选举库西宁任主席。其他12名委员是:

贝尔(英国),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埃尔科利(意大利),科拉罗夫(保加利亚),库西宁(芬兰),连斯基(波兰),曼努伊尔斯基(苏联),莫洛托夫(苏联),谢马尔(法国),斯大林(苏联),台尔曼(德国),屈维它(中国)。

张彪当选为候补委员。

关于本次全会的议程,在贝拉·库恩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876页所列为6项,而1929年7月3日全会开幕之日,库西宁代表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大会宣布的日程略有不同。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④

时间:1930年2月18日至28日,共开16次会议。

① 他又是本次全会后选举产生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成员(见前引卡汉第42号表)。

② 中国人民大学编《第三国际》(1956年版)一书,把这个名字定为陆定一。1979年陆定一同志来信否定了这一点。

③ 是否还有其他中国代表参加,尚待进一步查实。

④ 此次全会情况详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1930年2月18日至28日)决议》,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30年版;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915—931页。

地点:莫斯科。

议程共4项,经过10天工作共作出6项决议。没有为中国问题设专项议程,也未就中国问题作专门决议。

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

时间:1931年8月26日至4月11日,共开25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25个国家的180名代表,其中50名有表决权,130名有发言权。

中国代表:(已知)黄平、刘湘^①、张平(音)^②、王勤勤^③。

全会主席团:共13人,中国代表黄平被选入执行委员会主席团。^④

本次全会议程共3项,决议10项,没有为中国问题设专项议程,也没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专门决议。

1931年4月15日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选举产生政治书记处共13人,中国代表黄平当选为书记处书记。

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

时间: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共开32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中国代表:王明,洛发(音,中国红军代表),王宸宸(音)。

-
- ① 即刘少奇(见格里戈里耶夫《1928—1931年的中国革命运动》,莫斯科1981年版);又王光美同志证实此次全会刘少奇同志用刘湘的化名。
- ② 曾于第十四次会议(1931年4月3日上午)任执行主席(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速记记录)第1卷,第426页)。
- ③ 曾在第三十二次会议(4月9日晚)发言(见上引书第2卷,第109页)。
- ④ 主席团于全会闭幕后四日(4月15日)举行会议,选举由13人组成的政治书记处,黄平当选(见前引卡汉书第44号表)。

主席团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斯大林，契莫丹诺夫，洛佐夫斯基，阿诺特，波利特，科拉罗夫，苏（音，中国），王明，哥特瓦尔德，古特曼，库西宁，加香，多列上，兰斯麦尔，蔡特金，库恩，艾尔科里，加兰奇，片山潜，普罗契尼亚克，西伦，福斯特。

全会议程：

1. 库西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任务的报告。
2. 台尔曼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的教训的报告；连斯基、哥特瓦尔德的补充报告。
3. 冈野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人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对苏军事干涉中的任务的报告。

4. 曼努伊尔斯基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全会决议：

全会就第一、二、三项议程作出相应决议。

据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致联共（布）和苏联劳动人民书》。

另外，全会审查了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提交的 1931 年度财政报告并作出两项决定。^①

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

时间：193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2 日。共开 25 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中国代表：王明、康生。

主席团成员：皮克，台尔曼，季米特洛夫，白劳德，艾尔科里，哥特瓦尔德，科普林宁，贝拉·库恩，库西宁，连斯基，曼努伊尔斯基，

^① 此次全会资料据苏联党务出版社 1933 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速记记录）第 1—3 卷整理。

冈野进,皮亚特尼茨基,波利特,里赫特尔,多列士,契莫丹诺夫,王明,西班牙共产党代表一名(共20人)。

开幕式由皮克主持。

全会议程:

1. 库西宁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共产党任务的报告。

2. 某些党的报告:皮克同志关于德国共产党活动的报告;波利特同志关于英国统一战线策略的报告。

3. 皮亚特尼茨基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①

此次全会未就中国问题作专门决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长篇报告。

第七次代表大会

时间: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开23次会议。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全世界57个共产党的510名代表,共代表世界上314.1万名党员。

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代表团成员:吴玉章^②,周恩来,宋一平,刘光梯,李光,孔原,赵毅敏,高自立,周和生,欧阳钦,卢竞如,潘汉年,林育英(张浩),冯铨,陈潭秋,饶漱石(梁朴),吴克坚,孟庆澍,曹轶欧等。

大会共6项议程。

会议开始时设两个委员会。会议期间又据主席团提议临时设

^① 此次全会资料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4年版(1936年核定本)整理。

^② 会上用名王荣,李新同志告知,有时也写为“王永”。

立3个委员会,负责就季米特洛夫、埃尔科利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起草决议。

大会决议共6项。没有就中国问题作专门决议。

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构如下:

执行委员会(共46名委员,毛泽东^①、周恩来、王明、张国焘当选。候补委员33人,博古、康生当选);

国际监察委员会(共20人,中国周和生当选);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共19人,王明当选。候补委员12人,康生当选);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共7人:季米特洛夫(总书记),埃尔科利,曼努伊尔斯基,皮克,库西宁,马蒂,哥特瓦尔德。候补3人:莫斯科文,弗洛林,王明。^②

执行委员会全会^③

时间:1935年8月21日(七大闭幕之后的第二天),晚7时15分。

地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圆柱大厅。

议程:

1. 选举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国代表王明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2. 选举书记处成员和候补委员;

3. 林格关于波兰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为审查纲领全文,成立

① 毛泽东同志未参加此次代表大会,由于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实际作用,大会选举他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另外,基于同样原因,他还是1930—1940年《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编委之一。

② 大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的名单详见《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35年第23—24期合刊,第159—160页;《真理报》,1935年8月29日。

③ 据1935年8月22日《真理报》整理。

了专门委员会；

4. 其余问题交执行委员会办理。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

时间：1936年3月11日。

地点：莫斯科。

会议内容：审查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洛佐夫斯基提交的提纲和报告。

决议：《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的总结和红色工会国际的任务》^①。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时间：1936年3月23日至4月1日。

地点：莫斯科。

会议内容：讨论反战和反法西斯斗争问题。

决议：已知有《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②。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③会议

时间：1937年8月10日。

地点：莫斯科。

① 详见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72年第8期第22—26页。决议译文见本文献资料集第2辑第459—465页。

② 详见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69年第2期第3—11页。译文见本资料集第2辑第466—476页。

③ 书记处后来又就中国问题开过多次会议，但目前尚无确凿可靠的材料。据前引荷兰卡汉第56号、第53号、第55号表，只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书记处的成员有9人（无中国代表），候补委员2人，王明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的执行委员会40名委员中有3名中国代表：周恩来、毛泽东，王明，候补委员25名，其中有中国的康生、博古。另外，王明是这时期的主席团委员，康生是候补委员。

参加者：书记处成员。

中国代表：王明，王稼祥，邓发。^①

会议内容：讨论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王明在会上发了言，季米特洛夫也谈了中国形势，提出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建议。^②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时间：1943年5月15日。

地点：莫斯科。

参加者：（共12人）：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日丹诺夫（苏联），科拉罗夫（保加利亚），科普列宁（奥地利），库西宁（芬兰），曼努伊尔斯基（苏联），马蒂（意大利），皮克（德国），多列士（法国），弗洛林（德国），艾尔科里（意大利）。

决定：会议把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正式向各党提出，专门发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③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时间：1943年6月8日至9日。

地点：莫斯科。

会议内容：审查自1943年5月15日提议发出后各支部所作出的决定并发表公告。

决定：发布了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09页。

② 王明写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和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也反映了季米特洛夫的建议。

③ 此次会议资料据《共产国际》杂志1943年第5—6期合刊和1942年5月16日《真理报》整理。

团公告》。^①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① 此次会议资料据 1943 年 6 月 10 日《真理报》整理。

共产国际会议一览表

| | |
|------------------------|----------------------|
| 国际协商会议 | 1918. 1. 24. |
| 旅俄外国人国际主义者会议 | 1918. 3. 14. |
| 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 | 1918. 11. 4. —12. |
| 俄共(布)中央会议呼吁成立共产国际 | 1918. 12. 24. |
| 国际协商会议 | 1919. 1. (中旬) |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 | 1919. 3. 1. |
|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 1919. 3. 2. —6. |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 1920. 7. 19. —8. 6. |
| 东方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 | 1920. 9. 1. —7. |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 1921. 6. 22. —7. 12. |
| 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 1922. 1. 21. —2. 2. |
| 远东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 | 1922. 1. 22. —31. |
| 远东革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 | 1922. 1. 30. —2. 1.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会 | 1922. 2. 21. —3. 4. |
| 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三个国际执委会联席会) | 1922. 4. 2. —5.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 | 1922. 6. 7. —11. |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 1922. 11. 5. —12. 5. |
| 巴库国际反战大会 | 1922. 12. 10. —15. |
| 埃森会议 | 1923. 1. 6. —7. |
| 法兰克福会议 | 1923. 3. 17. —20.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 | 1923. 6. 12. —23.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 1923. 11. 25. —28.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 1924. 6. 12.
-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4. 6. 17. —7. 8.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四次扩大全会 1924. 7. 12. —13.
- 科隆国际共产党议员会议 1924. 10. 9.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 1925. 3. 21. —4. 6.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 1925. 4. —1926. 1.
- 布鲁塞尔国际共产党议员会议 1925. 11. 10. —13.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 1926. 2. 17. —3. 15.
- 妇女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6. 5. 29. —6. 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1926. 11. 22. —12. 16.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 1927. 5. 18. —30.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
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 1927. 9. 27.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 1928. 2. 9. —25.
-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8. 7. 17. —9. 1.
- 欧洲各国共产党反战日筹备会议 1929. 5. 16.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 1929. 7. 3. —19.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 1930. 2. 18. —28.
- 欧洲女共产党人会议 1930. 8.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 1931. 3. 26. —4. 11.
- 失业问题与失业者活动国际会议 1931. 8.
- 国际反帝斗争会议 1932. 3. 3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 1932. 8. 27. —9. 15.
- 关于反战反法西斯共同斗争问题的共产党会议 1933. 1. 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扩大全会 1933. 11. 28. —12. 12.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5. 7. 25. —8. 20.
-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
执行委员会全会 1935. 8. 21.

| | |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 | 1936. 3. 11.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 1936. 3. 23. —4. 1. |
| 国际共产主义者反法西斯统一行动会议 | 1937. 4. 21.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 | 1937. 8. 10.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 1943. 5. 15. |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 1943. 6. 8. —9. |

（摘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丛 书 后 记

19世纪70年代,当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解散时,马克思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同志:“不要担心,朋友,如果说现在的国际死亡了,那么再过几十年,新的国际将以更加相适应的精神复活起来。”^①历史很快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40年后,“一个真正革命和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诞生了”^②。

共产国际一诞生,就向全世界宣告:“如果说第一国际预见未来的发展,并指出了发展的道路,如果说第二国际聚集了并组织了千百万无产者,那末第三国际就是一个公开的群众性行动的国际,是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是一个创建事业的国际。”^③

共产国际的诞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将近1/4世纪的历史时期里,尽管有过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它继承和发展

① 季诺维也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季维尔:《共产国际的五年》,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5期,第248—249页。

②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③ 《共产国际宣言》,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第一国际和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的革命传统,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列宁曾指出:“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①

共产国际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它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蓬勃发展的产物,是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猖狂进攻的客观要求。

从成立到解散,共产国际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高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它统率过60多个共产党、400多万共产党人同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这是一支使帝国主义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革命无产阶级国际大军。一系列历史事件表明,共产国际不仅是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而且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因素,它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建立了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不同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支持和护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起和领导

^①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1页。

了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声援和推动了西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其中,支持、声援和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是共产国际的活动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共产国际的活动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各国共产党的联盟和统一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它统率全世界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同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以及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在中国革命持续高涨并继续向前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的革命运动成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关注的中心。因此,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中国和世界现代史以及马克思理论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共同的研究课题。离开它,不仅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很难解释清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降低这些学科的党性、科学性及其对人们的教育作用。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都对后来以至今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重大影响,是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因此,认真总结和吸取其经验教训,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包含着共产国际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过程中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相斗争的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要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更不能回避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是非功过的研究和评价。同时，只有准确地、全面地弄清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一步深刻地了解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国际条件和历史背景，我们才能全面地、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的科学联系，更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共产国际存在期间，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十分紧密。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中间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2年起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21年中，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大革命、北伐战争乃至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都曾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22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革命运动都做了很大的

帮助,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①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也妨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产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

综观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对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功过是非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应完全肯定。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这就是我们在评价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时所应坚持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由于共产国际成立后,其领导机构一直设在苏俄(苏联),其主要活动与联共(布)对外的革命指导交织在一起,所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实际上又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是一个新开辟的研究领域。认真总结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刻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涉及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重要革命人物生平研究等学科,无疑是一个重大课题。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又是一个“禁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禁区”逐渐被突破。上个世纪70

^①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毛泽东同志作详尽报告》,见《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学者李新研究员和黎澍研究员提出要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1980年,北京地区的部分学者在北京师范学院和北京大学召开过两次有关学术座谈会。1982年,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研究员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起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首次学术研讨会。

此后,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届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党史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重要课题,无论是在资料的发掘还是研究的水平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推动了中共党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但由于当时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大力发掘、利用各种有关文献档案资料,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俄方保存的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编辑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后改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政策的俄文版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

为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

学界和广大读者,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完成修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任务,1995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传华副主任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签订协议,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组织有关专家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在中国出版。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翻译了这套文件集,并聘请中外著名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这些文献资料选辑与上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43),陆续在我国出版。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由来。

为了保证翻译质量,这套丛书的译文采取双校制:即由高水平的翻译家把俄文档案文件译成中文后,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宋洪训译审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马贵凡译审先进行文字审校,确保译文符合俄文原意。随后,由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和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进行学术审校,确保译文中的人名、地名和事件名称符合当时的称谓。从1995年开始到2007年为止,这套丛书已经编译出版1920—1937年间的有关珍贵档案资料17卷,收入档案文献一千多件,共800多万字。

这套很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丛书的陆续公开出版,促进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许多重大问题的

研究,把有关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随着丛书的出版,一批有价值的论著在我国相继问世。这些论著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的总战略到具体政策和策略的实施;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政策的得失到具体政策和策略的实施;从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到其驻华代表之间的矛盾等等——研究的范围包含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方方面面。广大史学工作者根据新的史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的研究课题,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新见解。

从2007年至今,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在译者、编者的共同努力下,这套丛书的最后4卷,约200万字,也已完成编译工作,其中收入首次译成中文的1937—1943年间的有关档案资料300件。在这套丛书的最后一部分即将付梓之际,回顾从1995年以来长达14年的编译历程,我要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历届领导和有关部门,衷心感谢这套丛书的各位译者、编者和审校人员,衷心感谢关心、帮助、支持过这套丛书编译、出版工作的所有同志。我还要特别感谢这套丛书的九位学术指导:李新研究员、廖盖隆研究员、向青教授、杨云若教授、刘桂生教授、张注洪教授、宋洪训译审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格里戈里耶夫教授、舍维廖夫高级研究员。但令人万分难过的是,他们当中的李新老师、廖盖隆老师、向青

老师和俄国好友舍维廖夫博士还没有看到这套书出齐就离开了我们。

历尽艰辛,《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21卷终于于2009年6月完成了全部编译工作。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丛书。我深信它的问世,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不同的军事、政治团体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深化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黄修荣

2012年2月

于京北宝盛里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一、中共对苏德条约和苏德战争的态度与评价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日）毛泽东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1941年7月7日）

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1941年7月18日）

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苏德战争第六周战局及中国国内形势（1941年8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

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苏德战争形势和反对亲日派反苏反共阴谋（1941年8月26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0月12日）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1942年11月6日）

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1943年2月21日）毛泽东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群众工作

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节译）（1938年5月1日）
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1938年8月16日—23日）
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为纪念国际青年日向各级青救会发出的号召（1938年8月25日）
中国青年爱国者（1938年9月6日）B·罗戈夫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世界青年和平大会运动基本任务的决议（节录）（1938年10月10日）
季米特洛夫就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关系致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信（1938年10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节译）——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1周年（1938年11月7日）
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节译）（1939年5月1日）
为保卫祖国而斗争的中国妇女（1939年3月8日）冀玲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青年共产国际成立二十周年的宣言（节录）（1939年11月）
共产国际五一节宣言（1940年5月1日）
中国的青年爱国者（1940年9月1日）李锡声
美国青年代表大会致全世界青年书（节录）（1941年7月6日—9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青年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决议（节录）（1940年11月1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书记处关于解散青年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6月1日）
中国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拥护世界和平大会通电（1938年2月20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队部致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贺简（1938年8月13日）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致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电（1938年8月15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致世界青年大会贺电（1938年8

月16日)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致世界青年大会函(1938年8月)

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关于国际青年日宣传大纲(1938年8月25日)

延安青年纪念国际青年日大会宣言(1938年9月1日)
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任务——冯文彬在边区青年代表大会的报告大纲(节录)(1938年10月3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1939年2月20日)

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1939年3月3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1939年4月12日)

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1939年11月1日)

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部的指示(1940年2月1日)

中央关于“五一”工作的指示(1940年4月16日)

中央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1940年6月7日)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关于纪念国际青年节的通知(1941年8月1日)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筹备会致世界青年团体书(1941年11月27日)

延安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告世界各国青年书(1942年1月6日)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的建设和延安整风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问题的决议(节录)(1940年3月11日)

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年8月25日）
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
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
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0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940年10月20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指示（1940年10月26日）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
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1942年1月26日）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
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1942年2月11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节录）（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节录）（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
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导言
第一章 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人政党而斗争（一八八三至一九一一年时期）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成。党内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与孟什维克派组织的出现（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时期）
第三章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时期）

第四章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成为独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时期）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时期）

第六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俄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时期）

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实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初的时期）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时期）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时期）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时期）

第十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时期）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而斗争和新宪法之施行（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时期）

四、共产国际的解散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

共产国际结束声明（1943年6月9日）

论共产国际底解散（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1943年6月27日《解放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

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1943年7月5日）王稼祥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1943年）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
共产国际会议简介
共产国际会议一览表
丛书后记
封底